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 :第9版/(美)

奈(Nye,J.S.),(加)韦尔奇(Welch,D.A)著;张小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9th edition

ISBN 978-7-208-10942-1

I. ①理… II. ① 奈…②韦…③张… III. ①国际关系 - 研究 IV. ①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6079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

(第九版)

[美]小约瑟夫·奈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 著

张小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720X1000 1/16 印张26.75 插页4 字数389,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942-1/D·2136

定价52.00元

序

约瑟夫·S·奈在共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美国对外政策、核武器控制以及国际伦理等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和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贡献。他因为提出和阐述"软权力"概念,而在大众媒体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软权力"一词被很多可能并不知道此概念发明者的评论家们所使用。

奈教授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教育家,在政界和学界都卓有成就。在1977—1979年间,他担任负责安全援助、科学和技术的副国务卿帮办,并领

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核不扩散小组。他把自己有关世界政治中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之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对核扩散问题的敏锐理解,带到上述工作岗位中。他在1994—1995年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期间,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学专门知识,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制度化的美日关系,有助于缓解那个时代有害的贸易冲突。奈教授在上述两个从政时期,都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杰出贡献奖章,这表明政治学(至少是大师所掌握的政治学)可以为现实的政策世界提供洞见。读过他在《外交》杂志以及其他地方发表的观点锐利的时政评论文章的人,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一判断。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是一本篇幅不长的世界政治教科书,而不是一部学术原创著作、一份政策备忘录,或者一篇社论文章。具有原创性的学者们在讨论世界政治的重要问题时,往往显得学究气十足,而决策人的言论则常常令人琢磨不透,或者充满陈词滥调。奈教授并非如此。读者会发现手中的这本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约瑟夫·奈运用丰富的文献来表达清晰的观点,而非堆砌大量的材料让读者望而生畏。阅读奈的世界政治著述,如同观看乔·狄马乔(Joe DiMaggio)打棒球或者马友友(Yo—Yo Ma)演奏大提琴:他把复杂东西变得简单。

评估以上陈述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这本书。你将了解界定清晰的概念和表述清楚的观点,以及运用这些概念和观点的限定条件,它们都和有关真实事件的讨论结合起来,说明为什么这些概念与观点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关联。在大约300多页的篇幅中,奈谈论的问题十分广泛,从古典均势到冷战,从干涉到全球化与信息革命。奈的论述很简短,从而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空间。我希望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不是相信自己"学到全部",而是从中获得启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幸运的是,《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为学生们提供了可借以探索世界政治中引人入胜现象的途径。

因为乔·奈和我是交往40年的好朋友,并且在几乎同样长的时间里合写过一些著述,所以读者可能认为这些赞美之词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我今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就使用《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这本书。或许有人以为,这些学生在把奈教授的这部书和其他很多阐述各种观点的读物一起进行阅读的时候,会瞧不起这本主要作为本科生读物的教材。然而,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这本书对他们非常有用,而且他们也赞扬奈教授简明扼要的行文风格。一位学生这样写道:"在我们所阅读的每一个章节中,似乎都找不到一个多余的句子。"我敢说《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一书,在一门阅读材料同样包含学术原创著述和政策辩论文献的课程中,非常适合作为一本核心主题教材。

斯坦利·霍夫曼教授在该书第六版的序言中,称该书为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因为奈教授能够"看到一个问题的多个方面和一个事件可能引发的多种解释",并且能够"把人文精神、通情达理、谨慎周到和诚实正直完美地集于一身"。我们能够从该书中所学到的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关于世界政治本身的,也包括如何思考世界政治的方式——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敏锐地意识到世界政治对于全世界数十亿人生活的重要性。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罗伯特·O·基欧汉

前　言

最近一些年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招致很多批评,这是因为学术理论和真实世界的政治与政策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决策者(以及学人）抱怨那些充斥着专业术语的教科书在变得越来越厚的同时,却也变得越来越空洞无物。难道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真的无助于我们理解,像亚洲的复兴、阿拉伯世界的觉醒、网络空间冲突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日益增强等诸如此类的重要变革,到底将带来全球合作,还是导致全球冲突吗?

理论在实践中总是被加以使用。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至少需要简单的因果观念,以及简化(simplify）、诠释(interpret）现实的手段。假如有人让你描述自己在过去1个小时里所遇到的事情,那么你只能进行简化,或者再现60分钟的细节。如果有人要你去做某件事,那么你就需要想想什么样的行为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对实践有用,而在于什么样的理论以及它在什么场合下对实践有用。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每天都在使用理论。即便是那些有意识地使用理论的人,也常常对于自己所必须运用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局限性知之甚少或者毫无所知。大部分实际工作者似乎都回避学术理论,很多学者也瞧不起实际工作,并且使用只有其他学者能明白的语言来著书立

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最近列出25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其中仅有4人担任过高级政策职位:两人在美国政府当官,另外两人在联合国任职。《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一书旨在为这条鸿沟搭建一座桥梁。它源于奈在哈佛大学教的一门导论性的核心课程,他教这门课已经有十多年了。它也得益于奈在华盛顿三个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中担任助理部长级决策人的5年经历。他在政界中发现,理论和实践可以相互促进。本书旨在让学生在转向冷战后比较流行的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方法之前,先掌握好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以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我们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晦涩难懂的概念,这样学生们就可以理解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方法了。

在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21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这类冲突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制度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吗?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呢?没有一位好老师可以准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主要来自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帮助他们在今后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本书的宗旨。

这个版本新增加的内容

这是一部教科书的第九版,该书前七版的书名为《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在编写第八版的时候,我邀请我的朋友(也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作为合著者,我们借此机会把书名改成《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我们这么做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加上"合作"这个词,是想更清楚地说明,冲突与合作实际上为同一个问题(即解决争端)的两个方面。在世界政治中,争端既可能是因为诸如技术标准或者知识产权之类的普通问题而产生,也可能是源于像领土纠纷这类引起情感冲动的问题。争端的原因可能相对比较

简单,比方说如何保护鲸鱼,也可能相当复杂,比方说如何平衡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与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诉求。决策人、专家和教授更加关注冲突(而不是合作),因为冲突总是有可能失控。其结果是,我们常常看不到一个事实,即世界上大多数争端实际上是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的。我们有时也不能注意到,寻找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的合作方式,其难度不亚于避免战争,甚至前者比后者更难。我们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新材料,以便更清晰地说明冲突与合作的复杂关系。第二,我们把"国际"改为"全球",是想突出一个事实,即在21世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它们不仅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众多的行为体。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是"全球"的一部分。尽管以国际视角看世界依然很重要,也很有用,但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往往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研究世界政治的学人通常关注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在20世纪上半叶是有意义的,那时主权国家打了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在冷战时期也是有意义的,当时的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毁灭对方好几次,而且预警时间只有大约30分钟。今天,国家之间的冲突依然还是个重要问题,但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过去更严峻。当今的国内冲突比国际冲突更普遍,而且几乎总是带来国际影响。由于现代通信的速度与强度,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增多,以及经济和其他利益的全球化,这类冲突有可能影响到各个地方的人。我们越来越难以区分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当地问题与区域或全球问题。

读者对本书第八版的反映很积极,当然它也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本书第九版的编写建立在第八版的成功基础之上。我们仔细修订这本教材,参考来自评论人非常有益的反馈信息,使文字表达更精炼、深刻和清晰。这个版本各章中的变动内容如下:

第一章在文字、插图以及表格上都有所改进,以便更清楚地介绍本书的目的与主题,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们关注从古至今世界政治中的延续性与变迁性。

第二章扩展了有关建构主义和反事实推理的讨论,并且改进了历史图表。

第三章有关均势的讨论比之前的版本都更详尽,并且增加了一节论述均势理论。有关19世纪均势的论述也有所改进,使之拥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材料,结构也更为清楚。

第五章有关威慑和遏制的内容是重新写的,表述也更为清晰。有关冷战起源的论述被加以重新调整,以增强其逻辑性,并按时间顺序进行表

述。有关越南战争的讨论,与遏制概念以及世界事务中的道义判断问题结合得更好一些。

第六章加强了有关集体安全、维持和平(peace keeping) 以及建设和平(peace building) 的讨论；根据最近在利比亚所发生的事件改写有关"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的论述；通过增加内容更丰富的历史图表以及更新材料,使有关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讨论之表述更流畅；新增加一节有关南中国海这一潜在的当今热点的内容。

第七章使过去版本中有关石油政治的论述更加清晰一些,特别是有关各国针对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政策的反应的内容。这一章也把石油政策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问题结合得更好。

第八章通过论述2011年发生在北非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革命,进一步深入分析信息技术领域的变革,特别是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的兴起,如何增加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或者限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该章也讨论本·拉登之死的重要性,以及拉登死后美国与巴基斯坦紧张关系对跨国反恐战争的影响。

第九章反思日本"3·11"大地震与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核危机对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比分别修改各章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在书中更细致地描绘出一幅全球变革的图景。为此,我们更详尽地介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清晰地阐述与界定关键概念,尽可能地使有关历史问题的讨论之表述变得更为流畅一些,以免学生们陷于不必要的细枝末节之中,并且对术语解释部分也作了扩展与改进。

国际关系教科书时间性很强,于是推出新版本的一个主要目的自然就是更新内容,不仅仅是更新事实与数据,也是增加新事件与新分析。在编写完第八版后的两年之中,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假如过去要我们进行预测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把北非与中东地区发生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革命视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变革,这些事件尚在进行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俗的大众民主革命事件,是发生在传统威权政治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而且谁也没有预料到它们会发生。我们以一个近距离的视角,尽力对此进行分析。世界政治中其他重大事件还有另外两个。其一,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摧毁日本东北地区的"3,11"大地震与海啸,它还引发了自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后世界上最严重的民用核反应堆危机,即福岛核危机。其二,是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安全住所内击毙奥萨马·本·拉登,它给反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斗争以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都造成了重大影响,

而这两者对于那个世界上重要地区的局势稳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直努力帮助学生们理解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事件,总是努力通过我们的论述,鼓励学生们对世界事务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并且把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

与之前的8个版本一样,本书的主题是从理论与历史相互结合的角度来解释世界事务,这依然是第九版的支柱。这本教科书本身就是一个如何思考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范例。读者不能出于获取完整的事实描述的目的来阅读本书,而应该注意本书如何把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这是一个起点。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那些主张只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和隐藏着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孤立和沉迷于抽象概念的迷津之中,把自己头脑中的构想当作现实。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

本书可以为一门导论性课程的教学和读者自学这类课程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另外,它也可以作为一本辅助性教材,提供一种思考这一主题的方法。每一章都列有研究问题以便给辅导员和学生提供向导,同时也加入一些"后续的"阅读材料,供那些可能想更深入地探讨问题的学生们选用。同时,它也包含作者详尽讨论过的历史事件年表,以及一些很有用处的地图、图表、表格等等。

虽然一些教科书忽视伦理(ethics) 问题,但是关于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应当如何行为的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ies) 与分析性理论(analytic theories) 一样重要。伦理问题在本书的各章都有所论及,特别是在第一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得到了阐述。同样地,某些教科书只关注硬的军事和经济权力。我们通过引入有关软权力的讨论,而增加对权力的理解。软权力概念指的是吸引和说服他人的能力,它不同于惩罚和收买别人的能力。软权力在信息时代日益重要,美国对外政策也越来越需要软权力。软权力概念在第二章中得到集中阐述,但实际上它贯穿于全书之中,并且在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有关信息、全球化和治理(governance) 的讨论中得到进一步论述。我们区分了古典均势和"复合式相互依存"之间的不同,前者存在于国家间冲突世界中,而后者则是罗伯特·基欧汉与奈一起提出的概念。

我们希望第九版比第八版更易于为读者所接受。作为一部多年来一直在修订的著作,我们希望它还将继续得以发展与完善。事实上,我们很快就得开始考虑编著第十版。毫无疑问,从今开始的世界头条新闻将给我们所拥有的特别磨盘,即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提供更多待磨的谷物。

本书的特色

本书作为一个理论与历史对话的范例,可以为一门导论性课程的教学和读者自学这类课程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另外,它也可以作为一门课程的辅助性教材,提供一种思考这一主题的方法。本书每一章都列有研究问题,以便给辅导员和学生提供向导。同时,它也包含作者详尽讨论过的历史事件年表。这个新版本有两个特色。其一,"后续的"阅读材料被刻意放在每个重要的部分之后,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们去阅读那些具有历史意义以及(或者) 开拓性的著作,以便他们积极地去探索自己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其二,反思本书作者奈自己在政界与学界的经历,以此说明同样重视理论与历史的重要意义。

致 谢

这本书的编写基于哈佛大学的一门名为"历史研究类A-12:当代世界中的国际冲突"的课程。在过去的岁月里,奈有时与一些年轻的同事一起上这门课,他们是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 、邝云峰(Yuen Khong)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 以及M.J.彼得森(M.J. Peterson) 。同时他也得到一些极其能干的领衔助教(Head Teaching Fellows) 的帮助,他们是文·奥格(Vin Auger) 、彼得·费沃(Peter Feaver) 、梅里尔·凯斯勒(Meryl Kessler) 、肖恩·林恩-球斯(SeanLyn-Jones) 、帕姆·梅茨(Pam Metz) 、约翰·欧文(John Owen) 、吉登·罗斯(Gideon Rose) 以及戈登·西尔弗斯坦(Gordon Silverstein) 。他们都是灵感与创见的来源,其某些思想无疑已经偷偷

地闯入本书文字之中。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的影响也确实是这样的,前者教过我们俩人,而后者作为一位极富学术创造力以及慷慨大度的人,对本书编写的影响之大是别人难以想象到的。他们二人都仔细阅读过这本教材,并且提出过中肯的评论。

其他评论过全部或部分书稿并提供建设性反馈意见的人还有:劳伦斯·亚伯拉罕(Lawrence Abraham) 、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 、 以撒·阿尔卡提布(Ihsan Alkatib) 、本特利·艾伦(Bentley Allan) 、克里斯蒂娜·巴德斯库(Cristina Badescu) 、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 、 斯蒂芬·伯恩斯坦(Steven Bernstein) 、戴维·德斯勒(David Dessler) 、 琼·托伊费尔·德雷尔(June Teufel Dreyer) 、科林·杜克(Colin Dueck) 、彼得·费沃(Peter Feaver) 、尼科·福莱纳(Nicole Freiner) 、卡蒂·斯特罗迈尔·戈尔登(Kathie Stromile Golden) 、克利福德.格里芬 (Clifford Griffin) 、沃尔特·哈奇(Walter Hatch) 、马修·霍夫曼(Matthew Hoffmann) 、克里斯托弗·豪斯尼克(Christopher Housenick) 、内森·詹森(Nathan Jensen) 、凯勒奇·卡鲁(Kelechi Kalu)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 、伊丽莎白·拉鲁斯(Elizabeth Larus) 、霍华德·雷曼(Howard Lehman) 、詹姆斯·曼尼科姆(James Manicom) 、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 、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 、理查德·梅兰森(Richard A.Melanson) 、爱德华·米哈卡宁(Edward S.Mihalkanin) 、卡尔帕那·米斯拉(Kalpana Misra) 、中里宽(Hiroshi Nakazato) 、道格拉斯·纳尔逊(J.Douglas Nelson) 、卡拉·诺洛夫(Carla Norrlöf) 、黛安娜·保罗(Diane Paul) 、文森特·帕利奥特(Vincent Pouliot) 、马克·雷蒙德(Mark Raymond) 、丹·赖特(Dan Reiter) 、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 、乔治· 香博(George Shambaugh) 、阿伯雷亚·塞纳(Aboulaye Saine) 、白鸟润一郎(Junichiro Shiratori) 、巴里·斯坦(Barry Stein) 、詹尼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 、杰弗里·托格曼(Jeffrey Togman) 、西奥多·瓦斯塔尔 (Theodore Vastal)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约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梅丽萨·威廉斯(Melissa Williams) 。这本书的编写还 得到以下专业研究助理的帮助:马赛尔·迪奇(Marcel Dietsch) 、扎卡 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 、马特·科胡特(Matt Kohut) 、吉娜· 默吉德(Jenna Meguid) 、肖恩·米斯科(Sean Misko) 、卡尔·纳金(Karl Nagin) 、丹·菲尔波特(Dan Philpott) 、尼尔·罗森道夫(Neal Rosendorf) 、亚利克斯·斯卡柯(Alex Scacco) 以及理查德·伍德(Richard Wood) 。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

Ninth Edition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ISBN 978-0-205-85163-8)

Joseph S. Nye, Jr. and David A, Welch

Copyright © 2013, 2011,2009 by Joseph S.Nye,Jr. and David A. Welc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and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ongman, a Pearson Education Company.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u) .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封面贴有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东方编译所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美]小约瑟夫·奈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著	张小明译	52.00 元
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美]斯科特·巴雷特著	黄智虎译	36.00 元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	信强译	32.00 元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美]玛莎·芬尼莫尔著	袁正清译	25.00 元
国家与市场(第二版)	[美]苏珊·斯特兰奇著	杨宇光等译	38.00 元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	[美]邹谠著	王宁、周先进译	59.00元
霸权之后(增订版)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	苏长和译	42.00 元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	[美]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	秦亚青、魏玲、刘伟华、王振玲译	42.00 元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	杨宇光等译	52.00 元
长和平——冷战史考察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	潘亚玲译	46.00 元
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美]海伦·米尔纳著	曲博译	38.00 元
民主国家的承诺:立法部门与国际合作	[美]莉萨·L·马丁著	刘宏松译	30.00 元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美]肯尼思·J·奥耶编	田野、辛平译	32.00 元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	[美]本杰明·J·科恩著	杨毅、钟飞腾译	30.00元
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	[美]卡伦·明斯特著	潘忠岐译	58.00元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等著	王传兴译	55.00元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	[美]小约瑟夫·奈著	张小明译	38.00元
干涉的目的	[美]玛莎·芬尼莫尔著	袁正清等译	22.00元
战争与国家形成	[美]许田波著	徐进译	35.00元
驯服美国权力	[美]斯蒂芬· M·沃	郭盛等译	28.00元

	尔特著		
国际政治理论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	信强译	32.00元
系统效应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	李少军等译	40.00元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	王义桅等译	46.00元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	秦亚青译	45.00元
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	[英]克里斯托弗·希尔著	唐小松等译	36.00元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	[美]奥兰·扬著	陈玉刚等译	25.00元
大棋局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23.00 元
美国和诸大国	[英]巴里·布赞著	刘永涛译	25.00元
战争的原因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	何曜译	30.00元
国际制度	[美]莉萨·马丁等编	黄仁伟等译	50.00元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	秦亚青等译	48.00元
全球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	杨宇光等译	36.00元
帝国的悲哀	[美]查默斯·约翰逊著	任晓等译	24.00元
美国的致命弱点	[美]理查德·福肯瑞斯等著	许嘉等译	22.00 元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伊多·奥伦著	唐小松等译	20.00 元
建构安全共同体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 著	王正毅等译	25.00 元
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查尔斯·库普乾著	潘忠岐译	28.00 元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著	冯绍雷等译	28.00 元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	杨宇光等译	22.00 元
国家的性格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著	张智仁译	20.80 元

世纪之旅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	胡利平等译	22.00 元
预防性防御	[美]艾什顿·卡特著	胡利平等译	14.00 元

以上图书均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购买到。

邮购地址:上海市绍兴路54号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编:200020
联系电话:021—64313303

邮购方法:在定价的基础上加收15%的挂号邮寄费,量大者(请先致电联系）可免邮寄费。

欲了解更多相关图书,请浏览上海人民出版社网页:www.spph.com.cn。



纪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丧生的雅典人的大理石浮雕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永久的冲突与合作逻辑吗?

世界正在变小。"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用了3个月的时间。1924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 驾机飞越大西洋花了33个小时。50年之后,协和式飞机飞越大西洋需要3个小时。弹道导弹穿越大西洋只需要30分钟。在21世纪初,跨越大西洋的航班飞行费用只及1950年的三分之一,从纽约打电话到伦敦的费用只是20世纪中叶的很小一部分。全球互联网通讯几乎是在瞬间进行的,而且其费用微乎其微。今天,一位亚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或非洲的人权活动家,拥有了过去只有政府或跨国公司那样的庞大组织才享有的通讯权力。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核武器的问世给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内涵,即一个作家所说的"双重死亡":不仅是个人丧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整个人类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的事件说明,技术已经使得非国家行为体手中拥有了毁灭性的权力,而过去只有政府才拥有这样的权力。随着距离效应的减少,像阿富汗这样遥远和贫困的国家的状况,突然变得同美洲与欧洲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南战争纪念墙上美国阵亡者名字

然而,古往今来,国际政治中的某些东西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描述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距今已有2500多年,但是它同1947年开始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距今将近2000年前,抱怨罗马与印度(互利)贸易不平衡时所用的语言,同今天美国国会抱怨美国与中国(互利)贸易不平衡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千百年来,冲突与合作的基本逻辑令人惊奇地一成不变,尽管冲突与合作的形式以及导致冲突与合作的问题是变化不定的(比如古代人从不需要担心核武器、艾滋病或者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世界是一个由延续性和变迁性所组成的奇特的混合体。

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之任务在于借鉴历史以理解延续性与变迁性,他们不应为过去所束缚。我们必须学习传统的理论,并把它们运用于当前的环境之中。本书的前面几章将阐述历史和理论问题,以便为后面几章将要讨论的信息革命、全球化、相互依存和跨国行为体等现象提供背景材料。

> 本人在政府中的经历,使得我对于世界政治中的老问题与新问题都不会采取轻视态度。
>
> ——小约瑟夫·奈

如果独立国家消亡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但是,世界政府并不会很快就产生。像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恐怖集团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虽然对政府构成了新的挑战,但是并不能取代国家。目前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民族主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变得日益强烈起来。在新的世纪里,国家的数量不会减少,而且很可能还会增加。世界政府并不能自动解决战争问题,因为今天的绝大多数战争属于内战或者族群(ethnic)战争。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的20年里,世界上有75个地方发生了220次武装冲突。其中只有9次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24次有外国干涉的内战。[1] 事实上,19世纪最血腥的战争不是发生在欧洲交战国之间,而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美国的内战。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将生活在由竞争的团体以及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之中,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未来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什么是国际政治?

在世界上并非一直都存在着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从古至今,国际政治有三种基本形式。在 世界帝国体系**(world imperial system)** 中,有一个政府主导着与它交往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行为。在西方世界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帝国。16世纪的西班牙和17世纪末的法国试图获得类似的主导权,但是没有成功。19世纪,英帝国的势力遍及全球,但是即便这样,它还必须同其他大国一道,共同主导世界。古代的世界帝国,比如苏美尔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实际上只是地区性的帝国而已。这些帝国的君主认为自己统治了全世界,事实上,它们只是因为交通阻隔,才避免了同其他帝国发生冲突。它们同帝国周边蛮族的战争,与大致平等的国家间的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国际政治的第二种基本形式是 封建体系**(feudal system)** 。在该体系里,个人的效忠对象和政治义务主要不是由领土边界所决定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封建主义在西方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个人除了要效忠本地的封建主外,还可能对离自己较远的一些贵族或主教以及罗马教皇负有义务。政治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上级的命运。如果君主结婚了,那么一个地方及其居民的义务可能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而发生变化。一位法国城镇居民很可能突然间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佛兰芒人或英国人。城市或者城市同盟有时具有一种很特别的半独立地位。伴随封建体系而来的疯狂的战争,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modern) 领土战争是不同的。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领土之内,也可能是跨越领土界线的,并且与上述那些错综复杂的、与领土无关的效忠和冲突密不可分。

国际政治的第三种形式是 无政府的国家体系**(anarchic system of states)** 。它由相对具有内聚力的国家组成,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凌驾于这些国家之上。这样的例子包括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和15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 时代的意大利。另一类无政府国家体系是王朝领土国家,其内聚力来源于一个统治家族的控制。我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或者中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大的领土王朝于1500年左右在欧洲出现,而与此同时城邦国家或松散的地区同盟开始消亡。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终结,这场战争有时被人们称为最后一次宗教战争和第一次现代战争。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和约使得领土主权国家成为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的主要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体系,通常是指领土主权国家体系(简单地说,

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且我们把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定义为缺少一个共同主权者的政治,即在各行为体之上没有统治者的政治。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体系。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把这样的无政府体系称为"自然状态"。在某些人看来, 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所描述的景象就如同一群奶牛在农场里安然地吃草。然而,这并非霍布斯的本意。我们应该想想在美国开拓西部边疆的年代里一个没有警察的得克萨斯小镇,或者20世纪70年代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状况下的黎巴嫩,或者20世纪90年代的索马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不友善,它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正如霍布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所说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是艰难的、野蛮的和短命的。

由于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存在着法律、政治和社会上的重大区别。国内法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并且前后一致。警察和法院充当执法者。而国际法则不然,它是分散的、不完整的,建立在有时比较模糊的基础之上,也不存在日常的执法机制。在世界上缺少一支全球性的警察力量,国际法院/法庭虽然存在,但是它们却拿那些无视国际法的主权国家没有什么办法。

武力(force）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等级森严的国内政治体系中,政府垄断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而在国际政治中,谁都不能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力。这是由于国际政治属于自助的范畴,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强大,因此总是存在着某些国家诉诸武力的危险。由于不能在国际政治中禁止使用武力,所以国家间通常存在着互不信任和猜疑。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还在于各自的共同体观念不同。在秩序井然的国内社会里,有一个普遍的共同体观念,并且因此产生了共有的效忠对象、正义标准以及合法权威的观念。在全球层面上,人们有着相互竞争的效忠对象,全球共同体的观念是很弱的,人们对正义和合法性问题经常具有不同的认识。其结果是,在秩序和正义这两个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大多数人总是把国家愿望摆在国际正义的前面。法律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共同体规范的观念,它们不像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具有约束力。

某些人猜测,上述三个基本的体系,即世界帝国体系、封建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21世纪可能会逐步演变出一种新的封建主义,甚至出现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考察这些问题。

关于无政府政治的不同观点

从主权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政府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但在政治哲学上,人们对于自然状态的危害性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霍布斯生活在17世纪饱经内战之苦的英国,他强调不安全、武力与生存,认为人类总是处于战争状态。与霍布斯相隔大约半个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生活在比较稳定的英国。他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中缺少一个公认的主权者,但人民仍然可以发展相互间的关系和订立契约,于是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是和平的障碍。这两种有关自然状态的观点,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两个思想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的哲学源头。 现实主义**(realism）** 是比较悲观的,而 自由主义**(liberalism）** 则是比较乐观的。

几个世纪以来, 现实主义 在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战争和使用武力的问题,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actor）是国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著述和政策主张,代表着现代美国人的现实主义观念。有关无政府国家体系的假设是现实主义者思考问题的起点。比如,基辛格和尼克松力争最大限度地增强美国的实力和削弱其他国家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独立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贯穿于国际政治的始终。

另外一个传统被称为 自由主义 ,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Baronde Montesquieu）和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19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mham）、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之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而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则集中反映在作为政治学家和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著述与政策主张之中。

自由主义者认为,有一个全球社会与国家并存,且与国家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是制约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外部环境。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比如学生在外国就学）以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比如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自由主义者批评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成一些坚硬的台球,相互撞击以实现均势。他们认为,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有着跨国界的交往,而且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过分夸大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差别。由于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只是很极端的情况,所以自由主义者声称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的产生与发展。

现实主义者引用霍布斯的话来反驳自由主义者:"暴风雨天气并不意味着雨下个不停,所以自然状态也不意味着战争是没完没了的。" [2] 如同伦敦人在4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带着雨伞一样,处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一支军队以防备战争。现实主义者指出,自由主义者过去的一些预测都是错误的。比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在1910年说过,未来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国家难以承受战争的代价。自由主义者声称,战争已经过时了,文明已经跨越了战争的阶段。人们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工会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以及资本的流动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当然,这样的预言在1914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现实主义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都没有停留在1914年。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会改变国际政治性质的自由主义观点开始复兴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国家可以通过领土征服或和平贸易这两种途径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以日本的经验为例来加以说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领土扩张,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了灾难;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贸易和投资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按照官方汇率统计)和东亚的主要大国。日本成功了,而它的军费开支却比其他主要大国要少得多,与其人口或经济规模不成比例。因此,罗斯克兰斯以及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 1910年:战争是看不见的吸血鬼
>
> 如果没有其他阻止战争的因素,那么战争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迟早会让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产生良知。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塔夫茨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未来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国家难以承受战争的代价他说,欧洲的战争债款高达260亿美元,"每个人都对看不见的吸血鬼欠债,任何国家都还不起这个债,可怜的民众每年因此要交纳9500万美元的税"。和平时期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负担,正在日益侵蚀那些已经不堪承受债务的主要国家的力量。大战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全面衰败。
>
> ——《纽约世界》 [3]

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眼光更远。他们认为,迅速发展的生态相互依存将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人类将步入无国界的世界。例如,大气层中的臭氧层遭到破坏会导致皮肤癌,危及每个人的生存。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地球变暖的话,那么所有国家的人都会受到影响。艾滋病和跨国毒品交易正迅速地蔓延等问题,可能使我们正步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认为,这些跨国性问题和价值将改变在过去400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跨国性力量正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人类将迎来新型的国际政治。

现实主义者则在1990年反驳说:"请把这些话讲给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听吧!"伊拉克入侵其小邻国科威特的行为表明,武力和战争是国家始终面临的威胁。自由主义者申辩说,中东政治只是个例外。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超越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些有关国际政治的性质及其是否变迁的不同观点,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调和。现实主义者强调延续性,而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变迁性。双方都断言自己的观点符合现实。自由主义者通常把现实主义者看作是愤世嫉俗的人,认为他们只关注过去,无视将来。而现实主义者则声称,自由主义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家,他们的思想是"一派胡言"(globaloney)。

到底谁对谁错呢?两者都对,也都错。直截了当的回答自然很好,但是它也很可能不太准确和不太令人满意。进入21世纪的世界既有延续性的方面,也有变迁性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简单易懂和包罗万象的答案。

分析国际政治的方法不仅限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很多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最早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理论,它后来得到其他理论家的进一步论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这种关注经济中的阶级、生产和财产关系的思想倾向,有时被称为经济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是经济的表现。他们预言,资本家的贪婪促使国际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遍及全球和资本家自身的消亡。马克思主义者轻视民族主义、国家权力以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缺乏对外交和均势重要性的关注,导致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解漏洞百出,并且对未来提出了错误的预测。甚至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马克思的理论就已经由于未能解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以及一些共产党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现象,而损害了其解释力。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很难解释1969年中国和苏联的冲突、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9年中国与越南的战争等现象。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在20世

纪60年代和70年代十分流行。它预言,处于全球市场"中心"地带的富裕国家将控制处于"边缘"地带的贫穷国家,前者使后者越来越贫困。依附理论家认为,第一世界(富裕、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分裂,或者南北分裂,是历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依附理论的确具有一些解释力,比如可以解释许多贫穷国家为什么未能享受正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种经济自由化成果。它也可以让人们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dual economy)这一有趣和重要的现象,即少数富裕、受教育的城市经济精英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化,而大多数贫穷的农民、劳工以及矿工则未能如此。虽然依附理论有助于阐释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某些结构性原因,但是它很难解释为什么东亚的边缘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和欧洲这样的"中心"地带国家还快。韩国和新加坡现在已经属于富裕的"发达"国家,而马来西亚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国家。依附理论的弱点得以显露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依附理论的学界旗手之一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90年代当选巴西总统后,转向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试图模仿微观经济学,创立规范的演绎性理论。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 新现实主义者**(neorealist)** 和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首的 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 ,创建了国家的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s of states),把国家视为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变得更为简明和优雅(simplicity and elegancy),与此同时,他们也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复杂的内涵。其结果是,"到了80年代后期,理论上的争论也许只能归纳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模式内部比较细微的分歧" [4] 。

最近,一群观点并不一致、被称为 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 的学者,批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未能对世界政治中的长期性变革加以充分解释。比方说,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结束,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建构主义者强调观念(ideas)和文化(culture)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强调利益的主观性以及利益与不断变化的认同之间的联系。建构主义者有多种类型,但是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两个主流理论远没有做到真实地描述世界,我们需要做的不只是解释事情是什么样的,还要解释事情是如何变成那样的。建构主义者一直关注诸如认同(identities)、规范(norms)、文化(culture)、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以及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等等这类重大问

题。[5] 他们相信,政治家和其他人的行为动机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也包括他们的认同感、道义观以及有关什么是社会或文化所认可的合适行为之认识。这些规范是在变化之中的,有时要经过与其他规范的互动过程。建构主义者认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指出存在着从善意、和平、友谊到严重敌视和竞争的多种无政府状态。特定时期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取决于主流的规范、认知以及信仰。正如著名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制造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对一件朝鲜核武器的担心程度大于对500件英国核武器的担心,以及为什么上个世纪两次交战的法国和德国今天不再认为两国可能爆发战争。[6]

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行为都是出于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无法说清楚这些利益是如何被塑造的,并且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建构主义者吸取不同学科的知识,考察领导人、民众以及文化改变偏好(preference)、产生认同(identities)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behavior)的过程。比如,19世纪的奴隶制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曾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后来却遭到普遍的谴责。建构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变化?观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战争行为今后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民族主权国家概念的命运又将怎样呢?在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政治实体,比如部族(tribes)、民族(nations)和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只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建构主义者指出,像民族和主权这些影响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以及理论建构的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永久不变的。甚至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也处于演进过程之中。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只是从防止国家之间的暴力或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安全问题。但在当今世界,"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这一相对较新的概念也同样很重要。不仅如此,很多现象已经被"安全化"(securitized)了,它们被视为政治上的严重威胁,需要以更多的措施加以应对。正如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论述的,今天学者和政治家所担忧的,除了国家间的战争之外,也包括贫困、不平等、经济或者生态灾难等问题。

女性主义建构主义者还指出,有关战争的语言与意象(imageries),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工具,深受性别的影响。 女性主义**(feminism)** 作为一种批判路径(critical approach)在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了很大影响力,当时正值传统安全关切在冷战结束后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明显的紧迫性。女性主义者关注社会进程、非精英问题以及跨国性结构,否定主流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狭隘视角,旨在对世界政治进行更具有包容性的研究,并且揭示"在全球层次上国家以及主要社会成员(key social constituencies)的身份和利益得以塑造的进程"[7]。女性主义者强调

了性别之间的差异。比如,在2011年,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23位女性总统、首相和总理。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分析了全球化的阴暗面,诸如妇女与儿童的"出口"或贩卖,以及把强奸当作战争的手段。

建构主义是一种方法(approach) ,它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传统理论以探索科学规律为目的之思路,而寻求依条件而定的通则(contingent generalizations) ,并且通常把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 当作解释的一种形式。当今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重大争论,是围绕着 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人权以及种族屠杀 等概念之含义而展开的,建构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比传统理论更有发言权。 [8]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理论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并且补充了这两种理论。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时显得不甚严谨和缺乏预见力,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两个主流理论经常忽视的东西。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论及的,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追求当前目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上,还必须思考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如何在有的时候导致国家政策发生微妙的变化,有时甚至导致国际事务发生深刻的变化。建构主义者帮助我们理解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判断是如何被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补充而非否定上述两种主流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以及最后一章中讨论如何理解长期变革的问题。

有的时候,那些务实的人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呢?我的回答是,理论相当于路线图,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些不熟悉的地方。如果没有路线图的话,那么我们会迷路。即便在我们觉得自己是依靠常识的时候,通常也有一个隐含的理论在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只不过是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而已。我们假如可以比较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指导我们行为的理论,那么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的长处与短处,以及知道在什么时候加以运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曾经说过,那些讲究实际的人认为自己从不使用理论而只注重实践,但其行为很可能受到一些拙劣的作者之思想的左右,而这些作者的名字早已被他们忘记了。 [9]

> 当我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助理部长级职务并帮助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思想中都汲取了养分。我发现它们对我都很有帮助,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环境中对我很有帮助。
>
> ——小约瑟夫·奈

基本概念

行为体(actor)、目标(goal)和手段(instrument)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但是每个概念都在变化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把国家视为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而且认为只有大国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多。1945年,世界上大约只有50个国家。到了21世纪初,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已经是这个数字的4倍,而且数量还在增加。比国家数量增多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今天,大型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跨越国家间边界,它们有的时候比很多民族国家掌握着更多的经济资源(表1.1)。至少有192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比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要大。[10] 虽然这些跨国公司缺少某些类型的权力(power),比如军队,但是它们绝对可以极大地影响一国的经济。从经济上说,IBM对比利时的重要性要大于比利时的前殖民地布隆迪。

表1.1 2010年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体

排名	国家(地区)或公司	PPP GDP(国家/地区)或收入(公司)(单位:百万美元)	排名	国家(地区)或公司	PPP GDP(国家/地区)或收入(公司)(单位:百万美元)
1	美国	14 657 800	12	韩国	1 459 246
2	中国	10 085 800	13	西班牙	1 368 642
3	日本	4 309 432	14	加拿大	1 330 272
4	印度	4 060 392	15	印度尼西亚	1 029 884
5	德国	2 940 434	16	土耳其	960 511
6	俄罗斯	2 222 957	17	澳大利亚	882 362
7	英国	2 172 768	18	中国台湾	821 781
8	巴西	2 172 058	19	伊朗	818 653
9	法国	2 145 487	20	波兰	721 319
10	意大利	1 773 547	21	荷兰	676 700
11	墨西哥	1 629 917	22	阿根廷	632 223

（续表）

排名	国家（地区）或公司	PPP GDP（国家/地区）或收入（公司）（单位：百万美元）	排名	国家（地区）或公司	PPP GDP（国家/地区）或收入（公司）（单位：百万美元）
23	沙特阿拉伯	619 826	56	丹麦	203 159
24	泰国	584 768	57	日本邮政株式会社	202 195
25	南非	524 341	58	哈萨克斯坦	193 261
26	埃及	498 176	59	匈牙利	188 403
27	巴基斯坦	464 711	60	中石化	187 518
28	哥伦比亚	429 866	61	阿联酋	186 908
29	马来西亚	412 302	62	芬兰	185 019
30	沃尔玛	408 214	63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184 496
31	比利时	392 862	64	安盛集团（AXA）	175 257
32	尼日利亚	374 323	65	爱尔兰	173 614
33	瑞典	352 327	66	中石油	165 496
34	菲律宾	350 279	67	雪佛龙	163 527
35	委内瑞拉	346 973	68	荷兰国际集团	163 204
36	奥地利	330 496	69	通用电气	156 779
37	瑞士	325 305	70	道达尔公司	155 887
38	希腊	322 555	71	摩洛哥	152 619
39	中国香港	322 486	72	美洲银行	150 450
40	乌克兰	302 679	73	卡塔尔	149 995
41	新加坡	291 712	74	大众汽车	146 205
42	皇家荷兰壳牌	285 129	75	康菲石油公司	139 515
43	埃克森美孚	284 650	76	科威特	138 099
44	越南	275 639	77	白俄罗斯	130 780
45	秘鲁	274 276	78	巴黎银行	130 708
46	捷克	260 566	79	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	126 012
47	智利	257 546	80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	125 999
48	孟加拉国	257 545	81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123 018
49	挪威	255 505	82	家乐福	121 452
50	阿尔及利亚	252 189	83	斯洛伐克	120 758
51	罗马尼亚	252 173	84	新西兰	119 791
52	英国石油公司	246 137	85	福特汽车	118 308
53	葡萄牙	245 860	86	意大利埃尼集团	117 235
54	以色列	218 490	87	摩根大通银行	115 632
55	丰田汽车	204 106	88	伊拉克	115 330

(续表)

排名	国家(地区)或公司	PPP GDP(国家/地区)或收入(公司)(单位:百万美元)	排名	国家(地区)或公司	PPP GDP(国家/地区)或收入(公司)(单位:百万美元)
89	惠普公司	114 552	95	戴姆勒股份公司	109 700
90	安哥拉	114 343	96	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	109 656
91	E.ON	113 849	97	三星公司	108 927
92	厄瓜多尔	113 825	98	花旗集团	108 785
93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112 493	99	麦克森公司	108 702
94	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	111 069	100	Verizon	107 808

资料来源:"The Fortune Global 500,"；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1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b/ 2010/01/weodata/index.aspx.

在观察中东局势的时候,无视国家间的纷争和外部大国的插手,是绝对可笑的。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那同样也是愚蠢的。跨国石油公司,比如壳牌、英国石油和埃克森美孚公司等,同属于一个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非国家行为体。有一些较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例如联合国,还有一些较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阿拉伯联盟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大赦国际。另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跨国族群集团(ethnic groups）,譬如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和散居于整个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阿拉伯人。恐怖主义集团、毒品卡特尔和反政府秘密组织等都是跨越国界的,它们通常在几个国家之间瓜分其资源。国际宗教运动,特别是中东和北非的政治性伊斯兰宗教运动,也属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范畴。

问题不在于国家和非国家集团哪一个更重要——通常是国家更重要,而在于这些新型的、错综复杂的联合体会怎样影响地区政治。这正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解释不了的。国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它们并没有占据整个舞台。

国家目标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无政府体系中,传统上,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军事安全。今天的国家无疑关心自己的军事安全,同时它们也同样关心、甚至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经济财富、有关禁止贩毒或艾滋病蔓延的社会问题以及生态的变化。而且随着威胁的变化,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军事安全已经不再是国家追求的唯一目标。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一位加拿大外交官曾经说过,他所担心的并不是美国会像在1813年那样,再次入侵加拿大和占领多伦多,而是多伦多可能因为来自得克萨斯的一台电脑的攻击而处于瘫痪之中——这种困境不同于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所面临的传统的威胁。经济实力尚未取代军事安全(正如科威特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中所认识到的),但是国际政治的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广泛,其中包括人的安全。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分析家关心的是个人的安全,而非国家的安全。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 手段 也在发生变化。现实主义者的看法是,只有军事力量才是真正重要的手段。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在描述1914年以前的世界时,把大国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今天,国家无疑也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军事力量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认识到今天使用军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过去付出更高的代价。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说的,军事实力和实现目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

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军事力量之最后手段的核武器难以被加以使用。虽然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曾经超过5万件,但是自1945年迄今核武器从未被使用过。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力,难以成为人们追求任何理性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这使得领导人不愿意使用它。所以,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在战争中使用这种军事力量的最后手段以追求所有实际的政策目标,那么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即便是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统治已经具有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其代价也比过去要大得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通过派遣少量的、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士兵,征服了地球的其他地方,然后再用较少的驻军,统治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在一个民众已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时代,很难占领一个其民众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在越南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苏联则在阿富汗获得相同的启示。越南和阿富汗都没有核超级大国那么强大,但是不管对美国还是对苏联来说,统治这些已经进入民族觉醒阶段的民众,其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在民族主义时代,对他国实施统治的代价很高。在19世纪,英国能够用

少量的士兵和文官统治印度,这在当今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事情。

武力的作用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同国内制约因素有关。一种反军国主义的伦理已经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中形成,并日益深入人心。这样的观念虽然并不能防止使用武力,但是它会使得领导人在选择使用武力,尤其是选择大规模和持久的战争时,必须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人们有时说,民主国家不愿意承担牺牲,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比如,美国在1990年发动海湾战争的时候,准备付出1万人伤亡的代价,但是它在索马里或科索沃这样和美国国家利益关系不太密切的地方,并不愿意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不仅如此,如果其他国家认为使用武力是非正义的或不具有合法性的,那么民主国家中的政治领导人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武力并没有过时,而且恐怖主义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比国家更不受道德考虑的约束,但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现在使用武力要比以前困难得多,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最后,有一些问题是绝对不能靠武力来加以解决的。以美日经济关系为例。1853年,舰队司令马修·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 率领其"黑船"闯入浦贺港,以炮击相威胁,要求日本开埠通商。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当今的美日贸易争端,肯定是没有用的,也是难以被接受的。也就是说,虽然武力还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手段,但它已经不是唯一的手段了。经济相互依存、通讯、国际制度和跨国行为体等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武力还要大。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过时——我们看到了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这个国家的塔利班政权庇护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网络,我们也看到了美英两国在2003年使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是,在伊拉克赢得战争比赢得和平要容易,单靠军事力量本身不足以抵制恐怖主义的威胁。尽管军事力量依然是国际政治的终极手段,但使用军事力量的代价和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今天的国际政治比过去更为复杂。

尽管如此,基本的安全游戏还在继续进行着。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均势通常是由领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所决定的,16世纪的西班牙、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美国,就属于这样的霸权国家。到头来,最强大的国家会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或世界大战。在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一个新的条约确定世界新秩序,正如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9年的国际联盟以及1945年的联合国。如果自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以来国际政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是否会有一个新的挑战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或者说霸权战争的循环过程已经结束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美国吗?核技术是否已经使得世界大战太具毁灭性了?经济相互依存是否使得世界大战

的代价太高了?像恐怖主义者那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是否会迫使国家进行相互合作?全球社会是否使得世界大战在社会和道义上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希望是这样,因为下一个霸权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战争。但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国际政治的延续性。

后续阅读材料

1.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the war* :A Theorteical Analysi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p. 1—15.

2.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p. 1-28.

伯罗奔尼撒战争

人们普遍认为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年) 是现实主义之父。虽然大多数人在思考国际政治的时候不一定有意识地运用一种理论,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理论是我们组织材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今天,许多政治家和社论作者尽管不一定知晓修昔底德的名字,但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作为雅典精英阶层一员的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最伟大的时期,亲身经历了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描述的一些事件。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 指出:"说实在的,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20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对国家行为的了解,是否超过了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修昔底德及其同胞的认识水平?"接着,他表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 [11] 吉尔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为了讨论这个观点,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修昔底德的思想。理解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好办法是分析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所有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得的一个启示,就是要避免简单化地解读历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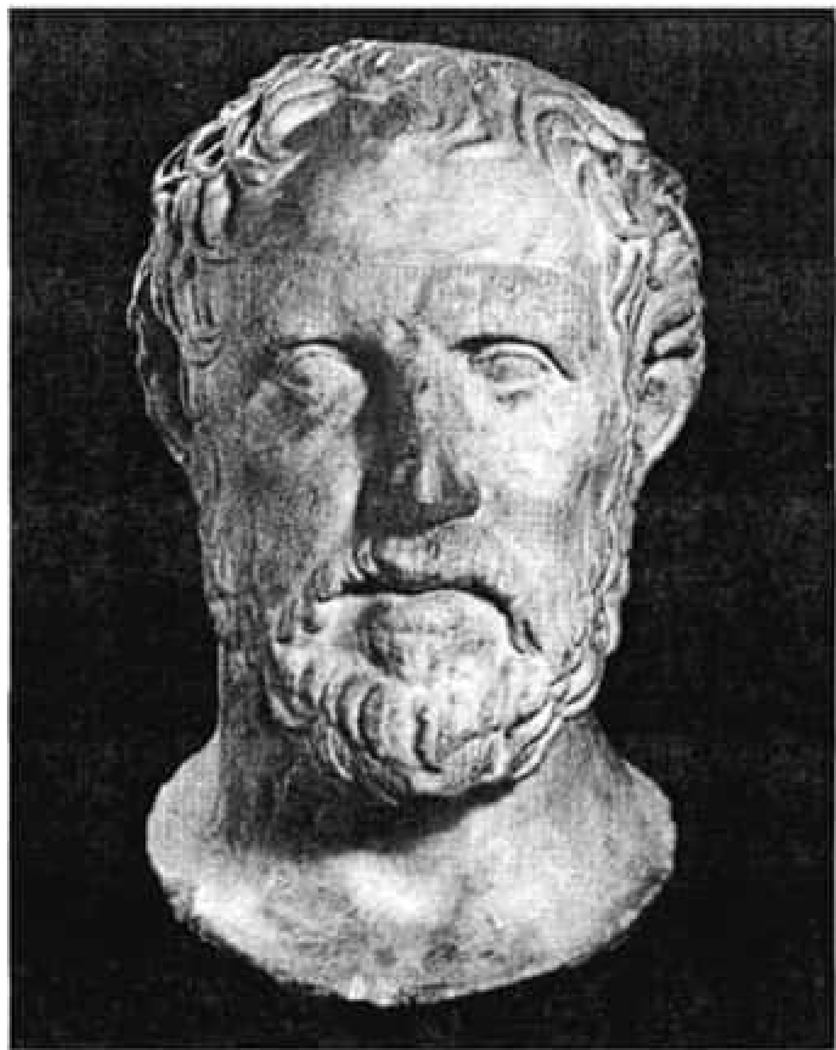
在公元前5世纪初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图1.1）曾经结盟,联合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它在战胜波斯之后,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个商业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经过了5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创建了提洛同盟,即环爱琴海国家的同盟,其目的是共同防御波斯人的威胁。而斯巴达则领导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国组成了一个防御同盟。原先站在雅典一边并免费享受保护的国家,很快便不得不向雅典人纳税。由于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在不断扩张的雅典帝国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势力,在公元前461年,也就是希腊人击败波斯人大约20年之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公元前445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交战双方签订了一项和约,约定维持30年的和平。这样一来,希腊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享受了一段和平的时期。



图1.1　古代希腊

公元前434年,处于边缘地带的较小的城邦国家埃皮达姆努斯发生内战。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规模冲突常常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区的那些规模较小和不太重要的危机所导致的,我们在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会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在埃皮达姆努斯,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就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展开了斗争。民主派向曾经帮助埃皮达姆努斯建国的城邦国家科西拉求助,但遭到拒绝。然后他们转向另外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求救,科林斯同意提供帮助。这激怒了科西拉,科西拉派出舰队,占领其前殖民地埃皮达姆努斯。科林斯感到受了侮辱,并向科西拉宣战。科西拉害怕科林斯的进攻,因而求助于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都派使节到了雅典。



修昔底德半身像

雅典人在听完双方的陈词之后,处于困境之中。他们并不愿意破坏已经保持了10年的和平环境,但是又担心如果科林斯(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强大的海军,希腊城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将变得不利于雅典。雅典人认为他们不能让科西拉的海军落入科林斯人的手中,所以决定"介入一点"。雅典采取一个小小的举动,即派出10条船,来吓唬科林斯,雅典船只得到的指令是,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可动武。

但威慑失败了,科林斯发动了攻击,而且在科西拉人将要战败的时候,雅典船只被拖入而非主动卷入一场纷争之中。雅典的介入激怒了科林斯,同时也让雅典人感到不安。雅典人特别担心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制造麻烦,帕提地亚虽然是雅典的盟友,但是它同科林斯间有着历史上的关系。斯巴达表示,如果雅典进攻帕提地亚,那么自己将帮助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发生叛乱之后,雅典出兵镇压。

这个时候,斯巴达内部产生激烈的争论。雅典人呼吁斯巴达人保持中立。科林斯人则鼓动斯巴达人与雅典交战,并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另一个重要的城邦国家墨加拉站在科林斯的一边,这是因为雅典人背弃和约,断绝了同墨加拉的商业联系。斯巴达左右为难,但是斯巴达人还是投票赞同向雅典开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对雅典的力量加以制约,雅典就可能控制整个希腊。斯巴达走向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持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均势。

雅典拒绝接受斯巴达的最后通牒,战争于是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雅典人怀有一种帝国的傲气,为自己的城邦及其社会制度感到自豪,而且相信自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战争在初期的时候处于胶着状态,在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和平是脆弱的,战火很快又重新燃烧起来。在公元前413年,雅典采取了一个很大的冒险行动。它派两支舰队和步兵去征服意大利南面的西西里岛,该岛上有一些同斯巴达结盟的希腊殖民地。结果,雅典人遭受惨败。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又从波斯人那里得到金钱的支持,波斯人希望看到雅典遭受打击。在征战西西里失败之后,雅典内部产生了分裂。在公元前411年,贵族派推翻了民主派政权,400名寡头政治支持者试图统治雅典。这些事件虽然并没有导致雅典历史的终结,但是它们的确使得雅典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10年,雅典取得一场海战的胜利,但是5年之后,斯巴达就在海上战胜了雅典,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求和。斯巴达要求雅典拆除其漫长的、用来防御陆上强国进攻的城墙。雅典的力量就这样被击垮了。

根源与理论

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和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件。战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修昔底德心里很清楚。在叙述完发生在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告诉读者说,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动因。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雅典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呢?如果雅典比较有远见的话,那么它是否可以避免那场灾祸?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cles)在战争初期,曾经向其民众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你们的国家有义务为了你们,捍卫国家的荣誉地位……你们也应该记住,你们参加战争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以奴役换取独立,而且还是帝国的消亡及其带来的仇恨。此外,退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所捍卫的,简单点说,就是一个专制政权,实行专制可能是不对的,但放弃专制是危险的。" [12] 换句话说,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雅典人既然建立了一个帝国,除非冒更大的风险,否则他们就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因此,伯里克利主张战争。尽管如此,在雅典内部还有别的声音。比如,公元前432年赴斯巴达参加辩论的雅典代表就对斯巴达人说:"请你们在决定参战之前,考虑偶然性因素在战争中的重大影响。" [13]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雅典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劝告呢?也许雅典人被爱国主义情感或者愤怒情绪冲昏了头脑,从而丧失了理智。还有一种可能是,雅典人虽然很理性,但是陷于一种安全困境中。

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 无政府状态(**anarchy**),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更高的权威,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因为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没有一方的行为是出于愤怒或者骄傲,而是由于另一方实力增强所导致的恐惧感。不管怎么说,增强国防是对所认知的威胁的理性反应。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看上去,国家显然应该相互合作,但为什么它们并不这么做呢?

我们可以从 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的一种特别的形式)的博弈中找到一个答案。囚徒困境的情形是这样的:假设警察在某个地方抓住两个身上带有少量毒品的人,这两个人可能因此被判处1年的监禁。警察相信这两个人确实是贩毒者,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治他们的罪。这两个人如果被认定为贩毒者,那么将很可能被判处25年徒刑。警察知道,一个嫌疑犯针对另一个嫌疑犯的供词,将足以使后者被量以最重的刑罚。警察告诉他们,揭发对方为贩毒者的一方将获得释放。警察还告诉他们,如果双方都招供的话,那么两人将被判处10年监禁。警察设想,如果双方都招供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关押10年;假如两人都拒不承认,那么他们只能被判1年徒刑,然后他们

很快就会出狱并再次干贩毒的勾当。

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囚室中,不允许相互沟通。两人都面对同样的困境:或者揭发对方,使对方坐25年的牢,而自己获得释放,或者保持沉默,争取蹲1年的监狱。但如果双方都招供,那么两人均被判10年徒刑。每一方都在想:"不管那个家伙怎么做,招供都对我比较有利。如果他保持沉默,那么我招供的话就将获得自由,而我不招供则要蹲1年的牢。假如那家伙招供了,而且我也招供,那么我将被判10年的徒刑,但是如果我拒不承认,自己就得蹲25年的牢。"

这便是独立理性行为的基本的结构性困境。如果这两个人可以相互进行交流,那么他们就可能达成协议,都拒不招供,从而两人都只需要蹲1年的监狱。然而,即使双方可以进行交流,也还存在信任与信用的问题。我还用囚徒的困境来加以说明。每个嫌疑犯可能都这么想:"我们都是贩毒者。我了解对方的行为。我怎么敢肯定,在我们俩达成协议后,他不会在心里想:'太棒了！我已经说服他保持沉默。现在我可以追求最优的结果,以免被人出卖了'?"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少相互沟通和信任,每个国家都可能只努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告诉另一个国家,"你别扩充军备,我也不扩充军备,这样我们大家以后都会过得很好",但是第二个国家可能不敢相信第一个国家。

雅典在公元前432年的处境类似囚徒的困境。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有一个共识,即停战对双方都有好处。即使在发生埃皮达姆努斯事件以及科西拉和科林斯之间的争端之后,雅典人还是不愿意破坏停战的局面。科西拉人最后是用这样的论点说服了雅典人:"在希腊有3个海上强国,它们是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首先控制了我们,而且你们允许我们的海军同科林斯的海军合并,那么你们就不得不同科西拉与伯罗奔尼撒人的联合舰队作战。但是,假如你们同意与科西拉结盟,那么我们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作战。" [14]

雅典人是否应该遵守停战协定和拒绝科西拉人的要求,从而同伯罗奔尼撒人进行合作呢?假设雅典人这么做,而伯罗奔尼撒人背信弃义,夺取了科西拉舰队,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海上力量对比态势将是2对1,雅典处于不利的地位。雅典人应该相信伯罗奔尼撒人和信守诺言吗?雅典人最后决定违背条约,此种行为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一个嫌疑犯招供了。修昔底德解释了其中的缘由:"这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没有人愿意看到像科西拉这样的一个海上强国成为科林斯的牺牲品。" [15]

不可避免性与未来的影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雅典人认为,既然战争很快就要爆发,那么雅典就应该争取拥有2对1的海军优势,避免面对1对2的海军劣势局面。有关战争即将来临和不可避免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决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囚徒的困境。乍一看,每个嫌疑犯都应该出卖对方和让对方当傻瓜。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很清楚,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两个人还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即都拒不招供。在一次性的博弈中,人们是很难进行合作的。在多次进行的博弈中,人们可以学会进行合作,而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只是欺骗别人的一方受益,相信别人的一方受害。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 在电脑上选择不同的战略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他发现,经过多次博弈后,最好的结果通常是由他所说的 "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 战略导致的。所谓"一报还一报"就是:"你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你。如果你首先欺骗我,那么我以后也会欺骗你。如果你还接着欺骗我,那么我也会再欺骗你。如果你合作,那么我也合作。如果你还接着合作,那么我也会再次合作。"结果是,参加博弈的人发现,学会合作所获得的回报是比较高的。但是,阿克塞尔罗德提醒人们说,只有当你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持续进行博弈和存在"未来长长的影像"(long shadow of future) 的时候,"一报还一报"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作为最后一步棋,欺骗总是理性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政治中,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那么具有破坏性。当你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已经接近于走最后一步棋了。在你决定走最后一步棋之后,你可能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对手。如果你怀疑对手将会欺骗自己,那么最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冒险采取欺骗对方的手段,而不同对方进行合作。雅典人就是这么做的。雅典人由于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所以决定不能相信科林斯人或者斯巴达人。他们认为,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走的最后一步棋,那么较好的战略是把科西拉的海军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吗?修昔底德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他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得当时人们的喝彩,而是创作一个可以永世流传的作品。" [16]

他的这部史书揭示了任何时候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人的本性。修昔底德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必须强调一些东西,忽略另外一些东西。修昔底德的结论是,战争的根源乃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但是,耶鲁大学古典主义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 声称,实际

上当时雅典的力量并没有在增长。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前夕,均势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雅典和斯巴达都属于奴隶制国家,双方都担心战争可能给奴隶起义提供机会。两者的区别在于:奴隶占斯巴达人口的90%,这个比例大大超过奴隶在雅典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且斯巴达在不久前即公元前464年经历了一次奴隶起义。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

于是,卡根认为,战争的近因或者导火索,比修昔底德根据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所阐述的原因要重要得多。比如,科林斯认为雅典不会参战,对雅典的反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科林斯是那么痛恨科西拉。伯里克利也反应过头,他向帕提地亚提出最后通牒,并以断绝贸易关系来惩罚墨加拉,这些都是错误的行为。这些政策失误使得斯巴达人认为值得冒战争的风险。卡根指出,雅典力量的增长导致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30年停战协定已经浇灭了这个引起战祸的火种。因此,为了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埃皮达姆努斯问题的火星,必须落在那些极少的尚未湿透的可燃物体上。然后,还需要科林斯人以及后来的墨加拉人、帕提地亚人、爱琴海人以及斯巴达主战派不断地使劲煽风。如果雅典人木在关键的时候添加一些燃料的话,那么火星也可能熄灭掉" [17] 。换句话说,战争并不是由那些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由人在困难环境中所做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

对历史之父修昔底德提出质疑可能有点冒失,但是历史上确实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东西。虽然人类的行为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但它始终是自发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古代希腊人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修昔底德所透彻论述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势之中。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不管怎么说,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制造了一个囚徒困境的场景,他在哥谭市(Gotham City)的两条渡船上安放了炸药,但是乘客们选择了合作,而不是欺骗。那场导致雅典毁灭的30年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它与人的决策有关联。偶然的因素和人的个性常常是很重要的,尽管它们是在一个较大结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不安全情势)所限定的范围中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从这段古代历史中获得哪些对当代有意义的启示呢?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

现的。

我们也要避免进行庸俗的历史类比。在冷战时期,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是民主和海权国家,苏联是陆权国家并设有奴役性劳改营,这就好比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苏陷于一种类似雅典和斯巴达争斗的历史大冲突之中。然而,这种庸俗的类比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古代雅典是个蓄奴国家,它面临国内动乱,民主派并不总能掌握政权。而且,与冷战有所不同的是,斯巴达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另外一个启示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是有所选择的,没有人能够叙述一个事件的全部内容。描述过去1个小时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无疑比描述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或者整个战争要容易一些。即使这样,它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已经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叙述过去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件所花的时间,同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是一样多的。因此,历史学家总是要进行概括。为了写历史,即使是描述过去1小时或者1天的历史,我们都必须把历史加以简化,必须有所选择。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

历史学家还受他们当时的考虑所影响。修昔底德写书的目的是探讨雅典人如何吸取战争的教训,以及批评伯里克利和民主派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于是把重点放在了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囚徒困境情势的那些方面。然而,这些方面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所有内容。修昔底德没有写雅典与波斯的关系、雅典断绝同墨加拉贸易关系的命令以及雅典提高提洛同盟其他成员应交纳的赋税等。修昔底德的史书不是有意误导后人或者存在偏见,但是它说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重新书写历史,因为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所选择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历史著述都是骗人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地思考问题和客观地研究问题。然而,他们及其学生们应该清楚,自己所选取的东西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要经常想想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他或者她是否在仔细和客观地对事实加以解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是否存在偏见。选择是历史和书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误解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多阅读,而不是少看书。

后续阅读材料

1.Robert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ichard Crawley(New York:Touchstone, 1996) .

2.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1 -56, 345—356.

中国的崛起

自修昔底德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历史学家们都知道,伴随一个新的大国崛起而来的总是不确定性与焦虑,暴力冲突经常(虽然不总是) 随之而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将是新世纪初亚洲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解释为什么民主的雅典决定背弃条约、从而导致战争的时候,修昔底德指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这种观念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他写道:"人们普遍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和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有关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后果。

——载于1998年6月27日《经济学家》 [18]

伦理问题和国际政治

鉴于安全困境的性质,某些现实主义者坚信,道义考虑(moral concerns) 在国际冲突中不起作用。然而,伦理(ethics) 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与伦理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自从修昔底德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使用道义主张(moral arguments) 。例如,科西拉在向雅典求救的时候,就使用了伦理语言:"首先,……你们

是在援助一个非进攻性的、受害于他人非正义行为的国家。其次,你们的善意是不会被我们所忘记的,我们将永远感激你们。"[19] 假如把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分别换成科西拉和科林斯,我们今天还可以说这样的话。

道义主张促成和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义(morality)的力量是强大的。然而,道义主张也可能被当作宣传语言,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到米洛斯岛镇压起义。在公元前416年,雅典发言人告诉米洛斯人,他们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投降。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候,雅典人回答道:"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20] 也就是说,雅典人认为,道义在现实主义世界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强权即公理。伊拉克、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在侵略科威特、入侵格林纳达和镇压东帝汶起义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类似的逻辑。但是,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雅典人在米洛斯如此露骨地表达的观念,在当今世界里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这能否说道义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比较显著的地位?或者干脆说国家已经更精通于宣传了?能否说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更加关心伦理问题?或者说2500年前雅典的行为同20世纪末伊拉克或者塞尔维亚的行为之间,是否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人们的道义主张并不相同,某些论点比较具有说服力,我们要看看它们是否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比如,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声称,核武器是个好东西,因为上帝把它赐予了自由世界。而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上帝也把核武器给了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呢?无偏见(impartiality) 是很多道义主张的试金石,也就是说,要用相同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利害关系。你的利害关系与我的利害关系要得到同等的关注。然而,在无偏见这个框架下,对于判断道义主张正确与否,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另外一个传统的源头是19世纪初英国的实用主义者,比如边沁。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看问题的不同方法。假设我们走进一个贫困村庄,在那里看到一个军官正要枪杀并排站在墙前的3个人。你可能会问那个军人:"你为什么要杀害这些农民呢?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恶意。"那个军官回答说:"昨天晚上,这个村子里的某个人把我的一个弟兄杀害了。我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个人是罪犯,因此我要枪毙这3个人,以杀鸡给猴看。"你会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将要杀害无辜者。如果你的人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么这里至少有两个人是无辜的,或许这3个人都是无辜的。你千万不能这么做。"这时,军官从他手下那里拿来一支步枪并交到你的手中,对你说:"你帮我把其中一个人打死,我就把另外两个人放了。你打死一个人,可以拯救两条性命。告诉你吧,在

内战中,你可不能采取这种高尚的态度。"你到底会怎么做呢?

你到底会怎么做?你可能想到用兰博的方式,试图把在场的军人都干掉,然而那个军官手下的一个士兵正用枪指着你。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开枪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并挽救两条性命,或者把枪放下以维护自己的清白。康德传统,即只能做那些正确的事,要求你不施恶行。而实用主义传统则可能暗示你,如果可以救两个人,那么你应该开枪打死一个。如果你选择康德的解决办法,死的人数就要增多。假如墙前站着100个人,你会怎么办?或者假设你可以通过杀死一个可能无辜的人,使一个城市的人避免恐怖主义炸弹的伤害,那么你愿意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而不管该城100万人的生死吗?在某些时候,结果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道义主张:动机或者意图,手段,后果。尽管这三个方面不总是那么容易得到调和,好的道义主张应该把它们都考虑进去。

伦理在国际政治中所受到的限制

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如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大。其原因有四个。第一,有关价值观念的国际共识是很少的。在对某些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的判断上,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第二,国家与个人不同。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尽管国家领导人是个人,人们用不同的标准分别判断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作为个人的行为。比如,在选择一位室友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愿意选一个坚信"你不应该杀人"的人。然而,如果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采取可能导致死亡的行动",那么选民肯定不会投他的票。公民要求总统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在某些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力。如果总统们只顾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能保护其国民,那么他们就不能得到信任,当不了好的庇护人。

在个人的道义观念中,牺牲是道义行为的最好体现。然而,领导人可以牺牲其领导下的全体民众的生命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告诉米洛斯岛的当权者,如果他们加以反抗,那么雅典人将杀死该岛上所有男人,并且把妇女与儿童卖作奴隶。米洛斯人进行了反抗,结果该国被摧毁了。米洛斯领导人应当让步么?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应该冒核战争的危险、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当时美国在土耳其也部署有类似的导弹)吗?不同的人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个人作为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判断其行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第三,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伦理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

角色。人们在国内政治中就很难知道行动的后果,而在国际关系中还要考虑一个复杂的层面,即国家间的相互作用,这使得准确预测结果的难度更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33年在牛津大学辩论社牛津联盟里所进行的一场学生辩论。鉴于20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学生投票支持一项动议,即宣布他们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但是,有一个人在关注着这场辩论,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希特勒从中得出结论,民主国家很软弱,他可以向民主国家随意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国家不会反抗。最后,希特勒走得太远,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是学生们不想看到、也没有料到的结局,他们曾经投票表决,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后来很多学生都参战,而且不少人死在战场上。

另外一个更小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汉堡包论调"。当时人们担心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一些学生说:"我们坚决不在餐厅吃肉,因为1磅肉相当于8磅粮食,它们可以用来救济世界各地的穷人。"许多学生停止吃汉堡包,而且自我感觉不错,然而他们并没有给印度或者孟加拉的饥民提供任何的帮助。为什么呢?不吃汉堡包所节省下来的粮食并没有到孟加拉饥民的手中,因为那些饥民无钱购买粮食。省下来的粮食只是美国市场的过剩商品,它使得美国国内市场价格下跌、农民减少产量。帮助孟加拉人民的办法是给他们钱,让他们可以买一些美国学生不吃汉堡包所节省下来的粮食。学生们在开展不吃汉堡包运动的时候,没能看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他们没能使得出于良好意愿的行动与其结果相统一,学生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最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制度特别软弱无力,秩序和正义在国际政治中相互脱节的情况比在国内政治中要严重得多。秩序和正义都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中,我们倾向于把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有时示威者为了伸张自己的正义观,故意破坏秩序。然而,一旦出现全面的混乱,正义也就荡然无存了,我们只要看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冷战后的索马里以及今天阿富汗很多地方的爆炸、绑架和杀戮事件就十分清楚了。某种程度的秩序是正义的前提。在国际政治中维持秩序就更难,因为缺少共同的立法机构、中央行政机构和强大的司法机关,去维持作为正义前提的秩序。

三种有关道义作用的观点

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际关系伦理观,即怀疑论、国家道义主义以及世界主义。尽管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是现实主义者在分析世界政治的时候

往往采取怀疑论者或国家道义主义者的分析方法,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国家道义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的观点。

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skeptics)认为,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毫无意义,因为在国际关系中缺少可以维护秩序的制度(institutions)。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中也不存在共同体的观念,因而没有道义权利与义务。在怀疑论者看来,雅典对米洛斯要求宽恕的反应,就是对伦理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经典表述:"强者做其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接受其必须接受的事情。"强权即公理。怀疑论者认为,这就是事实。

哲学家经常说:"应该"(道义责任)暗含着"能够"(做某件事的能力)。道义要求你做出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某些事,就没有义务非做不可。如果国际关系只是杀戮与被杀,基本上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怀疑论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然而,生存并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内涵。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声称别无选择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选择方式。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只从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偷偷地挪用了价值观念,嘴上还不承认。一位法国外交官曾说过"符合道义的行为就对法国有好处"这样的话,但是他避而不答为什么法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说"我别无选择"的领导人经常是有选择余地的,或许是一种不情愿的选择。如果在国际关系中存在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共同体,即不是无休止的杀戮与被杀,那么国家就有政策选择的余地。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没有政府",但它并不一定指混乱或者毫无秩序。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些不太完善的惯例和制度,它们保证世界具有一定的秩序,并且使得国家可能有一些较大的选择余地。这些惯例和制度包括:均势、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怀疑论者的观点是有偏颇的。

托马斯·霍布斯声称,为了摆脱那种每个人都可能杀别人的"自然状态",个人要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利维坦或者政府以寻求保护,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生存是艰难的、野蛮的和短命的。那么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不共同组成一个超级利维坦呢?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政府呢?霍布斯认为,原因在于国际层次的不安全感没有个人层次的不安全感那么强烈。政府可以向个人提供一些保护,避免强者为所欲为,国家之间的均势也能确保世界具有某种程度的秩序。即便国家处于准备战争的对立状态,"它们仍然保证其民众日常工作顺利进行"。国际间的自然状态不会经常导致那种与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相伴相随的苦难。换句话说,霍布斯相信,国家间的均势减轻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从而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秩序。

自由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世界上存在着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虽然这样的行为规范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它们使得违反这些规范的国家要承担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 。让我们来看看1990年的海湾危机。萨达姆·侯赛因声称,他兼并科威特的行为就是收复伊拉克的一个省,科威特在殖民主义时代被他人夺走了。由于国际法不允许国家以这种理由出兵他国,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12项决议明确表示,萨达姆的论点与国际规范相违背。虽然法律和规范并没能阻止萨达姆侵略科威特,但它们确实使得他失道寡助,并为建立起一个反伊拉克联盟和把侵略者赶出科威特做出了贡献。

尽管国际制度还不完善,但是它们通过促进和鼓励国际间进行相互沟通和形成某种程度的礼尚往来的行为习惯,使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鉴于几乎总是存在着相互沟通的情势,国际政治并不是像怀疑论者所说的那样总是表现为杀戮和被杀。领导人并不永远把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安全和生存问题上。合作(以及冲突) 存在于经济、社会和军事互动等很多问题领域中。虽然人们在对正义的认识上存在着文化上的分歧,但是国际政治中还是存在着道义主张,一些原则包含在国际法之中。

即使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法律和道义有时也能发挥作用。发端于早期基督教教会的 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doctrine**) 在17世纪以后开始世俗化,它反对杀害无辜平民。禁止杀害无辜平民原则的前提是"你不该杀生"。但如果说这是个基本的道义前提的话,那么是否能说任何杀戮都是非正义的呢?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认为,不能以任何理由杀害别人。这通常是基于康德思想的言论;但是某些和平主义者还提出一个相关论点,即"暴力行为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然而,在有的时候,不对暴力做出反应也会导致更多的暴力。比如,倘若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采取姑息的态度,那么本·拉登不见得会放过美国。与此相反,传统的正义战争观却把有关行为动机、手段以及后果的考虑结合起来。它认为,如果有人要杀你,而你又不愿自卫,那么结果将是邪恶占上风。不自我保护的结局是好人丧命。如果一个人面临迫在眉睫的杀身之祸,那么采取自卫的手段把对方杀死是符合道义原则的。但是,我们必须分清谁是可以杀的,谁是不能杀的。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士兵用枪指着我,那么我就可以采取自卫手段杀死他;而如果他放下枪,举起双手,并且说"我投降",从而成为战俘,那么我就没有权利杀死他。事实上,这已经写进国际法和美国军队的条例中了。如果一位美国士兵枪杀一名俘虏,那么他会因谋杀罪而受到美国法庭的审判。在越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官兵就是因为违反这样的条例而被关进监狱的。禁止有意杀害无辜者的法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恐怖主义行为是错误的。有些怀疑论者声称:"一个人所认定的恐怖主义者,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就可能是自由斗士。"然而,根据正义战争理论,你可以为自由而战,但是不能把矛头对准无辜平民。虽然这样的法律经常被人违背,但是它们的确是一种行为规范,即使在最严酷的国际环境中也能够发挥作用。不完善的国际法中包含着基本的正义观念,虽然它并没有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这表明怀疑论者所说的在战争状态中没有选择余地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正义战争理论

古典正义战争理论源于古罗马与基督教传统。西塞罗(Cicero)、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以及圣托马斯·阿查那(St. Thomas Aquinas)是其早期主要思想家。今天,正义战争理论具有广泛影响。该理论可能有很多种表述形式,但其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走向战争的正当性(jus ad bellum)原则,界定道义上允许使用武力的条件;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jus in bello)原则,界定如何使用武力才符合道义。

走向战争的正当性之五个标准原则是:正当原因;正确动机;合法权威;最后手段;获胜机会。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关这些原则的诠释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正当原因过去几乎只被限定为自卫,但是今天可能还包括反对干涉或者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一国君王曾经是无可置疑的合法权威,但是世界舆论日益要求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的批准。

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之三个基本原则是:遵守战争法;坚持适当性;不伤害非战斗人员。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战争法规也在发生演进,今天对战争的限制比中世纪要多得多。现代军事技术使得在某些方面难以坚持适当性和保护平民的原则,这是因为现代武器的毁灭性比剑与矛的时代要大得多,但是现代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先进的战场管理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现代战争的毁灭性。

我们不必赞同怀疑论者的观点,因为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确有一些发挥作用的空间。道义是个选择的问题,选择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而不尽一样。危及生存的威胁越大,道义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刚开始的时候,雅典人声称:"真正值得称赞的人,就是那些虽然崇尚权力,但是很有正义感、不为形势所迫的人。" [21] 不幸的是,雅典人后来在战争中没有牢记这一真知灼见。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势是罕见的,国家安全和威胁的程度经常是不甚明确的。怀疑论者以道义不起作用为由规避道义选择问题。总而言之,正如一个格言所说的,人类既不能完全靠说教(word) 而生,也不能仅仅依赖刀剑(sword) 而活。

然而,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怀疑论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认真对待道义问题,认为秩序至少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秩序,那么正义是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的。道义征讨的行为甚至可能导致混乱。比如说,如果美国过于关心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或宣扬人权,那么这可能会导致混乱,从长远角度来看它所造成的弊大于利。现实主义神学家和公共事务评论员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认为"道义和政治因素"同样重要。尼布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道:"只有当我们意志坚定以及我们的道义目标与战略考虑相匹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得人类免于另一次灾难。" [22]

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国际秩序的确很重要,但这涉及秩序的程度以及如何平衡正义与秩序二者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开始关注正义问题之前,需要何种程度的秩序呢?例如,1990年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采取镇压行动并导致一些人丧生,当时有的美国人呼吁美国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这些美国人看来,美国应当在其对外政策中表达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念,甚至不惜导致不稳定的局势和军备控制谈判的破裂。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关注和平与人权固然不是小事,但控制核武器和达成一项裁减军备的条约要比这更重要。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政府继续同苏联进行军控谈判,但把它同提供经济援助以促使苏联尊重人权挂起钩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常常不是在秩序和正义二者中选择一个,而是如何在特定形势下平衡各种政策选择。虽然现实主义者阐述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但是他们过于绝对了,认为秩序总是优先于正义。

国家道义主义者

国家道义主义者(state moralists) 声称,国际政治的基础是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 ,它有一些行为规则,但是国家不一定总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在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原则,它禁止国家跨越边界、干涉其他国家的管辖权。正如政治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国界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因为国家代表着所有个人的权利,这些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走到了一起。因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还有的人说得更明确,即尊重主权是维护秩序的最好方式。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话来说就是:"好篱笆带来好邻居。"

在现实中,这些国家行为规则经常被违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过越南入侵柬埔寨、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伊拉克入侵伊朗和科威特、美国和英国入侵伊拉克、北约以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受虐待为由轰炸塞尔维亚等诸如此类的事件。确定何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一直以来都是个难题。1979年,美国以强烈的道德语言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苏联人则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进行回击,即美国在1965年向该国出动一支25000人的军队,阻止当地共产党夺取政权。美国干涉多米尼加的背后动机是防止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政权,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动机是防止在自己的身边出现一个敌视苏联的政权,两者是极其相似的。

为了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我们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动机上。从所使用的手段来看,美国入侵多米尼加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很少,而且美国很快就从该国撤军。而在阿富汗,很多人丧失生命,苏联军队在阿富汗驻留的时间将近1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批评者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入侵巴拿马这两个事件加以比较。1989年12月,美国出兵巴拿马并推翻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独裁政权,伊拉克则在1990年8月,出兵科威特并推翻埃米尔政权。显然,美国和伊拉克都违背了不干涉原则,但两个事件的手段与后果是不一样的。美国在巴拿马扶植了一个由于诺列加的阻挠而未能宣誓就职的民选总统,没有打算兼并巴拿马。而伊拉克则试图兼并科威特,并且制造了很多流血事件。我作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判断巴拿马事件到底是完全正确的,还是完全错误的。读者在本书第六章中将会了解到,简单地运用不干涉原则和主权原则,经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干 涉

让我们想象一下1979年12月阿富汗的情景:

> 一位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掌权并努力对苏联保持一个更加独立的立场。这使得苏联领导人深感不安,因为苏联身边出现一个独立政权的事实可能在整个中亚(包括苏联的中亚地区）引起麻烦,而且可能开一个弱小的共产党邻国脱离苏联帝国的危险先例。让我们设

想一下,统帅入侵军队的苏联将军在面对即将被处死的、背叛苏联的阿富汗领导人的时候,如何解释自己那些违背国际公认的主权与不干涉原则的行为。他会说:"就正当性而言,我们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并不会有什么异议。如果有些国家维持独立地位,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很强大。假如我们不进攻它们,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害怕。因此,除了扩大我们的帝国之外,我们还要使你们臣服,以增强自己的安全感。你们作为一个比其他国家弱小的邻国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控制中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正是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过的话,只不过有些小的改动!干涉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世界主义者

在政治理论家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 这样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 看来,国际政治不仅仅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世界主义者声称,我们所说的正义应当是指个人的正义。世界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过于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他们如果把焦点放在有关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即谁得到什么的问题上,那么就会注意到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状况。持续不断的、跨越国界的经济介入有时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你是菲律宾的一位农民,你的孩子死于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因为当地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都到美国工作去了,对你来说这种外部的经济介入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世界主义者认为,国家边界并没有道义上的地位;如果我们从分配性正义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只是在维护理当废除的不平等状况。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包括道义怀疑论者与某些国家道义主义者) 反驳说,世界主义者看问题的方法很可能导致极大的混乱,因而是很危险的。旨在从根本上重新改变分配状况的行为,极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因为人们都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财富。一些比较温和的世界主义者认为,人们通常有多种效忠的对象,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国家,或许还有某些跨国性宗教组织和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大多数人都被那些有关生活在饥饿中的索马里儿童或者达尔富尔难民的画面所震动,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跨越国界的、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观念,尽管这种观念很弱。我们毕竟都是人。

世界主义者提醒我们,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分配方面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来说,道义不管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起作用。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政策,促进入类基本需求与人权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又不破坏世界秩序。在严重侵犯人权的个案中,世界主义者的观点已经被写进国际法,比如反对种族屠杀的国际公约。其结果是,决策者更加意识到道义问题。例如,克林顿总统曾经说过,他所犯的一个最严重错误就是没能阻止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后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支持非洲维和部队在苏丹的达尔富尔省制止种族屠杀的暴力行为。

在上述三种分析国际道义的思路中,怀疑论者的观点,即秩序是正义的前提,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怀疑论者忽视了秩序与正义的权衡(trade-offs) 问题。国家道义主义者看到了在国家组成的社会中存在着反对干涉的行为规则,从而揭示了维护秩序的制度途径,但是他们对于在什么情况下某些干涉行动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解答。最后,世界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颇有深度的看法,但是这种思路有可能导致极大的混乱。绝大多数人试图找到一种综合的视角,上述各种论点的名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权衡这些论点。

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所不同,因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较难发挥作用的。然而,不能因为原则的多样性而认为原则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国际政治中运用道义原则呢?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如果道义判断决定一切,那么道义观念会促使愤怒情绪的产生,进而导致过激的冒险行为。谨慎是一种美德,特别是当不谨慎行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不管怎么说,死人之间是没有道德问题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否认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每个人都必须审时度势,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权衡各种考虑。国际冲突中存在着永恒逻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进行道义选择,它只是告诉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很难抉择的。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反映的道义问题与安全困境是很特殊的,但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我们在回顾国际关系发展历程的时候,会一再看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怀疑论者与世界主义者、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我们也会不断碰到囚徒的困境和战争中的伦理难题。我们还会了解到,世界舞台中的行为体如何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而且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变量是修昔底德时代所不具有的。那时不仅没有核武器,也没有联合国、互联网、跨国公司和卡特尔。国际冲突的研究是一门把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的、不甚精确的学问。在我们运用理论和实例开辟前进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记

住哪些是已经变化了的,哪些是依然如故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与现在,并且避开未来航程中的险滩。

后续阅读材料

1. Joel H. Rosenthal, ed.,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A Reader, 3rd ed.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 David A. Welch, "Can We Think Systematically About Ethics and Statecraft?"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8(1994) , pp.23—37.

伯罗奔尼撒战争年表

公元前 490 年	第一次波斯战争
公元前 480 年	第二次波斯战争

公元前 478 年	斯巴达放弃领导权
公元前 476 年	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建立
公元前 464 年	斯巴达赫洛特(奴隶)起义
公元前 461 年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公元前 445 年	三十年停战协议
公元前 445—前 434 年	十年和平
公元前 434 年	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发生冲突
公元前 433 年	雅典干涉帕提地亚
公元前 432 年	斯巴达代表大会辩论是否参战
公元前 431 年	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公元前 430 年	伯里克利葬礼演说
公元前 416 年	米洛斯对话
公元前 413 年	雅典在西西里岛战败
公元前 411 年	雅典贵族反叛
公元前 404 年	雅典战败并被迫拆毁城墙

思考题

1.道义考虑应当在国际关系行为中起什么作用?在现实中,它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能够有意地向其他国家或其他国家的人民谈论道义责任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道义责任是什么?

2.伊拉克战争是否符合走向战争的正当性以及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原则?阿富汗战争呢?

3.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内的道义责任是否一样?根据米洛斯对话,雅典的行为符合道义吗?米洛斯元老的行为符合伦理吗?

4.什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同自由主义世界政治观区别何在?建构主义给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补充了什么?

5.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哪些是直接原因?哪些是深层原因?

6.在修昔底德关于战争的描述中包含着哪种国际关系理论?

7.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是什么,它应该在何时爆发?如果是可避免的,那么如何以及何时可以被制止?

[1] Calculated from 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 and Codebook, version 4-2009；也可参见 Nils Glcditsch, Peter Wallensteen,Michael Eriksson,Margareta Sollenberg,and Havard Strand,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39:5(September 2002) , pp. 615—637。

[2] Thomas Hobbes, *Liviathan* , ed. C. B. MacPhcrson(London: Penguin, 1981) , p.186.

[3] The New York World, "From Our Dec. 13 Pages, 75 Years Ag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December 13, 1985.

[4] Miles Kahler,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1945,"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West view Press, 1977, p.38.

[5] Emanuel Adler,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ources, Contributions,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

[6] Ian Hurd,quoting Alexander Wendt,"Constuctivism," in Christopher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Jacqui True,"Femin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3rd c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33.

[8] Michael Barnett,"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60.

[9]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383.

[10] 销售额和国内生产总值是两种不同的衡量单位,前者可能夸大公司的作用。尽管如此,作这样的比较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公司的销售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

[11]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27—228.

[12]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2.63, trans. Richard Crawley； in Robert B.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Touchstone, 1996）, pp. 125—126.

[13] 1.78; ibid., p.44.

[14] 1.36;ibid. , p.24.

[15] 1.44; ibid., p.28.

[16] 1.22; ibid., p.16.

[17]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 ,p. 354.关于雅典扩张的另外一种解释,见G. E. M.de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 ,pp.60, 201 —203。

[18] Joseph S. Nye,Jr.,"As China Rise,Must Others Bow?" *The Economist* , June 27, 1998, p.23.

[19]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33, p.22.

[20] 5.89; ibid.,p.352.

[21] 1.76; ibid.,p.43.

[22] Reinhold Niebuhr,"For Peace, We Must Risk War," *Life* , September 20, 1948, p.39.



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

第二章

解释冲突与合作的工具与技巧

基本概念

为了理解某个事情,我们需要一套合适的概念工具,其中包括有用的词汇、推理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略。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自然也不例外。研究世界政治的人,不同于物理学家、工程师或者自然科学家,前者拥有相对较少的非常专业的词汇。我们常常从其他学科借用词汇,或者使用大众语言。这导致了两种后果。其一,研究世界政治的门槛很低,几乎人人都可以发表有见地的观点。想想有多少人可以在晚餐的时候谈论血浆取出法(plasmapheresis) 或者量子隧道(quantum tunneling) 呢?其二,研究世界政治的人通常面临着表达模糊与混乱的高风险。这是因为,同样一个词汇在不同的场合含义截然不同,许多单词在同样一个场合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含义。我们不可能在使用英语中避免表达模糊,但可以学会找到混乱的用法。因此,我们在深入讨论理论与历史相互关系之前,有必要花点时间界定一些基本概念。

国家、民族、民族国家

世界政治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或许就是 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 。不幸的是,这个概念的含义也是最为混乱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由两个概念,即 主权**(sovereignty)** 和 国家**(state)** ,捆绑在一起的。大多数人认为,国家(state) 是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下面将更为详尽地分析"行为体"和"体系"概念) ,尽管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于其他行为体的重要性有着不同的认识。现实主义者坚称,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仅仅是许许多多行为

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然而,"国家"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

国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单位,它有两个关键特征,即 领土 **(territoriality ）** 与 主权 。领土很简单,即一个国家统治着地球表面某个特定的、可识别的部分。主权是指统治这块领土的绝对权利。在讨论世界政治的时候,国家有两个同义词,即"state"和"country"。英国、法国、阿根廷以及日本都属于国家。拥有主权意味着不需要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权威。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地方行使主权。在传统的君主国家中,国王或者女王是主权者,享有统治其领土的最高权威。而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拥有主权,并且授权其选举的代表进行统治。但是,不管主权的最终来源是什么,所有国家都拥有政府,政府制定法律、维护秩序,并负责保护生活在其边界之内的人民。

> 当概念以两种以上的方式被加以使用的时候,是很容易引起混淆的。我的一位来自南方的同事,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开始其教学生涯。她教的第一门课是有关比较政治的,课名为"西欧国家"。她在课堂上分析各种欧洲政治制度中的不同结构与惯例。几周之后,一位学生满脸困惑,在课后羞怯地问授课老师:教授,我知道您来自佐治亚州,而这里是威斯康星州。当您说到"国家"(state) 的时候,您是否指威斯康星州呢?
>
> ——小约瑟夫·奈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利坚合众国也属于一个国家(state) 。然而,它是一个由被称为"州"("states") 的政治单位所组成的联邦(federation) 。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墨西哥,也是如此。这很可能会引起混淆。美国的密歇根、澳大利亚的南威尔士、印度的北方邦以及墨西哥的奇瓦瓦都属于州或者邦,而不是国家。这些州或者邦拥有领土,但是缺少主权。它们虽然对某个区域拥有管辖权,但是从属于联邦宪法。

另外一个可能导致混淆的原因是,"国家"(state) 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一个国家(country) 的政府(government)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构成政府的机构(institutions) 和部门(offices) 之结构(structure) 与做法(practices) 。这是政治学科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通常用法。比如,新加坡经常被冠以"强政府"(strongstate) 国家,这是因为该国的中央政府拥有很多权威,而美国则通常被称为"弱政府"(weakstate) 国家,因为该国采取制衡制度,其宪法里有很多保护个人权利的内容。很显然,美国在物质权力方面要比新加坡强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诠释"强政府"与"弱政府"这样的词汇。分清使用词汇的场合是关键。

另外一个词"民族"(nation) 经常被用作"国家"的同义词。这是一个特别令人遗憾的做法,原因在于"民族"这个词通常是指一个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宗教、历史、神话、认同(或者共同命运观) 的群体。"民族"的一个比较合适(但不准确) 的同义词应该是"族群"(ethnic groups) 。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库尔德人、泰米尔人、魁北克人以及纳瓦伙族印第安人都属于民族,但不是国家。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指出:"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民族(nation) ,它基于对自由的坚信,并忠于所有人皆生而平等的信念。"如果他用"国家"(state) 代替"民族"(nation) 的话,那么其意思会更加明确一些,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欧盟成员是"主权国家"吗?

欧洲联盟(EU) 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超国家一体化的范例。其27个成员国同意建立一些超国家机构,包括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负责立法) 、欧洲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关) 以及欧洲法院和欧洲初审法院(司法机关) 。欧盟属于一个统一市场与关税同盟,商品、服务、资本与人员可以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它试图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协调成员国的政策,并且争取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目前有16个欧盟成员国使用共同的货币,即欧元,欧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美元。与此同时,成员国仅仅在比较宽松的程度上协调共同防务与外交政策。

以上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欧盟成员国不再是主权国家了呢?从技术的角度上说,并非如此,因为每个成员国拥有随时退出欧盟的权利。然而,退出欧盟的代价是很高的,况且也很难想象会出现促使成员国退出的极端情势。毫无疑问,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想退出。相反,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正在寻求加入。

欧盟是超国家一体化的最好(但并非唯一) 的范例。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 ,但是它在3年之后就解体了。另外一个更有意思、也更成功的试验是,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乌干达在1967年组建起东非共同体(EAC) 。东非共同体曾经运行良好,但后来由于三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个人冲突而解体。2001年,东非共同体得以再生,而且布隆迪和卢旺达于2007年成为其

新成员。然而,东非共同体若要转世成功,在推进成员国共同与个别利益上的效率达到欧盟那样的程度,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通常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像库尔德人、泰米尔人这样的群体已经为此目标奋斗了很多年。如果一个国家内的绝大多数公民属于同一个民族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 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一些真正的民族国家。日本、朝鲜与韩国是很典型的例子,98.5%的日本居民属于大和民族(ethnic Japanese) ,而朝鲜民族和韩民族(ethnic Koreans) 在朝鲜和韩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具有族群上的单一性。

国家中的民族群体经常主张 自治(**self-government**) 权或者 自决(**self-determination**) 权。自决是指自我决定自身政治命运的能力,这常常包括建立国家的主张。例如,魁北克分裂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权,目的在于从加拿大分离出来,建立一个国家。有的时候,主张民族自决的群体试图使自己居住的那块土地从母国分离出去,并且合并到其他国家之中。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德意志人就是这么做的。 [2] 主张自治权的群体或许也愿意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之中,但可能寻求更广泛的权利和特权,以关照自身的事务。比如,威尔士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只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威尔士人通过威尔士民族议会享有很高的自治权。

作为一种哲学理念,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在于,民族通常是杂居的,而且分布极为分散。很难划定边界,让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即便可以做到这一点,反对重划已定边界的规范已经在20世纪产生,并且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一规范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在于要应对一种局面,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企图实现民族国家理想、有偏见、前后不一致以及不成功的行为导致了屠杀。假如是处在另外一个时代,库尔德人和泰米尔人可能会很幸运,他们要求自决的主张或许会得到大国的同情,甚至可能获得积极的政治支持。今天,国际共同体只愿意在下列情形下承认分裂行为,即种族清洗、暴政、国家以暴力方式解体,或者像捷克与斯洛伐克在1993年"和平分手"那样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样的情形很少见) 。

为了使概念清晰,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人们在使用 国家、民族 以及 民族国家 这样的词汇时真正指的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些词经常是被混用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主权国家组织被称为联合国(United"Nations") ,国家间的关系被称为国际("international") 政治。

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个群体并不能简单地划定地盘、竖起旗帜,把自己称为一个国家(尽管有一位失意的澳大利亚农民及其家人在1970年曾经这么做过)。[3] 要想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为一个国家有点像成为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必须让现有成员接纳你。

那么其他国家是如何决定自己是否承认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呢?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清单,但是有5个问题影响着国家的决策。第一,是否存在一个实际上控制某一块领土的政府?第二,其他国家是否对这块领土提出要求?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一要求有多么坚决?第三,那些试图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人是否在过去遭受压迫?第四,这些人是否认为自己的政府具有合法性?第五,承认一个新的国家具有主权是否会影响自身的主张与利益?尽管成立国家的理由是充分的,但那些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分裂主义局势的国家,通常不愿意承认新的国家,担心这会开一个先例和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得到广泛的承认,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那么新的国家就成为世界上国家共同体的一员,享有和承担国家的权利、特权以及义务。其政府在国际上被接受为其领土边界内居民的合法代表,并享有最髙权威。科索沃和巴勒斯坦是最近的两个试图成为主权国家的行为体,前者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而独立,后者则在2011年努力争取国际承认。大多数观察家坚信,它们未来将成为联合国成员。索马里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虽然在1991年单方面宣布脱离索马里而独立,但是至今未被任何一个联合国成员所承认。

被接纳为俱乐部的成员是获得国家地位的一个标志,但它并非一个完美的标志,有时会导致反常现象。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比如索马里、津巴布韦和阿富汗,虽然在国际上被承认为主权国家,但是并没有满足作为主权国家的最基本条件,即不存在一个在边界之内行使有效控制权的合法政府。

国际行为体、权力以及权威

我们在前面提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国家是否为世界政治中唯一重要行为体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分歧的。 行为体(**actor**) 指的是某个人或者团体,其决定和行为会影响国际政治。我们在笼统地谈论行为体的时候,不使用专有名词。我们只有在讨论某些特定行为体的时候,才使用专有名词。当然,从技术上说,只有人才能做出决定和采取行

动,当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行为体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出于简约目的之抽象思维。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或者读到一种说法,即德国在1939年侵略波兰。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德国人进攻波兰人。这种把国家人格化的做法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在把国家或者其他团体(如跨国公司或者非政府组织)加以人格化的时候,它可能促使我们错误地假定,这些行为体属于具有自我利益、思想以及意志的 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我们常常只有在注意到国家内部的分歧、争论、(有时甚至是)斗争之后,才可以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中看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够迅速达成结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协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各自国家军方出乎意料的、粗心大意的以及有时缺乏协调的行为感到害怕,军方的这些行为可能把两个超级大国拖入一场核战争之中。这正是国家的代理人(即军人、外交官以及官僚,他们只根据上级的指示行为)不合时宜地以行为体的角色行事的情势。当然,并非所有的行为体都是人格化了的集合体,个人也可以是国际行为体。奥萨玛·本·拉登就是一个国际行为体,博诺(Bono)也是,当然我们不可将他们置于同一个道德评判范畴。甚至电影演员也可以是国际行为体。[4] 例如,米娅·法罗(Mia Farrow)曾经试图影响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的政策。

自由主义者比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相信,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移民社群、跨国犯罪网络、毒品卡特尔、恐怖主义集团、慈善基金会、明星以及其他类型的行为体,其行为可以对国际政治产生真实的影响。但是,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其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除了"失败"国家(诸如索马里、津巴布韦以及阿富汗)[5] 之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大体上都有能力控制人员、商品以及货币的跨界流动。虽然没有国家可以施加绝对的控制,但是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二,国家通常是唯一拥有大规模武装力量的行为体。尽管其他行为体也可以小规模地使用暴力,但只有国家具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能力。当然,在失败国家或者陷于内战的国家中,次国家行为体有时也拥有这种能力。第三,只有国家拥有大量地征收和使用税收的权力。黑手党收取保护费以及毒品卡特尔借非法产业敛财,其规模不可与国家征税同日而语,而且属于违法勾当。第四,只有国家可以颁布和执行法律。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

> 体系和战争
>
> 上一次战争结束之后,在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两个阵营僵持对峙的局面。这种两极状态导致灵活性的丧失和不安全感的增强。一个国家同盟以一个极权的陆权国

家为中心,另外一个国家同盟则以一个具有扩张性商业和文化以及海上优势的民主国家为中心。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在即将来临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然是发生在一个弱小国家内部且对同盟关系影响甚微的冲突,使得两个国家同盟的危机感增强,从而引发战争。

这种情况体现在何种战争中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

以上四个原因表明,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国家拥有更多的 权力(**power**)。权力是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中另外一个基本概念。然而,权力和爱情一样,比较容易被感受到,但是很难被界定和衡量。

权力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之能力。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 把权力界定为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然而,我们要想根据别人行为的变化来衡量权力大小,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偏好。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如同狐狸一样,以为自己把兔子布里尔(Rabbit Br'er) 扔到灌木丛里受了伤,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力。我们通常很难事先知晓如果我们自己不作为,别的国家或人民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对分析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因为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可以花费很多时间来反复思考过去的事情。而对务实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他们可用的时间或许就太少了。由于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通常与该国所掌握的特定资源是分不开的,所以政治领导人一般是从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这个角度来界定权力的。这些资源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队以及政治稳定等。与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相比,这种界定权力的方法使得权力看上去更具体,更容易被衡量,更能够被预见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指的是一国在国际政治纸牌游戏中拥有多少张好牌。纸牌游戏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如果对手亮出的牌是你手中的牌所无法匹敌的,那么你就应该赶快认输。如果知道自己打不赢,那么就别挑起战争。

然而,有一些战争往往是由最终战败的国家所挑起的。这表明,政治领导人有时会冒险或者犯错误。1941年的日本或1990年的伊拉克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国际政治游戏中,对手常常不把手中的牌全部亮出来。这就好像在纸牌游戏中的玩牌技巧,比如虚张声势和欺骗,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使对手没有欺诈的行为,国家在选择最佳资源以应对某个特定情势的时候也会犯错误。例如,法国和英国在1940年时所拥有的坦克数量要比希特勒多,但是德国的军队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先进的

军事战略。

在从资源的角度思考权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权力的转换(power conversion)这一基本问题。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手中的资源转换成实际的影响力,这就好比纸牌高手往往能够以弱胜强。权力转换是指把潜在权力(用资源来衡量)变成实际权力(用别国行为的改变来衡量)的能力。为了准确地预测结果,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一国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而且也要知道该国转换权力的能力。

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什么样的资源是最好的权力基础。坦克在沼泽地中不太管用,铀在19世纪算不上一种权力资源。在历史上的较早时期,人们比较容易判断权力资源。例如,在18世纪欧洲的农业经济体中,人口是个重要的权力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征召步兵的基础。法国在人口数量上居西欧之首。因此,在拿破仑战争(1799—1815)结束后,普鲁士在维也纳和会(1815)上向胜利国提出了一个详尽的普鲁士复兴计划,以维持欧洲的均势。该计划列出了普鲁士在1805年以后所失去的领土和人口,并且提出要收复这些领土与人口。在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t)时代里,以下事实并不重要,即那些地方的很多人都不讲德语,也不把自己当作普鲁士人。然而,经过半个世纪,民族主义已经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19世纪的另外一个环境变化,就是工业和铁路系统越来越重要,这使国家可以快速进行动员。在19世纪60年代,奥托·冯·俾斯麦(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担任首相时期的德国首先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并且很快就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俄国的人口虽然总是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多,但是动员起来却很难。俄国于20世纪初在其西部建立了铁路系统,这成为1914年德国担心俄国力量增长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铁路遍及欧洲大陆,这也使得英国不能只关注海上的权力。没过多长时间,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的确有必要在欧洲投放一支军队,以防止另一个大国主宰这片大陆。

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自从1945年核时代开启以来,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一直是特别重要的权力资源。然而,核武器的毁灭性是如此之大和可怕,以至于核力量难以被灵活地加以使用。核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很多情况中,使用武力是不合适的,或者说其代价太大了。

即使一些国家被禁止直接使用武力,军事力量仍然会扮演着重要的幕后角色。例如,美国可以向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以抵制外来威胁,或者美国军队能够确保重要能源(比如波斯湾的石油)的供应不受到威胁,这意味着别国提供军事保护力量,也可以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发挥作用。

有时这种联系(linkage) 可能是很直接的,而在更多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会看到的那样,它是存在于政治家头脑中的、没有公开表述的一个因素。

迫使他国改变行为,是一种直接地或强制性地使用权力的方法。这样的硬权力**(hard power ）** 既可以依靠奖励(胡萝卜) ,也可以依赖威胁(大棒)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软的"或间接的使用权力的方式。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而在世界政治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和吸引他人,其重要性不亚于在特定情势下改变他国的行为。这种形式的权力,即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可以叫做吸引力或者 软权力**(soft power ）** 行为。软权力所依赖的资源包括思想的影响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影响别人偏好的能力。身为父母的人都知道,假如父母能够影响孩子的信念和喜好,那么父母对孩子的权力比仅仅依赖严格管制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同样地,政治领导人和建构主义理论家早就知道,决定议事日程和辩论框架也可以产生权力。确立偏好的能力总是同无形的权力资源密不可分的,这些无形的权力资源包括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

软权力并非一定比硬权力更具有效力或者更符合道德,扭曲思想不一定比扭断胳膊强。道义判断依赖于使用权力的目的。例如,在那些发起2001年恐怖袭击的追随者眼中,奥萨马·本·拉登拥有软权力。软权力也并不是只和自由主义理论有关联,而同现实主义理论无关系。像肯尼思·华尔兹那样的新现实主义者属于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s) ,不关心理念的作用。他们为了追求简约,把现实主义理论变得平淡无味。实际上,古典现实主义者,如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汉斯·摩根索,从来都把理念当作权力的一种源泉。

权力是影响他人、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之能力,不管权力资源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对于政府来说,软权力往往更不容易使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并且在有些时候一点都不起作用。然而,如果分析家们忽视软权力,那么这是很危险的。例如,1762年,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在行将为法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军击垮之时,却因为崇拜普鲁士君主政体的俄国新沙皇彼得(1728—1762) 让俄国军队撤出反普联军而大难不死。又比如,1917年,英国在美国人眼中比德国具有更大的软权力,这促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英国一边。更近的一个例子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增强了美国的软权力,这是因为其形象与主张在原先敌视美国政策的那些地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把这些软权力资源变成具体的结果,却是很不容易的。

硬权力和软权力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又不是一回事。物质上的成就会使得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则会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然而,软权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权力。梵蒂冈的软权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今天,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欧洲拥有很强的软权力,但是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这种权力就被浪费掉了。许多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拥有强大的软权力,但是美国后来所推行的那种缺少睿智以及莽撞的单边主义政策损害了其软权力。

今天,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观察过去5个世纪里的现代国家体系可以看出,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权力资源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在今天的世界里也会继续发生变化。不仅如此,在世界不同地区,权力资源也有所不同。软权力在信息时代后工业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民主和平思想占了上风;而硬权力则往往在世界上那些正处于工业化或者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地区更加重要。

> 知晓何时使用硬权力,何时使用软权力,何时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能力,我称之为巧实力(smart power)。
>
> ——小约瑟夫·奈

在信息经济和跨国相互依赖的时代,权力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转移、不太具体和缺少强制性,本书将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对此做更为详尽的论述。传统的分析家主要会根据哪一方军队获胜来预测冲突结果。今天,在诸如反对跨国恐怖主义斗争这样的冲突中,谁讲的故事更吸引人,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使用硬权力对付死硬的恐怖主义者无疑是需要的,但使用软权力来赢得主流民众的心也同样是重要的,否则民心会被恐怖主义者夺去。

世界各个地方的权力变迁情况并不相同。在21世纪,信息和制度权力肯定会起较大的作用,但是中东局势也告诉我们,硬的军事实力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市场和自然资源意义上的经济规模也将依然重要。随着现代经济体中服务行业的发展,今后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信息量将变得更大,快速和灵活反应的组织能力将是重要的资源。政治凝聚力以及具有普世性和可输出的大众文化,也将依然十分重要。

请注意权力与 **权威(authority)** 之间有点复杂的关系。如果权威得

到其他人的尊重,那么它就可以是权力资源。但是,你可以拥有权力,而不具有权威。美国在1954年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使用权力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总统雅各布·阿本斯·古兹曼(Jacobo Arbenz Guzman) ,但不具有这样做的权威。危地马拉是一个主权国家。权力是一个实证的概念,而权威则是一个道义的、规范的或者法律的概念。权威要求有合法性。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虽然在权威的法律分布上说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在权力分布上从来就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在单极体系中,一个国家享有权力主导地位,可以有效地决定国际合作的条件,并且使别国同意或者接受。在两极体系中,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或者对其盟国(实力较弱的国家或者仆从国) 拥有主导权。在多极体系中,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拥有很大的权力。我们通常把单极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称为 霸权国**(hegemon,**来自希腊语中的"领导者") ,把现代两极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称为 超级大国**(superpowers**) ,而把多极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称为 大国**(greatpowers**) 。

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

我们一直都在使用"体系"这个词。那么,体系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字典的解释, 体系**(system**) 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单位。体系的单位或者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方式可能有点复杂。我们用 结构**(structure**) 这个词来描述单位的权力分布,用 过程**(process**) 这个词来描述单位之间的互动。在一个给定时期内结构和过程两者的区别,可以用纸牌游戏来加以解释。纸牌游戏的结构即权力分布,它指的是玩牌的人手中有多少筹码以及需要应对多少张好牌。过程指的是游戏如何进行以及玩牌人之间互动的类型是什么样的(规则是如何制定和理解的?玩牌者是否为高明的虚张声势的人?他们遵守规则吗?假如他们骗人,是否会被人识破?) 。例如,允许参加囚徒困境游戏的人进行相互间的沟通,会改变游戏的性质。同样地,当国家进行相互沟通和达成互利协定,或者创立被充分理解的规范与制度时,这会改变国家传统的战略选择,从而改变政治后果。

国际体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系,即政治体系。我们很容易对很多国内政治体系加以定义,因为它们都包含着明显的制度性的东西,比如总统、国会和议会等。而当今国际政治体系则不然,它比较分散和不具体。即使没有联合国,国际体系也依然是存在着的。然而,我们切不可被国内政治体系的具体性所误导。国内政治体系中也包含不具体的方

面,比如公众态度、新闻界的角色,或者宪法中的不成文惯例等等。换句话说,体系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理念性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计算机、人的身体以及生态圈,都属于物质体系。计算机有电源、处理器、内存条、总线、键盘、存储设备以及显示器等等,它们依据物理学原理而进行互动。语言属于理念体系,其构成部分是词汇,它们根据语法与句法规则而进行互动。国际体系是物质因素与理念因素的混合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把某个事物视为一个"体系",属于一种脑力家政(mental housekeeping)练习,因为到最后所有东西都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相互联系。比方说,我们通过分清计算机与计算机工作所需要的电力,以及分清电力与河流大坝的水力发电过程,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认识世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也是头脑中建构出来的一种东西。国际体系的发展,不仅受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而且也受其他体系的影响。例如,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降雨类型改变、植被变化以及大规模移民等等。这些变化有可能引发国内冲突(如达尔富尔冲突)与国际冲突。我们从理论上也可以说,太阳系可以通过大气系统影响到国际政治体系。但是,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看作一个庞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做是不明智和适得其反的。把国际体系视为某个独特的东西,这可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尽管所有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

虽然国际体系的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但是该体系并非无秩序。所有全球互动关系都是有秩序的,因为这些互动关系都呈现出有规则的、大致可预见的格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互动关系是受规则约束的。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虽然国际法比国内法要弱,但事实上遵守国际法的情况通常与遵守国内法的情况差不多。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比较少见的,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律体系受困于大量的刑事与民事违法行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体系(比如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之标志是:存在着处理争端的制度与惯例;大多数冲突得到和平解决;存在着一套具有权威性的规则(法律、规章、方针、普遍接受的惯例等);规则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具有对付不遵守规则行为的手段。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答案在于,世界上只有少数地区可以说是处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中。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台球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台球之间盲目地相互碰撞那样,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国际体系具有 **社会性(social)**。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即从权威分布上说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 **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存在着行为规则、内容日益丰富的国际法、明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甚至

是国际礼仪规则(外交惯例、荣誉之类的）等等,简单地说,这些都是"文明社会"(polite society）的特征。轻视规则的行为会导致国际冲突,正像轻视规则的行为会在日常生活中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一样。俾斯麦通过违反公认的外交规范,先是在没有事先与法国协商的情况下试图让普鲁士人担任西班牙国王,然后是把法国秘密的外交文件透露给国际新闻界[即著名的埃姆斯电报(EmsTelegram）],从而有意地挑起了普法战争(1870—1871）。[6] 现实主义者为一方,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为另外一方,对于国际体系社会性的真实程度,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的社会性是很弱的、表面上的。而在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看来,国家行为所受到的社会制约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上面两个派别的人都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层面因素将促进有秩序的交往。

体系稳定与危机稳定

能够承受冲击、不走向解体的国际体系就是稳定的。假如体系不能服务于既定的目标,那么它们就会解体。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其成员的主权与安全。小规模战争不一定导致体系的瓦解,因为在有的时候,维护某些国家的主权与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由于这个原因,澳大利亚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详尽地论述战争是一种制度,即一种被认可的、有规则的维护秩序的做法。[7] 但是,大规模战争会危害大多数国家或者所有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因而导致体系的不稳定。

那么,什么因素有助于体系稳定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中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特性。维系国家间关系的规范与制度纽带越强大,国家间关系就越密切,国家防止体系解体的利害关系就更大,国家就有更多的途径防止冲突失控并解决冲突。如果社会因素比较弱,那么体系就会更像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换句话说,国家就要更加依赖于自助(self-help）。

在像肯尼思·华尔兹这样的体系理论家们看来,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中,权力分布对于体系稳定来说至关重要。当国家通过平衡霸权国家来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或者一个新兴的国家挑战领导国的时候,单极体系就开始走向瓦解了。在多极或者权力分散的体系中,国家会缔结同盟以实现均势,但是同盟关系是很灵活的。在多极体系中,战争可能发

生,但其规模是相对有限的。在两极体系中,同盟变得比较僵硬,从而可能导致大规模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的分析家声称,"两极体系或者消亡,或者爆炸"。这种情况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当时雅典和斯巴达都加强对各自盟友的控制。1914年前夕的形势也是如此,当时欧洲的多极均势开始逐步演变成两个强大同盟体系的对峙,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灵活性。然而,用多极还是两极体系来预测战争的分析方法,却解释不了1945年以后的现实。在冷战时期,世界是两极的,美国及其盟友和苏联及其盟友是两个主要角色,然而一直到苏联解体导致两极体系瓦解时的四十多年里,全面的大战并没有发生。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世界大战的前景太可怕了。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大致解释体系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单靠体系层次的分析并不能充分解释问题。

有关冷战体系很稳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冷战体系表现为 危机稳定**(crisis stability**) 。在一个危机不稳定(crisis-unstable) 的情势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紧张的国际危机之中,那么它们面临极大的压力,从而首先进行攻击。我们以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加以说明。假定你和敌手站在一块空地上,而且都拿着枪。双方都不能肯定对方的动机。如果你认为应该首先开枪,那么你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这么做。先开枪的一方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这样的情势非常可能会升级,从而导致暴力行动。

现在再想象你和敌手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里被浇上汽油,每个人都有火柴。在这种情势中,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去点燃火柴。假如你这么做的话,那么敌手无疑会被烧死或者严重烧伤,但是你自己也不能幸免于难。于是,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就属于一种危机稳定情势。

在很大程度上说,危机稳定是由于技术的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技术的主流信念之作用,它体现在军事理论之中。当主流军事技术被认为有利于进攻一方的时候,决策者会有首先发动进攻的压力。当主流军事技术被认为有利于防御一方的时候,决策者则没有首先发动进攻的压力。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欧洲领导人相信发动进攻对自己极为有利,于是1914年的7月危机很快就升级了。(很不幸,他们的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正如此后持续4年的大屠杀所显示的,那些自我防御充分、配备有机关枪并得到大炮支持的步兵,可以把进攻的军队撕成碎片。) 在冷战时期,有关军事技术的主流信念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无法抵御核攻击,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可以依赖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行动之能力,来抵御对方的核攻击。这一情势被恰当地称为"相互确保摧毁"(MAD) ,它属于高度的危

机稳定情势。

"国家利益"

我们需要界定清楚的最后一个基本概念就是 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领导人和分析家都声称,"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事'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国家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的。否则的话,它没有多大意义。

现实主义者声称,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国家在界定自己的利益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必须根据均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否则自身的生存就成问题。正如理想市场中的一家公司,如果只考虑利他而不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那么肯定是要破产的。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它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并且预示着该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对国家偏好和国家利益是如何形成的提出了更多的解释。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看重经济福利和贸易,并且认为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个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就不同于专制国家,尽管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不多。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国际制度和沟通渠道使得国家间产生相互信任,那么上述论点是尤其正确的,这有助于国家摆脱囚徒困境。

既然非权力的动因可以影响国家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判断一种特定情势是否接近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体系中,明天你可能被自己的邻居所杀害,有关民主或者贸易的偏好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很有限的。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制度以及对和平的稳定期望减轻了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么那些与国内社会和文化相关的其他因素就可能起到较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的预言比较适用于中东,而自由主义者的预言则比较适用于欧洲。分清不同的场合,有助于我们衡量不同理论的预测力。

我们需要记住,有关国家利益的界定几乎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们虽然会

在抽象层面上一致认为权力和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对于促进国家利益的具体政策则经常存在着分歧。有的时候政策偏好是完全对立的、不可兼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辩论,一些人认为维护美国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卷入欧洲与东亚的权力政治之中,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维护美国的安全,有赖于积极地与他国一道遏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崛起的大国及其帝国野心。在另外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论中,一方认为道义与追求国家利益是互不相关、不可兼容的,另一方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正义观是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置疑的一个事实是,试图采取某种对外政策的人,总是会给它披上一件国家利益的外衣。换句话说,国家利益的概念不仅仅是国家重大目标的简单表述,也是决策者与政策分析家论争的对象。

后续阅读材料

1.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47, No. 3(Summer 1993), pp.327—352.

2.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分析层次

体系大于构成体系的部分之和。体系能够导致任何体系成员都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们用经济学中的市场体系来打个比方。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所有商务公司都努力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但是市场体系所导致的竞争会把公司的利润减低到收支相抵的水平,从而让消费者受益。商人并无意让消费者受益,但是理想市场中的行为模式会导致这一结果。换句话来说,体系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与体系行为体的愿望大相径

庭。

国际政治体系可能导致行为体始料未及的结果。例如,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他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整个国家间的外交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极其荒唐的东西。他们试图摧毁国家体系,认为革命将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废除边界。无产阶级的跨国联合将取代国家体系。事实上,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领导俄国外交部的时候,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人民发布革命的宣言,然后把世界"连为一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发现自己本身就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其行为受到该体系的制约。1922年,这个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与德国签署了《拉巴洛条约》,两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世界所排挤的国家结成了同盟。约瑟夫·斯大林接着在1939年同自己最大的意识形态敌手阿道夫·希特勒缔结了一项条约,旨在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尽管苏联在刚成立的时候发布了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也表述了革命的幻想,但苏联的行为很快就变得同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没有什么不同。

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传统的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因为邻居之间接触比较多,发生摩擦的机会也比较多,这就难怪在1816—1992年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军事冲突是发生在邻国之间。[8] 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我们经常可以在无政府体系中找到此种行为模式的例子。例如,早在基督诞生之前3个世纪,印度作家考提亚(Kautilya)就指出,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倾向于同远方的国家结盟以保护自己,从而导致跳棋盘似的同盟模式的产生。马基雅维利也提出,公元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有类似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非殖民地获得独立并建立国家,而且热衷于讨论非洲国家的团结这个话题。但是,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很快就开始建立考提亚所说的古代印度那种跳棋盘似的同盟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加纳、几内亚和马里比较激进,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则相对比较保守,但是它们都通过结盟来对付自己的邻国。另外一个例子是越南战争后东亚所形成的格局。如果在地图上把苏联和越南涂成黑色,把中国和柬埔寨涂成红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跳棋盘似的格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依据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即一个国家倒向共产主义会引起其他国家步其后尘。假如美国较有远见的话,它应该把东亚看作一个跳棋盘,而不是多米诺骨牌,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陷入越南。跳棋盘格局的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即"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它有助于我们有效地预测国家在无政府情势中的某些行为。

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模式与倾向呢?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控制实验条件那样,来左右世界政治。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它,而不能像做实验那样去控制它。这几乎总是意味着,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根本就缺少一些发现与否定错误结论的有效手段。然而,我们常常就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出判断,而且这样做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能够用上哪些技巧与窍门呢?

体系并不是解释国际政治的唯一视角。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即他所说的三个"意象"(image):个人 、 国家 和 国际体系 。常常被论及的跳棋盘模式,即"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更多) 层次上的动力所致。因此,为了确定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需要判断哪一个分析层次最具解释力。我们既可以关注个人(比如领导人) 的行为动机(个人层次分析) ,也可以观察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国家层次分析) ,还可以分析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体系层次分析) 。

个人层次

个人层次的解释是很有用的,因为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大部分分析家相信,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只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合作,美国都会进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并且推翻塔利班政权。假如是阿尔·戈尔(Al Gore) ,而不是乔治·W.布什,赢得200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依然会看到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或者其他类似的行动。然而,很少有分析家认为,"戈尔总统"会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不管是国内政治因素,还是体系因素,都没有使伊拉克战争像阿富汗战争那样是不可避免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被选择的战争,为了解释这场战争,我们有必要探讨布什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选择打这场战争的特别原因。

毫无疑问,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萨达姆·侯赛因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面对着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且手中掌握着最后决定权。然而,从个人层次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这是情势结构中的某种东西使然。同样地,了解德国

皇帝威廉二世或者希特勒的个性,对于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够充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德皇在1890年解除奥托·冯·俾斯麦的首相职务是很重要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威廉二世带来的。

运用个人层次分析法的一个方式,就是聚焦个人的特点(诸如他们的个性、生活经历之类的)。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从人的共性(即人所共有的"人性")去寻找解释问题的答案。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加尔文主义国际政治观,把战争的终极原因归结于我们内心的邪恶。这样就可以把战争解释为人性不完美的产物。但是,这种解释的预见力过大。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邪恶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邪恶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善良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善良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有关人性的通论有时会导致不可证伪的解释。一些现实主义者把冲突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对权力的持续追求。比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y)声称:"我们可以很自信地提出一种有关战争目标的通论。战争的目标只是权力的各种表现而已。自大的民族主义、传播意识形态的意志、保护邻近国家的同胞、贪图更多领土或商业利益、为失败或者屈辱后果采取报复行为、渴望国家更加强盛或者独立、希望影响同盟关系或者缔结同盟关系等等,都是权力的不同包装。竞争国家之间的目标冲突,总是权力冲突。"[9] 假如把每一个目标都视为对权力的追求,那么"权力争夺导致战争"的说法,就属于不可证伪的同义反复。什么都能解释,也就等于什么都解释不了。

有关心理倾向性的解释更有价值。许多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心理因素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都是(或者可以被假定为)"理性"行为体。假如他们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了理解或者预测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只需要搞清楚每一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根据这一观点,任何一个理性行为体在面对囚徒困境那样的情势时,都会选择背叛而非合作。然而,尽管有些人的确根据精确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而做出决定,但由于缺乏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即便有此可能性,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或不能以这种方式做决定。利用心理因素解释那些明显与"理性"行为不相符的现象就很有意义。

这正是考察全球冲突与合作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它有四种主要路径。第一种路径是 **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认知心理学考察人们试图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之过程。认知心理学家表明,人们是通过寻找他们正在努力理解的事物与他们已经知道或者相信的事物之间的共性,换句话说,是通过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与不熟悉事物之间

的共性,来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领导人,因为震惊于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独裁者给世界所带来的恐怖后果,所以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位声称自己遭受其他国家不公待遇的独裁者,实际上都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侵略者。他们的这种认知有时是对的,而有时则是错误的。他们犯认知错误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1956年,当年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宣称,埃及有权控制苏伊士运河,因为该运河通过埃及领土。当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法国与英国领导人得出结论,纳赛尔"就像希特勒",其行为必须受到制止。其结果是爆发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中东政治变得极为复杂,使得北约盟友之间产生矛盾,转移了世界对苏联压制匈牙利的注意力,以及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权力地位与声誉。

第二种路径是 动机心理学(**motivational psychology**)。动机心理学家从根深蒂固的心理恐惧、欲望以及需求,来解释人类行为。这些需求包括自尊、社会认可以及效能感。比如,动机心理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所有的德国外交官,都针对欧洲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奥地利和德国军事行动的措施,提交了错误的或者把人引入歧途的报告。他们只是害怕,说了德国外交部不愿意听的话会有不好的后果。众所周知,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门听不进不同意见。唯一一位准确地判断了英国可能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做出反应的德国外交官,就是德国驻伦敦大使卡尔·利希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Karl Lichnowsky),但他被柏林以"已经变得像当地人"的理由而解除职务。德国政府所犯的这个判断错误,可以用已经得到充分论述的动机心理倾向来加以解释:即试图逃避自我承认错误所带来的心理痛苦。1914年德国整个速战速决战略是建立在英国不参战的基础之上,如果利希诺夫斯基的报告被接受,那么它会起扰乱决策的作用。

第三种路径,也是较近出现的一种,就是运用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原理,尤其是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解释了那些不符合理性的行为,认为人们所做出的决定是很不相同的,这取决于他们面对的是获益的前景,还是亏损的前景。人们通常愿意冒较大风险去规避损失,而不愿意冒较大风险去争取获益。搞清楚领导人如何进行选择,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预测他们会有多大的意愿去采取冒险行为。很多存在选择的情势,同样可以用成本或收益的语言(100个人中损失10个人,等于90个人保住性命)来加以描述,战略选择思维会促使人们做出不同的决定。比如,人们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规避损失的一般倾向,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注定失败的路线增加投入。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徒,在老虎机上输得越多,越不愿意停止下赌注,这是因为他(或她)想把输掉的钱赢回来的欲望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同样地,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丧生的人数越多,就越不愿意认输。那

些失意的赌徒和打败仗的领导人,常常落得个输得精光的下场。

第四种路径,即 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 ,以心理动机解释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这一路径帮助人们从公认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错乱症中发现古怪个性特征。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乔治与朱丽叶·乔治(Alexander and Juliette George) 有关伍德罗·威尔逊和豪斯上校的心理传记,它试图解释美国在巴黎和会中采取强硬立场,以及随后未能参加威尔逊自己筹建的国际联盟之行为。他们从威尔逊的控制欲、不愿意妥协的立场以及容不得反对意见的倾向,来解释美国的行为,而且认为所有这些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威尔逊在孩提时代受虐于父亲专横行为的痛苦经历。 [10] 同样引人入胜的是许多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传记,它们强调希特勒试图补偿自我憎恨、性挫败的欲望之重要性。 [11] 如今,美国情报部门常常编写外国领导人的心理传略,旨在更好地预测这些领导人的行为。然而,心理传记学虽然总是很引人入胜,但它与其鼻祖弗洛伊德心理学传统一样都具有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不可证伪和难以证实。假如有关国际政治事件的解释,要依靠了解世界上的领导人(其中很多人已经去世或者无法被加以细致考察) 潜意识里的恐惧、需求以及欲望的话,那么它们就很难令人信服。

国家层次

当我们试图在国家分析层次上解释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世界政治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为国内政治、国内社会的各种特征或者政府机构所导致。国内层次的思考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么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从埃皮达姆努斯贵族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国内冲突开始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国内政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冷战的结束,我们必须考察苏联内部的因素,即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很容易找到国内政治起作用的例子,但是我们因此可以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吗?除了说国内政治很重要之外,我们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它们都注重第二个分析层次,认为国内社会性质类似的国家行为相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在列宁看来,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战争:"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 [12] 可以

用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来解释战争的原因,即财富分配的不平均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停滞以及缺少国内投资。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向外扩张,以便在外国市场销售剩余产品,创造对外投资机会,并且确保自然资源的获得。帝国主义也通过增加军费开支来刺激国内经济。于是,马克思主义预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军备竞赛和冲突。正如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所了解到的,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不仅如此,它与20世纪下半期的历史经验也不相吻合。像苏联、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共产党国家都卷入了相互间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导致战争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古典自由主义,即19世纪在英国和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和平的倾向,因为战争会对商业造成损害。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贸易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科布登领导了反对英国谷物法令的斗争。英国谷物法令属于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它指导英国的国际谷物贸易长达500年之久。科布登同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贸易和繁荣比战争要好。他声称,如果我们希望国家越来越富裕和公民的福利不断得到改善,那么和平是最好的选择。他在1840年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观点:"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13]

自由主义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影响很大。一些著作,包括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经典著作《大幻觉》(1910),声称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战争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可以用那个时代慈善家的例子,来说明一战前夕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态度。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1910年创建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想到了持久和平到来之后基金会款项的用途问题,所以他在遗嘱中写上一个相关条款。一位名叫爱德华·吉恩(Edward Ginn)的波士顿出版商,为了不让卡内基把即将到来的持久和平都归功于自己,于是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与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宗旨一模一样。吉恩也考虑到了持久和平到来后基金会余款的用途问题,所以他要求把这些钱用于为年轻的工作女性提供廉价住房。

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虽然银行家和贵族间的跨国交流十分频繁,劳工也有国际联系,但是它们并不能阻止欧洲国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统计分析表明,一国介入战争与该国是否为资本主义或民主国家并无多大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它们都是从国内政治,特别是从经济制度的性质寻找战争的根源。

国家层次的解释存在着与人性角度的解释相同的问题。如果某种类型的社会能导致战争,那么为什么有些"坏的"社会或者"坏的"国家不介入战争,以及为什么有些"好的"社会或者"好的"国家也会介入战争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民主的"、"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定性为"好的"或"坏的"国家。举个例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热衷于一种观念,即民主国家的胜利将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但是,民主国家也会介入战争,而且经常这么做。不管怎么说,雅典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所有国家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战争就消亡了。然而,我们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诸如中国和苏联、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因此,社会性质,不管是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不足以决定国家是否介入战争。

有一种观点(本书后面将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那么战争就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虽然世界上发生过很多场民主国家同极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我们确实难以找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我们尚不清楚民主国家之间迄今为止无战事的原因,而且也不知道这种局面今后能否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民主国家间尚无战事的事实告诉我们,从第二个分析层次探讨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相对较近出现的从国家层次进行探讨的路径,就是 官僚政治学 **(bureaucratic politics)** 。官僚政治学的解释,其关注点不在国家的国内政治或者经济安排,而在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员的相互作用。官僚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组织动力(organizational dynamics),特别是所有复杂性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赖以运行的惯例和标准运作程序。可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般欧洲国家军队,特别是德国军队,所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很死板,这限制了领导人在危机关头的选择余地。这一点再加上"进攻崇拜"(即美化骑兵和战术机动),使得1914年7月和8月的形势具有高度的危机不稳定性。官僚政治学的另一个分支强调官僚部门狭隘利益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通过分析军方部门之间如何争抢资源导致不断推高预算,以及让对手感觉更不安全并增加防务支出,最终导致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我们就可以解释军备竞赛。官僚政治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可能就是迈尔斯定律(Miles's Law):"职位决定立场"。假如迈尔斯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参与政策辩论的决策者们所努力追求的,就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的利益。我们既可以找到支持迈尔斯定律的证据,也可以找到否定迈尔斯定律的证据。有一些个案符合该定律。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州长手下担任加利福尼亚州财务总监的时候,由于大力削减预算而被称为"大刀卡

普"(Cap the Knife）。他后来在担任里根总统的国防部长时,却致力于提高军费开支,因而被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称为"联邦赤字战中的一个逃兵役者"。[14] 然而,也有其他研究成果表明,官僚职位与政策偏好之间的联系不大,或者说一点联系都没有。不管怎么说,虽然有关官僚政治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特定的政策选择,但是也可能难以帮助我们解释世界政治的一般模式。

体系层次

有意义的解释通常都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分析层次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能够令人满意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解释,可能需要把以下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僵硬的两极体系(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危机不稳定的军事计划和军事学说(这是国内军事文化的产物,德国最为典型）；主要领导人犯下严重的判断错误(心理因素）。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在三者之中,何者最为重要呢?我们是应该从外到内开始进行分析吗?从外到内的分析,意味着从体系层次开始分析,也就是探讨整个体系如何制约国家的行为。或者说,我们是应该从内到外开始进行分析吗?从内到外的分析意味着从个人或者国家层次开始进行分析。

由于我们通常同时需要不止一个分析层次的信息,那么应该首先从哪个层次着手分析呢?一般来说,人们通常首先采取最简明的方法进行分析。如果简明的解释是恰当的,那么它就比复杂的解释更为可取。这就是"简约原则"(rule of parsimony）或者"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它来自14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c. 1287-1347）。奥卡姆的威廉认为,好的解释方法必须抛开不必要的细节。简约——以简单语言概括较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判断理论是否恰当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关注理论的适用范围(range of a theory,即理论可以解释多少行为）和解释力(explanatory fit,即它可以解释多少不甚清楚的目的和反常的现象）。不管怎么说,简约是我们着手分析的起点。体系层次的解释最为简明,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分析起点。如果体系层次的解释被证明是不恰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体系内部的单位,增加分析的难度,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

体系分析到底是简明一点好,还是复杂一些好呢?肯尼思·华尔兹等一些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主张极致的简约,只把注意力放在结构上面。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华尔兹的体系概念过于简明,解释不了多

少东西。

经济学家把市场结构称为卖方权力的集中。寡头垄断指有一个大的卖方,双头垄断指有两个大的卖方,多头垄断指有多个卖方。而在理想的市场中,卖方的权力是极其分散的。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会让消费者获益。但是,如果市场是寡头垄断或者多头垄断,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寡头垄断或者多头垄断体系中,大的公司会通过减少生产和抬高价格来增加利润。因此,当体系结构是已知条件的时候,经济学家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预测公司会采取什么行动以及谁将获利。同样地,国际体系结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体系中的国家行为。请注意,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我们不需要了解公司内部的情况,或者说不需要了解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个性,就可以理解或者预测整体的市场行为。我们可以假定,公司都是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这是因为公司如果不以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或者近乎于这种行为体）经商的话,那么最终都将倒闭。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它们终将被体系所淘汰。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适应市场规律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当然,寡头或者多头垄断市场中的公司并不一定如此。我们如果想理解那些市场,有时就必须理解左右公司与个性的因素。

国际体系真像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吗?其实两者并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但是它们极少"被体系所淘汰"。因此,我们似乎更难把国家假设为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然而,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中,国家总是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自我保护,为自身的安全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财富与权力。那些不能够捍卫自身安全的国家(可能是因为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为邻）,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找盟友。它们可能试图去平衡最强大的国家。这一逻辑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影响最广泛的体系理论,即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民主与和平

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对美国来说是好事。不管怎么说,民主国家更可能 保持稳定,而不太可能发动战争。民主国家增强了公民社会的力量。民主国家为人民提供了建设自己家园的经济机会,而不会让他们逃离祖国。我们所采取的帮助民主建设的措施,会让我们大家都更安全、更繁荣、更成功,我们要让这个充满巨大变革的时代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敌人。

——威廉·克林顿总统在第4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

话,1994年9月26日

自由要在我们国家中得以生存下去,越来越有赖于自由在其他国家中获 得成功。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维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就在于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美国的根本利益以及我们最基本的信念现在是一致的……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寻求与支持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在每一个民族与文化中得到发展,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埋葬暴政。

——乔治· 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二次就职演讲,2005年1月20日

后续阅读材料

1. J. David Singer,"The Levels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1969）,pp.20—29.

2. Jack S. Levy,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A Levels-of-Analysis Approach,"in Chester A. Crocker and Fen Osier Hampson, eds., *Managing Global Chaos: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6）, pp.3—24.

范式与理论

我们为了对某个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需要采取一种方法来组合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与技巧。告诉我们如何使用工具的概念工具包(conceptual toolkit)或者"手册"(handbook),通常被称为一种"范式"(paradigm)。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urton)所说的,范式是指"一个分析学派所采用的基本假定、概念以及命题之系统陈述"。在默顿看来,范式具有"标志功能"(notational function),它可以让概念有序排列,明确阐明假设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它们促使那些帮助我们观察世界事务的有用理论不断增多,帮助我们发现新的问题,以及推动严谨的分析、超越单纯的描述。[15] 范式可以被看作是我们构建越来越高深的(以及越来越专业的)知识结构之基础。

结构本身就是理论。理论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性陈述。我们从范式中得到理论。

我们利用 **假设(hypotheses)** 来证明理论。假设是关于我们在理论正确的前提之下可以从世界中观察到什么的一种陈述。如果我们的期望破灭了,那么我们就要放弃自己的假设,重新构建(或者抛弃)理论。如果我们的期望得以实现,我们就认为理论得到证实,继续对它加以发展和完善,或者构建与此兼容的其他理论,逐渐构建起一整套让我们信服的、关于世界的命题。我们经常会放弃一种解释力不强的范式,转而喜欢另一种范式。牛顿范式主导物理学长达几乎300年之久,它很好地帮助我们解释了物理世界在大多数条件下是如何运行的,它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多实际用处。但是,牛顿物理学不能帮助我们解释,在极短时间和距离内,或者在其速度接近光速的条件下,物体是如何运动的。后来出现的范式,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在世界政治研究中,有四种最主要的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建构主义。每一种范式都有明确和肯定的假定,它们被称为"公理"(公理总是需要的,因为人们不可能质疑所有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实际上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事情)。每一种范式都使用特定的一套概念,尽管这四种范式经常使用相同的概念。每一种范式导致特定的理论。表2.1简要比较了这四种范式。

表2.1 范式的基本特征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建构主义
基本行为体		国家	国家、非国家行为体	经济阶级	国家、非国家行为体
基本公理	主要人类动机	恐惧、统治欲	恐惧、对生活美好的祈求	贪婪	追求有秩序、有意义的社会生活
	行为体主要目标	所有国家追求权力或安全	行为体追求安全、财富与正义	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工人阶级追求合理工资与劳动条件	行为体利益是通过互动社会建构的
基本公理	行为体主要手段	军事实力	军事实力、贸易、投资、谈判说服	财富(资产阶级);劳动(工人阶级)	取决于历史和社会背景
	主要互动过程	竞争	竞争与合作	剥削	取决于历史和社会背景
	国际体系基本特征	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	非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	经济不平等	社会制约因素(如法律、规则、规范、禁忌)
主要理论		均势理论、霸权转移和霸权战争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民主和平"论	依附理论;革命理论	结构化理论;规范演进理论

现实主义

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内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表2.1所表述的现实主义显得很简单,但实际上现实主义是一顶巨大的帐篷。各个分支的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所有的政治归根结底都是权力政治。但是,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时也称"结构现实主义") 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像马基雅弗利和摩根索那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既重视观念因素,也重视物质权力。在他们看来,对外政策既可能源于国内原因,也可能源于体系压力。他们甚至提到道义方面的考虑会起到塑造外交政策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倾向于认为道义的此种作用不够强大,也不太实际。古典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采用人

文主义路径,而非科学路径,去研究世界政治。在古典现实主义者当中,很多人是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与此相反,新现实主义者试图模仿自然科学,而且更关心构建纯体系理论。

现实主义内部还有其他差别。"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强调安全为国家最重要的目标,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关注权力。它们属于剑桥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 所说的"硬现实主义者"(hardrealists) 的两个变种,不同于那些强调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软现实主义者"(softrealists) 。很多所谓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的学者,比如赫德利·布尔,大体上属于"软现实主义者"的范畴。

因此,现实主义有点像芭斯罗缤冰激凌(Baskin-Robbins) :共有31种风味,但都属于冰激凌。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都持一种观点,即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个不变的逻辑,其最好的表述就是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 于1848年在英国国会下议院所说的: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然而,当前在现实主义内部还有很大的争论空间,也有不少颇具活力的研究纲领,这些研究纲领试图帮助我们回答如下问题:国家到底是平衡权力,还是平衡威胁?国家何时采取均势行为,何时采取搭便车行为?美国未来还能够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吗?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世界政治将会如何变化?

自由主义

我们在前面没有像探讨现实主义那样,花很多篇幅来论述自由主义。因此,我们准备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自由主义。这或许很有意义,因为自由主义最近正在得到复兴。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使得自由主义理论名誉扫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美国的国际政治著述都带着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然而,随着跨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重新开始对自由主义理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自由主义思想有三个分支: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制度,一种关注民主。

经济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贸易。他们认为,贸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国家介入战争,而是由于它会使国家以特定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它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战争。贸易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

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征服来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途径。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提到了日本的例子。[16]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认为获得市场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因此试图征服其邻国,迫使它们同日本进行特惠贸易。芝加哥经济学家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 早在1939年就指出,日本的部分行为可以用经济保护主义来加以解释。斯特利认为,当经济围墙沿着政治边界构筑起来之后,占有领土与经济机会是相统一的。避免战争的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在一个开放的、没有军事征服的贸易体系中寻求经济发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通过贸易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柏林墙倒塌

现实主义回答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有别的国家向它提供了安全保障。日本尤其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以抵制邻近的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国的安全威胁。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不再介入东亚的安全事务,并且会增加针对日本的贸易壁垒。日本将会重新军事化,美国和日本之间最终会发生冲突。但是,自由主义者反驳说,当今日本的国内社会同20世纪30年代大不一样,它已经属于世界上军国主义色彩最弱的国家之一。其部分原因在于,在今天的日本,最吸引人的职业是商人,而不是军人。他们认为,现

实主义者未能对国内政治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且没有注意到日本已经由于经济机会而发生变革的事实。贸易可能并不能防止战争,但是它会改变动机,从而可能导致一个战争倾向较小的社会结构。

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分支是社会自由主义。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冲突。这种跨国交流在学生、商人和游客等多种层面上进行,使得相互间不那么陌生和敌对,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事实的证实,也遭到了其他一些事实的否定。在1914年的时候,银行家、贵族和工会领袖的国际接触的确很频繁,但是这并没能阻止他们穿上戎装并相互杀戮。很显然,有关社会接触促进理解和防止战争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然而,这种观点对我们理解问题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的欧洲同1914年的欧洲是大不一样的,跨国交往十分频繁,教科书的编者们努力公正地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同1914年相比,如今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形象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舆论调查表明,欧洲认同观念正与国家认同观念共存。欧盟的伊拉斯谟项目(the Erasmus Program) 鼓励学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学习。跨国社会的存在,影响着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本国对外政策的看法。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法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反应。虽然对外政策专家们对此有些焦虑不安和不知所措,但是民意测验却表明,大多数法国人欢迎德国统一。这与法国人对1871年德意志国家第一次统一的态度形成了巨大反差。

自由主义第三个分支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强调制度的作用,它因此经常被冠以"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说国际制度起作用呢?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框架而塑造了期望(expectations) 。国际制度使民众相信,不会再发生冲突。它们拉长了未来的阴影(shadow of future) ,从而缓解了安全困境。制度减轻了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不确定以及不能形成相互信任) 。霍布斯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他又很谨慎地指出,战争状态并不等于无休止的交战,而是指战争的倾向(propensity) ,正如阴天有可能下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状态指的是和平的倾向,当无政府状态因国际制度而有所减轻和相对稳定之后,民众会产生对和平的期望。

制度从四个方面稳定人们的期望。首先,它们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连续观念(a sense of continuity) ,比如大多数西欧人都期望欧盟永远存在下去。欧盟今后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冷战以后,许多东欧国家政府同意和准备好加入欧盟,这影响了这些国家在2004年最终加入欧盟之前的行为。其次,制度创造了礼尚往来的机会。如果今天法国人得到了较多的好处,那么明天意大利人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过于计较每一次的交易,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的收益可能是均等

的。第三,制度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大家在做些什么呢?意大利人是否会遵守欧盟通过的决定?贸易往来是否大致均衡?欧盟的制度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信息。最后,制度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法。欧盟国家可以在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和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 的框架内进行讨价还价,此外,还有一个欧洲法院。这样一来,制度创造了一种气氛,促使人们期望稳定与和平。

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期待看到,在制度和稳定期望已经形成的区域,出现和平群岛(islands of peace) 。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 把这样的区域称为"多元安全共同体",在那里,国家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对和平的稳定的期望已经形成。制度有助于增强这样的期望。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曾经相互残杀,美国也同英国和墨西哥打过仗。但在今天,这样的行为是难以产生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似乎具有和平的倾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制度创造了一种人们期望和平的文化,并且为谈判提供了论坛。对稳定的期望可以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一种路径。

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即使存在着欧盟这样的自由主义制度,欧洲今后也将重新陷入安全困境。人们曾经对1992年欧洲一体化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紧接着欧洲就进入了一个强烈抵制一体化进一步深入的时期,这特别体现在有关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斗争上,欧元在2002年开始流通。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就担心,给欧盟更多的权力可能有损各成员国的独立与繁荣。在2003年和2004年,有关制定一个新的欧洲宪法的过程就显得十分艰难。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民众投票反对批准欧洲宪法。与此同时,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担心,如果它们选择彻底退出欧盟的话,那么这将使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等选择留在欧盟内的国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遇到这样的障碍,但是原来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中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尽管欧盟还远没有变成一个超国家,但欧盟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自由主义者也声称,现实主义者不够重视民主价值观念。今天的德国与1870年、1914年或1939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其政党和政府都发生了和平变革。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扩张者的角色。因此,自由主义者质疑现实主义者的预言,认为这种预言没有考虑到民主观念的影响。

国内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战争倾向有关系吗?现有的证据表明,答案是肯定,但也留有余地,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十分清楚的地步。普鲁士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是最早提出民主国家不如专制国家好战的人之一。专制统治者可以轻易地使自

己的国家卷入战争,正如弗雷德里克大帝在1740年因为想得到西里西亚而发动战争,或者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但是,康德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指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会投票反对战争。不仅如此,为战争承受最大负担的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康德坚信,人民比统治者更不愿意要战争。然而,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人民总是会投票反对战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国家有可能和其他国家一样经常介入战争,民主制度下的选民经常投票支持战争。在古代希腊,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介入战争。在1898年,美国选民把不情愿介入战争的麦金莱(McKinley) 总统拖入美西战争之中。在2003年,美国的民意调查和国会表决都支持布什总统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尽管后来公众舆论因为冲突迟迟无法结束而发生逆转。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 提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康德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有限制条件的命题,即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和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两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交战这个事实,属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但是有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可能是不真实的。火灾和救火车的出现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救火车引起了火灾。造成不真实的因果关系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民主国家一般是富裕国家,富裕国家倾向于从事贸易,而根据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这样的国家不太可能相互交战。然而,这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因为富裕国家经常发生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相互关联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合法性问题。也许民主国家的人民认为,同其他民主国家交战是不对的,因为通过杀戮来解决争端是错误的行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是否同意的权利(right of consent) 。不仅如此,只有当公众可以对战争的合法性进行广泛辩论的时候,宪法中有关战争的制衡原则才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像希特勒或者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专制恶魔,那么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太容易被动员起来。

虽然还需要对"民主和平"理论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与考察,但是我们要找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确实很困难。不管其原因是自由民主国家共享并尊重一套共同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还是这些国家相互认同,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或许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解释) ,民主和平论表明,假如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至少民主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过去大约20年的事态发展是令人鼓舞的。据自由之家统计,"自由国家"(即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 的数量,已经从冷战刚结束时候的65个,增加到现在的87个。也就是说,自由国家的数量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的比重,从40%增加到45%。[17] 但是,我们需要采取谨慎态度。民主和平论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处于民主化初级阶段以及尚未完成民主化过程的国家行为。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还缺乏新闻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制衡以及定

期选举等自由民主程序,它们可能只是公民投票式的民主国家。冷战后处于战乱中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政府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这些国家还远不是民主国家。厄瓜多尔和秘鲁也是这样,两国在1995年发生过边界冲突。民主国家的属性是很重要的。

考虑到民主和平论的这些局限性,我们在依据该理论提出对外政策建议的时候就需要很谨慎。选举并不能确保和平。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有关在全世界推进民主的主张,可能从长远来说有助于增进和平与安全,但是在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却存在着战争危险增加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国际关系的主要范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的预言十分明确,这便于我们对它加以评估。马克思主义者很明确地但不准确地预言,帝国主义、大规模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的兴起,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帝国主义的终结、国家间大规模战争的衰退、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频率的降低(一些国家甚至发生了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看上去受到自身三个主要弱点的困扰。第一,它试图把政治还原成经济。人们虽然关心经济,但是也关心很多其他的事情。人们主要的效忠对象不太可能是经济阶级。第二,它错误地认为,国家只是特定阶级的工具。虽然富裕的资本家经常对本国的对外政策施加极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自我狭隘的利益难以成为对外政策的动力,这种动力即便存在,也不能持久。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某些跨国公司能够说服华盛顿决策者,极力推翻那些宣布将当地的美国公司国有化的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美国政府试图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但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分别在1954年和1973年成功地推翻了危地马拉以及智利的社会主义政权,美国公司的利益都影响了美国政府的上述行为。第三,马克思主义过于死板地理解历史进步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长篇大论地阐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是,他们低估了偶然性以及人类选择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在人的一生中,除了死亡和纳税,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发生的。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贡献了某些

有价值的东西,它通过依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不断加大的全球不平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可能导致财富集中的观点并没有错,他也十分正确地引导我们注意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的危险性,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是今日世界国家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没有人能够做到事事正确一样,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事事都错。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相对较新的范式,它从社会学领域获取很多养分。和以前的范式相比,建构主义对"结构"的理解"更有厚度"(thicker)。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不只是指单位的数量与布局,还包括"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即共有话语、观念、习惯、规范、规则以及适当性逻辑,这帮助构建了单位的身份,并使得单位之间以相互理解的方式进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塑造了认同与利益。一个在阿富汗农村长大的人,跟一个在洛杉矶长大的人相比,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二者追求的目标各异。

与此同时,人们在社会背景中进行互动的时候,也会改变社会背景本身,即便这种改变是很小的。因此,社会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行为体—结构(agent-structure)的概念有点像系列电子游戏《辐射》(Fallout) [*] 中的声誉(karma)评分系统:玩家角色的声誉值随行善而提升,随作恶而下降,它影响角色与玩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影响游戏的结局。

建构主义的洞察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1)"行为体"和结构互动方式是循环往复和相互影响的;(2)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不是给定的,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3)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体间意义会由于社会互动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规则、规范、合法期望发生变化,甚至最终导致国际体系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

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相比,建构主义相对来说属于一种新的范式,因此在建构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以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一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建构主义纯粹属于形式上的(formal)、而非实质上的(substantial)国际政治研究路径。因此,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

及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建构主义与那些范式不同,它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人性的假定,因而未能表达有关行为体应该如何行动的基本主张或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有点像 博弈论(**game theory**),后者纯粹属于一种形式上的、表述互动关系的数学技巧。相反,另外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建构主义有点像"天性还是习性"(nature vs. nurture) [**] 辩论中的"习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比较靠近"光谱"中的"天性"一端(其中新现实主义离得最近),建构主义由于也处于同一个"光谱"之中,因此本质上与其他三个范式具有可比性。

上述两种建构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在于调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不同观点的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在于解释世界事务为什么发生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测世界事务未来发展的人来说,这样的分歧有一个实际效果,即它揭示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人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为。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看世界的,这样才可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此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我们必须"重构世界",以便解释世界,这就需要获得大量信息,也因此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一些愿意付出努力的建构主义者们,已经成功地解释了用那些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视角难以解释的事情,其中包括:日本反军国主义力量的兴起;有关反对奴隶制、修改领土边界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大国际规范之流行;世界人权规制的迅速演变;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兴起;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形成等等。 [18]

现实主义由于提出了很多强有力的假定,所以比建构主义更容易进行预测。现实主义者的预测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与很多著名的现实主义者预言相反,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损害西方世界的团结。但是,现实主义者给我们提供了预测未来的现成工具。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国际政治具有"路径依赖"性,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并非主要由诸如均势这样的永恒机制所决定,而更多的是取决于领导人今天必须借以做出抉择的历史背景。根据这一观点,预测的前提是能够梳理出未来貌似合理的路径,并且判断出可行性最大的路径。这样的任务不仅很难完成,而且也意味着,我们想得越远,对预测未来的信心就越小。

建构主义解释并非总是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解释不相一致。比如,自由主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反军国主义力量的叙事,即强调经济机会的吸引力,就与建构主义者的叙事相吻合,后者强调日本人民反思过去军国主义领导人所造成的屈辱、背叛以及痛苦。我们并不需要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但两种叙事都可以有自己的合理之

处。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有必要把其他范式的解释"纳入"建构主义解释之中。比方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解释那些主要外交实践者们都信奉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期的时候,现实主义最有说服力。在亨利·基辛格当国务卿的时候,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色彩最浓。而在解释那些由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比如伍德罗·威尔逊)充当主要角色的历史时期的时候,自由主义则最有解释力。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这种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强烈互动的现象一点都不奇怪。

后续阅读材料

1. Annette Freyberg-Inan,Ewan Harrison,and Patrick James,eds., *Rethinking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1, No.4(Autumn 1997), pp.513—553.

3.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Routledge, 2006).

反事实推理与"虚拟历史"

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斯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6个月前还是一名政治囚徒。哈维尔说道:"作为剧作家,我习惯于幻想。我常常梦见各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写进我的剧本中。所以,我可以适应这种从蹲监狱到在你们面前发表演说的角色的突然变化。遗憾的是,那些可怜的政治学家们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他们总是极力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 [19] 几乎没有人,其中包括苏联人和东欧人,曾经预见到1989年苏联在东欧统治权的瓦解。人类有时会做出令人惊奇的抉择,而且人类历史总是充满着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如何才能分清哪些原因和哪些分析层次比较重要呢?

国际政治不同于实验科学。在国际政治中,无法进行可以人为控制的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观察一个变化中的事情时,不让其他事情发生变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说,任何学科必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做到精确。如果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精确,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要求太精确。国际政治中的变量很多,会同时发生许多变化,我们可以找到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仍然需要对五花八门的原因加以筛选,搞清楚哪些原因比较重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被称为 反事实推理 **(counterfactuals)** 的思维实验(mental experiment)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筛选原因的有用工具。

反事实推理 就是 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contrary-tofact conditionals)**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探讨因果关系的思维实验。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的时候不可能拥有一个真实和有形的实验室,只能靠自己想象出一些情势,并假定在这些情势中只有一件事情发生变化,其他事情是不变的,然后依此勾画出一幅有关世界面貌的图画。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运用反事实推理。许多学生可能会说:"如果我今天晚餐没吃那么多,我的阅读注意力就会更集中一些。"

历史学家也运用更为精细的类似方法来判断事件的根源,只是他们经常不承认自己这么做而已。比如,我们可以假定德皇并没有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这是否会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发生呢?俾斯麦的政策能否继续减轻其他国家对德国威胁的恐惧心理,从而避免两个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呢?在这个例子中,运用反事实推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除了结构因素之外,个人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反事实推理的例子。假定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 的司机开车到达萨拉热窝那个重要路口时没有转向到那条不该走的街道,从而没有给加夫里洛·普林斯普(Garvrilo Princip) 提供射击的目标,那么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呢?这个反事实推理的例子揭示了暗杀事件(以及偶然因素) 的作用。那个暗杀事件到底有多重要呢?

鉴于当时的同盟结构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如果这个暗杀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是否可能出现其他的导火索将战火点燃呢?那个暗杀事件的影响是否仅仅限于决定战争爆发的时间?

设定与历史事实相反的条件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探讨某个原因是否重要,但这种"不确定的历史"(iffy history) 也存在着漏洞。反事实推理如果被不恰当地加以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否定历史的意义,从而误导人们。事实上,只要某件事情已经发生,其他事情就不可能与它处于同等的地位,这是因为历史事件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某件事情发生,所有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的概率也会跟着变化。一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可以用四个标准来衡量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是否很好或者有用。这四个标准是:合理性(plausibility) ,相近性(proximity in time) ,理论性(relation to theory) 和真实性(facts) 。

合理性

有用的反事实推理必须是在合理选择的范围之内,这有时被称为"要站得住脚"(cotenability) 。我们必须合理地设想出两个同时存在的条件。假设某个人说,如果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那么他就能够赢得滑铁卢战役。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旨在说明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但在19世纪背景中设想20世纪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条件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当笑话说可能很不错,但它并没有正确地运用反事实推理,因为其中包含着与时代不符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联系。

相近性

每个重要的事件都处于一个长长的因果关系链当中,而且绝大多数事件

都具有多重的原因。我们在时间上追溯得越远,那么就必须把越多的原因看成是常量。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也就是说,A是否导致B?)在时间上越相近,那么答案越可能为"是"。让我们来看看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的一个著名的反事实推理的论点,即假如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鼻子短一些的话,那么她对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的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都将重写。于是,克利奥帕特拉鼻子的长度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对的,但是到1914年8月的时候,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及其原因有无数个。克利奥帕特拉生活的年代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之远,她的鼻子对这场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最多只能逗人乐一乐,而对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没有丝毫的意义。时间上接近意味着因果关系链上的两个事件比较相近,这样我们就能够相对较好地控制其他的原因,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各种因素作用的大小。

理论性

好的反事实推理应当借助现有的理论,理论浓缩了我们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认识。我们应当分析导致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所有个案,来判断某个反事实推理是否合理。理论使我们在分析众多原因时具有思想上的条理性和组织性,从而避免随意猜想。例如,有关拿破仑如果拥有隐形飞机就不会在滑铁卢战败的反事实推理就缺少理论依据。这种随意猜想能让人觉得好笑,也会妨碍我们通过大脑的思考获取有益的启示。

假定我们在探讨冷战起源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1945年的时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会发生呢?或者我们假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会发生呢?这些反事实推理的问题,可以用来探讨有关冷战主要源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是否正确。另外一个同冷战相关的假说是,两极国际结构导致冷战的发生。也就是说,正如均势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即使美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紧张局面也可能会出现。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增强反事实推理的推论。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同盟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平衡美国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这就说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至少战胜了自由国家之间的均势考虑。但是在冷战时期,至少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共产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采取均势政策,而

且自冷战开始以来至今,苏联/俄罗斯和中国都一直对美国保持警惕性。因此,我们有充分依据得出结论,意识形态与均势考虑都很重要,但并非对所有行为体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总之,与理论相结合的反事实推理更有意义,也更有用处,因为这样的思维活动运用了更加广博的知识,我们可以时常就理论本身提出有新意、有意思的问题。

真实性

只设想出有意义的假说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真地用已知的事实对这些假说加以检验。进行反事实推理需要确切的事实和详尽的历史分析。为了检验一个思维实验是否有道理,我们必须搞清楚,所谓不变的因素是否与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相吻合。我们必须谨防在同一个思维实验中,把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建立在另外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的基础之上。这种多重的反事实推理会导致混乱,因为同时发生变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无法通过仔细分析所有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判断思维实验是否准确。

一个特别好的进行反事实推理的方法,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所提出的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 。一个好的虚拟历史,通过严格地根据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来回答可能发生的事情,可以避免不合理性以及时间上的遥远性。在2008年出品的电影《虚拟肯尼迪》中,导演增谷浩治(Koji Masutani) 探讨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假如肯尼迪总统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那么他是否可能会像其继任者那样派出大量的美军介入越南战争呢?他通过仔细考察肯尼迪有关出兵海外的决策行为来回答这一问题。肯尼迪在其总统任期内曾经6次面对这样的决策问题,而每次都决定不出兵。肯尼迪不仅很反感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也极度怀疑军事和情报官员有关出兵的建言。根据肯尼迪的实际行为以及已知倾向,我们可以进行反事实推理,从而有理由判断肯尼迪不会向越南派遣大量的美军。

一些历史学家追求纯正性,他们认为,假定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反事实推理不属于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设想可能发生什么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忽视了一点,即我们不仅要努力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要努力了解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为此,我们还需要知道是否可能发生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运用反事实推理。因此,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录

下来,但是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主张,恰当的反事实推理分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纯正论者提醒我们,不可提出诸如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这样不甚严谨的反事实推理的论点。然而,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下一章中看到的,粗浅的反事实推理分析与深刻的反事实推理分析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有助于我们搞清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后续阅读材料

1. Philip E. Tetlock and Aaron Belkin, eds.,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 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James G. Blight, Janet M. Lang, and David A. Welch, *Virtual JFK: Vietnam If Kennedy Had Live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思考题

1."国家"、"民族"以及"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是什么关系?

2.权威如何成为权力源泉?它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的源泉?

3.体系稳定与危机稳定是什么关系?

4.华尔兹的三个层面指的是什么?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吗?如果可以,如何结合?

5.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可以防止战争?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缺陷?

6.国际体系的结构与过程之间的区别何在?建构主义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过程是如何变化的?

7.什么是反事实推理历史研究方法?你可以用它来分析阿富汗战争吗?

[1] 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此我们经常很难给出一个客观的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是一个自我定义的实体。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2] 一个国家以居民自治权的名义向另外一个国家提出领土要求,这样的主 张被称为"领土收复主义"(irredemism）,它来自意大利语irredenta,意思是"未赎回的"。

[3] 参见 http://www.huttriver.net/。

[4] Andrew F. Cooper, *Celebrity Diplomacy*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8）.

[5] 参见http://www.fundforpeace.org/web/index.php?option＝com_ contcnt&task ＝ view&id ＝ 99&Itcmid ＝ 140。

[6] David A. Welch, *Justice and the Genesis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pp. 76—94.

[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8] Paul R. Hensel, "Territory: Theory and Evidence on Geography and Conflict," in John A. Vazquez,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2000）,p.62.

[9]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p. 150.

[10] 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New York: John Day Co.,1956）.

[11] 写得最好的可能当属 Fritz Redlick: *Hitler:Diagnosis of a Destructive Proph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7）, p.119.

[13] Richard Cobden, quoted in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04.

[14] Barry M. Blechma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gress and U. S. Defens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6 —37.

[15]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and enl. ed. (New York: Free Press,1965）,pp. 12—16.

[16]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1986）, p. ix.

[17]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 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January 2011) , p.25.

[18] Peter J. Katzenstein, Rethinking Japanese Secur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New York:Routledge, 2008) ；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atthew J. Hoffmann, *Ozone Depletion and Climate Change: Constructing a Global Respons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9] Václav Havel, "Address to U.S.Congrcss," *Congressional Record* , February 21, 1990, pp.S1313一1315.

[*] 又译《异沉余生》。——译者注

[**] 又译"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培养"。——译者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象

第三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人类历史中,主要政治单位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异。在孤立的、乡野的采猎社会中,像部落或者扩大的家庭单位那样的小规模群体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城市化以及更加专业的社会与经济角色的产生,诸如城市化国家以及小王国那样的大规模单位开始出现了。在技术、组织以及军事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有时获得了对广大地区的统治权。历史上幅员最辽阔、辖区连成一片的政治单位就是蒙古帝国,它在1279年鼎盛时期,统治的范围从日本海到波罗的海、从南中国海到波斯湾。1922年的大英帝国,统治了地球表面四分之一的地方以及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多个政治单位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情形。当忽必烈统治着领土范围确定的蒙古帝国时,欧洲存在着诸多封建王国、主教管区、公国以及较小的封地,而北美则主要是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的家园。只是在20世纪,一种单一的政治组织形式,即主权国家,开始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今天,南极洲(1961年国际条约禁止国家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以外的地球上每一块陆地,都处于主权国家或者具有主权国家相同功能的实体的管辖之下。这种状况到底

是怎样形成的呢?

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地球上的很多政治单位都管辖有一定领土、行使内部统治权,并且不从属于一个外部权威,但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它们作为国际社会中拥有特定权利与义务的单位,是欧洲的产物。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主权国家是欧洲最成功的外销产品。在欧洲抛弃封建主义,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数百年之后,欧洲强国采取海外冒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全世界。换句话说,那些在欧洲尊重当地邻邦独立地位的国家,却无视其他地区的独立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帝国逐渐瓦解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团体以战争或者谈判方式获得正式的独立地位。那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在急于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同时,也热切希望采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一系列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648年签署的《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和《闵斯特条约》,它们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1] 尽管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统计,但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之一。大部分战祸发生在现代德国的领土之内,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曾经讽刺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的,还不是一个帝国")。虽然三十年战争涉及的国家与问题很多,但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宗教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效地维护了"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这一原则,从而使得各国统治者拥有决定本国宗教信仰的权利。该条约并没有像当今国际社会那样全力支持国家主权原则,因为其中包含了有关干涉权利的条款。但是,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所指出的:"这些文件通过奠定欧洲领土专属权原则的法律基础、结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剥夺帝国皇帝和教皇的权威并把它移交给国家,授权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王朝国家体系,并且增强体系成员的内部团结。"[2]

政治哲学家们后来以政治共同体拥有根据自己有关美好社会的愿景来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它让统治者拥有权力与财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把国家比作一个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其统治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向无能为力的公民收取租金(即剩余基金)。[3] 这也是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在非殖民化之后热衷于强调主权国家地位的部分原因,他们中的某些人曾经设法中饱私囊。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让欧洲避免战祸,但它的确降低了战争的残酷性与频繁性。欧洲大国继续为争夺优势权而斗争。荷兰曾经在17世纪的短暂时期,主要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努力,充当着商业霸主,是

最早在海外建立持续长久的帝国的欧洲国家之一(还有葡萄牙）。路易十四(1638—1715）统治下的法国在欧洲获得了优势地位,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官僚制国家,并且把北美大片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英国同荷兰、法国争夺海上优势地位(它虽然有强大的经济与海军实力,并且成功地获取海外殖民地,但是从未成为欧洲的主要陆上强国）,通过在魁北克的阿拉巴马平原打败法国军队(1759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战胜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1805年）,以及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协助挫败拿破仑,逐渐在18世纪和19世纪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虽然英国因为美国革命战争而深受困扰并丧失了殖民地,但是它凭借较早开始的工业化、海上控制权、对资本市场的主导权以及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在19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三十年战争以后到拿破仑战争以前,欧洲的大多数战争都是短暂的、快速的、局部的。战争的原因主要包括王朝问题、领土争端,以及在某些个案中战争只是为了防止有的国家变得太强大。欧洲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为了改变基本的游戏规则而发生战争。换句话说,那时的欧洲国际体系是非常稳定的。欧洲领导人并不怀有革命目标。比如,在18世纪,基本的游戏规则是:维护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君权神授）以及维持这些国家之间的均势(171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明确提到均势的重要性）。让我们看看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1740—1786）对待其邻居奥地利的玛利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1717—1780）的方式。1740年,弗雷德里克下决心夺取属于玛利亚·特里萨的西里西亚省。弗雷德里克并没有宏大的革命目标,只是想兼并领土。他并不想鼓动西里西亚的人民发动矛头对准玛利亚·特里萨的革命,从而推翻操德语的维也纳贵族统治政权。毕竟弗雷德里克自己也是操德语的贵族,他统治着柏林。他兼并西里西亚的动机就是因为自己想得到这块地方,同时他也小心不做其他有损奥地利或君主制正统性原则的事情。

让我们把它同半个世纪后的法国革命(1789 - 1799）加以比较。当时法国的主流观点是,所有君主都应当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而把权力交给人民。拿破仑把这种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欧洲,拿破仑战争对当时的游戏规则和均势局面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18世纪中叶那种温和的过程和稳定的均势,到18世纪末已转变成革命的过程和不稳定的均势。我们把法国革命这样的变革视为结构理论视野之外的因素,因为该理论无法对它加以解释。这个例子说明,建构主义者的思想可以补充现实主义结构理论。建构主义很适合用来解释像人民主权(其对立面是君主主权）规范的兴起这样的某些现象。

国家除了改变目标之外,也会改变手段。体系的进程也受国家所采取的手段性质之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了解到的,不同的手段会产生促进稳定或者破坏稳定的作用。一些手段随着技术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例如,机关枪等新式武器的问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场血腥味特别重的较量。手段也可能由于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在18世纪,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目标是有限的,其手段也是有限的。他只有一支不太忠诚和后勤补给不足的雇佣军。18世纪的军队通常是在夏季从事战事,因为这个时候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军队,或者有足够的金币向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士兵提供军饷。当食物或金币用光之后,士兵们会开小差。法国革命把战争的社会组织改变成法国人所说"全民皆兵",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征兵制"或"兵役制"。建构主义者所指出,士兵的认同感是会发生变化的。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公民身份,为了自己的祖国而集合起来,并且认识到所有人都应该参战。战争不再是到远方征战的数千名雇佣兵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这种大规模的参与和群众的支持,大大超过了过去雇佣兵的力量。国家所拥有的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18世纪国际体系的变迁。

管理大国冲突:均势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结束到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国际体系是稳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均势原则的有效作用。

那么,均势(balance of power) 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均势是国际政治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但它也是含义最不清楚的词汇之一。这个词被广泛地使用,用来描述各种事情和为各种事情寻找合理的依据。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把均势视为永恒的、明智的政治规则。但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却把它称为"一个怪物,一个没人描述过、没人能够描述清楚以及没人可以理解的虚无的东西" [4] 。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总统,他认为均势是个邪恶的原则,因为它鼓励政治家像切奶酪那样,根据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不顾民众的意见,对国家进行瓜分。

威尔逊之所以不喜欢均势,还由于他相信均势会导致战争。均势政策的捍卫者则认为,均势会导致稳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和平与稳定并不是一回事。欧洲国家体系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发生了119次有大

国卷入的战争。和平并不是主流的情势,因为至少涉及一个大国的战争就占了这个时期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在那些战争中,有10次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许多大国都介入其中,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霸权战争或者世界大战。假如要问均势是否维持了过去5个世纪里现代国家体系的和平,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国家追求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独立,而不是维持和平。均势有助于维护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无政府体系,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国家都生存下来。比如说,波兰在18世纪末被其邻国像切奶酪那样地瓜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大块波兰的领土。离我们更近的一个例子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在1939年达成了一个协定,波兰再次被瓜分,苏联获得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国家。此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1年为止。总之,均势不能维持和平,也不总是能够维护各国的独立地位,但它维持了无政府国家体系。

权力资源难以被衡量(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对此进行讨论),这是领导人在努力判断均势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而国际政治研究者们会遇到更多的疑惑,因为同一个词会被用来指不同的事物。我们必须区分与搞清同样一个词被随意使用的时候到底各自指的是什么。"均势"这个词一般来说有四种含义。

作为权力分布的均势

均势这个词首先被用来描述权力分布。当你听到"当前权力分布"这个说法的时候,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单纯从描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美国人声称,假如尼加拉瓜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冷战均势将发生变化。这或许是真实的,但只有一小点意义,它对于分析宏观大局没有什么意义或启迪。单纯从描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可能在修辞学上很给力,但是对于分析问题的作用很有限。

这个词也可以被用来指一种特别的(或少有的)情势,即权力均等地分布,如同处于平衡状态下的天平。一些现实主义者声称,权力均等才会产生稳定。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在一国权力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不敢攻击它的时候,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霸权稳定理论的信奉者们就坚持后一种观点。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是最好的

稳定局面维护者。但是,根据霸权稳定理论的第一个变种,即霸权转移理论,当最强大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或者一个新的追求霸权地位的国家崛起的时候,战争就很可能发生。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或者对崛起的大国感到恐惧的国家,会拼命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正在崛起的大国则孤注一掷地争取霸权地位。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论述到的,权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的解释: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促使后者采取大胆和冒险的行为去支持科林斯。

我们要对这些理论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95年,美国和英国在南美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似乎可能动用武力。美英两个国家,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挑战者,另一个是日薄西山的霸主,这正是两国会走向冲突的一个动因。然而,我们在史书上并没有读到关于1895年英美大战的描述,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正如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所指出的,我们可以从狗不吠叫的现象中得到重要的线索。在这个例子中,英美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这促使我们去寻找其他的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德国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更为紧迫的威胁。自由主义者则把原因归结为两个讲英语的国家日益增强的民主性质,以及衰落的领导国和崛起的挑战国之间存在着超越国界的文化纽带。我们至多只能从均势这个词汇的第一种用法中得出这么一个有关均势的结论,即主要国家间不均等的权力分布状况的变化是我们用来解释战争和不稳定局面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作为政策的均势

均势的第二种用法是,它指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平衡政策。均势预示着,其他国家会采取行动阻止一国发展成为主导国家。这种预言由来已久。帕麦斯顿勋爵的名言,即国家没有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均势政治坚定的倡导者们所持的观点。帕麦斯顿作为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外交大臣,始终推行均势政策。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 也采取均势政策。丘吉尔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他很讨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但是他认为,同斯大林结盟对于防止希特勒统治欧洲至关重要。丘吉尔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那么我至少也会在下议院给魔鬼说几句好话。 [5]

采取均势政策的领导人,几乎肯定也会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常常用德语 权力政治(**realpolitik** ）,来表述坚定地推行均势政策的做法。

试图维持均势的一种主要手段就是 同盟(**alliance** ）。同盟是指主权国家相互间通过协议结成盟友,以维护共同的安全。正如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与苏联缔结同盟一样,同盟的动机可能单纯是军事方面的考虑:两个中等国家可能决定缔结同盟,以便抵御来自更大国家的威胁。传统上,军事同盟是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一。但是,国家也可能因为非军事目的而缔结同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缔结同盟,有时是由于经济原因,或者出于意识形态信仰相同、文化相近。在那些军事关切正在减弱的地区,比如今天的欧洲和北美,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同盟的瓦解与同盟的缔结一样,有着多种原因,但一般来说,国家不再结盟,是因为认为对方与自己无关,或者把对方视为自身安全的威胁。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个国家发生政权变更。在此之前,两个国家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但现在它们已经相互对立。中国和美国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期间是盟友,但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成为敌人。当然,还有其他可能导致同盟瓦解的原因。一个国家可能变得更为强大。一个国家可能把另外一个国家视为对手,而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把对方视为一个威胁并寻找其他盟友。

作为理论的均势

均势一词的第三种用法,就是描述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自动平衡。这就是均势理论。

均势理论预测,国家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得权力优势地位。或者换句话说,它预言国家将采取均势政策,其原因在于它们不得不这么做。现实主义者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看作是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体系中的国家普遍怀有恐惧感,并且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他们把这种体系视为"自助"体系,确保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获得权力优势地位。这可以通过对内进行政策调整(比如增加军费开支）、对外进行合作(比如与其他国家结盟）或者二者结合起来得以实现。

在国内政治中,我们经常看到 尾随(**bandwagoning** ） 而非均势行为:

政治家们常常投靠占上风的一方。然而,均势理论却预测,国家将会加入处于下风的一方,因为国家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取权力优势地位。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尾随行为有损于该国的独立地位。在1939—1940年间,意大利的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加入希特勒对法国的进攻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但是意大利变得越来越依赖德国。这就是为什么均势政策主张"加入较弱的一方"。均势是一种帮助弱者的政策,这是因为,假如你帮助了强者,强者可能会翻脸伤害你。

均势理论并不预测说,意识形态信仰或者文化特点相同的国家会联合起来。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提到的,当伊朗和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交战的时候,一些观察家声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会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统治下的伊朗,这是因为伊拉克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大部分居为阿拉伯人的、由世俗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 统治的国家,而伊朗则是一个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居民为波斯人的、推行神权政治的国家。然而,叙利亚作为一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而且其领导人也属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却支持伊朗。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叙利亚担心邻近的伊拉克在本地区中增强自己的权力。叙利亚选择均势政策来对抗伊拉克,尽管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偏好,用意识形态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往往是错误的,而基于均势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常常是正确的。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人类的行为不是确定无疑的。人类总要进行选择,他们不总是按预测的那种行为方式行事。特定的情势会促使人们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预测人们行为的细节。如果有人在拥挤的报告厅里喊"着火了",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学生们会向出口跑去,但我们不能肯定是哪个出口。假如所有人都选择同一个出口,那么大家会拥挤在一起,结果谁都跑不出去。国际政治理论经常都有解释不了的例外情况。虽然均势理论提供了一种在国际政治中进行预测的方式,但是它的历史记录绝非完美。

为什么国家有的时候会违背均势的原则,加入强者的一方,而不是帮助弱者,或者采取超然的立场,从而甘冒丧失独立的风险呢?有些国家会说,我们别无选择,或者我们无力影响均势。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小国可以决定自己不得不处于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同时希望以中立来保留某些行动自由的权利。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芬兰无法同苏联抗衡,并且远离欧洲中心。芬兰人认为,保持中立比参加欧洲的均势更为稳妥。芬兰人身处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以失去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权换取对内事务上的独立权。

用均势预测国家行为有时并不正确的另外一个原因,与对威胁的认知有关。举个例子说,人们根据对1917年国家权力资源的机械统计,应该预言美国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的一边,因为英国、法国和俄国拥有世界工业资源的30%,而德国和奥地利只拥有世界工业资源的19%。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认为德国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战争中的侵略者。

邻近性(proximity) 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一个邻近的国家根据某个全球绝对标准来衡量,或许属于弱国,但它对其所在的地区或当地来说,可能极具威胁性。让我们看看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时的英国理应和美国交战,但是它最终还是选择了姑息美国的政策。英国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出了让步,包括在修建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向美国让步,使得美国加强其海军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与遥远的美国相比,邻近的德国更让英国感到恐惧。尽管美国比德国强大,但由于德国离英国很近,在英国人的眼中,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更大。邻近性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1945年后的同盟状况。美国显然比苏联强大,但是为什么欧洲和日本不与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呢?部分答案就在于威胁的邻近性。在欧洲和日本看来,苏联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而美国则离它们很远。欧洲和日本于是请来远方的强国,以便在自己的邻近地区重新确立均势。邻近性影响了国家对威胁的认知,这个事实表明,通过简单、机械地统计权力资源来预测国家行为的方法是有很大缺陷的。

从均势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不甚准确,这也同世界事务中经济相互依赖作用的不断增大有关系。根据均势政策,法国应该不希望看到德国实力的增长。然而,由于经济一体化,德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可以促进法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法国政治家们在本国经济增长的时期,比较容易竞选连任。由于法国和德国的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遏制德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愚蠢的。从经济上考虑,过于简单地推行均势政策,往往会导致双赢(join gains) 机会的丧失。

最后,与均势理论的预测相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有时也会使得一个国家站在强者而非弱者一边。甚至是在修昔底德的时代,民主制城邦国家更可能和雅典结盟,而寡头制城邦国家则更可能和斯巴达结盟。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姑息美国,或者欧洲国家在1945年以后和美国结成民主国家间的同盟,这些都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威胁的邻近性有关联。但是,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太简单,也太危险。在1939年的时候,许多欧洲人都不相信斯大林和希特勒会走到一起,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但是,他们却结成了同盟。同样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错误地假定,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构成一种联合的、铁板一块

的威胁。而一种基于均势的政策应该会预测到,中国、苏联、越南以及柬埔寨会相互制衡,实际上这些国家最后就是这样做的。假如美国领导人预见到这一点,他们无疑会采取一种代价较小的、促进东亚地区稳定的途径,而不是派超过50万的军队去参加越南战争。

作为历史上多极体系的均势

均势这个词的第四种用法是,它被用来描述历史上的多极体系的例子。19世纪的欧洲体系有时被称为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the model of a moderate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例如,历史学家爱德华·久利克(Edward Gulick) 用"经典的均势"(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这个词来描述18世纪的欧洲多极体系。我们常常用"19世纪欧洲均势"这个提法,来表述从拿破仑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欧洲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势要求有几个国家,它们遵循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由于均势这个词的这一用法指的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所以我们将考察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体系的两个层面,即结构和过程。

后续阅读材料

1. 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Norton, 1967) .

2. William C. Wohlforth, Stuart J. Kaufman,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19世纪的均势体系

19世纪的多极均势体系,使1815年到1914年之间的100年成为现代国家体系历史上最长的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但是,这个具有活力的体系并非完全是和平的。其结构与进程的变化,从根本上导致了两次洪水般的世界大战分别在1914年和1939年爆发。因此,我们必须小心避免把一个复杂的故事变得传奇化、简单化。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概念及其区分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穿越迷雾,更好地理解导致20世纪大规模冲突的19世纪根源。

结构

我们如果从新现实主义视角,即权力分布,来考察19世纪均势体系的结构,那么就可以划分出三个时期(见表3.1)。第一个时期开始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拿破仑曾经努力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他的努力使得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并最终打败法国。假如他成功的话,那么欧洲体系就会是单极的。然而,在拿破仑战败之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原先的多极秩序,有5个大国相互制衡,这5个国家是:英国、俄国、法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这5个国家经常改变同盟关系,以防止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从1815年到1870年,欧洲体系的特点是"松散的多极体系"。

1815—1871 年	松散的两极
1871—1907 年	德国的崛起
1907—1914 年	同盟的两极分化

表3.1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均势体系的结构变迁

在德国和意大利实现统一之后,欧洲就有6个大国。欧洲的巨大变革伴随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在1871年以前,"德国"包含37个国家,一直是其他国家干涉的国际政治舞台。1871年以后,德国成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不仅如此,它处于欧洲的中心,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从

结构的视角来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管它是太强大,还是太弱小,都是一个问题。假如德国足够强大,可以同时抵御来自俄国和法国的威胁,那么它也就有足够的能力单独击败俄国或者法国。但是,假如德国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击败俄国和法国的地步,那么它就可能面临像波兰那样被强邻入侵、瓜分或者控制的命运。

在这第二个时期,德国的实力稳步上升。俾斯麦聪明的外交手腕,使得德国这样一个新近统一的、迅速壮大的、地处欧洲中心的国家,并没有导致欧洲体系的不稳定。然而,欧洲其他国家日益增强的对德国的焦虑,加上俾斯麦继任者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导致欧洲体系进入第三个时期。到1907年的时候,欧洲均势体系已经彻底丧失灵活性。两大同盟得以形成并且僵化:三国协约(英国、法国和俄国)与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欧洲均势的两极化或者形成两个紧密的集团,使得均势无法得以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们很快就要论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过程

我们如果仅仅观察权力分布的变化,那么就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体系的变迁。古典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如果观察体系运行的方式,并且注意影响国家间关系模式的欧洲文化与观念之变化,那么就可以把19世纪欧洲国际体系划分出五个不同阶段来。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国试图通过定期召开大会达成维持均势以及制止自由民族主义革命浪潮的协议,来维持欧洲地区秩序。这一体系后来被称为"欧洲一致"(Concert of Europe)[*]。"欧洲一致"始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滑铁卢战争中的获胜国把法国带回到国际舞台,并且共同制定旨在确保各国之间力量均等的某些游戏规则。从1815年到1822年,"欧洲一致"是积极的和有效的。欧洲国家经常聚会以处理争端和维持均势。它们允许在一国内部发生政治变革并可能引起该国改变政策的时候,可以采取某些国际干涉行动。从1822年到1854年,"欧洲一致"不那么积极和有效。最后,自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挑战过去那种以领土补偿或者恢复旧政权来维持均势的做法,"欧洲一致"于是停止存在。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民族主义观念变得太强大,它不允许国家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瓜分奶酪。

第三个阶段是从1854年到1870年,它相对比较动荡,经历过5次战争。第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它是一场经典的均势战争,即法国和英国阻止俄国对正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但是其他几次战争则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有关,政治领袖们抛弃了过去的原则,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来追求自己的权宜目标。例如,俾斯麦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士,他希望德意志在普鲁士君主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然而,俾斯麦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战争来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从而实现德国的统一。俾斯麦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重新采取比较保守的行为方式。

1815—1822 年	欧洲一致
1822—1854 年	松散的欧洲一致
1854—1871 年	民族主义与德国、意大利的统一
1871—1890 年	俾斯麦让欧洲一致复兴
1890—1914 年	丧失灵活性

表3.2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均势的演变过程

第四个阶段是从1870年到1890年,它是俾斯麦的均势时期,新兴的、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在这个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俾斯麦以灵活的手段和各种各样的同盟伙伴周旋,并且努力使法国的注意力从其普法战争以后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到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动。他也限制了德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以便维持欧洲以柏林为轴心的均势。灵活性与复杂性是俾斯麦同盟体系的特点。前者确保均势体系的稳定,因为它允许偶尔发生不至于导致整个大厦倒塌的危机或者冲突。但复杂性是它的弱点。该同盟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像俾斯麦那样能使几只球不落地的魔术大师。然而,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没有像他那么高明。他们未能同俄国续订条约,错误地让英国、法国和俄国逐渐走到一起。他们也未能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对抗行为。在最后一个阶段,德国开始介入海外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中,并且试图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些政策加深了周边国家对正在崛起的德国的恐惧,从而促使体系发生两极分化。

这五个阶段各有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是由于一些在整个阶段没有消退的强劲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

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也影响了国家进行合作的动机。其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其结果是,国家与统治者逐渐变成不是一回事。路易十四在距滑铁卢战争一百多年前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朕即国家。"当时没有人反驳他。但是,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言论会引起轩然大波。诚然,拿破仑未能建立起法国霸权,改变欧洲政治的结构,但是他通过在欧洲传播革命思想,改变了欧洲政治的进程。维也纳会议曾经一度压制这些思想,但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像火山一样在1848年革命中喷发,敲响了专制统治的丧钟。

体系与过程

> 政治家在判断欧洲均势是否令人满意的时候,他们所考虑的因素往往与 权力及其分布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因素包括:国家的排名与地位;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国家考虑结盟是否值得;国家是否在国际问题上有发言权等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均势并没有受到影响或者威胁的时候,危机却由于对均势的不满而发生了。这表明,像国际法、"欧洲一致"以及同盟这些被用来限制自己盟友的手段,在促进与维护欧洲均势中,比像缔结对立的同盟或者破坏对手 的联盟这样的权力政治方式,更普遍地被加以使用,并且也更有效果。
>
> ——保罗·施罗德:《19世纪的体系》 [6]

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和国家领导人都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对方。民族主义对王朝统治者合法性的挑战,导致一些旨在维护古典均势的奇怪同盟开始瓦解。比如,法国在1866年并没有向受到普鲁士进攻的奥地利伸出援助之手,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法国反对奥地利在其占领的意大利领土上压制民族主义。俾斯麦利用了其他日耳曼国家要求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观点,但是民族主义思想后来也约束了他的行为。俾斯麦在1871年从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引发了法国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使得法国和德国后来无法成为同盟伙伴。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新的意识形态改变国家的目标,并且使得19世纪的国际政治局势不那么和缓。 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新的工业技术在军事中的使用,产生了威力巨大但缺少柔性的战争手段。铁路的出现使得可以很快地把大量军队从一个地方投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精确的计划,而精确的计划则会减少动员的选择余地,并且让最早采取行动的一方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危机的

稳定性。机关枪、大炮以及战壕的使用,使得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所成功运用的短兵相接、速战速决和有限战争的军事思想被人讥笑。技术的变化如同观念的变化,改变了领导人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值得的这类问题的认知。因此,我们如果要想理解19世纪均势体系是如何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么就需要同时考察结构和过程。

后续阅读材料

1.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m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 1812—1822(New York:Grosset & Dunlap, 1964) .

2. John Lowe, *The Great Powers, Imperialism and the German Problem* , 1865—1925(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pp.202—239.

现代续编

当1990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重新走向统一的时候,19世纪开始出现的所谓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议题。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首先宣称,德国统一会严重破坏欧洲的均势。政治家们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讲德语的国家的数量到底应当是多少,才可以维持欧洲的稳定?"一直以来,人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时候,讲德语的国家有37个。俾斯麦认为应该有2个,而不是1个。他没想把奥地利纳入其构想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之中,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削弱普鲁士对新国家的控制力。希特勒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建立一个讲德语的国家。

它应该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希特勒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决定建立3

个讲德语的国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还有一个关于某个法国人的笑话,即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这个法国人应该有几个德国,他回答说:"我太爱德国了,当然是越多越好。"

苏联在东欧的力量退缩,导致战后两极政治结构不复存在,并且使得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可能。但是,德国的重新统一,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和位于大陆心脏地区的欧洲最大经济实体的忧虑。德国会努力扮演新的角色吗?它会再次虎视眈眈,先进攻东线,然后进攻西线吗?它会插手德国一直可以施加较大影响的东面邻近国家的事务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声称,答案就是"退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 。他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分析方法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未来和过去没什么不同,因为未来和过去的情势结构是相似的。

然而,已经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在结构层次上,美国介入了欧洲,而且美国的领土大约是统一后德国的4倍。结构主义者担心,美国今后会不再介入欧洲事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在某个时候可能转向孤立主义和"回家"。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欧洲国际政治的进程由于新制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盟把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变化不是发生在国际体系方面,而是发生在国内政治方面。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而且公众观念的变化已经使德国从一个好战国家变为一个福利国家。分别于1870年、1914年和1939年在欧洲心脏挑起事端的德国不是民主国家。结构、过程以及国内方面的变化哪一个最能预示欧洲的未来呢?我们对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但是基于过程和国内变化的预测似乎最有说服力。

欧洲大事年表

17 世纪

1618—1648 年	三十年战争: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的冲突;最后一场宗教战争;德国被击垮
1643—1715 年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在位
1648 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结束
1649—1660 年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联邦
1652—1678 年	英法和英荷争夺海上霸权的一系列战争
1660 年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登基
1682—1725 年	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西方化"过程
1683 年	土耳其对维也纳的围攻被击退

1685 年　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镇压法国新教徒
1688—1689 年　英国光荣革命
1688—1697 年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反对路易十四的全面战争

18 世纪
1700—1721 年　北方大战：俄国、波兰和丹麦反对瑞典在波罗的海的主导权；俄国成为欧洲强国
1701—1714 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乌得勒支条约》；法国和西班牙王室的永久分离；法国实力继续衰落
1707 年　英格兰和苏格兰组成大不列颠王国
1740—1748 年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56—1763 年　英国和法国的七年殖民地战争；法国被逐出加拿大和印度；大不列颠王国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强国
1775—1783 年　美国革命战争
1789—1799 年　法国革命
1799 年　法兰西拿破仑·波拿巴政变
1799—1815 年　拿破仑战争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主导国

19 世纪
1801 年　大不列颠王国和北爱尔兰组成联合王国
1804—1814 年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位
1806 年　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弗朗西斯二世取消皇帝称号
1810 年　荷兰王国并入法兰西帝国
1812 年　法国入侵俄国；拿破仑军队覆灭
1814—1815 年　维也纳会议：欧洲君主制国家被恢复
1815 年　滑铁卢战役：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但被英国和普鲁士军队击败
1833—1871 年　德意志统一
1837—1901 年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工业大发展和繁荣
1848 年　法国、德国、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革命；卡尔·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
1848—1916 年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时期，他在 1867 年成为奥匈帝国皇帝
1852—1870 年　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位
1854—1856 年　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在同俄国的战争中支持奥斯曼帝国
1855—1881 年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
1859—1870 年　加里波第领导下的意大利政治统一
1861 年　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俄国农奴
1862—1890 年　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

1864—1905 年	俄国在波兰、巴尔干和中亚的扩张
1867 年	奥匈帝国建立
1870—1871 年	普法战争;日耳曼人入侵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
1870—1914 年	欧洲帝国主义的巅峰期;工业发展;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1871 年	巴黎公社:巴黎成为革命中心,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国家政府的战争
1878 年	柏林会议:奥地利、俄国和英国瓜分奥斯曼帝国
1881 年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1882 年	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同盟条约;1907 年续约
1899—1902 年	南非布尔战争

20 世纪最初 10 年

1904 年	英国和法国的双边协约
1904—1905 年	俄日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日本成为世界强国
1907 年	俄国和英国、法国建立三国协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超过1500万的人丧失生命。仅仅在索姆河(Somme)一役中,就有130万人伤亡。让我们来作点比较:俾斯麦在1866年击败奥地利的那场战争导致3.6万人丧命,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都是大约5.5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令人可怕的战壕、铁丝网、机关枪和大炮,让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躺在地下。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人的死亡,也摧毁了3个欧洲帝国,即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均势的中心是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依然重要,但是美国和日本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迎来了俄国革命,由此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折磨着20世纪的世界。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呢?在1900年到1909年间担任德国首相的伯纳德·冯·皮洛夫(Bernhard von Bülow)公爵,于战争爆发后不久,在柏林的首相府会见了其继任者希奥波德·冯·贝斯曼·霍尔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下面是皮洛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的描述:

> 贝斯曼就站在房间的中央,我永远忘不了他此时的脸色和眼神。某个著名的英国画家画过一幅画,画中一只可怜的替罪羔羊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可言状的痛苦神情,我现在就在贝斯曼的眼中看到了这种痛苦神情。开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我对他说道:"告诉我,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举起自己那细长的胳膊,用迟钝的、疲惫的声调回答我:"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在此后很多有关战争罪行的辩论中,我常常想,假如能够把当时贝斯曼站在那里说那些话时的神情抓拍下来,那该多好啊！这样一张照片一定是这位可怜的人从未想要战争的最好证明。[7]

此后几代的历史学家都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试图解释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看到的,我们不可能把战争的爆发归结为单一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几个独立的层次加以分析。在每个层次上,均势不管是作为一个多极体系还是单个国家和领导人个人的政策,都是我们理解这场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所在。随着同盟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均势的多极结构越来越受到削弱,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三个分析层次

答案就分别在三个分析层次上。简约原则告诉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原因着手分析,看看它们有多大的解释力,然后再根据需要,分析较为复杂的原因。因此,我们先看看体系层次(结构与过程）的解释,然后探讨国内社会层次的解释,最后分析个人层次的原因。接下来我们使用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看看如何把这些原因结合起来,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结构层次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德国的崛起和同盟体系的僵化。德国实力的上升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德国的重工业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英国的两倍。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5%,但是到了1913年,英国的份额下降到10%,而德国的比重上升到15%。德国把它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转变成军事能力,包括推行大规模的海军军备扩充计划。德国1911年制定的"特皮茨计划"(Terpitz Plan) 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世界上第二大海军,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德国的扩张计划令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感到不安。英国开始担心自己将被孤立和难以保护其庞大的帝国。19世纪末英国反对荷兰在南非的移居者布尔人的布尔战争,使得英国的忧虑加重,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同情布尔人。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斯普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霍恩堡女公爵索菲

1907年,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Eyre Crowe) 爵士写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试图解释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备忘录成为英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他的结论是,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国一定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克罗声称,英国的反应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法则。

英国对德国实力增长的反应,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结构性原因:欧洲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1904年,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的半孤立政策,同法国结成同盟。1907年,英法伙伴关系扩展到俄国(它已经同法国结盟),形成了"三国协约"。德国看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加强了同奥匈帝国的关系。随着同盟关系的僵化,外交上的灵活性也就丧失了。俾斯麦时代那种经常变换盟友的均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大国都把自己捆在两极的一极中。两极体系的强化加剧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分析中所强调的安全困境。

过程上的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继续兴起。在东欧出现了一个呼吁讲斯拉夫语的人联合起来的运动。泛斯拉夫主义威胁着拥有大量斯拉夫居民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德国出现了敌视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作家著文宣称条顿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不可避免,他们还编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教科书。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在团结工人阶级方面比社会主义更有力量,在团结银行家方面比资本主义更为强大。在君主制国家之间,民族主义力量的确比家族关系还要强大。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皇帝致电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希望他避免与德国交战。德皇在电报中称其表兄为"亲爱的尼克",署名为"您的威廉"。德皇希望沙皇和自己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所面临的问题,把战争迫近的原因归结为一位皇室家族成员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被暗杀。但是在当时,民族主义力量已经压倒贵族或君主团结一致的观念,那封家族电报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20世纪初均势体系丧失灵活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对和平产生了自满情绪。这正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变化的重要性。欧洲已经有40年没有发生一场有大国介入的战争了。1905—1906年在摩洛哥、1908年在波斯尼亚、1911年再次在摩洛哥以及1912年在巴尔干发生了危机,但是这些危机都得到了控制。然而,旨在解决这些危机的外交妥协也导致了挫折感。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一方要退让?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另外一方做出更多的让步?"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关适者生存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物种的世代遗传问题,但是把它应用在人类社会和特殊事件上是有问题的。达尔文的思想被用来证明"强者必胜"观点的正确性。既然强者必胜,那么为什么要为和平担忧呢?许多领导人认为,持久的战争看来是不可能的,强者占上风和速战速决的战争则是值得欢迎的。

20世纪均势体系失去灵活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政策。正如艾尔·克罗所言,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德皇的政策有一个极其笨拙的方面,即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追求更多的权力。德国人

的"世界野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们实现野心的方式得罪了所有的人,这正好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俾斯麦玩弄体系的方式相反。德皇过于重视硬权力,而忽视了软权力。德国人因挑起海军军备竞赛而激怒了英国人(图3.1) ,而且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人,在摩洛哥的一个保护地争端中刺激了法国人。德皇试图以压力迫使英国与德国和好,以为德国给英国以足够的恫吓,就会使英国觉得自己必须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英国在德国的胁迫下,先是同法国联手,然后又同俄国合作。所以,到了1914年,德国人认为必须冲出这个包围圈,因而故意冒险挑起了战争。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和平自满情绪的滋长、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灵活性的丧失,进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们还可以从第二个分析层次考察国内社会、政治以及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否定有关该层次的一种解释,即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观点。按照列宁的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像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1898年,英国和法国在苏丹的法绍达相互对峙,英国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南非到埃及连成南北一条线,法国则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东西一条线。假如英法爆发战争,列宁的解释可能得到证实。但事实上,战争是在16年之后发生于欧洲,而且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强烈抵制战争的,他们坚信战争对经济有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 爵士认为自己必须遵循艾尔·克罗的建议,英国一定要阻止德国主宰欧洲的均势,但是他也担心伦敦的银行家不支持政府向德国宣战。因此,我们可以否定列宁的解释,但另外两个国内方面的原因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是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危机,另一个是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

三国同盟
三国协约
圆圈代表军队规模的大小

1914 年的陆军与装备

英国
B.E.F8 个师 T.A.28 个师，加上帝国的军队
伯明翰
50 个师加上 32 个预备役师，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
埃森
德国
奥地利
俄国
114 个步兵师 36 个骑兵师缺少训练且装备很差
法国
62 个步兵师、10 个骑兵师、按拿破仑的传统进行训练
54 个师，其战斗力受民族与语言多样化的影响
意大利
规模很小且未做好介入战争的准备
巴尔干
作为德奥的盟友加入战争
土耳其
一位法国人挖苦说，意大利军队总是"倒向胜利者一边"

各国步兵师的编制比较

师	人数	马匹	大炮	机关枪
英国	18 000	5 000	76	24
德国	17 500	4 000	72	24
法国	15 000	5 000	36	24

德国海军基地
同盟国海军基地
三国同盟
三国协约
（意大利在 1914 年没有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它后来加人同盟国）

1914 年的海军与海军基地

斯卡帕湾
罗斯
北海
英国
赫尔戈兰岛
波罗的海
基尔
威廉港
利尼斯堡
哈维茨
普利茅斯
朴次茅斯
布雷斯特
德国
俄国
大西洋
法国
奥地利
塞瓦斯托波尔
黑海
意大利
巴尔干
土伦
直布罗陀
地中海
马耳他

型号	英国	德国
主力战舰	20	13
较旧的战舰	40	22
战列巡洋舰	8	5
巡洋战舰	58	7
轻型巡洋舰	44	34
驱逐舰和 MTB	300	144
潜水艇 *	78	28

* 请注意，英国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图3.1 1914年欧洲军事力置的平衡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因而都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威胁。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政府极其虚弱和腐败,它成为那些要求从土耳其人几个世纪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集团较易攻击的对象。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土耳其人的统治,但是巴尔干国家在1913年就因为瓜分赃物而陷入相互间的战争之中。战争增大了某些巴尔干国家反对奥地利的胃口:我们既然可以赶跑土耳其人,那么为什么不能赶走奥地利人呢?

在巴尔干国家中,塞尔维亚带头行动起来。奥地利担心自己的帝国在这种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解体,从而丧失其地位。最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交战,这不是因为一个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1863—1914) ,而是由于奥地利想削弱塞尔维亚,防止它成为巴尔干斯拉夫人民族主义的一个磁场。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 将军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动机:"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出于对暗杀事件的报复,奥匈帝国必须把剑指向塞尔维亚……我们的君王已经被掐住喉咙,只能选择被掐死或者作最后一搏以挽救自己。" [8] 帝国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走向解体,是战争爆发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弗兰茨·斐迪南遇刺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德皇威廉二世对英国宣战的反应

躺在坟墓里的爱德华七世(德皇的舅舅和1901—1910年间的英国国王) 竟然比依然健在的我更强大!有些人认为,只要使用小小的手段就可以把英国争取过来或者让它安静下来!!!……现在必须无情地揭穿这种诡计,要无情地当众揭下英国人脸上所戴的基督教和平主义面具,把伪善、可耻的和平论调架上颈手枷示众!!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使节、代表等,必须鼓动整个伊斯兰世界起来反抗这个可憎的、骗人的、无道德的商人的国家;如果我们坚持到流完最后一滴血,那么英国至少要丢掉印度。

——德皇威廉二世 [9]

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内层次上的原因和德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cher) 及其追随者们声称,德国的社会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在费希尔看来,德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行为,就是德国精英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社会内部融合程度低

这个问题上转移开的一种举动。他指出,统治德国的势力是一个由土地贵族和一些工业大资本家组成的国内联盟,这个联盟被称为"裸麦和钢铁的联盟"。这个统治集团不进行国内改革,而是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采取冒险行动,以竞技场代替面包。他们把扩张主义当作社会民主的一种替代品。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不足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在1890年以后对国际体系施加压力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个国内层次的解释,就是关注1914年夏天的危机不稳定局势。所有国家的军事领导人都有"迷信进攻"的观念,偏好快速动员和部署战略,包括快速调动侧翼军队或者大规模地发动正面突破进攻。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主流军事技术不利于进攻,但是欧洲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可以在个人层次上解释这个现象,即将军们常常期望下一场战争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而欧洲最近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就成为一个可以被随心解读的事件。)当1914年7月危机爆发之后,领袖们就面临着首先发动进攻的极大压力。当然,这样的解释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处于一个火药桶上面。然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巴尔干的火星很快形成熊熊大火。

那么,第一个分析层次即个人的作用又如何呢?平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领袖们的特征。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1830—1916)是一个疲惫的老人,受康拉德将军以及表里不一的外交大臣康特·利奥波德·冯·伯克托尔德伯爵(Count Leopold von Berchtold)的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的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可能会是一个制约战争的力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贵族,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抵制国内的改革。他由无能的外交和国防大臣所辅佐,而且深受其多病和神经质的妻子的影响。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1859—1941),但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是个脾气暴躁和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感情用事。他使得德国推行一个缺乏技巧或者前后不一的冒险政策。正如政治学家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指出的:

> 威廉二世并不想要战争,只是在真正危急形势的压力下,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而固执己见。在危急时刻,皇帝陛下会痛苦地意识到,他决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带进战场。他很清楚自己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那些充满火

> 药味的黩武演说,只是想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个弗雷德里克大帝或者拿破仑式的人物。[10]

那些阿谀奉承的德国外交官从大多数大国首都发回的报告都带有很浓厚的玫瑰色彩,主要是为了讨好自己在外交部的那些有报复心的顶头上司们。这也不能帮助德皇做出明智的决定。

个人的特性确实起作用。领导人的某些个人因素,特别是德皇的个人因素,是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体系、社会和个人原因之间的关系见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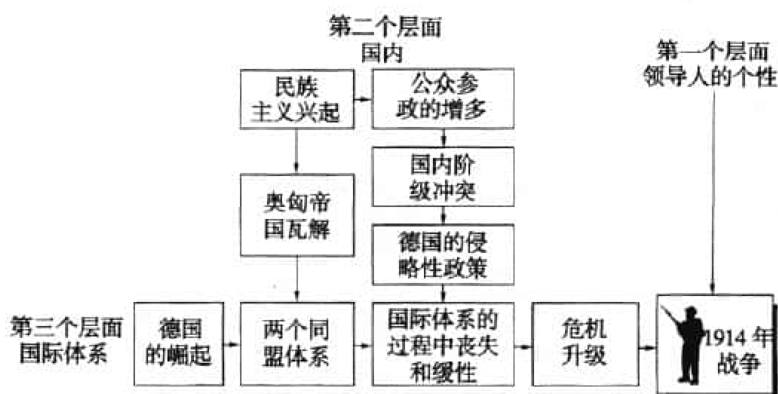


图3.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如果一个情势有好几个原因,而且每个原因都是充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样一个情势是 过于确定的(**overdetermined**)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过于确定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不可避免的?答案是否定的。一直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此后的4年大残杀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让我们根据时间上的远近,来区分三种类型的原因。最远的是 深层原因(**deep causes**) ,其次是 中层原因(**intermediate causes**) ,最近

的原因是 突发原因(**precipitating causes**) 。我们用房间里的灯光来进行类比:突发原因是你按了开关,中层原因是有人给房子拉了电线,深层原因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dison) 发明了输送电力的方法。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烧火来进行类比:木头是深层原因,干柴和纸张是中层原因,划火柴是突发原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层原因是均势结构的变迁和国内政治体系某些方面的变化。特别重要的因素包括德国力量的崛起,两极力量体系的出现,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导致的两个衰落帝国的死亡,还有德国政治。中层原因包括德国的政策、和平自满情绪的增长以及领导人的个人特性。突发原因是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者刺杀,及其在严重的危机不稳定局势中得以迅速升级。

回顾历史,历史事件看上去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确可以说,假如没有那次暗杀事件,其他某个突发事件也会发生。有的人说,突发事件就好比公共汽车,每隔10分钟一辆。因此,发生在萨拉热窝的那个特别的事件并没有那么重要,某个突发事件或许迟早都要发生。这样的观点可以用历史研究中的反事实推理方法来加以检验。我们仔细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提出"如果……那么……"和"要是……应该……"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那么结果会怎么样?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掌权,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由于深层和中层原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可能性很大并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再用火来做比喻,木头和干柴可能放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了,但一直都没有被点燃。如果在某个人拿来火柴之前下了场雨,那么即使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也不会燃起大火来。

假定在1914年并没有发生萨拉热窝事件,而且一直到1916年都没有发生危机,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一种可能是,俄国力量的增长会使德国不敢无所顾忌地支持奥匈帝国。在1914年,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将军和外交大臣哥特利波·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 这两位德国领导人在促使战争爆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坚信德国与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很清楚,两线作战会出问题,德国应该先把一方击垮,然后再同另一方交战。俄国虽然国土较大,但是技术上很落后,而且交通系统也不发达,所以应该被列为第二次打击的目标。德国应当首先西进,击败法国。在西线获胜之后,德国才可以东进,来打击俄国。实际上,这就是"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见图3.3) ,即德国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它要求借道比利时(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 对法国发动闪电式的攻击,迅速击败法国,然后把矛头转向东面。

但是,如果这一计划的实施被推迟到1916年,它或许就不能获得成功,因为那时候俄国已经用法国的钱建设好自己的铁路系统了。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人需要用2到3个月的时间把军队集结到德国战线,这样一来,德国就有足够的时间先把法国击败。到1910年的时候,俄国运送军队的时间缩短到18天,德国的战争策划者们知道,德国所拥有的时间已经没有那么宽裕了。到1916年的时候,德国大概就根本没有时间先西进、后东进了,这样一来,它可能因此放弃两线作战的战略。一些德国领导人认为,从发动战争的时机看,1914年比1915年好。所以,他们想利用危机,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并获得战场上的胜利。

假如1914年没有发生暗杀事件和出现危机,那么可能直到1916年战争都不会爆发,这样一来,德国人就可能被威慑住,不敢冒险发动两线战争。他们在决定给奥匈帝国一张空头支票之前,一定比1914年时要谨慎得多。他们或许会放弃施利芬计划.只把注意力放在东线的战争上,或许会同英国人达成共识,改变战争中进攻有利的观念。总而言之,如果再有两年的时间,俄国实力的变化就可能防止战争的爆发;假如这个期间没有发生战争,德国的工业实力会继续得到增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估计,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德国很可能获得对欧洲的主导权,因为德国的实力可能强大到法国和英国无法遏制的地步。

如果欧洲能再享有两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也可以用反事实推理法来假定英国内部的事态发展。历史学家乔治·丹杰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在《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一书中,叙述了英国的内部动荡。自由党主张英国放弃爱尔兰,而保守党人,特别是来自北爱尔兰的保守党人则极力反对英国放弃爱尔兰。在英国军队中也可能发生叛乱。如果阿尔斯特叛乱(Ulster Revolt)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英国很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从而不能和法国、俄国结成同盟。的确,如果再有两年的和平时间,那么可能出现很多重大的历史变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另外一组根据反事实推理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战争能否爆发,而是战争的类型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毫无疑问,德国的政策让其邻国感到恐惧,而且德国后来也担心自己被三国协约所包围。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到底爆发一种什么类型的战争呢?不一定爆发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有可能发生另外四

种类型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多前,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波茨坦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同其表兄德皇威廉二世会面

第一种仅仅是局部战争。德皇最初只希望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重演,在那场危机中,德国人支持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因此使俄国人

在巴尔干遭受失败。德皇在1914年7月5日许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然后他就度假去了。德皇度完假回来以后,发现奥地利人已经填了那张他给的空头支票,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德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采取措施努力避免战争的升级,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封威廉致尼克的电报。假如德皇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1914年8月发生的冲突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

第二种可能是一条战线的战争。在俄国进行军事动员的时候,德国也采取相应的行动。德皇询问冯·毛奇将军,他是否可以只限于准备东线的战争。冯·毛奇回答说,只准备东线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改变集结军队和运输给养的计划会给后勤造成严重的问题。他告诉德皇,如果改变军事计划,那么德军将变成乌合之众。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负责德军铁路运输的冯·斯塔伯(von Staab) 承认,德国完全可能顺利地调整军队集结计划。如果德皇知道这一点,并且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后来所发生的战争就很可能是一条战线的战争。

第三种可能是没有英国参加的两条战线的战争,即德国和奥匈帝国对法国和俄国的战争。如果英国不介入,那么德国很可能获胜。假如德国不入侵比利时,英国真有可能不介入战争,尽管德国侵略比利时并不是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例如,在爱德华·格雷和外交部看来,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存在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危险。但是,英国是个民主国家,内阁中的自由党人士发生了分裂。左翼自由党人反对战争,但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后,主战的自由党人说服了反战的自由党人,从而弥合了英国内阁的裂痕。

最后一种可能是没有美国参加的战争。假如美国不在1917年介入战争和改变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德国很可能在1918年初就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美国介入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德国发动了针对协约国和美国的潜艇战。德国还有一个拙劣的举动,即德国政府发送过一封电报,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齐默尔曼电报"(Zimmerman telegram) ,它指示德国驻墨西哥使馆试探墨西哥政府是否愿意与德国结盟。美国把这些截获的指示视为敌对的行为。上述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参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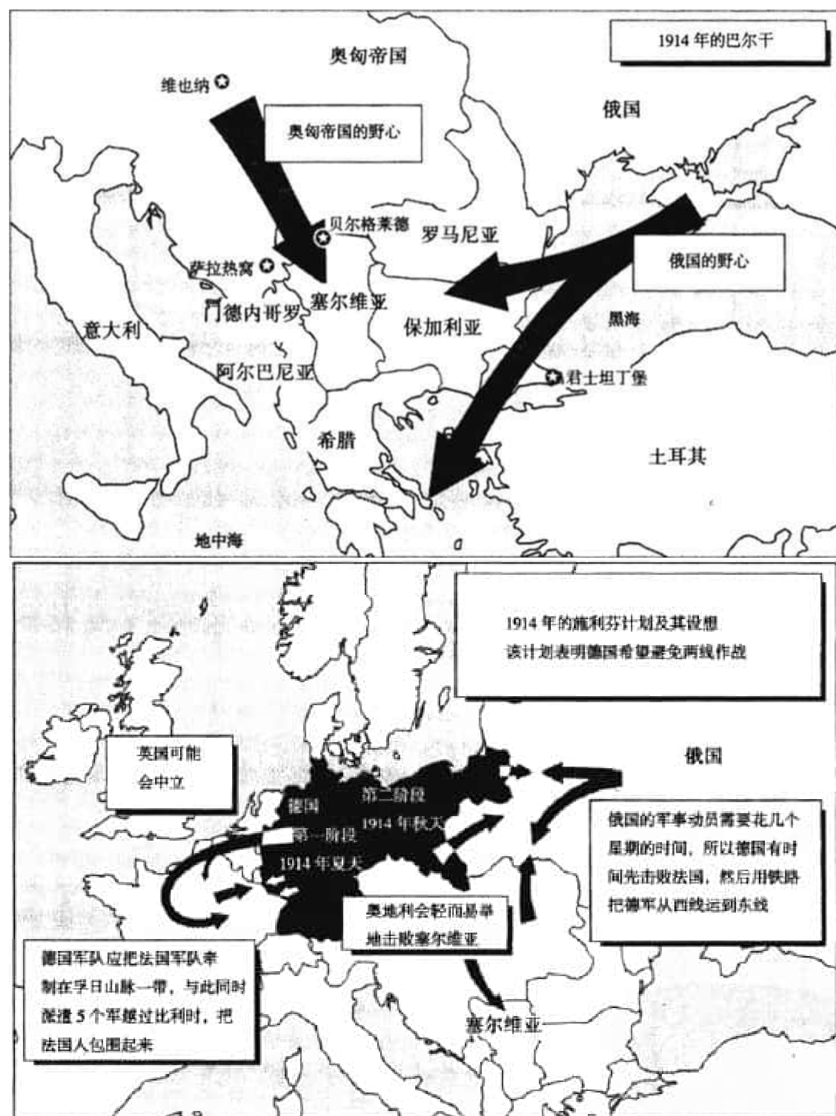


图3.3 大战前夕的错误想法

我们从上述反事实推理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战争可能不会在1914年爆发；其二,爆发了的战争不一定是历经4年的大残杀,那场战争摧毁了作为全球均势中心的欧洲。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

个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件。人类的选择是有作用的。

选择的漏斗

历史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越来越迫近,选择的余地就越来越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然而,领导人所面对的选择漏斗有可能变大,选择的余地也有可能增多(见图3.4)。假如我们从1898年开始考察,并且提出当时欧洲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战争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法英战争,这两个国家那时正由于在一个非洲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而怒目相视。但是,在英法于1904年建立起协约关系之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已经变得很小。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使得爆发一场同德国的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然而,一些有意思的事件在1910年发生了。德国首相贝斯曼·霍尔威格(Bethmann Hollweg)极力改善德英关系,英国也暗示德国,如果德国限制其海军,英国愿意在任何一场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与此同时,英国和俄国以及英国和法国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重新激化,三国协约似乎有可能因此瓦解或者受到削弱。换句话说,到1910年,选择的漏斗又变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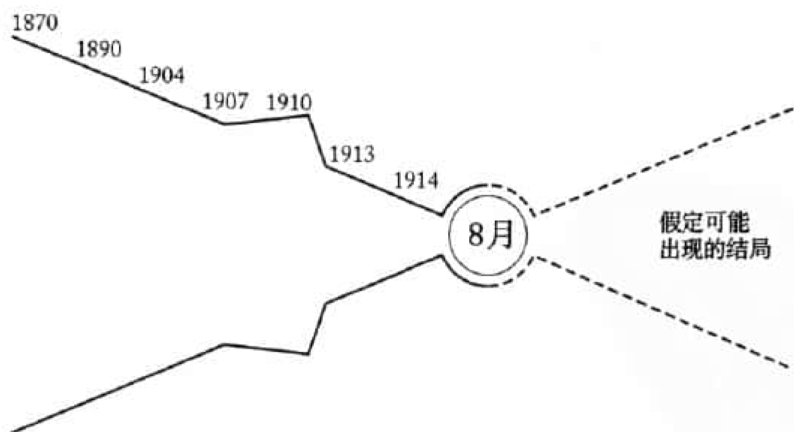


图3.4日益变窄的选择漏斗

但是,这个漏斗由于1911年发生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又变小了。当法国出兵帮助摩洛哥苏丹之后,德国要求在法属刚果获得补偿,而且派遣一艘炮舰开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英国则准备出动其舰队。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进行反战游说活动,德皇也让步了。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激起了人们对德国动机的忧虑。

尽管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奥匈帝国的危机为1914年的战争搭建了舞台,有关国家还是在1912年再次采取措施,努力促进局势的缓和。英国政府派霍尔丹(Haldane) 勋爵去柏林,英德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很显然,英国当时已经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赢得了胜利。所以,漏斗或许还能再变大。

1914年6月,英国派出4艘巨型战舰访问德国的基尔港,在人们看来,英德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英国已经认定战争很快就要发生的话,那么英国最不该做的事就是让4艘自己的主力战舰驶人敌人的港口。英国显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战争会很快爆发。实际上,英国和德国的水兵是于6月28日一起在基尔码头行走的时候,听到了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在一个叫萨拉热窝的遥远的地方刺杀奥地利大公的消息。历史上常常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再一次看到,"可能"不等于"不可避免"。

再谈历史教训

我们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吗?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历史教训。类比可能起误导的作用,人们制造了很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神话。比如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偶然发生的战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的,因为奥匈帝国是有意发动战争的。如果战争迟早都要发生,那么德国宁愿这场战争在1914年而不是在1914年以后爆发。人们对这场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和残酷程度的估计是有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战争是偶然的。

也有人说,这场战争是由欧洲的军备竞赛所引起的。但是,到1912年的时候,海军军备竞赛已经结束,英国取得了胜利。虽然欧洲各国陆军实力的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军备竞赛所引发的观点是过于简单的。

在另外一个方面,战争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事态发展之后爆发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其中的一个教训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均势体系的结构或者权力分布,也要关注均势体系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者提出了现实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重要论点。体系是否和缓(moderation) 取决于过程,单靠权力分布是不能确保体系稳定的。另外一个有益的教训是,我们必须防止产生对和平的自满情绪,或者那种认为下一场危机是上一场危机的翻版的观念:人们认为1914年的战争只是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的重演,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普法战争的重演。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保持一支在危机中可以起稳定作用的军队是很重要的,不可认为我们要么必须使用军队,要么就不需要军队。铁路的时间表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使得政治领导人较难获得很多的时间用来采取外交行动。

今天的世界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同于1914年的世界:其一,核武器使得大规模战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其二,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今天的战争意识,或者赞成战争的观念,要比过去弱小得多。在1914年时,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宿命论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欢迎战争,因为战争就像暴风雨一样,可以净化空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人们的情绪的确就是这样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危机中的世界》一书中十分清楚地论述了这种情绪:

>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情绪。由于未能从物质繁荣中获得满足感,各国转而热衷于国内或国际争端。民族情绪随着宗教影响的衰落而极度高涨,几乎每一个地方都燃起了熊熊的(即使被掩盖着的) 大火。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渴望受苦。的确,每个地方的男人们(men) 都急于冒险。 [11] 他们冒了险并遭到失败,这就是1914年的教训。

后续阅读材料

1.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8) .

2. William Mulligan,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Kier A, Lieber,"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and What It Mea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2(Fall 2007) , pp.155—19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事年表

1905—1906 年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德皇访问丹吉尔,德国试图取代法国的地位;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解决方案让法国满意
1908 年	奥地利宣布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奥地利自 1878 年开始统治了这两个斯拉夫人的地方;塞尔维亚以战争相威胁,但是由于没有俄国的支持,塞尔维亚人无能为力;德国支持奥匈帝国,牵制俄国
1911 年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炮舰"豹号"出现在阿加迪尔,企图迫使法国以牺牲在其他殖民地的利益来换取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
1912 年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打败土耳其并获得色雷斯和萨洛尼卡;奥匈帝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国,以遏制塞尔维亚
1913 年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打败保加利亚并夺取后者的领土
1914 年	
6 月 28 日	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遇刺
7 月 5 日	奥地利努力获得德国支持其反对塞尔维亚的行动
7 月 23 日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7 月 25 日	塞尔维亚拒绝接受最后通牒的某些内容;寻求俄国的支持
7 月 26 日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建议召开一个会议以解决危机;德国和奥地利反对英国的提议
7 月 28 日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
7 月 29 日	奥地利军队轰炸贝尔格莱德;俄国开始针对奥地利的动员
7 月 30 日	俄国和奥地利宣布总动员;法国军队从法德边界后撤 10 公里
7 月 31 日	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取消总动员;俄国拒不答复
8 月 1 日	德国向俄国宣战;英国动员其舰队;法国在德国军队入侵卢森堡后宣布总动员
8 月 2 日	德国要求比利时提供通道
8 月 3 日	比利时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德国向法国宣战
8 月 4 日	德国军队开进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

思考题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可以避免?

2. 你如何运用华尔兹的三个层面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3. 你认为下面哪个因素最能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a.同盟体系

b.公众舆论

c.军事学说和军事指挥(具体说明哪个国家)

d.政治领导(具体说明哪个国家)

e.经济压力或武力

f.错误认知

g.其他因素(具体说明)

4. 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英国的恐惧?或者俄国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德国的恐惧?

5. 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战争,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偶发性战争?讨论"偶然发生的"战争有意义吗?它是否属于"没想要的战争"?什么样的战争是想要的战争?谁想要战争?

6.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7. 今天的决策者们可以从1914年学到哪些教训以避免战争的发生?

[1] 《比利牛斯条约》(1659)标志着1635年开始的法西战争的结束,通常被认为是全面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2] Kalevi J. Holsti,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 1648—198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39.

[3]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pp. 169—191.

[4] Richard Cobde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 Unwin, 1903 ； New York: Kraus Reprint, 1969.

[5] Winston Churchill, June 22, 1941, to his private secretary Colville, in Robert Rhodes James, M. P., ed., *Churchill Speaks: Winston Churchill in Peace and War : Collected Speeches* 1897—1963(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0) .

[6] Paul Schroeder,"The 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Sword & Ploughshares* 4:1 (October 989) , p.4.

[7] Bernhard von Bülow, *Memoirs of Prince Von Biilow* 1909 — 1919 (Boston: Little, Brown 1932) ,pp. 165—166.

[8] Baron Conrad von Hotzendorff,引自 Sidney 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 vol. II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 pp. 185—186。

[9] Kaiser Wilhelm II, quoted in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 p.139.

[10]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 p.144.

[11] Winston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New York: Scribners, 1923）,p.188.

[*] 又译为"欧洲协调"。——译者注



1919年,获胜了的盟国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劳合·乔治在签署《凡尔赛条约》之前

第四章

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集体安全制度的兴与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社会的大分裂,并且使得人们对冷酷无情的杀戮行为(表4.1) 极其反感。人们普遍认为,均势政治导致了这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位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均势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背了民主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威尔逊看来:"均势现在已经成为永远令人憎恨的游戏。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它是一种古老而邪恶的主导秩序。我们今后再也不需要均势这个东西了。" [1]

国　　家	死亡人数
奥匈帝国	1 250 000
大英帝国	900 000
保加利亚	100 000
法国	1 500 000
德国	1 750 000
意大利	600 000
罗马尼亚	300 000
俄国	1 750 000
塞尔维亚	50 000
土耳其	30 000
美国	112 000

表4.1 1914 - 1918年战争死亡人数

威尔逊的看法不无道理,因为民主或和平不是均势政策优先考虑的对象。我们知道,均势是维持主权国家体系的一个途径。国家努力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均势是维护国家独立所必需的,但是它允许使用武力或者违背了自决原则。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混乱性和残酷性,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通过战争来维持均

势是一种再也不能令人容忍的行为。然而,如果均势体系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

威尔逊承认主权国家是不可能被废除的,但是他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自由主义的药方是建立起类似于国内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国际制度,使得民主程序也可以应用于国际层次上。当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使得民主在世界上长治久安,而反过来民主可以让世界更为和平。1918年1月,威尔逊宣布了14点美国参战的理由,其中的第14点最为重要。它主张"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基于特别盟约基础上的普遍的民族[nations,他这里指的是国家]联盟"。实际上,威尔逊想把基于均势政治的国际体系改变成基于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体系。

国际联盟

尽管威尔逊被批评家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但他自己还是坚信,使国际安全建立在国际组织的基础上,可以是处理世界政治的有效方法。他很清楚,仅靠纸上协议和条约是不够的,需要用组织和规则来实施协定。这就是为什么威尔逊如此钟情于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思想的原因。道义力量是很重要的,但它需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安全必须是集体的责任。假如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在一起,那么力量的天平就会倒向善的一方。国际安全能成为集体的责任,爱好和平的国家可以组成反对侵略的同盟。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国家如何建立起这样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呢?首先,应当宣布侵略和进攻性战争为非法的行为。其次,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结成同盟,对侵略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如果大家都许诺支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受害者,那么爱好和平的力量就将占上风。最后,假如威慑失败和出现侵略行为,所有国家都要同意惩罚发动侵略的国家。 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原则和均势政策有相似之处,即国家都努力通过缔结强大的同盟来遏制侵略行为,一旦威慑失败,它们都愿意使用武力。

但是,集体安全和均势的方法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人们的关注点是国家的侵略政策而非国家的能力。而均势政策则不同,一些国家通过缔结同盟来反对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的国家。也

就是说,人们的关注点是国家的能力。第二,在集体安全体系中,同盟不是预先建立起来的,因为不能预先确定哪些国家是侵略者。但是,一旦发生侵略行为,就是所有国家反对一个国家。而在均势体系中,同盟是预先建立起来的。第三,集体安全体系具有全球性和普世性,因为没有中立者或者免费搭车者。如果太多的国家采取中立的态度,那么善的联盟可能就会显得很弱小,从而削弱联盟威慑或惩罚侵略者的能力。

集体安全思想体现在《国际联盟盟约》上,而《国际联盟盟约》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条约之一。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国际联盟盟约》中的几个条款。《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规定,参加国承诺保护任何一个遭受侵略的成员国。第11条规定,任何一个战争或者战争威胁行为都和所有的国家有关系。第12条和第15条规定,成员国同意将争端移交仲裁,而且在仲裁失败后的3个月内不诉诸战争。第16条至关重要,它规定任何违背国际联盟程序的战争都将被看作敌视所有国际联盟成员国的战争。发动战争的国家将立即遭受经济制裁,国际联盟行政院可以进一步建议采取军事行动。

这样的条款听起来直截了当,但是它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国际联盟必须经过所有成员国同意,才能实施集体安全措施。这样一来,每个国家都具有否决权。国家在签署盟约的时候许诺遵守第16条,但是实际上各国自己可以决定采取何种制裁措施以及如何实施制裁,它们不受一个更高权威的制约。因此,国际联盟不是建立世界政府的一个步骤,只有存在着世界政府才能使得在国家之上具有一个更高的、对国家有约束力的权威。所以,国际联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无政府国家体系的终结,它只是国家集体惩罚体系中不守规矩的行为体的一种举措。

集体安全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 主权(**sovereignty**) 与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主权的定义很简单,即国家在指定领土内享有最高的管辖权。国家道义主义者宣称,而且国际联盟也承认,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容侵犯的,一国政府在其边界之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只有在国家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其权威才可以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一国政府签署一项条约,允许另外一国的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某些影响,属于自愿地接受限制,而不算侵犯主权。因此,签署《国际联盟盟约》的国家就自动把某些主权转让给了所参加的国际组织,以换取集体安全和国际法的保障。

根据威尔逊的理解以及《国际联盟盟约》的阐述,国际法的地位优先于国内法以及特定情势中的主权。甚至自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法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国家在违背国际法的情势中不享有主权,而且应当受到惩罚。如同警察与国内法相互联系一样,集体安全与国际法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国际法被国家遵守的程度远不及国

内法。许多国家拒绝接受国际法的约束,认为遵守国际法应该是自愿的行为,而非强制的行为。

美国与国际联盟

国家不愿意放弃某些主权以换取集体安全,其原因在于国际联盟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不参加自己创建的这个国际组织。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包含有关建立国际联盟内容的《凡尔赛条约》。其结果是,这个集体安全制度只能在缺少美国这个理应是最重要的角色的参与下运作。

国际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有关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自由主义计划,但为什么美国突然又退缩了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回到"正常状态"。不少人把"正常"理解为避免介入国际事务之中。反对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人士指出,1823年的"门罗主义"把美国的利益限定在西半球,并且提到抵制"纠缠不清的同盟"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反对国际联盟的领军人物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他担心《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会限制美国的主权和宪法赋予参议院的宣战权力。洛奇担心,美国可能因为国际联盟有关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的决定,而不是由于参议院的决定和人民的意愿,被拖入远方的战争。

威尔逊总统与洛奇参议员的争论有时被描述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同一位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但它也可以被视为美国道德主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争论。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朱丽叶·乔治(Juliette George)在其引人入胜的心理传记[2]中指出,威尔逊坚决不与洛奇进行协商以达成共识,与众所周知的威尔逊的性格特点有关,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参议院拒绝批准条约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对欧洲均势政策的态度。反对国际联盟的人认为欧洲国家以均势的名义干了肮脏的勾当,美国不应该积极参加这种游戏。但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能够不关心19世纪的均势,正是因为英国的舰队让美国人享受免费搭车的好处,欧洲其他国家无力染指西半球和威胁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实际上并非一直是一个孤立主义国家,它干涉过其弱小邻邦如中美洲、墨西哥和古巴的内部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面临着在两种形式的道德主义中进行选择的困境,抵制欧洲均势的孤立主义观念最终占了上风。其结果是,这个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均势天平发生倾斜的国家,拒绝承担创建战后世界秩序的责任。

早期的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得能够防止德国重新崛起的军事保障。由于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法国要求英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且希望两国联合进行军事准备,以防范德国重新崛起。英国对此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这样一个同盟违背了集体安全原则,因为它预先就确定了一个侵略者。而且英国认为法国比德国强大,英法没有必要建立同盟,即使该同盟的基础是传统的均势原则,它也是没有必要的。英国声称,应当把德国重新纳入(reintegrate)欧洲大家庭之中,这就如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维也纳会议把法国带回到"欧洲一致"的体系之中。英国人的战争激情比法国人的战争激情消退得快,英国人觉得已经到了安抚(appease)德国人和让他们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之中的时候了。

法国却不为这些论点所动,它与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结成了同盟。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国家,而原属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结成了"小协约"同盟。法国的政策是两头落空,因为这些同盟关系不仅违背了集体安全原则,而且从均势的角度上看对法国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波兰同其邻国的关系不和睦,而且它也代替不了俄国的作用,俄国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被排挤在外。"小协约"国家则因民族问题和国内分裂而动荡不定,成为法国弱小的盟友。

>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愿景
>
> 我的国际联盟设想就是这样的,它应该作为全世界人类的有组织的道义力量发挥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错误的行为和侵略行径,或者产生采取此类行为的企图,它们都要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光之下。
>
> ——伍德罗·威尔逊 [3]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图4.1)。它丧失了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700万的人口。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把陆军人数削减到10万名,而且禁止德国拥有空军。该条约包含一个"战争罪行条款",它断定德国发动了战争。这是因为战胜国认为,德国由于负有发动战争的责任,所以它必须支付赔款。赔款总额达

330亿美元,德国人认为这样的赔款额对于经济已经受到重创的德国来说实在是过高了。在德国没有按期支付赔款之后,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直至德国支付赔款。德国在进行消极抵抗之后,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吞噬了中产阶级的积蓄。这进而导致在民主化道路上艰难迈进的魏玛共和国面临动荡的国内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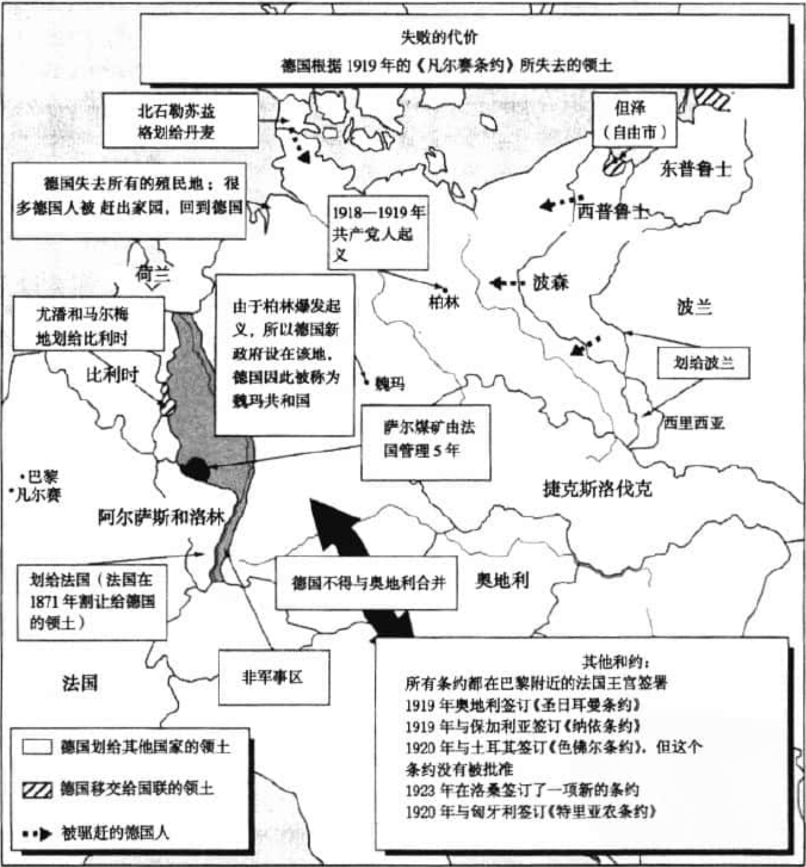


图4.1　德国的损失

意大利对巴黎和约或者国际联盟从来就不太热心。意大利最初是和德国及奥匈帝国结盟的,但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它便决定站到协约国一边,以便得到更多的好处。在1915年秘密签署的《伦敦条约》中,缔约方许诺,把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即战后的南斯拉夫)划给意大利作为补偿。意大利人期望这些许诺能得到兑现,但是伍德罗·威尔逊反对这种旧式的分配战利品的行为。不仅如此,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人于1922

年上台执政,其对外政策目标是追求国家的荣耀,并且实现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的理想。这样的目标与集体安全新构想是相违背的。

所以,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无能为力的。但是,1924年到1930年是国际联盟相对成功的时期。国际联盟制定了减少德国赔款额的方案。1924年,国际联盟成员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议定书,同意通过仲裁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大概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1925年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允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且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中占据一个席位。

《洛迦诺公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德国保证其西面与法国、比利时的边界不可侵犯。根据《凡尔赛条约》,在1870年战争中被俾斯麦夺取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退还给法国,德国同意沿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洛迦诺公约》重申了《凡尔赛条约》的上述规定。另一方面,德国同意在寻求改变其东部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前,应先接受国际仲裁。然而,上述第二个条款隐藏着危机,因为这样就使德国有了两种边界,西面的边界不可侵犯,而东面的边界则可以谈判——但这样的协定在当时算作是一个进展。

国际联盟设法解决了一些小的争端,比如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的争端,而且它也开始了裁军谈判的进程。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英国和日本达成了一项海军军备裁减协议,随后国际联盟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以便进行更为广泛的裁军谈判。国际联盟的行为促使在1932年召开了世界裁军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召开的时间有点太迟了。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这个公约是以美国国务卿和法国外长的名字命名的。最重要的是,国际联盟成了外交活动的中心。虽然美国和苏联不是成员国,但是这两个国家还是派了观察员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会议。尽管1929年10月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1930年国家社会党(或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预示着严峻的问题即将出现,但于1930年9月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还是充满了乐观的气氛。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两场危机,使得这种有关集体安全的乐观主义情绪消失了。

国际联盟在中国东北的失败

为了理解九一八事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的处境。日本把自己从19世

纪中叶的一个潜在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变成了19世纪末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1904—1905年的一场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在1910年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协约国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其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之一。欧洲国家和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建议国际联盟宪章确认种族平等的原则,但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通过了种族歧视法案,排挤日本移民。与此同时,英国也终止了其同日本的双边条约。许多日本人认为,在日本就要加入大国俱乐部的时候,规则被改变了。[4]

中国是九一八事变的另外一个当事国。1911年的革命宣告自1644年以来统治中国的清朝的终结,并建立起一个共和国。然而,这个国家很快就陷入了由军阀混战所引起的内乱之中。中国东北虽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处于一个军阀的统治之下,享有半独立地位。中国国民党在军事强人蒋介石(1887—1975)的领导之下,试图统一中国,并且严厉谴责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使中国饱受凌辱与剥削。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党力量的增长,中日之间的摩擦开始出现,中国宣布抵制日货。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人和文官集团在争夺领导权。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日本这个岛国极其脆弱。日本的军事集团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军的权利。1931年9月,日本军队在南满铁路线上制造了一起事件。这起事件给日本军队夺取整个中国东北提供了一个借口。虽然日本声称其行动的目的是保护南满铁路,但它越走越远,建立了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的行为,但是日本阻止国际联盟通过一项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案。该年12月,国际联盟决定派出一个以英国政治家李顿(Victor Buluer-Lytton)勋爵为首的委员会去调查。李顿勋爵最后于1932年9月向国际联盟递交了一个报告。该报告认定日本为侵略者,并且指责日本的干涉行为是非正义的。虽然该报告建议国际联盟成员国不要承认伪满洲国,但是它没有呼吁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日本实施制裁。1933年1月,国际联盟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的表决,接受了李顿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报告。日本投了反对票,然后退出国际联盟。总的来看,九一八事变表明,国际联盟的程序很慢、很谨慎,也没有任何的效果。国际联盟没能经受中国东北事件的考验而遭受失败。

埃塞俄比亚纷争

1935年发生的埃塞俄比亚事件使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体系面临了最大和最后的一次考验。国际联盟在这个时候实施了制裁,但结果还是失败了。意大利很早就想兼并埃塞俄比亚,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地方紧靠意大利在红海沿岸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而且还由于法西斯分子认为,埃塞俄比亚在19世纪挫败意大利在该地区殖民的企图侮辱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声称,这个历史"错误"必须加以纠正。在1934年到1935年之间,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之间有一项和平条约,意大利也签署了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的《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而且意大利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许诺过把争端移交仲裁,并且在仲裁失败后3个月内不采取其他行动。但是,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行为完全没有顾及这些规定。

意大利在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行政院为了避免意大利投否决票,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对意大利采取何种制裁措施。有50个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侵略行为发生80天之后,该会议建议成员国采取4项制裁措施:禁止向意大利出售军事产品;禁止向意大利提供贷款;禁止从意大利进口东西;禁止出售意大利不容易在其他地方购买到的某些产品,比如橡胶和锡。但是,国际联盟的决定没有涉及如下三项内容:没有对钢、煤和石油实施禁运,意大利仍然可以得到这些产品;没有断绝与意大利的外交关系;英国没有关闭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可以通过这个运河向厄立特里亚运送物资。

为什么国际联盟成员国不能采取更多的措施呢?它们普遍存在着乐观主义情绪,认为已有的制裁措施足以迫使意大利从埃塞俄比亚撤军。国际联盟的制裁的确影响了意大利的经济:当年意大利出口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意大利里拉也贬值,而且人们估计意大利的黄金储备将在9个月内耗尽。然而,尽管制裁措施给意大利以一定的打击,但它未能迫使墨索里尼改变其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英国和法国对欧洲均势的担忧胜于它们对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关注。英国和法国不想疏远意大利,因为德国的实力正在增强,这两个国家认为有必要把意大利纳入遏制德国权力的同盟之中。1934年,墨索里尼看到希特勒似乎就要占领奥地利,于是调动意大利军队到奥地利边界,希特勒作了退让。英国和法国希望说服意大利加入反对德国的同盟。

传统的外交家并不反对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制度,他们根据古老的均势

原则对此加以新的解释。从均势的角度来看,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在欧洲心脏地区出现十分紧迫的问题时,卷入发生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上的一场冲突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在遥远的非洲所发生的侵略行为,并不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有关国家有必要通过谈判和协商,把意大利重新拉进反对德国的同盟之中。因此,英国和法国开始对制裁意大利的举动采取了不太热心的态度,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和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在1935年12月会面,并拟订了一个把埃塞俄比亚划分成两部分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属于意大利所有,另外一部分属于国际联盟管辖。有人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新闻界,这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霍尔被指责背叛了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原则,因而被迫辞职。

但是3个月后,英国的舆论又倒转过来了。1936年3月,希特勒违反《洛迦诺公约》,派德国军队进驻莱茵非军事地区。英国和法国顿时把埃塞俄比亚问题搁置一边,并同意大利协商如何恢复欧洲的均势。显然,欧洲均势的重要性超过了在非洲贯彻集体安全原则。1936年5月,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同年7月国际联盟取消了针对意大利的制裁。

海地驻国际联盟代表的一席话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悲剧:"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邻近的国家还是遥远的国家,白人的国家还是有色人种的国家,都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即我们有一天也可能成为某个国家手中的埃塞俄比亚。" [5] 而且几年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落入希特勒的侵略魔掌之中。世界上最初的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的努力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后续阅读材料

1. George Scot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

2. Graham Ross,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 1919—1945(London: Longman, 1983) , pp. 109—12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估计在3500万到5000万之间,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任何一场战争。这次战争还以使用先进的武器而闻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和飞机才刚刚被使用,其作用微不足道,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和飞机占据了主导地位。雷达在不列颠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原子弹诞生了,世界迎来了核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战败国无条件投降而告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西方盟国占领了德国和日本,并且在占领期间改变其社会。"德国问题"通过德国分裂半个世纪而得到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两世界的出现,美国和苏联在这场冲突结束后成为实力超群的国家。这场战争宣告欧洲主导均势的时代结束了,欧洲从此成为外部大国角逐的场所,如同1870年以前的德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框架一直维持到1989年。

希特勒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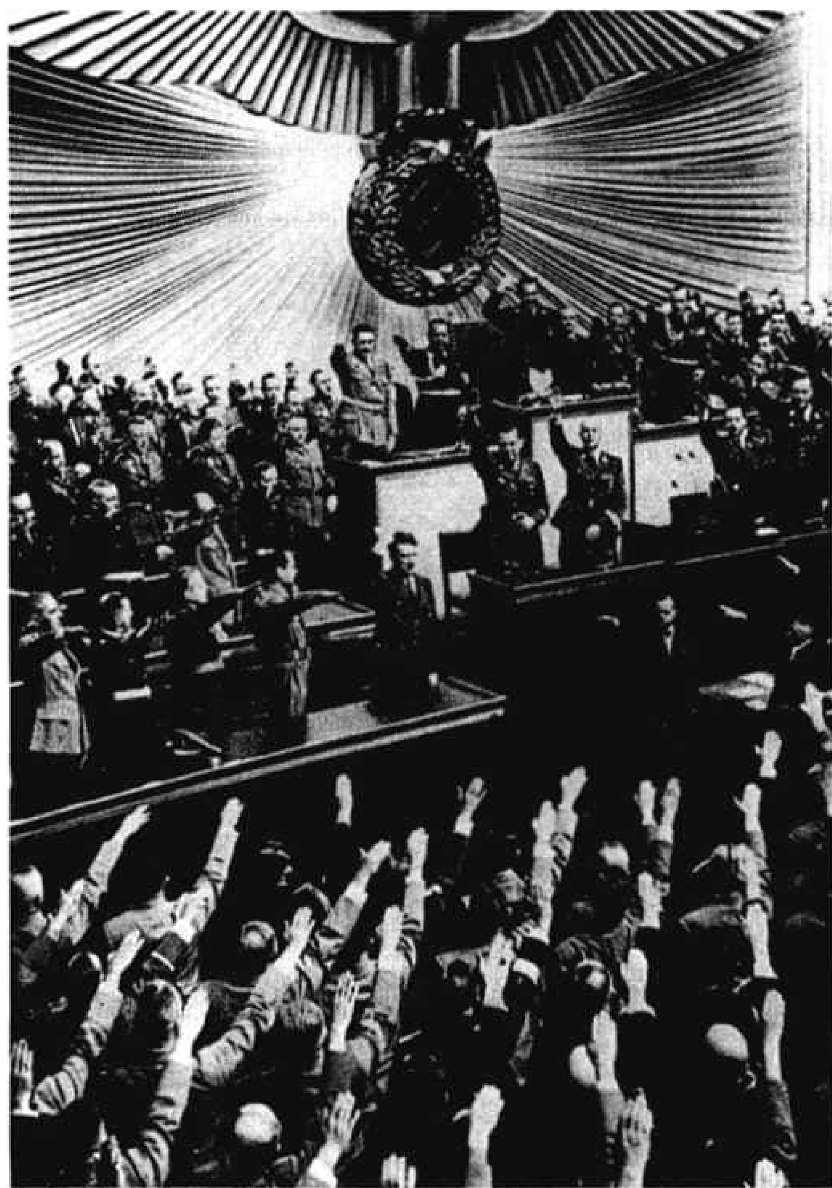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经常被称为"希特勒的战争"。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过于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以往事态发展的产物,它是使欧洲霸权在1918年终结的那场大战的第二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只是一次幕间休息。希特勒想要战争,但是他想要的并不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想要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另外,这场战争也发生在太平洋地区,这更加说明这场战争不止是"希特勒的战争"。希特勒一直鼓动日本进攻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或者攻击西伯利亚,以迫使苏联从欧洲抽调兵力。但日本既没有进攻新加坡,也没有攻击西伯利亚,而是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这令希特勒大为吃惊。太平洋战争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但是其根源和欧洲的战争不一样,它是一个更为传统的、追求地区霸权的帝国主义行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过于强调其他的原因。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近乎为希特勒开脱罪责。A.J.P.泰勒就声称,虽然希特勒是个可怕的人物

和令人讨厌的冒险者,但他只是一个闯入西方民主国家绥靖政策所制造的真空地带的机会主义者。泰勒的观点有点过分。比如,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不甚明确的计划,泰勒把它视为希特勒对法国入侵鲁尔的愤怒情绪的发泄。但是希特勒在1928年还写了另外一本秘密的书,这本书重申了《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即便那并不是一个详尽的计划,它也是希特勒所思所想的清楚表白。

>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希特勒
>
> 在我看来,这就是有关希特勒是否有意发动战争这个问题的关键。他并不是一心想要战争爆发,除非他可以使用某种聪明的诡计逃避战争,如同他曾经逃避国内战争一样。那些心怀险恶动机的人很容易认为别人也怀有同样的动机,希特勒认为别人的行为与自己一样。
>
>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6]

泰勒对于"霍斯巴赫备忘录"也是轻描淡写。希特勒的助手霍斯巴赫(Hossbach)上校在1937年贝希特斯加登的一次会议上,记录下了希特勒准备在1943年以前(即在德国的对手重新全面武装之前)夺取领土的计划。希特勒十分清楚,德国一定要抓住在东面出现的机会,奥地利和捷克将是最初的目标。泰勒否定这个备忘录的重要性,认为它不是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在泰勒的著作问世之后,有更多的证据已经为人们知晓。我们可以知道,希特勒经常谈及该时间表和那些目标。"霍斯巴赫备忘录"基本上预告了希特勒的行为。



1939年希特勒在国会受到欢迎

希特勒的战略

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后,可以有四种政策选择,但他否决了其中的三种:他可以采取 消极 的立场,接受德国的国际地位被削弱的现实；他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德国的实力(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以工业发展来扩大德国的国际影响；他可以把自己的目标限定在修改《凡尔赛条约》上,收回德国在1918年丧失的部分权益。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都推到德国的头上确实有失公允。但是希特勒拒绝采取以上三种对策,而是选择了 扩张战略 ,挣脱他认为的德国所受的遏制。在他看来,德国被夹在欧洲的中心,不应该永远处于被包围的境地,它必须获取土地。德国可以向东扩展生存空间,增强自己的地位,然后再争取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希特勒经过四个阶段来实施上面的第四种对策。首先,他通过一系列聪明的外交行动,来破坏凡尔赛体系的框架结构。1933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以及国际联盟所召开的裁军会议。希特勒把导致德国采取此种行为的原因归结为法国人的态度。他声称,由于法国在裁军会议上不愿意裁减自己的军队,所以德国不可能继续留在国际联盟内和参加裁军会议。在1934年1月,德国同波兰签署了一项条约,破坏了法国同波兰以及东欧小国通过"小协约"所达成的协议。1935年3月,希特勒指责《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宣称德国军队的数量不再限定在10万之内。他宣布了把德国军队数量增加3倍以及建立德国空军的计划。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的斯特莱沙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希特勒的行动。但是还没等这些国家组织起来,希特勒就向英国建议,德英通过谈判缔结一项海军军备协定。英国迅速抓住这个机会,从而使得斯特莱沙会议不能提出各国协调行动的对策。1936年3月,正当埃塞俄比亚事件转移了人们对中欧的注意力的时候,希特勒把他的军队开进了莱茵地区,这个地区根据《洛迦诺公约》应该是非军事化的。希特勒宣称是法国迫使他这么做的。他说,法国与苏联达成一个协议,这已经破坏了《洛迦诺公约》。他还暗示,假如其他欧洲国家接受他的关于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想法,德国可能回到国际联盟之中。这是一个利用西方民主国家的负罪感和犹豫不定心理的举动。

希特勒在第二个阶段(1936—1940）向邻近的小国进行扩张。希特勒在1936年制定了一个为期4年的扩充军备计划,以便在1940年以前做好战争的准备。德国与意大利签署了轴心国条约,同日本签订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共产国际在1919年由列宁建立,旨在发起世界范围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它在1935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改变了自己的方针,支持所谓的"人民阵线"政府,以及由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

级政党"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希特勒还支持法西斯分子反对民选的西班牙人民阵线左翼政府的战争。希特勒声称,他派遣军队和轰炸机支援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的法西斯将军弗朗西斯·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是为了保护西方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1937年,西班牙成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实验场,希特勒的飞行员轰炸了手无寸铁的民众,并且毁灭了格尔尼卡的巴斯克市(the Basquecity of Guernica）。这场野蛮的屠杀因为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一幅画作而被人们永远地记住,许多人认为这是毕加索画得最好、也最让人心神不宁的作品,它曾经出现在本书(北美版）第八版的封面上。尽管国际社会广泛声援西班牙,但法国、英国和美国很少或没有采取措施保护西班牙共和国的拥护者。1938年,奥地利总理科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呼吁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奥地利是否并入德国,他希望奥地利人民在希特勒强行吞并奥地利之前,能够投票反对与德国合并。但是,希特勒进行了干预。在1938年的合并行动中,德国军队开进了维也纳,奥地利的独立地位从此终止。

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便是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以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300万日耳曼人的民族自决问题,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靠近捷德边界的苏台德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那里的波希米亚丛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然防线,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抵抗可能发生的德国入侵行动的前沿地带。希特勒声称,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解决方案,战胜国把那些讲日耳曼语的人划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之内,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这是西方国家出卖德国的又一个例证。他要求让讲德语的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加入日耳曼人的祖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人感到恐惧,开始动员其一部分后备军。这激怒了希特勒,他发誓要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事件也让英国感到不安,英国不希望欧洲爆发战争。1937—1940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3次出访德国,试图阻止战争。张伯伦确信,英国无法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英国离捷克斯洛伐克很远,而且自己在欧洲大陆也没有驻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英国不值得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况且他也知道,英国尚未做好参战的准备。德国对格尔尼卡的轰炸表明,制空权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轰炸的恐惧日益增长,张伯伦认识到英国的防空和雷达系统尚未做好空战的准备。(某些英国官员也认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有理由抱怨,苏台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强行从德国划到捷克斯洛伐克。）出于这些考虑,张伯伦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同希特勒举行会晤,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条件是德国不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希特勒作了这个承诺,张伯伦于是回到英国并且声称自己拯救了捷克斯洛伐克,争得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仅仅经过了6个月,德国的军队就于1939年3月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并且占领了其首都布拉格。英国对此深感震惊,并且认识到希特勒还可能进一步采取行动,他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波兰。波兰在18世纪被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建国,拥有一条通往波罗的海沿岸但泽港的走廊,在该地区的居民中包括讲日耳曼语的人。希特勒再一次使用了同样的伎俩。他宣称,波兰领土包含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违背了自决原则,这是《凡尔赛条约》出卖德国的另外一个例证。但在这一次,英国和法国决心抵制德国的侵略行为,它们表示要捍卫波兰的独立地位。

另外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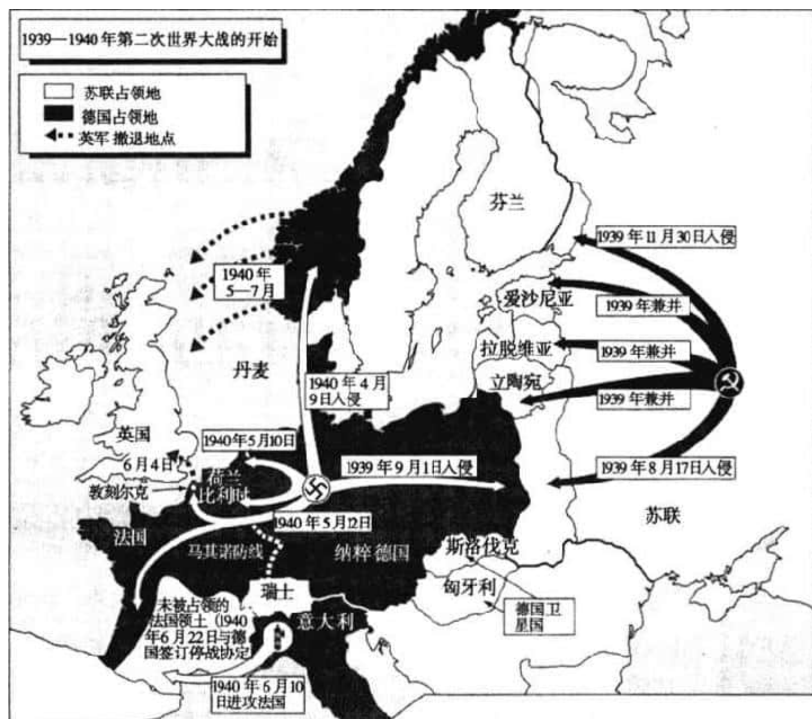
希特勒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元首和一个近乎于救世主的统治者,是因为经受过民族屈辱和政治孱弱之苦的德国渴望国家复兴与团结,这使得德国成不了一个"正常"或平常的国家,也没有出现较为保守的威权主义。其政权试图通过主宰欧洲和种族净化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这意味着德国要不断保持活力与生机,并且强化种族主义。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妄自尊大,它所带来的灾难就越加深重。德国为了追求世界霸权,要缔结一个同盟,对抗一些强大的国家。这是一场以弱敌强的赌局,必然导致希特勒政权和德国本身的毁灭。这正是纳粹党人极其不理智的表现。因此,希特勒成为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正表明,德国不仅具有从未有过的毁灭力量,而且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德国独裁者在1945年4月30日自杀,不仅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且也是第三帝国合乎逻辑的生命终结。

——伊恩·科肖(Ian Kershaw) :《希特勒和纳粹独裁》 [7]

希特勒接着采取了一个高明的外交举措。虽然希特勒曾经表示要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西方的威胁,但是他突然在1939年8月同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使得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在西面采取行动。这项条约也包括一个关于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意各自获得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占领了自己所应得的那部分领土。希特勒这一次并不想再得到一个慕尼黑协定,不愿意让英国介入和以同意德国吞并波兰的一部分领土换取德国许诺不再采取侵略行动。

第三个阶段十分短暂。德国在1940年的时候,在军事上取得了对欧洲大陆的主导权(图4.2)。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欧洲局势一度显得比较平静,这个时期被称为"虚假的战争"(phony war)。希特勒估计英国会求和。然而,到了1940年春天,希特勒十分担心英国出兵挪威。于是,他抢在英国的前面,先向挪威出兵。然后,他又对荷兰、比利时与法国发动闪电式进攻。德国的坦克穿越了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阿登森林,让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十分吃惊。他绕过了法国沿法德边界修建的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他把英军赶到了敦刻尔克,迫使英军丢下装备,让剩余的军队横渡海峡。因此,希特勒通过一系列高明的举措,在1940年的时候已经成为苏联以西的欧洲大陆的主人。

德国在第四个阶段,即"战线过长的阶段"(1941一1945),发动了全面的战争。虽然希特勒很长时间以来就想向东进攻苏联,但是他想先吃掉英国,避免两线作战。要是德国具有空中优势,德军一定会渡过海峡、入侵英国。可是希特勒的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遭受重创。由于德国不具备空中优势,人们会做这样一种猜测:希特勒会推迟执行进攻苏联的计划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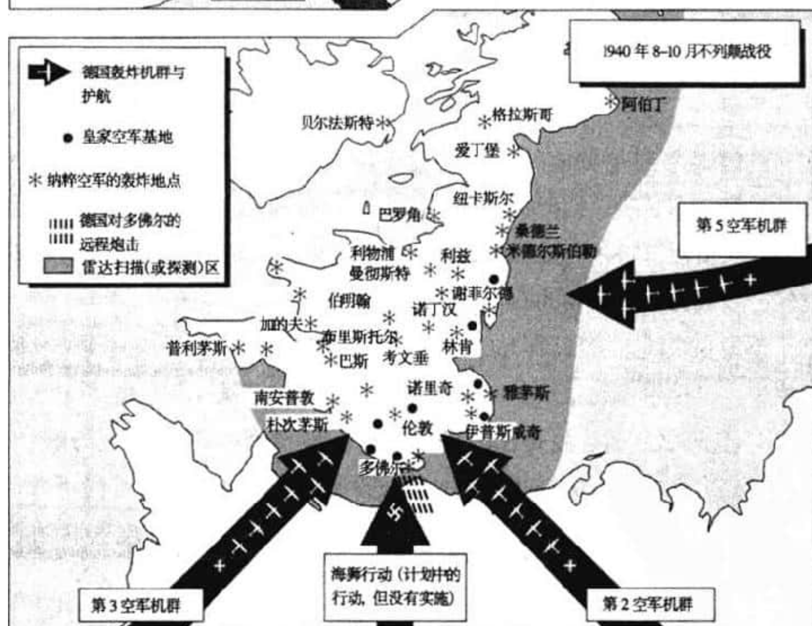


图4.2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尽管德国无力击败英国,希特勒还是决定进攻苏联,希望迅速击垮苏联,然后再来对付英国。而且,他认为德国这样做还可以阻止英国与苏联结成同盟。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从而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在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希特勒又犯了一个大错:他向美国宣战。或许希特勒是想让日本深陷战争之中,因为他一直希望日本站在自己一边,而且他也对美国的船只发动潜艇战。这样一来,希特勒也就挑起了一场葬送第三帝国的全球大战。

个人的作用

希特勒的个性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在第一个阶段或许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西方民主国家是那样地充满负罪感、显得软弱无力和处于内部分裂的境地,任何一个聪明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都可能修改凡尔赛体系。但是,德国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使得自己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势力,则与希特勒的计谋、胆量和好战性分不开。他经常否决其思想保守的将军与幕僚们的建议。希特勒想要战争,也愿意冒险。德国在第四个阶段的行为导致全球大战的到来和德国的失败,这也同希特勒个性的两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希特勒的胃口越来越大。他相信自己具有非凡才能,这种自负导致他犯了两个大错误:在吃掉英国之前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向美国宣战,让1933—1945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获得了美国介入欧洲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借口。(罗斯福一直都很想和英国一起与希特勒作战,但他只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使得国会同意美国对德国宣战。)

希特勒另外一个方面的大弱点就是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他宣称雅利安人种是最优秀的。这大大削弱了德国的力量。比如,德国第一次进攻苏联的时候,许多乌克兰人和其他一些民族起来反对斯大林的野蛮统治。但是,希特勒把他们视为低等的斯拉夫人,认为德国不值得与他们进行合作以对付斯大林。他也认为美国很弱,因为其人口中包含黑人和犹太人。他常常取笑罗斯福有一个犹太人的祖先,不知道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也可以是权力的源泉。不仅如此,反犹太主义的观念促使他赶走一些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至关重要的科学家。简而言之,个人的因素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战争的类型和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希特勒的偏执狂个性。[8]

体系和国内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只是希特勒的战争,A.J.P.泰勒的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还有体系的原因,包括结构和过程的原因。从结构层次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凡尔赛条约》一方面太苛刻,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又太宽容,让德国拥有对抗该和约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和苏联长期处于欧洲的均势体系之外(它们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改变这种地位),德国的扩张主义行为没有受到制约。此外,国际体系的过程也缺少和缓性。德国是一个致力于摧毁凡尔赛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力量的增长,强化了国家间的敌视并阻碍了国家间的沟通。

国内层次上的三个变化也特别重要。首先,西方民主国家由于阶级分化和意识形态分野而四分五裂,几乎无法通过协商一致来制定对外政策。例如,在1936年法国社会党人莱昂·布卢姆(Leon Blum)执掌政权之后,法国的保守派提出了"宁要希特勒,不要布卢姆"的口号。1939年,英国派遣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试探与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的可能性,但是该代表团以及英国政府内部就存在意见分歧。在英国人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给英国人当头一棒。英国人迟迟未同苏联达成共识的原因,就在于英国上层人士不愿意和共产党人打交道。

第二个导致战争的国内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崩溃。大萧条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波及所有国家,其产生的原因在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协调制度,以解决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不平衡的问题。但是,这场大萧条对国内政治和阶级冲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量人员的失业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就如同往火上浇油,它导致纳粹在德国掌权,并且削弱了民主国家政府的力量。

> 希特勒眼中的自己
>
> 现在,波兰已经处于我赋予她的地位……我只是担心在最后关头会有某个讨厌的家伙向我提出一个斡旋方案。
>
> ——阿道夫·希特勒,1939年8月27日 [9]

第三个国内层次的原因是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它拒绝承担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责任。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得美国人更为关心国内问题,其孤立主义倾向大大增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不怎么关心欧洲的事务。他在1936年竞选连任后才开始认识到,如果希特勒变得过于强大,德国有可能主宰欧洲,并最终威胁美国。1937年,罗斯福开始谈论欧洲发生的事件,但是美国公众并不想介入。1940年,罗斯福向英国提供驱逐舰,换取英国同意美国使用其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1941年,罗斯福说服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英国提供战争物资,防止英国被希特勒击垮。然而,由于受国内舆论的限制,罗斯福反对希特勒的行为不能走得太远。只是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才得以终结。

上述国内、个人和体系的原因是如何一起发挥作用的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是体系因素,即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中层原因主要是国内因素,即社会和意识形态分裂,它们使得德国出现了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并导致了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弱点。突发原因是阿道夫·希特勒争夺霸权的战略(见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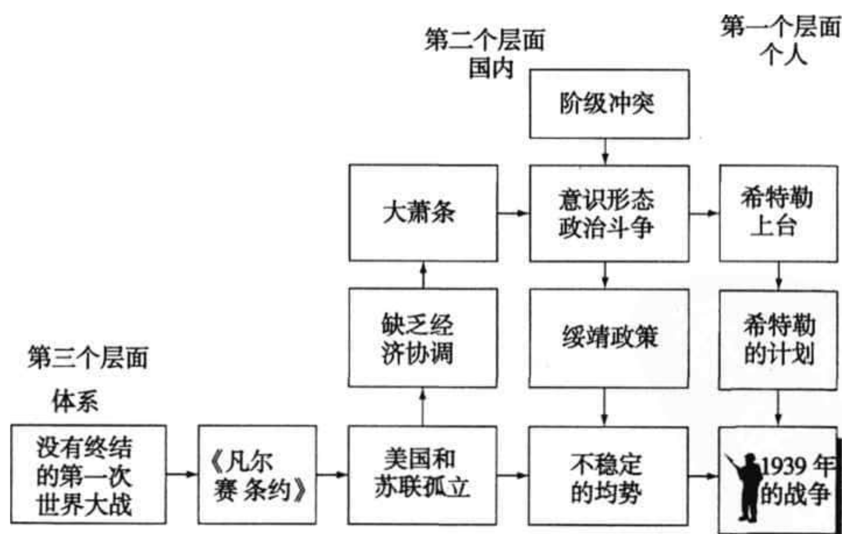


图4.3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1926年的时候(即签订《洛迦诺公约》之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变小,但是随着1929年发生大萧条和1933年希特勒上台,选择的漏斗变小,最后在1941年爆发了全球性的战争(见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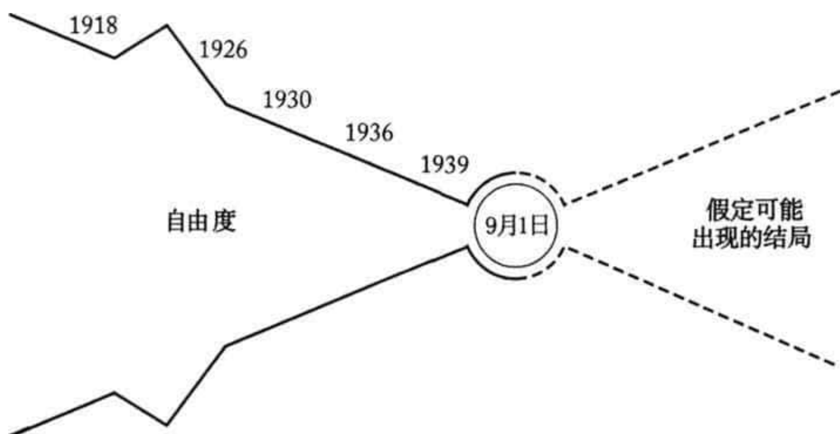


图4.4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没能解决德国问题,所以发生第二次战争的可能性在1918年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安抚德国的政策,而不是那样严厉地惩罚德国,那么魏玛共和国民主政府或许可以生存下来。或者假如美国批准了《凡尔赛条约》,并且留在欧洲以维护均势(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做法一样),希特勒可能就不会上台。欧洲可能会发生战争,但不一定会爆发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使了那些美化侵略行为的意识形态之兴起,使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变大。

依据反事实推理,我们假定英国和法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同德国对抗,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或者假定美国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样一来,希特勒就可能被遏制住或者其侵略行为被推迟。希特勒或许就不能一开始就接二连三地获得成功,也可能会被其手下的将领所推翻,他的将领有好几次想发动这样的政变,并且一再同英国官员秘密接触,提醒英国注意希特勒好战动机,并希望英国采取措施加以阻止。[10] 然而,由于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希特勒的个性和战略成为了关键的突发原因。到20世纪30年代末,当希特勒开始策划战争的时候,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即便如此,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如果法国和英国在1939年9月发动攻势,它们很可能击败德国。

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有自己特殊的原因。日本把注意力集中在东亚,它对欧洲事务的介入程度并不是很深。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日本远未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但是已经有了议会制度。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军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日本总是担心不能获得本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进口原料。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日本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减少,日本人担心,如果不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那么日本的前途就是十分黯淡的。日本想建立一个地区霸权秩序,即他们自己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征服邻国的一种十分委婉的说法)。日本坚信,建立这样一个共荣圈将使得它可以抵制英国和美国的威胁,这两个国家是太平洋上的主要海上力量。

日本首先向中国扩张。日本对中国发动的野蛮战争,导致日美之间产生了外交冲突,因为美国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1940年法国被希特勒攻陷之后,日本人抓住机会,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现在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日本扩张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向西攻击苏联。由于日本和苏联军队已经在靠近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发生过冲突,所以有的人认为日本和苏联在靠近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发生战争是最有可能的。第二种选择是向南进攻。虽然日本已经占领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但是荷属东印度(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的石油是日本所需要的。第三种选择是向东进攻美国,这是最为冒险的一种选择。

日本人最后采取了第二和第三种对策。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东攻击美国,向南进军印尼和菲律宾。南进是出于获取原料,而攻击美国的动机则难以解释。由于权力资源对比悬殊,日本人很清楚,他们最终无法赢得一场对美国的战争,但是他们希望,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会使美国士气低落,同美国的全面战争可能不会发生。这是日本人犯的一个极大的判断错误,但是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看,与其坐等失败,还不如冒冒风险。



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

到1941年秋天的时候,日本扩张主义者已经不再把苏联当作要攻击的目标了。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消除了苏联对日本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努力阻止日本的南进行动。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指出的:"美国要在日本的脖子上系上绳套,时不时勒它一下。"据说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那时也声称,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战争,因为"理智的日本人都清楚,攻击美国只会给日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11] 。但是日本人却认为,如果不发动与美国的战争,那么最终无论如何也会遭受失败。日本90%的石油依赖进口,假如石油供应被切断,日本海军将坚持不到一年。因此,他们认为,与其慢慢地被绞杀,不如发动进攻。

除了限制日本的石油供应,美国还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日本人认为,日军撤出中国将使得日本失去其经济腹地。正如一名日本军官对裕仁天皇所说的,当时的局势就好像一位患重病的人:"动手术可能十分危险,但是有挽救其生命的一线希望。" [12]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发动战争的行为并非完全没有理智,因为这可以算作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假如德国击败英国,而且突袭珍珠港使得美国人失去信心,那么通过协商缔结和平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津久田(Tsukuda)

的一席话正反映了日本领导人的这种不太明智的心态:

总的来看,如果我们发动战争,前途并不光明。我们都在考虑是否还有某种和平的方式。没有人愿意说:"别担心,即使战争被一直拖下去,我也会承担全部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维持现状。因此,大家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发动战争。[13]

当然,日本可以选择放弃侵略中国与东南亚的政策,但是这对于那些具有扩张主义和好战思想意识的军事领导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此,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袭击了珍珠港(见图4.5)。

那么,如何从三个分析层次来考察太平洋战争呢?太平洋战争中 个人的作用 同希特勒在欧洲的作用相比绝对要小得多,但是决策者个人无疑影响了事态的发展。主张扩张的日本将军们企图增强日本的地区影响力,积极策划西侵中国,南占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东袭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诸如东条英机那样的领导人,在决定政府政策的时候起了主导作用。然而,东条英机的政策主张与其他许多军事和政治高层领导人的政策主张是一致的。在德国,虽然希特勒得到了军方和工业巨头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断专行的。而在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协商而制定的。

日本领导人看日本的境遇

即便我们向美国做出让步,放弃我们国家政策的某些目标,从而换取暂时的和平,美国随着其军事地位的增强,肯定也会要求我们做出更多的让步,最终使得我们的帝国匍匐在美国的脚下。

——《1941年日本政策会议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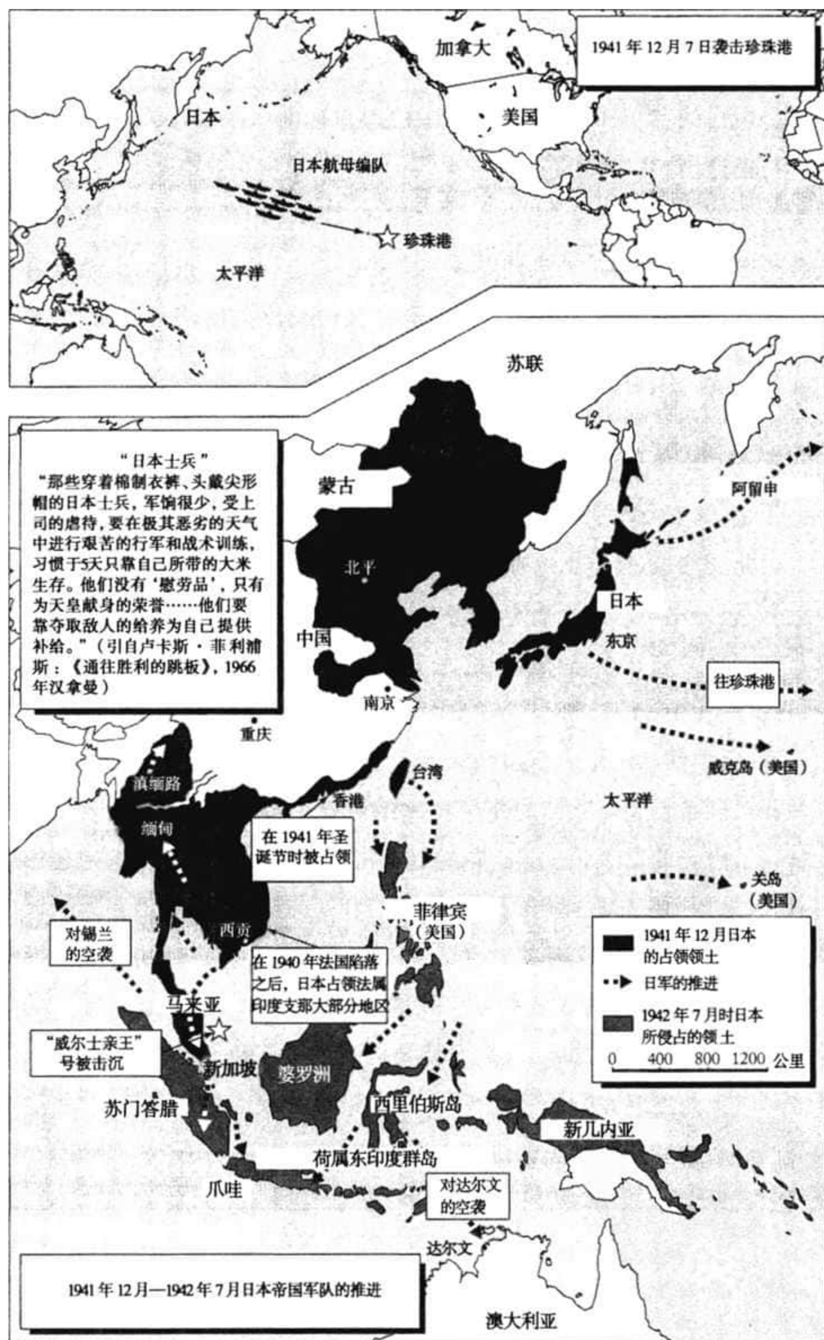


图4.5 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

个人因素在决定美国政策的时候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对日本实行惩罚性的制裁,以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侵略行为,但是在国会以及整个美国,有很多人不喜欢罗斯福那种积极的和对抗性的对外政策。1940年和1941年,在美国还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不少人仍然反对美国介入国际政治。假如某个像蒙大拿州参议员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的孤立主义者担任总统,那么美国很可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绥靖而不是对抗的政策,其结果是日本可能不会想到要进攻美国。当然,日本的侵略行动也不会受到约束,而且日本可能成为西太平洋的地区强权(regional power)。

我们再看看国内和体系的原因。国内层次上的日本政府中日益增强的军国主义倾向,使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在20世纪30年代,与欧洲的情形一样,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崩溃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日本变得更具扩张性,而1940年以前的美国则变得更愿意推行孤立主义政策。此外,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国内战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使得它在面对日本扩张行为的时候,更加脆弱不堪。这反过来也增强了日本国内政治中军国主义者的影响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人对美国不愿意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写人种族平等的条款一直心怀不满,这毒化了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从体系层次上看,《凡尔赛条约》没能满足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使得日本更难完全靠贸易获得原料。本来就已经很弱的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制度在1931年到1933年间完全失败,这也使得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受任何国际制度的制约。与欧洲的战争有所不同的是,太平洋战争的深层和中层原因主要是国内层次的,即日本的扩张倾向、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增强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内战争。突发原因是罗斯福在1941年7月决定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军队在当年12月7日攻击美国。

绥靖与两种类型的战争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有的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教训就是,绥靖没有作用,它是一种邪恶的政策。然而,绥靖本身并不坏,它是传统的外交手段。它是一种允许均势发生有利于竞争对手的变化的政策选择,有利于竞争对手。一个国家可能认为,与其遏制对手的侵略行

为,还不如让对手得到一点好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科林斯人对雅典人说,雅典应该允许科林斯吞并科西拉。但是雅典拒绝对科林斯采取绥靖政策,而是选择同它打仗。我们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雅典在科西拉问题上对科林斯采取绥靖政策或许要比挑战科林斯好。绥靖政策在1815年的时候被运用得十分成功,当时的战胜国对战败但依然强大的法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对正在崛起的美国也采取了绥靖政策并卓有成效。 [14] 甚至绥靖政策也可能是西方盟国在20世纪20年代对德国政策的正确选择,因为英国那时特别愿意尝试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以满足其"合理的抱怨"(很多英国人对《凡尔赛条约》在领土上肢解德国的做法,强烈地感觉到良心上不安)。 [15]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情是,西方国家在20年代应该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实际上却采取了对抗政策,在30年代应该对德国采取对抗政策,但是实际上却采取了绥靖政策。

绥靖是对付希特勒的一种错误政策,然而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并非像在慕尼黑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个胆小鬼。他想避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他在1938年7月这样说道:

> 当我想起那4年可怕的战争,想到700万年轻人没能享受青春年华、1300万人死亡和伤残以及那些身为父母和儿女的人所经受的折磨的时候,我坚信在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感觉到,我的首要职责就是尽力避免在欧洲再次爆发大战。 [16]

张伯伦的错误不在于其动机,而在于他的无知和自负,他未能正确地估计形势。犯这样错误的人不止他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常被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即偶然发生的战争和蓄意预谋的侵略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冲突不断升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战争可以通过绥靖政策得以避免,尽管德国的要求没有那么容易得到满足。政治学家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曾经说过:"我们从中吸取的有益教训并不只是要对侵略者保持警惕,而是认识到拒绝对崛起的国家采取合理的绥靖政策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冲突不断升级的结果,而是由于希特勒策划的侵略行为没有被威慑住。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别用于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理政策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安抚德国可能有助于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遏制德国则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实际的政策

正好相反。英国领导人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而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政策,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对日本的威慑政策促成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威慑政策遭到失败,这是由于日本感觉到自己被逼到墙角,认为选择和平不如选择冒险发动战争。

但是,把两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两种类型的战争有点过于简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单纯是偶然发生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蓄意预谋的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它并非希特勒侵略所致)。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要小心对待过于简单的历史模式。永远要对一个模式提出质疑,看看它是否同历史事实相吻合,是否与现实相一致。我们有必要记住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讲述的一个有关猫的故事。马克·吐温指出,被热炉子烫过的猫不会再爬到热炉子上,也不会爬到凉炉子上。我们在运用历史类比的分析方法,或者把两次世界大战当作理解后来事件的模式时,需要知道哪个炉子是凉的,哪个炉子是热的。

后续阅读材料

1. A.J.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an, Hamilton, 1961).

2. Qlan Bullock,"Hitl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 R. Louis,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J.P. Taylor and His Crirics* (New York: Wiley, 1972), pp. 117—145.

3. Scott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4 (Spring 1988), pp. 893—922.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事年表

1919 年	凡尔赛和会召开；通过《魏玛宪法》
1920 年	国际联盟创建
1921—1922 年	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
1922 年	海牙常设法院成立；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拉巴洛条约》；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
1923 年	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以惩罚德国停止运煤的行为；纳粹啤酒馆暴动失败
1924 年	道威斯赔偿计划被接受；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日内瓦议定书获得通过
1925 年	洛迦诺会议与公约
1926 年	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1928 年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署
1930 年	伦敦海军会议
1931 年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奥地利信贷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被迫放弃金本位制
1932 年	裁军会议；关于德国赔款的洛桑会议
1933 年	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国会纵火事件；德国国会通过《授权法案》，建立纳粹独裁政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1934 年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935 年	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法苏缔结同盟条约；英德达成海军协议；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霍尔—拉瓦尔协定》
1936 年	德国违背《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莱茵地区；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获胜；作为政治工具的国际联盟丧失信誉；罗马—柏林轴心形成；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
1936—1939 年	西班牙内战
1937 年	日本进攻南京以及其他中国城市
1938 年	德国侵略和吞并奥地利；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哥德斯堡和慕尼黑会晤希特勒以解决德捷危机；《慕尼黑协定》签署
1939 年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英法向波兰做出许诺并答应向希腊与罗马尼亚提供安全保障；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苏德（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
1940 年	希特勒入侵法国；不列颠战役；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
1941 年	希特勒侵略苏联；日本袭击珍珠港

思考题

1．当时的决策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什么"教训"?这如何影响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行为?

2．集体安全概念与均势概念有什么区别?集体安全原则是乌托邦式的观念吗?如果不是,那么集体安全原则如何才能在两次大战的间歇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3．第二次世界大战适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可以被避免?

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有关领导人的个性有多大的关系?

5．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某些经验教训有助于今天的决策者们避免战争吗?

6．日本攻击美国的行为是不理智的吗?

[1] Woodrow Wilson,引自 Ray S.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eds. ,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 , vol. I (New York: Harper, 1927) ,pp. 182—183。

[2] 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New York: John Day Co. , 1956) .

[3] Woodrow Wilson,引自 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l04o

[4] 事实上,该条约原定于华盛顿会议上签署,承认日本的大国地位。英国决定终止该条约,是因为受加拿大政府影响,加拿大政府担心续签该条约会让美国不高兴。Phillips Payson O'Brien,"Britain and the End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in Phillips Payson O'Brien,ed.,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2* (London:

RoutledgeCurzon,2003）,pp. 264-284。

[5] 引自 F. P. 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p.653。

[6] Taylor, A. J. P.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2nd ed. (Greenwich: Fawcett, 1961）, p.281.

[7] Ian Kershaw, "Hitler and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Mary Fulbrook, ed., *German History since 1800* (London: Arnold, 1997）, p.336.

[8] 希特勒是众多传记和个性研究作品的研究对象。当然,任何一个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述都会详细提到希特勒。特别具有启示的佳作是一本相对 较旧的传记:Alan Bullock, *Hitler:A Study in Tyranny* ,abr. ed. (New York: Harper&Row,1971）。有一本最有创意的心理传记作品,它详尽地分析并提出合理谨慎的结论。该书就是 Fritz Redlick, *Hitler: Diagnosis of a Destructive Proph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Adolf Hitler,引自 Gordon Craig, *Germany* ,1866—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712。

[10] Bulllock, Hitler, p. 190；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Gdirden City, NY: Doubleday,1976）,pp. 467—469; Sidney Aster,1939: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p.235.

[11] Dean Acheson,引自 Scott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Tabb,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p.335—336。

[12]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p.325.

[13] Tsukuda,引自 Scott Sagan,"Deterrence and Decision: An Historical Critique of Modern Deterrence Theory," Ph. D. thesis,Harvard University, 1983, p.280。

[14] Stephen R. Rock, *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xing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0) , pp.25—47.

[15] Robert J. Caputi, *Neville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Sdinsgrowe, PA: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39.

[16] Neville Chamberlain, *In Search of Peace: Speeches* 1937—1938 (London: Hutchinson, n.d.) , p.59.

[17] David P.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p.6.



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在雅尔塔

第五章

冷战

20世纪上半叶充满了暴力,20世纪下半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下半叶爆发了一场冷战,也就是一个没有战争的紧张对抗时期。这场对抗是如此的紧张,以至于许多人预言两个超级大国会发生军事冲突。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爆发过战争,只不过战争是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不是直接发生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冷战从1947年到1989年,前后持续了40多年。1947年至1963年是冷战的高潮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美苏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谈判。两国最高领导人甚至在1945年至1955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会晤。1952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rman) 认为,他被孤立于美国驻苏使馆内的处境同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拘禁于柏林的经历相类似。20

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冷战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和苏联人频繁接触,他们一直在进行军备控制谈判。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随着苏联政策的变化,冷战很快也令人惊讶地结束了。1989年,苏联在东欧的霸权地位开始瓦解。1991年,苏联本身也解体了。

威慑和遏制

为什么冷战没有变成热战?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将论及这些不同的观点。冷战的发展轨迹不同寻常,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认识国际关系的视角,而且也揭示了国家可能进行两种对外政策选择的动力。这两种对外政策选择是 威慑(**deter**) 和 遏制(**contain**) 。威慑是指通过恐吓,让对手打消某种念头,它并不是冷战所特有的,也不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概念。在历史上,国家常常通过增加军备、缔结同盟和发出威胁,来阻止其他国家发动进攻。在冷战期间,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超级大国更多地借助威胁来促使对手放弃某种行为,而不是在敌手发动进攻之后,通过防御来加以抵制。冷战中的威慑依赖于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它也是均势逻辑的延伸。通过核威胁进行威慑,是一个超级大国努力防止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取得优势,从而避免破坏两国间均势的一种方式。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威慑经常加剧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我们难以证明威慑是否起作用。有的因果关系是不真实的。如果一位教授说她的讲课使大象跑出了教室,那么我们很难证明她的话是错误的,因为大象根本就没有进过教室。我们可以用反事实推理来验证此种说法:如果某人在讲课,那么大象进教室的可能性有多大?与此相类似的是,到底是核威慑的作用还是侵略计划的缺失,能够更好地解释冷战时期的和平状态?我们在冷战时期知道,美国并没有军事征服的意愿,但是美国人假定苏联有这样的意愿。如今,苏联冷战时期的档案已经公开表明,苏联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一样,都不能确定对方的动机。

出于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美国采取 遏制(**containment**) 政策。遏制指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所采取的特定政策,它通过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外推动形成一个自由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来包围苏联。然而,遏制和威慑一样,并非冷战所特有的,但这个专用名词是冷战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遏制一直是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在18世纪,欧洲保守的君主制国家试图遏制法国革命所主张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而且在比法国革命更早的时候,天主教教会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企图遏制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展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思想的传播。遏制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它既可以是进攻性的,也可以是防御性的。它可以是战争或同盟形式的军事遏制,也可以是贸易集团或制裁形式的经济遏制,还可以是运用软权力,后者的表现形式为传播思想和价值观。在冷战期间,美国总是在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扩张性政策和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较为有限的政策之间摇摆,但是它始终把硬权力和软权力资源结合起来使用。

后续阅读材料

1.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2.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4(July 1947) , pp. 566—582.

解释冷战

三个路径

到底谁导致冷战,或者什么原因导致冷战呢?几乎从冷战一开始,这些问题就一直是学者和决策者们激烈争论的东西。有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传统派 、 修正派 和 后修正派 。

传统派(traditionalist) 声称,有关谁导致冷战的问题很容易回答:是斯大林和苏联导致了冷战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是防御性的,而苏联外交则是进攻性和扩张性的。苏联的威胁使得美国人慢慢地警觉起来。

传统派引用了哪些证据呢?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就主

张通过联合国建立起普遍的世界秩序和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则不怎么重视联合国,因为它想扩展自己的影响,并且维持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执行军队复员计划,而苏联则在东欧留驻大量军队。美国承认苏联的利益,比如在罗斯福同斯大林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晤的时候,美国努力满足苏联的要求。然而,斯大林却不遵守协定,特别是不允许波兰举行自由选举。

他们还指出,战争结束后,苏联迟迟不从伊朗北部撤军,这是苏联扩张主义的又一个表现。最后,苏联只是在压力之下才被迫从伊朗撤军的。1948年,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苏联在1948年和1949年封锁柏林,企图把西方国家赶出西柏林。紧接着在1950年,朝鲜军队跨越边界进入韩国。在传统派看来,这些事件使得美国逐渐认清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性质,从而导致冷战。

修正派(revisionalist) 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表著述,他们认为,冷战是由美国的扩张主义而非苏联的扩张主义所导致的。他们的证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并不是两极的,苏联要比美国弱小得多,美国在二战中增强了实力,而且拥有核武器；而苏联的实力在战争中受到削弱,而且没有核武器。战争使苏联丧失了3000万人口,战争结束时,其工业产值只及1939年工业产值的一半。斯大林在1945年10月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苏联将致力于国内重建。不仅如此,修正派还指出,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外行为是很有节制的:在中国,他试图限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行为；在希腊内战中,他试图限制希腊共产党人的行为；而且他还允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的非共产党政府继续存在。

修正派分为两个分支派别,一派强调个人层次的解释,另外一派强调国家层次的解释。强调个人重要作用的修正派学者认为,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因为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继任总统后,美国的政策变得比较强硬。1945年5月,美国突然停止执行战时租借援助计划,一些已经开往苏联港口的船只中途返回。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故意在斯大林面前提到原子弹,以此吓唬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美国国内,民主党逐渐从左倾和中间立场向右倾立场转变。1948年,杜鲁门解除了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农业部长职务,后者主张美国同苏联维持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杜鲁门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 则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温和修正派认为,这些人事变动表明美国开始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

强调国家层次因素重要作用的修正派学者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个人,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例如加布里埃尔·科柯

(Gabriel Kolko）、乔伊斯·科柯(Joyce Kolko）和威廉·A·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就认为,美国的经济性质决定着美国要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以及确保资本主义而非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宁的环境。美国的经济霸权绝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经济区。美国领导人担心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演,如果没有对外贸易,一次新的大萧条就会来临。在这些修正派学者看来,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经济扩张的一种方式。苏联人认识到马歇尔计划对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构成了威胁,因此明智地拒绝参加该计划。用威廉姆斯的话来说,美国人总是主张在国际经济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闯进别人的门户了。

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以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强调体系结构层次的解释。他们声称,不论传统派还是修正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不能把发生冷战的责任归结于某个人或某一方。战后的两极均势结构决定了冷战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39年的世界是个多极世界,存在着7个主要大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只剩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极结构加上欧洲国家的虚弱,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并将美国和苏联拖入其中。后修正派因此认为,美国和苏联注定要发生冲突,追究发动冷战的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后修正派也指出,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和美国的目标是不同的。苏联更关心确保领土控制,既包括对本国的控制,也包括对缓冲区或者势力范围的控制。美国的主要兴趣在于建立一个自由的、根据规则治理的国际秩序。换句话说,美国的环境目标与苏联具体的领土占有目标发生冲突。美国倡导全球性的联合国制度,而苏联则努力巩固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然而,后修正派指出,这些风格上的区别并没有让美国人感到自己是伪善的,由于美国的盟友在表决中占有多数票,因此联合国使得美国获得了好处,而美国却不怎么受联合国的约束。苏联人在东欧拥有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在西半球也拥有一个势力范围。

后修正派宣称,美国和苏联都注定要扩张,其原因不在于修正派所强调的经济决定论,而在于很早就有的、国家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不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允许对方主宰欧洲,就像雅典不允许科林斯控制科西拉的海军一样。后修正派为了证明这个论点,引用了斯大林在1945年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讲的一段话:"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领土,都会在那里强加它自己的社会制度。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其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1] 换句话说,在一个意识形态两极化的世界中,一个强大的

国家会在其势力范围内使用军事力量,按照自己的意象去重新塑造其他国家,以确保自身的安全。罗斯福在1944年秋天也说了一段类似的话:"在这次全球性的战争中,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是美国所不感兴趣的。" [2] 后修正派指出,这种两极结构使得冲突呈螺旋状发展:一个国家的强硬路线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也采取强硬路线。两个国家都把对方视为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那样的敌手。随着双方认识的僵化,冷战不断深化。

罗斯福与斯大林:互不信任

> 总统的行为似乎表明,美国人相信真正的合作不管是在战时还是战后都是可以实现的。罗斯福显然忘记了(假设他曾经认识到),在斯大林眼里,他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两样,两人都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头,其长远的企图同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相抵触的。
>
> ——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斯大林的对外政策》 [3]

冷战结束以后,一些苏联时期的秘密档案开始被解密并为人们所知晓,它促使人们再次争论有关哪一方挑起冷战的问题。比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就越来越确信,苏联要对这场超级大国争斗的开启与性质负主要责任。他的论据包括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所持的僵硬立场,以及克里姆林宫顽固坚持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帝国。加迪斯的看法已经向传统派的观点靠拢,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这也就预示着,这场争论在可见的将来不会结束。

罗斯福的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因此他反对凡尔赛式的和平,而是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他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贸易体系,避免出现那种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破坏世界经济以及促使战争爆发的保护主义。美国要加入一个新型的、较强有力的国际联盟,其表现形式就是设有一个强有力的安全理事会的联合国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是一位铁杆威尔逊主义者,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强烈支持

联合国。

罗斯福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在国内需要得到美国两党对其国际主张的支持。而在国外,他要让斯大林相信,加入联合国将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有人批评罗斯福的战后计划过于天真。罗斯福的计划并不天真,但他的某些策略确实是天真的。他对联合国寄予太大的期望,过高估计了美国孤立主义势力,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过分低估了斯大林的敌意。罗斯福认为他可以用对待一位美国政治家的方式来对待斯大林,希望通过主动拥抱斯大林,来促进美苏双方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充分认识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是极权主义者,"他以人民的名义,屠杀了无数的人;他为了防备希特勒的进攻,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条约,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战利品,像希特勒一样驱赶、消灭或奴役其周边的民族;他在德国西进的时候袖手旁观,并且挖苦那些西方国家,而在希特勒东进的时候又指责西方国家没有向苏联提供足够的支持"[4]。

罗斯福对斯大林的认识是不准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像后来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并非在其政策的各方面都是天真的。他试图以经济援助换取苏联做出政治让步,并且拒绝同苏联人分享原子弹的秘密。对于战争结束后哪个国家应该在欧洲驻军和对该地区事务拥有发言权这个问题,他完全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罗斯福所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斯大林看世界的方式与自己一样,相信自己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觉得可以用美国领导人那种调和分歧与增进友谊的政治技巧,与斯大林打交道。

斯大林的政策

对斯大林来说,战后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国内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不仅包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员的惨重损失和工业产量的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不少苏联人出于对斯大林高压统治的强烈不满,在战时同德国人合作,德国的入侵严重削弱了斯大林的控制权。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助民族主义来号召民众,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已经下降,不足以动员苏联人民。(那时的苏联人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人都把这场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后,斯大林采取了孤立主义的政策,旨在消除来自

欧洲和美国的外部影响。斯大林把美国当作敌手,以此让苏联人民不信任外国人,并且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集中控制。但是,这并不是说后来发生的冷战正是斯大林想要的。

如果国际合作有助于苏联实现其在东欧的目标和从美国获得一些经济援助,那么斯大林愿意采取某些合作的态度。作为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美国会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向外输出资本,以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斯大林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新的危机将在10年到15年内爆发,苏联到那个时候已经复兴,将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既要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也要维护苏联通过1939年苏德条约所获得的在东欧的权益。斯大林也曾试探能否在其他地方扩展自己的影响,这样的举动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更容易获得成功。1941年,斯大林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他喜欢算术,不喜欢代数。换句话说,他喜欢务实性的东西,不喜欢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当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一个有关瓜分战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丘吉尔的这个方案,巴尔干有些国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和苏联在某些巴尔干国家中的影响力各占50%。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支持都是有所节制的,这同斯大林喜欢以算术而非代数的方式追求目标的行为方式是相吻合的。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用共产主义的认识框架看世界,但是他经常采取务实的策略。

冲突的阶段

早期的冷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1947年是冷战的序幕和滑向冷战的阶段；1947—1949年是冷战开始阶段；1950—1962年是冷战高潮阶段。

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杜鲁门,都不愿意看到冷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就派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出访莫斯科,寻求同苏联达成共识。即使是在波茨坦会议以后,杜鲁门依然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稳健、温和的人。直到1949年,他还把斯大林比作自己在堪萨斯城的老朋友博斯·彭德格斯特(Boss Pendergast）。

1946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电报,试图让美国决策者了解斯大林政权的真实性质与动机；温斯顿·丘吉尔则在密苏里的富尔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警告说一个"铁幕"已经降临欧洲。当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 还在努力与苏联进行谈判、希望同苏联达成一项战后条约的时候,杜鲁门指派其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 准备一份有关苏联真实计划的报告。克利福德与一系列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凯南的看法是正确的:苏联人会抓住一切代价不高的机会进行扩张。然而,杜鲁门在1946年12月看到这份报告后告诉克利福德,他不想让很多人知道该报告的结论,因为他还在努力遵循罗斯福的大政方针,尚未制定出一个新的战略。

有6个问题促使美国最后调整了战略,导致冷战的爆发。第一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催化因素,并且美国人认为,斯大林违背了战后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的诺言。然而,斯大林的承诺是不甚清楚的。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会面的时候,罗斯福提出了波兰问题,但是他主要是出于1944年美国将进行总统选举的考虑,吁请斯大林允许波兰举行选举。罗斯福自己将参加总统选举,美国有许多美籍波兰裔选民,他需要向这部分选民承诺,波兰在战后将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从来就不担心苏联的选举,所以他对罗斯福的吁请并不是很在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也比较含糊,斯大林极力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其含义,当苏联红军从波兰赶走德国人之后,苏联便在华沙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美国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是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会接受现实,因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

第二是美国在1945年5月,突然终止租借援助计划,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因此陷入一个紧张的境地。租借援助计划突然终止执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官僚机构所犯的一个错误,而1946年2月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贷款要求,则是两国总体关系没能改善的结果。苏联人把以上美国的两个做法解释为敌视行为。

第三是德国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同意,德国要支付200亿美元的赔款,其中一半给苏联。但是雅尔塔会议并没有确定如何以及何时支付赔款,只是决定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要求获得100亿美元的赔款,而且它要求这些赔款应从美、英、法占领的德国西区获得。哈里·杜鲁门关心德国的重建问题,他提出,如果苏联要从德国获取100亿美元赔款的话,那么它应该从自己占领的德国东区获得。杜鲁门声称,在德国西区实现重建之后,如果那里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告诉苏联人。这样,在有关德国如何重建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人存在着分歧。美国同英国、法国一道,

在德国西区发行新货币,开始了把德国西区融入西方的过程,这也导致了苏联加强对德国东区的控制。

第四是东亚问题。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个星期前,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还保持中立的态度。然后苏联就向日本宣战,并乘机从日本手中夺取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以及整个千岛群岛。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要求在日本获得一个占领区,就像美国拥有一个德国的占领区一样。杜鲁门的反应实际上是这样的:苏联人来迟了一步,所以不能获得一个占领区。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然而,这不能不让苏联人联想起东欧的情形,美国要求在东欧举行自由选举和在东欧事务上拥有发言权,而苏联军队是最先到达这个地区的。因此,苏联人把远东情势与东欧情势相类比,而美国人则把远东发生的事视为苏联努力扩张其影响的又一个例证。

第五是原子弹问题。罗斯福已经决定美国不与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杜鲁门下令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主要是为了使对日战争早点结束,而不是如一些修正派人士所说的旨在吓唬苏联。但是,他确实希望原子弹会产生一些政治效果。在波茨坦会议上,当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的时候,斯大林脸上表情木然,显得若无其事。显然,斯大林事先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人员知晓了这个消息,但是他的镇定态度让美国人感到惊讶。1946年,美国提出了由联合国控制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斯大林对此表示断然拒绝,因为他想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在斯大林看来,处于国际控制下的原子弹仍然是美国的原子弹,因为只有美国人知道如何制造原子弹,苏联拥有原子弹更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安全。苏联研制的原子弹终于在1949年爆炸成功。

第六个问题涉及东地中海和中东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该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该地区发生了一些事件。首先是1946年3月苏联拒绝从伊朗北部撤军。美国在联合国的有关辩论中支持伊朗。苏联最后还是撤走了军队,但是这个事件让苏联人感到很不高兴。接着,苏联又对其南面的邻居土耳其施加压力,而且希腊共产党看上去快要获得希腊内战的胜利。这些事件让西方更加相信,苏联人正在扩张其势力。

尽管上述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某些误解的因素,但这6个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和绥靖的方式得到解决吗?绥靖能起作用吗?或许不能。凯南声称,苏联人倾向于试探对方的每一个弱点。绥靖政策可能被视为一个弱点,从而招致苏联采取更多的试探行为。1946年6月,苏联前任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告诫美国国务卿不要做出让步,因为紧张关系的根源是"这里

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即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让步只会导致"西方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面对越来越多的要求"。[5] 绥靖政策或许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强硬的讨价还价态度可能制约了某些事态的发展,导致冷战的爆发。如果美国在采取坚定立场的同时,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一些安抚性的策略,并且做出愿意进行谈判的姿态,那么1945—1947年间的事态发展或许会更好一些。

第二个阶段,即1947—1949年的冷战开始阶段,是在希腊与土耳其问题出现后开始的(图5.1)。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削弱,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再向东地中海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美国面临着或者让该地区继续存在一个真空地带,或者取代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政策选择问题。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务意味着美国要改变传统的对外政策轨道。杜鲁门不敢确定美国国内舆论是否会支持这么一个举动,当时人们仍然担心,孤立主义可能继续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杜鲁门问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参议院是否支持美国政府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范登堡回答说,杜鲁门必须"让议员们感到害怕",这样才可以使得国会支持政府改变美国传统对外政策。于是,杜鲁门在向国会解释政策变化的时候,没有提及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来维持东地中海地区均势的必要性。相反,他却大谈美国需要支持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这种从道义和意识形态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援助的做法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当时已经回到国务院任职的乔治·凯南,反对这种用意识形态语言表述对外政策的做法,认为它是没有限度的,会使美国陷入困境。显然,"杜鲁门主义"所表述的遏制政策包含着极其含糊不清的内容。美国到底是要遏制苏联的权力,还是要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呢?刚开始的时候,遏制苏联的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似乎是一回事,但后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含糊不清所造成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杜鲁门夸大了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且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解释美国政策的变化,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吗?一些观察家指出,在民主国家中改变公众舆论比在极权国家中改变政策要困难得多。他们声称,夸大威胁的做法加快了民主国家公众舆论的转变过程。为了让一辆狂奔中的马车掉转头,勒紧缰绳是十分必要的。不管夸大威胁的做法是否必要,它的确促使冷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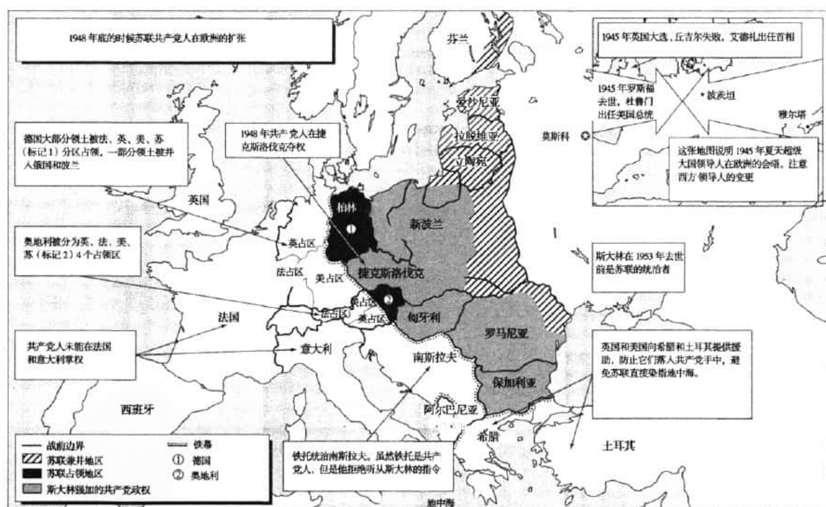


图5.1欧洲冷战的早期

1947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提出了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按照马歇尔计划的最初建议,假如苏联和东欧国家愿意的话,它们可以参加该计划,但是斯大林向东欧国家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它们不敢参加这个计划。在斯大林看来,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慷慨大方的表现,而是一个经济大槌,它被用来破坏东欧作为苏联安全缓冲区的地位。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想得到美国的援助之后,斯大林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1948年2月,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

杜鲁门从这些事件中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事态发展的回声。他开始担心斯大林可能成为另一个希特勒。美国提出了一个有关德国西区货币改革的计划,斯大林则以封锁柏林来加以回击。美国对柏林封锁的反应是实施空运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双方针锋相对,冲突不断升级。

1949年发生的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得冷战进入了最为僵硬的阶段。一个事件是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比美国人预计的时间要早得多。另一个事件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除了台湾) 。美国人的惊慌心理表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 这个绝密政策文件上,该文件预测,苏联在4年到5年内会发动一场进攻,这是它追求全球霸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NSC-68呼吁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杜鲁门由于受到财政问题的困扰,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批准NSC-68。

朝鲜战争所起的作用就如同往小火苗上浇汽油(图5.2）。它使得西方确信斯大林具有扩张主义野心,并导致美国杜鲁门政府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为什么斯大林允许朝鲜的行动呢?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做这样的解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促使斯大林抓住统一朝鲜的时机。美国人曾经表示,朝鲜半岛不在其防御线之内,艾奇逊国务卿表明了这一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进行相应规划。对斯大林来说,朝鲜就像一个软腹部。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而非深思熟虑的。他想起了希特勒进军莱茵地区,并且想到了必须在各处反击侵略行为的格言。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历史类比,其作用之大让有关防御线的精心计划黯然失色。美国当时可以动员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当时苏联抵制安理会,当时联合国安理会未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以合法地位,而让台湾当局享有合法席位）,并且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朝鲜,把共产党人推回到"三八线"以北,"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朝鲜半岛与NSC-68

NSC-68的目的在于改变美国大众对政府的认识,让他们相信总统不仅可以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可将该决定加以实施。即使是这样,假如苏联人没有那么愚蠢地鼓动对韩国发动进攻和掀起"仇视美国"的运动,那么美国可能就难以在此后的几年里采取那些行动了。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参与创建》 [6]

开始的时候,朝鲜军队向南长驱直入,几乎到达半岛的最南端。但是,美国军队于1950年9月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的退路。如果美国军队就地止步,那么就能因为恢复朝鲜半岛战前现状而成为胜利者。然而,杜鲁门迫于国内的压力,命令美军跨越"三八"线,追击朝鲜军队。在美国人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介入,把联合国军队赶回到半岛的中部。双方在战争中相持了3年,最后于1953年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美国开始卷入与中国的纠纷之中,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在美国国内,美国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挫折使得国内发生分裂并使麦卡锡主义兴起。麦卡锡主义因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而得名,麦卡锡严厉指责所谓的美国国内的颠覆阴谋,然而他的指责并没有什么根据。冷战的营垒日益分明,两大集团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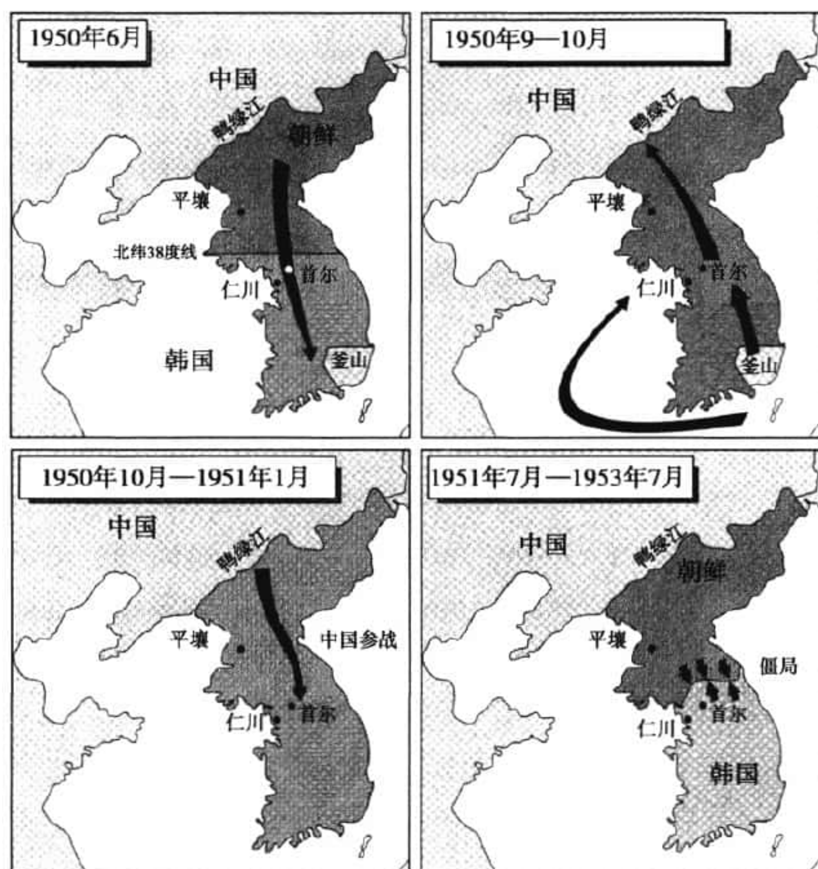


图5.2朝鲜战争

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冷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吗?假如我们把"不可避免"理解为"可能性很大",那么后修正派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两极结构使得双方很可能被拖入欧洲的权力真空之中,并且很难从中摆脱出来。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限制了联合国的作用,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造成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不和缓的。在这样的体系条件之下,国际间的冲突会因为上述6个问题或其他某些问题而产生,而且很难得以解决。

然而,后修正派过于依赖体系层次的解释。冷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冷战的激烈程度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冷战具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由于两极体系结构一直到1989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结构层次的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场冲突会出现不同的阶段,也说明不了为什么它的激烈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个人以及国内政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有考察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其所处的国内政治背景,才能真正地理解冷战。修正派关注国内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错误地过分强调经济决定论。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中的夸大其词所起的作用更大。鉴于战后苏联的国内问题,斯大林利用了意识形态,而杜鲁门则为了让美国人民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故意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把当前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形势相类比的思维方式,使得双方的立场更加僵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双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选择其他的政策,那么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或许会减轻。比如,如果美国在1945—1947年间听从凯南的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反应措施,在1947—1950年间争取同苏联进行务实的谈判和相互沟通,那么冷战很可能不会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激烈的程度。

分析的层次

冷战的起源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意象或者分析层次加以解释,如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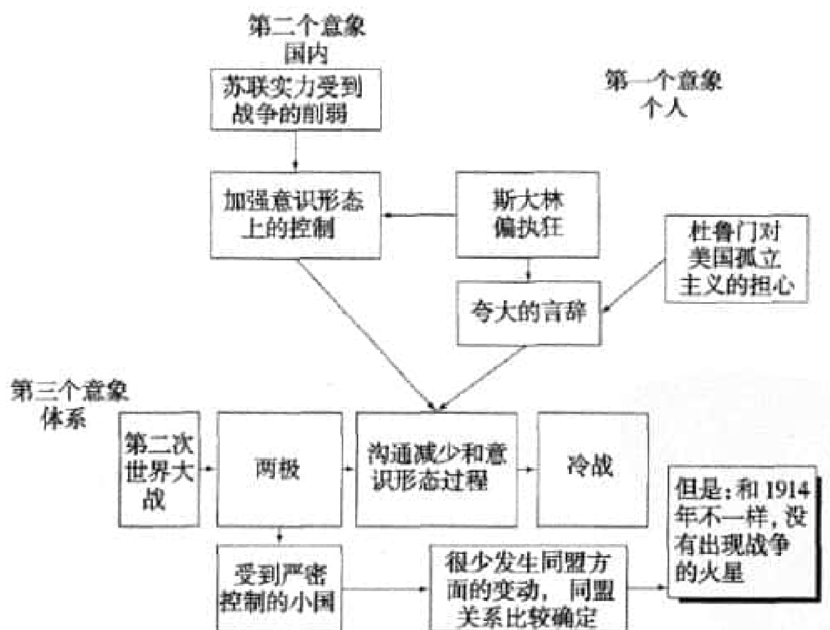


图5.3 冷战的原因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19世纪时就预言,俄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现实主义者可能因此预言,这两个国家将陷于某种形式的冲突之中。当然,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给这场冲突增加了意识形态内涵。伍德罗·威尔逊最初获知俄国革命的消息后,对俄国人民的民主精神大加赞扬。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谴责布尔什维克党人处死沙皇、没收私人财产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等行为。美国派了一小支军队参加盟国干涉俄国的行动,声称这样做的动机是想让俄国继续参加对德作战,但是苏联人却把这一干涉行动的目的解释为西方国家企图把共产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但美国和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并没有发生冲突,还在20世纪40年代上半叶成为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大国权力的衰落所导致的两极结构以及权力真空地带的出现,改变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在此之前,虽然美苏相互不信任,但是两国相距甚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两国避免相互接触,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们开始近距离地相互面对,欧洲被一分为二,严重的冲突在1947年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即这种局面是否为两极结构的必然产物?不管怎么说,苏联是一个陆上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海上强国,为什么它们不能像熊和鲸鱼一样进行劳动分工、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呢?

答案在于,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或者那些可以影响均势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日本),正好位于苏联的边缘地带。正如乔治·凯南在战后所指出的,世界上有4个地区具有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创造力,它们的同盟倾向将左右全球的均势。这4个地区是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结盟,共同反对苏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体系层次的解释预测冲突必然发生,但是它无法说明冲突的强度有多大(参见图5.2)。为此,我们需要超越体系层次的分析,从国家与个人层次探讨问题,以及了解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在国家层次上,这两个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简单来说,苏联的政治文化及其在外交中的表现,是由俄国传统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根源所决定的。建构主义者指出,俄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强调专制而非民主,渴望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害怕出现无政府状态(因为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担心无政府状态与异己分子的存在会导致帝国的解体);担忧外来入侵(俄国是一个在地理上很脆弱的陆上大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多次遭受邻国的侵略);希望甩掉落后的帽子(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活力)以及崇尚秘密(试图掩盖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制度以阶级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为正义的基础。个人或者社会应当起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成为领导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被认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意识形态因素增强了苏联对外扩张的倾向,并且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过程是秘密的,受到严密控制的。这种对外政策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斯大林在1939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正是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优点。斯大林可以不受公众舆论的制约,他也不需要担心官僚机构会拖自己的后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迅速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此时的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同苏联打交道。然而,当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斯大林不敢相信希特勒会那么做,于是他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处于情绪极度消沉的状态。其下属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填补领导真空,其结果是,苏联的军事防御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与此相反,美国的政治文化强调自由民主、多样性和权力分散。美国人不仅不用为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而汗颜,相反会为美国在技术和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美国不用真正担忧外来入侵,这是因为其邻国皆较弱小(它们因而容易受到美国的攻击),两个大洋把美国与其他大国隔开,而且英国海军也曾经阻止其他国家插手西半球。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政府文件经常在出笼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后,就能为新闻界所获得。美国社会十分重视个人的正义,不强调阶级的正义。基于此

种政治文化的对外政策强调道义感和公开性,而且总是在内向和外向两种倾向之间来回摇摆不定。其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过程常常是前后不一致、缺乏连贯性的。然而,硬币还有它的另一面。公开性和多样性的优点经常能保证美国避免犯更大的错误。

因此,两个结构迥异、对外政策过程不同的社会不能够相互理解,这一点都不让建构主义者感到奇怪。我们从20世纪40年代杜鲁门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打交道的方式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很难理解苏联,因为后者就像是一个暗箱。美国领导人只能看到进出暗箱的东西,不知道暗箱里面所发生的事。美国同样也让苏联人难以理解。美国就像一个发出噪音的机器,它产生的背景声音太杂了,让人很难听清真正的信号音。也就是说,过多的人在谈论太多的事情。因此,苏联人经常搞不清楚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苏联经常被指责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和革命国家,而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然而,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更精细,也更准确。在他们看来,苏联事实上更倾向于追求具体目标或占有目标,而美国则倾向于追求抽象或环境目标。我们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谈判桌上所提出的目标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目标十分明确,即从德国和波兰获得权益。罗斯福想建立联合国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丘吉尔的目标是帮助法国重建,以便在美国军队"回家"之后抗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传统目标,他想保留通过苏德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斯大林的目标和彼得大帝的目标十分相似。

一些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扩张主义者,旨在建立世界霸权。也有人认为,苏联人主要是追求安全,其扩张是为了防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和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有所不同。第一,苏联不好战,它不想介入战争。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候,担心西方国家建议同他再签署一个慕尼黑协定,而他真正想要的却是战争,以此为其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第二,苏联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机会主义态度,不会轻率地采取冒险行动。冒险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同共产主义相违背的罪恶,因为它可能打乱历史发展的进程。苏联在冷战时期,从未像希特勒那样好战与鲁莽。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苏联的行为完全是防御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在两极世界中很难区分进攻与防御行为。某些行为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可能对对方极具威胁。而且,防御性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在19世纪,英国开始进入埃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在夺取埃及之后,英国人又认为应该占领苏丹以保护埃及,接着再觉得有必要吞并乌干达来保护苏联。在占领乌干达之后,英国又不得不夺取肯尼亚,以建设一条铁路来保护乌干达。吃得越多,胃口越大,安全困境被用来说明不断扩张的合理性。苏联还用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标,为其扩张行为寻找合法依据。简言之,苏联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但是其扩张行为是小心谨慎和机会主义的。

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想遏制苏联。但是,遏制政策有两个十分含糊不清的地方。其一是目标问题:到底是遏制苏联权力还是遏制共产主义?第二个是手段问题:到底是使用资源阻止苏联的任何一次扩张行为,还是仅仅在对均势至关重要的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行为呢?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就遏制手段和目标含糊不清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乔治·凯南批评杜鲁门所提出的那种毫无限制的遏制政策。凯南自己的遏制思想与古典外交思想相吻合。它不太强调军事手段,而且地点是有所选择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48年,铁托因为反对苏联控制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以及南斯拉夫向希腊共产党人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而同斯大林决裂。从遏制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国不应该支持南斯拉夫,因为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从遏制的均势角度来看,美国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以此削弱苏联的权力。美国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政策选择。尽管"杜鲁门主义"提出要保护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还是向一个共产党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它大大削弱了苏联在欧洲的势力。

凯南有关遏制的观点

> 说美国单枪匹马就能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并很快使得苏联政权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比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加温和与克制,从而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垮台或者逐渐软化。
>
> ——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7]

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的遏制主张失去了说服力。在当时,NSC-68有关苏联扩张主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在中国人加入朝鲜战争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有关遏制的言论强

调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个意识形态目标。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开始介入越南的内战。

后续阅读材料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 (York: Penguin, 2005）.

遏制行动:越南战争

美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1955—1973）,努力阻止共产党人控制越南,为此导致58000名美国人丧生,200—300万的越南人失去生命,美国花费了6000亿美元,美国国内出现了动荡局势,遏制政策因此失去民众的支持。美国除了在南越遏制共产主义,还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美国担心,假如它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的信誉将受到损害。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成功挫败了法国在二战结束后使越南重新殖民化的企图,1954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把越南划分为两部分,北面是共产党国家北越,其首都位于河内,南面是非共产党国家南越,其首都位于西贡(即今日的胡志明市）。越南战争始于这两个政府之间的内战,南越政权努力抵制北越"统一祖国"的行动。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南越成功地阻止了一次有关统一的全民公决,尽管它在日内瓦会议上赞同举行全民公决。

美国干涉越南

美国派遣军队到越南,试图扭转当地斗争的局面,结果美国的行为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死亡和痛苦。正如最后结局所表明的,美国最终未能扭转局面,它只能推迟这

种局面的终结。

我们这些反对越战但又不希望共产党获胜的人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即提不出能够令人满意的结束战争的方案——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我们在提出自己相对复杂点的想法的时候,处于很难受的境地,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管是主战派还是反战人士,只要那种简单明了的答案。

——欧文·豪(Irving Howe),迈克尔·沃尔泽:《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犯错误了吗?》[8]

美国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越南的冲突,即把它视为共产党国家对非共产党国家的侵略。美国担心,假如南越陷落的话,那么东南亚的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而垮台。北越政府及其南越的盟友(民族解放阵线或者NLF,美国人通常称之为"越共")则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争取独立和自决的反法斗争的继续。经过15年的战争,美国在1973年签署巴黎和平条约之后停止其在越南的直接干涉行动。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75年河内统一越南为止。然而,统一后的越南不仅没有导致多米诺骨牌倒塌,反而与其共产党邻国(柬埔寨和中国)发生了战争。假如美国当初从民族主义和自决的角度认识越南冲突,那么就可能以均势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并且以跳棋而非多米诺骨牌的比喻来指导自己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越南共产党政府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

动机、手段和结果

除了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否明智这个问题之外,从美国的目标来看,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还涉及是否道德的问题。我们应当遵循什么原则来对越南战争进行道德判断呢?我们可以从与正义战争传统(读者应该记得,本书第一章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三个层面来加以判断:动机、手段和结果。这三者都很重要,因为只从一个层面判断干涉行为,可能无法全面地理解冲突,它在伦理上也是有问题的。

单单是好的动机也不能证明干涉行为是正当的。诺曼·波德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指出,美国干涉越南的行动是正当的,因为美国的

目的是把南越人民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这里举一个类比的事例。假设某个晚上,一个朋友主动提出要开车送你的孩子回家。当时正下着雨,你的朋友车开得太快,结果车翻到路边,你的女儿死了。你的朋友说:"我的动机完全是善意的。我只想让她早点到家睡个好觉,准备第二天的学术评估测试(SAT)。"然而,你更关心的无疑是你朋友的行为后果,很显然是开车不小心导致事故的发生。同样地,像波德霍雷兹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是"鲁莽但符合道义的",却没有考虑到结果和手段。单单是结果也不能证明行为的正当性。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声称,越南战争是正义的,因为美国愿意以巨大的生命与金钱代价兑现对南越的长期承诺,显示美国可信赖和增强其在欧洲的威慑力。假设越南战争真的具有这样的效果(许多外国领导人对美国干预越南的认识,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好感),那么美国的行为也有点像前面提到的你那位朋友所言,他自己没有错,开车送孩子回家的行为应该受到赞扬,即便他给出的原因只是为了不用在家里刷盘子(动机),而且他一路上闯红灯(手段)。最后,单单是手段也不能证明行为是否正当。假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是严格符合法律的(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这也并不能用来为美国的行为辩护。你那位朋友为了不刷盘子而开车送你女儿回家,这样的行为动机自然是不会让他获得赞扬的,如果他撞死3个路上行人,即便他没有超速,也遵守了交通信号灯,那么他的行为也是不正当的。我们在评估干涉行为时,必须考察动机、手段以及结果。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努力把南越从北越所造成的恐怖中解救出来,这并不足以说明美国的行为是正当的。即便美国的动机是正当的,它所使用的手段也是不正当的。人们可能会问,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干涉是最后的手段吗?美国采取保护无辜生命的措施了吗?干涉是适度(比方说罪与罚是否相称)还是过头了?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考虑过采取国际多边措施,以克服人类从自我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如何?这样做会取得成功吗?由于不能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难以区分平民和游击队员,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显而易见,我们对那些错综复杂、原因众多的情势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我们在做出判断之前,必须把动机、手段和结果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让我们来看看遏制政策是怎样导致美国干涉越南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应该取代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地位,以防止土耳其以及希腊可能遭受苏联的入侵。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向人民解释美国的干涉行动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其他人,如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则主张用道义言辞来使美国人相信普世的自由权利。所以,杜鲁门总统后来在"杜鲁门主义"演说中解

释自己的行动时,大谈美国要保护各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

曾经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斯大林侵略计划的乔治·凯南,看到遏制政策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后感到很失望。他声称,美国要遏制的是苏联的权力,因此任何可以平衡苏联的权力而又不需要动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措施都是好的。但那些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则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方式直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经过一段时间后,平衡苏联权力的主张让位于使世界远离共产主义的遏制主张,后者的目标较为广泛。这种观念导致美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低估了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美国开始认为它必须遏制中国和苏联的权力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当遏制主义从1947年的东地中海转到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野心勃勃和注定要失败的干涉行动的依据。

后续阅读材料

1. David A. Welch, *Painful Choices: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7—160.

2. Richard J, Regan, *Just War:Principles and Case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 pp.136—150.

美国卷入越南大事记**(1954—1975**)

1954年

艾森豪威尔总统针对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提醒如果越南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他东南亚国家将步其后尘。

1956年

该年夏天,随着法国撤出印度支那,美国的军事援助顾问团开始训练南越军队。

该年7月,越南没有举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所约定的选举。

1961年

截止到该年年底,美国每天对南越的援助超过100万美元。

该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胡志明将之解释为允许共产党人对南越的攻击升级。

该年5月,约翰·肯尼迪总统派遣400名绿色贝雷帽特种兵充当南越军队反叛乱战争行动的"顾问"。

1963年

到该年12月31日,大约有16000名美国军事顾问在越南。

该年11月1日,在美国的同意之下,南越军队包围西贡的总统府,吴庭艳总统在次日被暗杀。

该年11月22—24日,林登·约翰逊接替被暗杀的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他表示在其任内,美国不会"丢掉"越南。

1964年

美国每天对南越军队的援助超过200万美元;截止到该年12月31日,23000名美国军事顾问在越南。

该年8月2日,发生"东京湾"事件,三艘北越巡逻船在东京湾向美国军舰USS Maddox开火。

该年8月7日,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约翰逊"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防止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1965年

在该年1月,民众对美国干涉越南的支持率大约80%;到该年年底,大约

184000名美国军人被派往越南。

该年3月,约翰逊下令开始实施"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美国军队为此对北越实施了持续3年的轰炸,而且美国也在越南使用地面部队。

该年12月,麦克纳马拉警告约翰逊,时间越长对北越越有利,美国战斗部队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每个月1000人；当月月底,第二轮轰炸暂停。

截止到该年年底,大约390000美国军人被部署在越南。

该年1月底,美国开始了为期6周、旨在彻底消灭越共的"搜剿"行动("Search and destroy" missions）；美国重新开始轰炸行动,并且于4月份开始使用B-52轰炸机。

1966年

到该年年底,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大约463000人,战斗死亡人数大约16000人。

该年11月29日,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职务,部分原因在于他不满约翰逊的战争政策。

1967年

到该年年底,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上升到495000人,每个月的伤亡人数超过1000人,美国军队在越南的死亡人数累计达到30000人。

该年1月,北越发起"春季攻势",多次攻击包括西贡在内的南越城市；尽管美国军队挫败了共产党人的叛乱行动,"春季攻势"的规模使得美国新闻界和公众质疑五角大楼有关敌人已基本被消灭的说法；在"春季攻势"之后,民调表明只有26%的美国人支持约翰逊的战争政策。

该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自己不寻求连任；他还提出美国部分停止轰炸行动,并呼吁北越人参加和谈。

5月10日,"巴黎和平谈判"开始,美方代表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北越代表为外交部长春水(Xuan Thuy）；双方的谈判在此后的5年中时断时续。

该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

1968年

美国在越南军队死亡人数达到大约40000人。

该年1月底,巴黎和谈恢复。

该年3月17日,尼克松下令对北越在柬埔寨的补给站实施秘密轰炸。

该年4月,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达到新高——543400人。

该年6月,尼克松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宣布美国的"越南化"政策,美国将因此开始撤出军队和让南越部队承担更多的责任。

1969年

截止到该年12月31日,在越南的美国军队人数下降到280000人。

该年1月,基辛格开始了持续2年的与黎德寿(Le Duc Tho)的谈判。

该年4月30日,尼克松宣布加大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力度。

该年6月24日,美国参议院投票废除东京湾决议。

该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库珀-邱奇修正案(Cooper-Church Amend-ment),禁止使用美国的国防预算在老挝和柬埔寨从事军事行动。

1971年

到该年年底,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减少到大约156000人;美国军队在越南的死亡人数超过45000人。

该年6月18—2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要求美国军队在该年年底之前撤出越南。

1972年

该年4月,尼克松下令用B-52轰炸机轰炸河内和海防,企图迫使北越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

该年7月,巴黎谈判恢复。

该年10月,基辛格在和黎德寿达成一个宽泛的协议后,宣称"和平即将来临"；但是,南越总统阮文绍(Thieu) 拒绝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允许共产党军队留在南越的建议。

该年12月,由于北越对阮文绍提出的一系列协议修正方案的不满,和谈失败了；尼克松下令实施一系列"圣诞轰炸"(Chirstmas bombings) 行动,企图迫使北越回到谈判桌来。

1973年

到该年年底,美国从越南撤走所有军队；美军在越南的死亡人数为47244人。该年1月,基辛格和黎德寿达成一项修改后的协议,美国迫使阮文绍接受该协议；阮文绍称该协议"无异于投降"。

该年3月29日,美国实现了从越南军事脱身。

1974年

该年12月,北越对南越发动新的攻势,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美国在外交上做出回应。

1975年

该年4月30日,随着北越军队进入西贡,最后一批美国政府雇员撤出大使馆；几个小时之后,北越宣布越南战争结束。

冷战的其他方面

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当选美国总统,他曾经在竞选中表示要结束朝鲜战争,并把共产主义推回去。共和党声称,遏制是一种向共产主义妥协的胆小鬼的行为,正确的方法是把它推回去。但6个月之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把共产主义推回去的政策风险太大,因为它可能引发核战争。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在冷战中僵持的东西方关系开始有所缓和。1955年,美苏两国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就奥地利成为一个中立国的问题达成了协议。1956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揭露斯大

林的罪行。秘密报告被泄露出去,并导致在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发生了动乱。匈牙利人试图发动起义,但是苏联出兵干涉,迫使匈牙利继续留在共产主义阵营之中。

赫鲁晓夫决定要把美国人赶出柏林和彻底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苏联巩固其在东欧的地位,并且利用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所带来的机会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赫鲁晓夫和美国打交道的方式,使人联想起了德皇在1914年以前试图迫使英国同德国谈判的外交风格,二者都充满着恐吓与欺骗。苏联努力迫使美国就范这种做法使结果适得其反,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都遭受失败。

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所看到的,苏联和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彼此都让对方感到恐惧,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从1963年到1978年,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或者说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军备控制谈判取得了进展,1963年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双边贸易也逐步增长,缓和的范围似乎正在扩展。越南战争使得美国人给予共产党中国以更多的关注。

从1969年到1974年,尼克松政府以缓和为手段,追求遏制的目标。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大大增加了军备开支,在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与美国均等的地位。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公众对于冷战的干涉行动失去了信心。尼克松的战略是:(1)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使得双方核力量对比相对平衡;(2)打开对华外交关系,在亚洲形成一个三边的均势格局(而不是促使苏联和中国联手);(3)扩大美苏间的贸易,使得美苏关系中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4)利用"联系"原则把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结起来。缓和的高潮出现在1972年和1973年,但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苏联在非洲支持反美运动导致美苏相互指责。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如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极力主张把对苏贸易同人权问题(比如苏联对待犹太居民的态度)联系起来,而反对把对苏贸易同苏联的国际行为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内政治就加速了缓和的衰亡过程。1975年,在葡萄牙宣布允许其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后,苏联运送古巴的军队到了那里,支持当地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府。到了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再也不使用"缓和"一词了。其继任者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上台后的最初两年里,还努力维持与苏联的"缓和",但是苏联和古巴还是介入了埃塞俄比亚内战之中。此后,苏联继续扩充军备,特别是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缓和寿终正寝。

为什么美苏两国又重新进行对抗呢?一种解释是,缓和被吹过头了,人们的期望值太高。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的3个事态发展导致了缓和的消亡。首先是苏联的军备扩张,苏联国防预算的年增长率将近4%,苏联所增加的新式重型导弹特别让美国军方领导人感到不安。其次是苏联干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苏联人认为,上述地区的事态发展正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历史正朝着马列主义所预言的方向发展。最后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向右转的倾向,破坏了原先支持民主党的联盟。苏联行为和美国政治倾向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明,冷战是持久的,而缓和则是短暂的。然而,美苏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进行对抗,并不意味着两国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冷战。两国回到了50年代的冷战只是在言论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尽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总统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但他还是准备同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定。两国间的贸易,尤其是谷物贸易,继续增长着,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交流也没有间断。两个超级大国还制定了相互关系中的某些谨慎的原则:避免直接交战,不使用核武器,进行军备与核武器控制谈判。显然,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与50年代的冷战不可同日而语。

冷战的结束

冷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由于冷战的起源同欧洲的分裂密切相关,所以冷战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欧洲分裂结束的时间,也就是1989年。1989年11月,苏联决定不使用武力来支持民主德国的共产党政权,兴奋的人群拆毁了柏林墙,这可以说冷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冷战为什么结束呢?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遏制的结果。乔治·凯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就声称,如果美国可以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那么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就会因为缺少胜利果实而受到削弱,苏联共产主义会逐渐软化。新的观念就会产生,人们会认识到,共产主义并不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未来,历史并不在它那一边。总的来看,凯南是对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帮助制止苏联扩张,而美国文化、价值以及观念的软权力则侵蚀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有关冷战结束的时间问题:为什么冷战在1989年结束?为什么冷战持续了40年?为什么苏联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软化?为什么冷战不能再延续10年?



布什、里根和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纽约

另外一种观点是"帝国过度扩张"。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宣称,帝国总是过度扩张,直至耗尽帝国内部的所有能量。苏联的确是过度扩张的,因为它把四分之一的经济资源都用在国防和对外事务上,相比来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这方面的开支只占其所有经济资源的6%。但是,肯尼迪又进一步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过度扩张的多民族帝国只有在一场大国战争中战败或者受到削弱之后,才会退缩到本族群的原有生存地域。然而,苏联并没有在一场大国战争中战败或者受到削弱。

第三种观点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扩充军备迫使苏联在冷战中投降。这种观点有些道理,因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政策加重了苏联过分扩张的负担,但是它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不管怎么说,美国以前的扩充军备行为并没有导致这种结果。为什么只是在1989年才产生这种结果呢?我们必须寻找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因为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言论和政策是导致苏联衰亡的主要原因,就有点类似认为公鸡在黎明前的啼叫导致日出的这种想法。这是有关虚假的因果关系的又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突发、中层和深层三种类型的原因,更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导致冷战结束最重要的突发原因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的个人因素。他想对共产主义加以改革,而不是以别的东西取而代之。然而,改革就像滚雪球一样导致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苏联上层很难对此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在

内政和对外政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加速了苏联的衰落和冷战的结束。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后的最初时期,试图通过增强苏联人的纪律来克服经济停滞问题。在发现加强纪律不足以解决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改革"(perestroika) 的主张,但是他无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官僚们不服从他的指示。为了打击官僚主义者,他推出了"公开化"(glasnost) 战略,或者公开讨论问题和民主化进程。戈尔巴乔夫坚信,让人民发泄对苏联制度的不满情绪,可以对官僚主义者施加极大的压力,并且使改革产生作用。然而,一旦公开化和民主化允许人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并且享有表决权,许多人就会提出:"我们要改变现状。在苏联没有新型的公民。这是一个帝国王朝,我们对这个帝国没有归属感。"戈尔巴乔夫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失败之后,苏联的解体很快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到了1991年12月,苏联的历史已经终结了。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他自己称之为"新思维") 也加速了冷战的结束。这一政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的变化,比如提出了共同安全观念,主张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以维护国家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指出,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安全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各国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核威胁的存在意味着,如果竞争失控,那么大家会一起死去。戈尔巴乔夫摒弃了核武器越多越好的观念,提出保持"充足"的核力量的思想,即保留最低限度的核保护力量。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中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是,他认为扩张主义的代价大于收益。苏联控制东欧的代价极大,而收益很小,入侵阿富汗是一个高代价的灾难。苏联不再需要通过输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种方式,来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

因此,到了1989年夏天的时候,东欧国家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匈牙利政府允许民主德国人通过匈牙利逃往奥地利,民主德国人的出逃给民主德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此外,民主德国政府已经丧失了镇压示威者的决心(或者失去了苏联的支持) 。该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了,这段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我们可以说,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判断失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被修补的,但事实上,他努力修补的结果是挖了一个洞。如同水坝中出现一个漏洞,一旦被抑制住的压力开始消失,漏洞很快就会导致决口和破坏整个体系。

我们还没有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冷战在1989年结束?为什么冷战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结束?从某种程度上说,戈尔巴乔夫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3位苏联领导人一个接着一个

地去世。直到1985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这位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所谓的"1956年的那一代人") 的领导人才有了机会。但是,如果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85年选择一位同戈尔巴乔夫争权的、坚持强硬路线的人作为苏联领导人的话,那么已经衰落的苏联很可能还会再继续存在10年的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就不会那么快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冷战结束的时间,

至于中层原因,乔治·凯南和保罗·肯尼迪两人都已经提到了。两个重要的中层原因,分别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属于软权力的自由观念,以及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过度扩张。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公开化、民主以及新思维,都是西方的观念,它们已经为1956年的那一代人所接受。亚历山德罗·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 是改革和公开化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曾经作为一名交换生在美国呆过一年,并且在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他为西方的多元主义理论所吸引。跨国交流与接触的增加,使得铁幕被刺破,并且促进了通俗文化和自由观念的传播。西方经济上的成就增加了这种观念上的吸引力。硬的军事实力遏制了苏联扩张主义,软权力则侵蚀了铁幕后的共产主义信仰。柏林墙最终在1989年倒塌,不是因为受到大炮的轰击,而是民众用铁锤和推土机把它推倒了。

在帝国过度扩张方面,苏联巨额军费支出开始影响苏联社会的其他方面。苏联人所享受的健康福利待遇在减少,而死亡率则在上升(苏联是唯一一个死亡率上升的发达国家)。由于缺少资金,该国的基础设施开始衰败。最后,甚至苏联军方也感受到了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包袱。1984年,苏联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科夫(Nikolai Ogarkov) 元帅提出,苏联需要进一步发展民用经济,扩大同西方的贸易,以及加大力度从西方引进技术。但是在那个停滞的年代里,年迈的领导人不愿意接受奥加科夫的建议,并且解除了他的职务。

软权力和帝国过度扩张这两个中层原因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最后还必须分析深层原因,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衰落(建构主义者的解释) 和苏联经济的衰退(现实主义者的解释)。共产主义在战后时期逐步丧失了合法地位,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在早些时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少共产党人曾经在欧洲领导了反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苏联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很多软权力,但滥用了它。苏联的软权力不断受到以下事态发展的损害:1956年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非斯大林化运动;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81年波兰事件;以及自由观念跨国交流的增加

等。尽管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阶级正义为基础的制度,但是列宁之后的领导人则是通过野蛮的国家安全制度,如劳改营、流放地(gulag)、范围广泛的书报检查和告密等等,来维持国内统治。这些压迫性措施导致苏联人民普遍丧失了对这种制度的信心,这种不满反映在地下抗议文学作品以及日益增多的人权活动家的异端言论中。

除此之外,苏联经济的衰退表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已经难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个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它强调重工业和烟囱工业。它极其不灵活,即只有大拇指,没有手指头。它倾向于囤积劳动力,而不是把劳动力转移到发展服务行业上。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破坏,是灵活地应对技术变革重大趋势的方式。在20世纪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变革就是,信息成为一个经济体所具有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它的作用正日益增大。苏联的制度尤其不善于处理信息,其政治制度的高度机密性意味着,信息的流动是缓慢和困难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增强国防力量的举措,给已经为经济问题所困扰的苏联政权增加了压力。

苏联的产品和服务达不到世界标准。20世纪末,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可以把劳动力转移到服务行业,可以对重工业加以重组,并且转向电脑产业。而苏联则跟不上这些变化。比如,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有5万台个人电脑,美国有3000万台个人电脑。4年以后,苏联个人电脑数量达到40万台,美国个人电脑数量为4000万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和民主国家在应对技术变革的时候,比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烟囱工业时期建立起来的苏联集权制度要灵活得多。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按照世界标准,只有8%的苏联工业具有竞争力。一个92%的工业缺少竞争力的国家,是很难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

从内到外解释冷战

和大多数历史学家写历史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史学家们是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在事件结束以后,来描述冷战的。我们不清楚最后的结局,我们只能确定主要角色的某些而非全部的动机……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或者说,我们现在至少要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们永远也了解不了历史的全貌:不管一个历史事件离我们有多远,我们都无法了解它的全貌。历史学家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之描述的详尽程度, 超不过地图再现地上景

物的详细程度。但是,我们可以描述过去,就像制图员绘制地形图一样。冷战的结束,以及至少是将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档案部分开放,会使得我们的描述更接近事实。

——约翰· L.加迪斯 [9]

冷战的结束是20世纪发生的一个重大的革命性事件。从它对国际体系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来说,冷战的结束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是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将分析冷战结束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革过程。冷战后的俄罗斯放弃了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试探性地迈上了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上充满着危险。俄罗斯政府最初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实施经济"休克疗法",希望以此完成俄罗斯从经济集权制国家到自由民主国家的转变。然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社会大分裂,它很快就被一种较为渐进的方式所取代。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开始复苏。

迈克尔·多伊尔等理论家,根据自由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点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俄罗斯顺利实现转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这就有利于国际和平。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否与民主和平论相吻合,或者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否再度兴起和挑战美国与欧洲,这些都还有待于观察。

不管今后的前景如何,还有一个与冷战为什么结束同样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解答:为什么冷战持续了那么长时间,而美苏之间一直都没有爆发"热战"?也就是说,为什么冷战没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核武器的作用:物理学和政治学

一些分析家认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吸取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根本就不想打仗。另外一些人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长久和平"是超级大国追求有限的扩张主义目标的结果。还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两个国家(而不是两个紧密的同盟)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粹的两极结构的稳定性。然而,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核

武器和核威慑的特殊性质。

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一次百万吨级的核爆炸可使温度高达1亿摄氏度,这是太阳中心温度的4 - 5倍。1945年投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爆炸力是比较小的,只相当于15000吨的炸药(TNT）。今天的导弹可以携带超过广岛原子弹爆炸力100倍以上的核弹头。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所有炸药的爆炸力,只相当于一颗300万吨级的核弹头,在一枚重型洲际导弹的头部就可以装载上一枚这样的核弹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一起拥有的核武器达到数万件(见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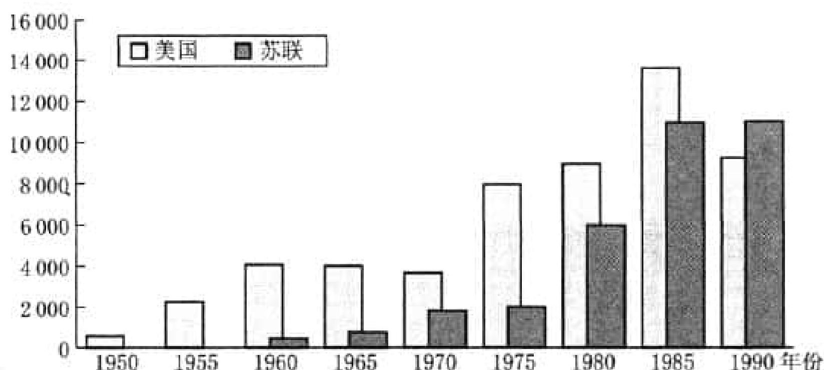


图5.4 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核武器

核爆炸所产生的某些物理效应,目前尚不确定。比如,核冬天理论认为,核战争在大气层中所产生的很多的尘埃会阻挡阳光、妨碍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从而导致生命种群的灭绝和人类文明的毁灭。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核冬天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很不确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武器瞄准的是城市还是武器。燃烧中的城市会产生大量的烟雾,它阻挡住很多的太阳光线,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烟雾到底能够飘浮多长时间。如果北半球发生核弹爆炸,那么烟雾是否会飘到南半球呢?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最坏的结果并不是出现核冬天,而是出现核秋天——这给人们一点小小的慰藉。人们难以确定的是,大规模的核战争能否导致文明的毁灭,或者至少是摧毁北半球的生命?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1983年所发表的一份关于核武器的报告中,只是使用了如下略带夸张的表述:"我们是自创世以来具有毁灭上帝创造物能力的第一代人。" [10]

核武器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它没有改变世界的基本结构。国家之上没有更高权威的那种无政府国家体系依然继续存在于核时代。1946

年,美国提出有关国际控制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苏联把它视为美国的又一个阴谋。在巴鲁克计划流产之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悲叹道,什么都发生了变化,只有思维方式依然如故。据传,他说过"物理学比政治学更容易"这句话。

1945年以后核武器之所以没有导致更大后果,是由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最早的原子弹的杀伤力不及大规模地使用常规武器。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轰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于原子弹袭击广岛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尽管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一次空袭所用的全部常规炸弹,但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很少。美国在1947年时有两颗原子弹,1948年时有50颗。

美苏较量的开始也使得政治思维方式变化缓慢。苏联不信任联合国,认为它过于依赖美国。美国不能逼迫苏联同它进行合作,因为欧洲是夹在美国和苏联中间的人质。如果美国以核进攻相威胁,那么苏联可以用对欧洲发动常规军事进攻来威胁美国。其结果是一种僵局。核技术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并不足以改变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的行为方式。

1952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核革命从此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氢弹依靠原子聚变后产生的聚变能量,裂变式原子弹则不同,它依靠原子的裂变所产生的能量。氢弹极大地增加了单独一件武器的毁灭力。在地球表面上所进行的最大威力的氢弹爆炸试验发生在1961年,当时苏联爆炸了一颗6000万吨级的氢弹,其爆炸威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全部炸弹爆炸威力的20倍。这种特别武器的试验只是半强度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氢弹问世之后,核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竟然是表现在弹头的小型化上。聚变技术使得很小的弹头就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早期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核弹头变大后,它所占据的空间必然增大。B-36轰炸机是一种具有8个引擎的巨型飞机,但是它只能装载一颗原子弹。而一颗威力相同的氢弹则要小得多。如果把核弹头装在弹道导弹的头部,那么发动一场洲际核战争只需30分钟,而B-36轰炸机飞行同样的距离要花8个小时。

氢弹破坏力的增强也提高了核战争的代价,人们因此不再认为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了。19世纪的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 宣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无限制的战争是个愚蠢的行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意味着,今天,军事手段和国家所追求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目标是相互脱节的。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导致有关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使用核武器

这个终极的军事手段。1945年以后,核武器从来没有被使用过,核武器只是用来吓唬人的。核武器的威力实在太大了,它因而与任何有意义的目标相脱节。



康维尔B-36(右)与波音B-29(左),后者曾对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

核武器虽然没有改变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产生了五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第一,它让人们重新接受有限战争的观念。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看到了从19世纪的有限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变化,这两场战争导致了数千万人丧生。在20世纪中期,分析家把20世纪称为"全面战争的世纪"。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战争更像18世纪和19世纪那种旧式的战争,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虽然各导致超过55000名美国人丧生(战斗与非战争人员),但它们依然在范围与规模上都属于有限战争。在越南和阿富汗,美国和苏联都分别接受了失败,没有使用自己的终极武器。

第二,危机取代战争成为真实的瞬间。在过去,战争就是在桌面上亮出手中所有的牌。在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太大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太危险了。在冷战期间,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危机,都起了类似战争的作用,反映了军事上的力量对比状况。

第三,核武器使威慑(通过恐吓使对手不做某事)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今天,事先调动军事力量让对手感到害怕,从而阻止对手发动进攻,

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靠的是在战事爆发后进行动员和逐渐做好参战准备的能力,但是这种战争动员的方式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核战争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结束。

第四,核武器导致超级大国事实上的行为谨慎规制(a de facto regime of superpower prudence) 的产生。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也具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避免核战争。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介入过代理人战争或者间接的边缘战争,但是这两个国家从未迎头相撞。而且,双方都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美国大谈要在东欧把共产主义推回去,但实际上,当1956年匈牙利人起来反对苏联统治者的时候,美国由于担心爆发核战争,并没有急于帮助他们。同样地,除了古巴之外,苏联比较小心谨慎,避免向西半球渗透。另外,两个国家都遵守不使用核武器的规则。最后,两个超级大国学会进行相互沟通。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建立了热线联系,使得美苏两国领导人可以经常进行通话。技术手段使得两国在危机时期更容易进行相互合作,因为它使得两极体系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更灵活、更直接。美苏两国领导人自从1963年签署《部分禁试条约》以后,签订了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军备控制谈判是讨论如何在冷战体系中实现稳定的途径。

第五,核武器,尤其是氢弹,被大多数官员视为战时不可使用的武器。这不仅仅是由于氢弹潜在的破坏力。总是有某种力量在阻止有关国家使用核武器,而常规武器的使用则没有受到这种限制。事实上,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都在不断地想办法,使核武器小型化,使得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分别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使用一些小型的核武器,避免造成巨大的破坏效果。但是,不管是美国领导人,还是苏联领导人,都避免使用小型核武器,而是选择常规武器。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不管核武器有多小,只要使用这种武器,就将开启使用其他种类核武器的窗口,因此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不愿意使用核武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自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人们就一直怀有这么一种观念,即核武器是不道德的,它不可以在战争中使用。尽管我们很难衡量这种规范性约束力的大小,但这种观念已经渗透进有关核武器的辩论之中,它是国家不愿意使用核武器的一个原因。

恐怖的平衡

核武器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均势,它有时被称为"恐怖的平衡"。双方的较量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非物理上的。双方都奉行防止对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但是和以前的均势体系相比,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在19世纪的均势体系中,5个大国不断更换盟友,而冷战时期的均势则明显地围绕着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展开,每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迅速摧毁另一个超级大国。

传统安全困境所导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核恐怖而消失,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十分谨慎,尽管它们相互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两国这种谨慎的态度类似于19世纪的大国在处理多极均势的时候频繁地进行沟通。与此同时,超级大国努力计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就像以前的政治家比较双方的领土、步兵和炮兵的数量一样。

核恐怖平衡正好出现在两极体系时期。一些诸如肯尼思·华尔兹那样的新现实主义者,把两极界定为全部力量几乎都集中在两个大国的一种情势。但实际上,单纯的两极状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两极状况,通常都是两个同盟的内部关系十分紧密,从而失去了灵活性,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均势状况就是这样的。尽管同盟的成员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两个同盟内部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从而导致了两极局面的产生。与此相类似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盟体系变得很紧密,进而发展成为两极对峙。

华尔兹声称,两极体系特别稳定,因为这种体系使得相互沟通和计算力量变得很简单:当只需要关注另外一个大国的时候,你就可以密切监视均势状况。另一方面,两极体系缺少灵活性并且提高了边缘战争(如越南战争)的重要性。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两极体系要么逐渐消亡,要么引起矛盾激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体系没有引起矛盾激化呢?或许这是由于核武器使得大国的行为十分谨慎,华尔兹把稳定归结于单纯的两极结构,实际上稳定是核武器的产物。核恐怖通过"水晶球效应"导致稳定的局面。让我们假设在1914年8月,德皇、沙皇和奥匈帝国皇帝从水晶球中看到1918年的画面。他们可能看到自己失去了皇冠,帝国被肢解,数百万国民被杀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还会在1914年介入战争吗?也许不会。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大概就好像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导人一个水晶球。由于国家不值得冒自我毁灭的危险去追求某个政治目标,所以他们都不会去冒大的风险。当然,水晶球可能因为意外事件或者判断错误而被打碎,但是这个类比说明,正是两极结构和核武器的结合,导致了一个自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主要大国之间最长的和平时期。上一次记录是1871年到1914年。

核威慑的问题

核威慑属于威慑的一种形式,但是核武器具有独特的性质,它改变了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核威慑促使人们这么思考问题:"假如你攻击我,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你的进攻,但是我手中的报复手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不敢首先对我发动攻击。"因此,核武器使得一个古老的概念具有了新的含义。

判断核威慑是否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反事实推理。假定没有核武器,冷战变成热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声称,冷战没有变成热战的事实跟核武器没有关系,正如日出跟公鸡啼叫没有关系一样。他认为,欧洲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经开始反对把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和平的原因在于人们,至少是发达国家的人,日益认识到战争的恐怖性。在米勒看来,希特勒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少有的、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取教训的人,他还想参加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的反战情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然而,绝大多数的分析家还是认为,核武器同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着极大的关系。假如没有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促使政治家采取谨慎的态度,那么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或许还有中东危机,很可能升级和失控。

> 核武器和越南战争
>
> 当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到1963年间决定大大增加美国军事力量的时候……他脑中想着两个问题:假如赫鲁晓夫在1961—1962年的柏林危机中不相信他,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假如赫鲁晓夫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不相信他,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
> 我想,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中国人大概不会在1950年介入朝鲜战争,这影响了美国不入侵北越的决策。军方说,虽然他们不相信中国会介入越南战争,但万一中国介入的话,核战争就可能发生,这导致美国决定不入侵北越。
>
> ——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1]

这引出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靠什么来进行威慑呢?有效的威慑不仅要求具有伤害对手的能力,也需要让对手相信某种武器将会被使用。可信性(credibility) 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到底有多大。比如,美国威胁要用核武器打击莫斯科以报复苏联的核进攻,这是可信的。但是,假如美国在1980年威胁说,苏联若不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就要用核武器打击莫斯科,这能让苏联人相信吗?美国的确具有打击莫斯科的能力,但是美国的威胁不具可信性,因为苏联在阿富汗的利害关系太小,而且苏联反过来也会威胁要打击华盛顿。因此,威慑不仅和能力有关系,也和可信性密不可分。

可信性问题使得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以威慑手段抵制针对自己国家的威胁;二是把威慑范围扩大到保护自己的盟友。比如,美国不能使用核威慑来阻止苏联入侵阿富汗,但是它在40年的冷战中明确表示,如果苏联侵略西欧的北约国家,那么美国将使用核武器。因此,在判断核武器在扩大威慑范围和防止战争中的作用大小时,我们有必要考察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重要危机。

历史可以回答这些有关核武器作用的问题吗?肯定不能,但是它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在1945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垄断了核武器,但是没有使用核武器。因此,甚至在相互进行核威慑的局面产生之前,就已经有某些自我约束的行为了。其中部分原因包括:核武器数量很少;对这些新式武器缺乏认识;美国担心苏联会使用其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占领整个欧洲。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核武器,而且美国领导人在几次危机中曾经考虑过使用核武器。朝鲜战争的时候,核武器没有被使用,1954年和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集结军队和威胁进攻国民党所控制的台湾时,核武器也没有被使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于某些考虑,不同意使用核武器。在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搞不清楚投掷核武器能否阻止中国人介入战争,而且美国也担心苏联的反应。这场冲突一直存在着升级的危险,而且苏联人可能使用核武器来支持其中国盟友。因此,尽管美国在核武器的数量上享有优势地位,但还是存在着战争范围扩大、不仅限于同朝鲜和中国交战的危险。

此外,伦理和公众舆论也起了作用。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估计,如果核武器被加以使用,那么将会导致很大数量的人员丧生,所以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就没有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被问及有关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时,回答道:"我们不应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再次使用那些可怕的东西对付亚洲人。我的上帝!" [12] 尽管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比苏联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但一些因素促使美国人决定不使用核武器。

"最为严重的问题"

到了1962年10月中旬的时候,冷战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严峻起来。古巴这个曾经一直是美国事实上殖民地的国家,最近加入了苏联的营垒。在9 月底的时候,美国报纸开始报道苏联向古巴运送武器的消息。约翰·F.肯尼迪告诉美国公众,据他所知,这些都是防御性武器,不是进攻性武器。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曾经向他作过这样的保证。肯尼迪表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最为严重的问题将会出现。"

10月16日,星期二,在上午将近9点的时候,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c Bundy)把照片送到总统的卧室里,这些照片表明,"最为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这些照片是由U-2侦察机在高空拍摄到的,表明苏联在古巴修建了针对美国本土城市的核导弹基地。

在肯尼迪看来,美国不能容忍这些导弹的出现。而且这也证明赫鲁晓夫欺骗了他。在此后的13天里,肯尼迪和他的幕僚讨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他们十分清楚,可能发生的一个后果将是核战争,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中的文职防务专家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到害怕的、有关美国人口易于遭受打击的情报。

——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 和菲利普·泽利科夫(Philip Zelikow) :《肯尼迪录音带》 [13]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有关核威慑的重要个案。这场持续了13天的危机是由赫鲁晓夫企图把核武器偷偷运进古巴的行为所引起的,它或许是核时代最接近于导致核战争的一个事件。如果一个纯粹的局外人或者"一位来自火星的人"来考察这个事件,那么他一定会看到,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巨大优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苏联当时仅有少量可以打到美国的战略导弹。 [14] 假如肯尼迪总统认为赫鲁晓夫走的这步棋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他不下令对当时大多尚处于建设之中的、相对比较脆弱的、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呢?答案就在于,肯尼迪不愿冒风险,担心只要有1—2枚苏联导弹漏网,就会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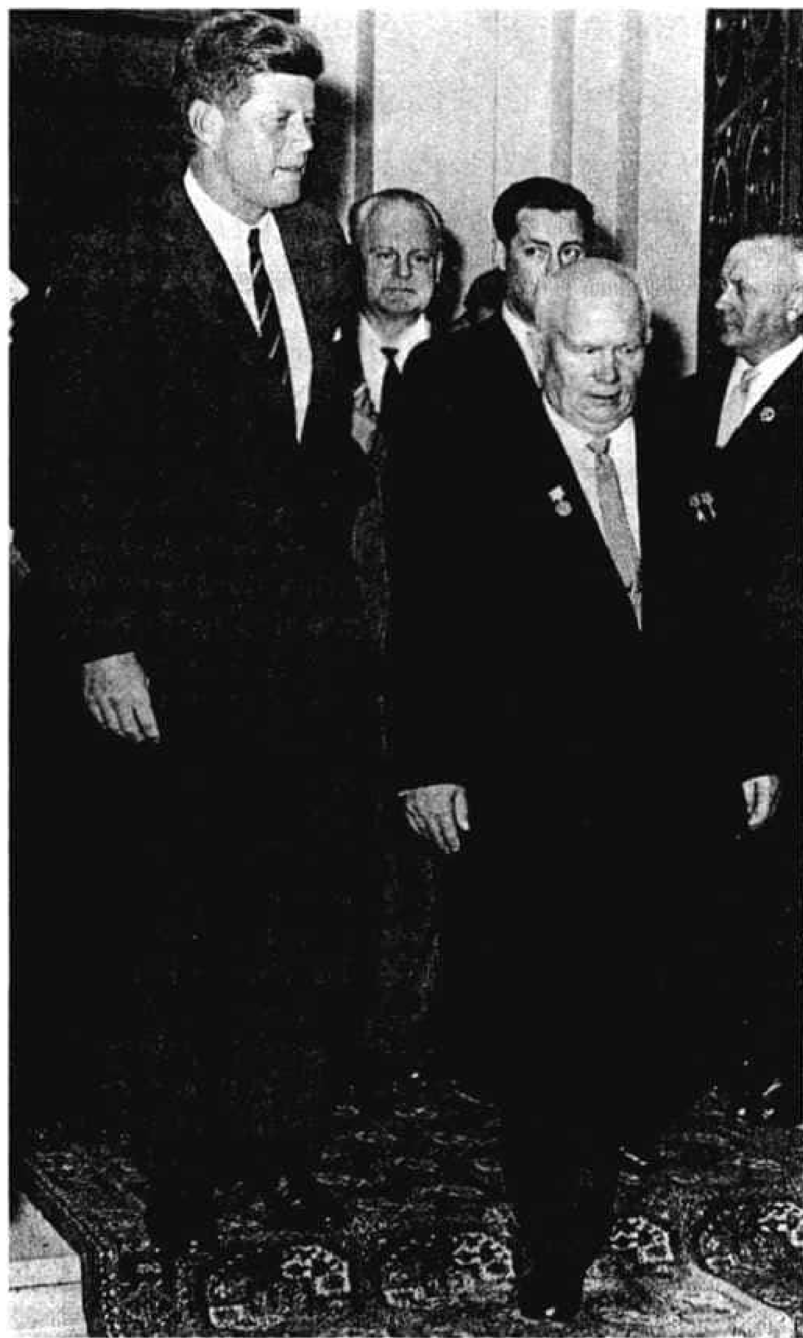
一座美国城市发射。此外,随着危机的发展,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意识到,他们实际上难以控制本国军队的危险行为,双方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开战的状态。他们如果了解一些当时并不知晓的内情的话,那么会感到更害怕。 [15] 在危机接近最高点的时候·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极为恐惧的心理。他写道:"我们各自抓住一根绳子的一端,在这根绳子的中间有一个我们所系的战争之结,我们两人拽得越紧,这个结也就越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绳结被系得很死,以至于系绳的人无力解开,只能把结砍断。这意味着什么,就不需要我向您解释了,因为您本人十分清楚我们两国军队所拥有的可怕力量。" [16]

25年之后,一群哈佛大学学者与曾经参加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委员会的美国官员与一道举行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共开了6次,与会者后来包括苏联人和古巴人。与会者们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和苏联到底愿意冒多大的风险?这取决于各方判断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随着危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谨慎。他当时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爆发核战争的几率大概是五十分之一(尽管他在20世纪90年代获知苏联当时已经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后认为爆发核战争的几率更大)。肯尼迪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龙(Douglas Dillon)则认为,爆发战争的几率基本上为零。在他看来,危机不会发展到爆发核战争,因此美国应该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冒更大的风险,而不应该像麦克纳马拉所主张的那样小心谨慎。肯尼迪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也认为,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他批评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让步太多。他指出,美国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下台。泰勒将军说道:"我确信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占上风,我对最后的结局一点也不感到担心。" [17] 可是,肯尼迪总统十分担心危机失控,他极其小心谨慎,甚至谨慎到让他的某些幕僚不喜欢的程度。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一小点的核威慑具有很大的作用。这被称为 有限威慑或存在性威慑(**finite or existential deterrence**)。无疑,这样的核威慑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起了作用。

然而,我们不能把危机的结局只归结于核威慑的作用。公众普遍认为,美国赢了。但是,有关美国到底赢了多少以及为什么赢了这样的问题是难以有确切答案的。至少有三种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结局的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比苏联多,所以苏联退缩了。第二种观点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危机中所具有的利害关系的大小程度不一样。古巴是美国的后院,而对苏联人来说只是在遥远的地方下的一个赌注。第三种观点声称,古巴靠近美国意味着,美国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调动占绝对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入侵古巴的

可能性也起了作用。苏联人背着心理包袱,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拥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而且可以随时动用常规军事力量,这使得美国的威胁比苏联的威胁更具有可信性。

最后,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古巴导弹危机的赢家——因为赫鲁晓夫公开同意撤走导弹——这场危机实际上是妥协的产物。美国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具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动用武力,轰炸古巴的导弹基地;第二个选择是封锁古巴,迫使苏联撤走导弹;第三个选择是收买苏联,即通过提出某种交易,比如美国从土耳其撤走自己的导弹,让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很长时间以来,有关当事人很少提起收买苏联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美国悄悄地向苏联许诺自己将从土耳其撤走其已经该退役的导弹。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核威慑在这场危机中是起了作用的,在约翰·肯尼迪的脑子里,有关核武器方面的问题的确很重要。另一方面,核武器的数量并没有那么重要。核武器的数量对比并不是那么重要,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1961年在维也纳会晤

道义问题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冷战的紧张程度相对来说有所缓解,似乎美国和苏联在踉踉跄跄地走到悬崖边和往下看一眼后,赶紧缩回去了。1963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核大国签署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军备控制条约,肯尼迪宣布美国要扩大与苏联的贸易,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有所缓解。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主要关注于越南战争,也在军备控制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人们又开始担心爆发核战争。在1980年至1985年间的"小冷战"时期,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停顿了下来,美苏双方使用激烈的言辞相互进行攻击,军费开支和核武器的数量有所增加。罗纳德·里根总统在谈论进行和打赢核战争问题时,反战团体则要求首先冻结和最终销毁核武器。

许多人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核威慑符合道义吗?"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正义战争理论认为,道义判断需要符合特定条件。自卫通常被视为正义的事业,但是自卫战争的手段与后果也同样重要。从手段来说,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从结果来说,目标和手段要相称。

核战争有可能符合正义战争理论吗?从技术上说,是可能的。小当量的核武器,比如核炮弹和深水炸弹,可能被用来攻击雷达系统、潜水艇、海面船只或者很深的地下指挥掩体。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可以把战斗人员同非战斗人员分开,相对地限制核武器的影响范围。假如战争到此为止了,那么核战争并不违反正义战争的理论。但是,到底战争会就此停止还是会升级呢?升级的危险是很大的,值得冒可能导致上亿人死亡、甚至是地球毁灭的风险吗?

从历史中学习

在1962年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必须阅读芭芭拉·塔奇曼所著的《8月的枪声》。这本书写的是欧洲国家如何无意地介入战争之中。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头引用了俾斯麦的一句话在巴尔干国家中发生的某些讨厌的、愚蠢的事情"会点燃下一场战火。然后她叙述自从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以后所发生的

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很小的、本身并不重要的事件,导致了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军事冲突。在战争爆发前夕,有关国家领导人不断努力阻止冲突的发生,但是这些事件还是把他们拖入战争之中。

肯尼迪总统提醒我们注意两位德国首相关于那场战争起源的一个对话。 一位问道:"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继任者回答说,"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肯尼迪以这种方式来强调判断失误的危险性。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掉进灾难的深渊》 [18]

在冷战时期,一些人宣称:"与其死亡,不如赤化。"然而,上述提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对。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为了避免一场大灾难,冒点小风险是否正当呢?据说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认为,发生战争的几率是"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19] 此外,还有核升级的危险。肯尼迪的冒险行为是否正当呢?我们可以通过反事实推理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假定肯尼迪不想在古巴冒险,那么赫鲁晓夫有可能试着采取其他更危险的行为吗?假定苏联在危机中取胜,并且后来又在柏林或者巴拿马挑起一场核危机或更大规模的常规战争,那么结果将如何呢?

核武器在防止冷战变成热战上,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声称,核威慑在特定条件下是正当的,它是在寻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可以接受的暂时性措施。但是,这个暂时的阶段到底有多长呢?只要人们还具有核知识,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就肯定会继续存在。尽管核武器使得有关国家在冷战时期采取了谨慎的行为,但由此产生的自满情绪也是很危险的。美国和苏联经过一段时间才学会控制核武器,但是我们不清楚,那些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比如朝鲜,或许还有伊朗,将来是否会遵循这样的控制规则。此外,这些控制规则也可能对恐怖主义者没有效用。

人们对核扩散的担心还将继续存在。虽然已经有189个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爆炸了核武器,朝鲜(曾经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在2006年也进行了核试验。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国家也试图获得核武器,尽管它们都是该条约的签署国。生物和化学武器等非常规性武器的扩散,也同样让人担忧。比如,利比亚和伊拉克建造了化学武器设施,而且伊拉克在两伊战争(1980—1988)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联合国核查人员发现并摧毁了伊拉克主要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工程。人们担心这样的工程会被重新启动,这是导致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原因。报纸上出现了有关核材料流出前苏联地区和流入国际黑市的报道,这说明这

些武器仍然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和把国家推向战争的边缘。在2004年,巴基斯坦核科学家A.Q.汗(A.Q. Khan) 被披露曾向一些国家,包括利比亚、伊朗和朝鲜,出售核技术。不仅如此,有报道指出,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本·拉登的基地网络等恐怖主义组织正在试图生产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这表明这样的武器今后某一天可能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

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担忧,有道义和现实主义两方面的动机。从道义上谴责核武器的国家,不仅包括那些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或者不想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而且也包括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芥子气并引起广泛的抗议之后,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行为就一直受到谴责。现实主义方面的考虑很简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并且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只要这些武器还存在着,冲突的动力就是变化不定的。拥有核武器或者非常规武器的弱国能对强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而拥有这些武器的强国则可以更有效地威胁对手和产生威慑的作用。与此同时,不管是在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峙中,还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中,一旦危机失控和对抗加剧,这些武器就可能被使用。正如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将要论述的,恐怖主义者可能使用这类武器的危险,更让人们相信,仅靠威慑是不够的。冷战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还没有终结。

冷战时期大事年表

1943 年	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会晤
1944 年	
7 月	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8月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立联合国
10月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在巴尔干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
1945年
2月　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晤
4月　罗斯福去世
5月　德国投降
4—6月　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宪章》
7月　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杜鲁门、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参加波茨坦会议
8月　广岛和长崎毁于原子弹；苏联参加亚洲的战争；日本投降
1946年　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希腊内战重新爆发
1947年
3月　杜鲁门主义出笼
6月　马歇尔计划出笼
10月　莫斯科建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8年
2月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动政变
3月　柏林部分封锁开始
6月　柏林空运开始；南斯拉夫被情报局开除
11月　杜鲁门再次当选总统
1949年
4月　《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签署
5月　柏林封锁结束
8月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9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950年
2月　中苏条约在莫斯科签署
4月　NSC-68草案出笼
6月　朝鲜战争开始
1952年　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杜勒斯出任国务卿
1953年
3月　斯大林去世
6月　东柏林动乱
7月　朝鲜战争停战
8月　苏联第一颗氢弹爆炸
9月　赫鲁晓夫当选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
1954年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5 年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华沙条约》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签署;奥地利中立化
1956 年	
2 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
6 月	波兰波兹南起义
10 月	匈牙利起义开始
11 月	苏联干涉布达佩斯
1957 年	
8 月	苏联发射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
10 月	苏联发射人造卫星
1958 年	
2 月	美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8 月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9 年	
1 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胜利
9 月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1960 年	
2 月	法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5 月	美国 U2 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巴黎首脑会议流产
1961 年	
4 月	在古巴猪湾的登陆行动失败
6 月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
8 月	修筑柏林墙
10 月	柏林查利检查站事件;紧张关系加剧
1962 年	古巴导弹危机
1963 年	
6 月	肯尼迪访问柏林,声称"我是柏林人",以显示坚定的态度
10 月	肯尼迪签署《部分禁试条约》;苏联、美国和英国同意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空进行核试验
11 月	肯尼迪被刺杀;约翰逊接任总统
1964 年	
8 月	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美国在越南的介入升级
10 月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京掌权
11 月	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6 年	
3 月	在美国和欧洲爆发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
4 月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 年	

1月　美国、苏联和另外60个国家同意签署禁止把外空用于军事目的的条约

6月　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

1968年

1月　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越南的春季攻势

7月　美国、苏联和另外58个国家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8月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1月　尼克松当选总统

12月　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达到最高点:53.5万人

1969年　美苏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1970年

2月　美国和越南开始巴黎和谈

4月　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4名美国大学生在肯特州立大学反战游行中被杀

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1972年

2月　尼克松访问中国

5月　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在5年中冻结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

1973年

1月　《巴黎协定》签署,规定在越南实现停火和政治解决越南战争

5月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9月　智利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政府为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所推翻

10月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斋月战争,美国和苏联差一点卷入战争;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持续到1974年3月

1974年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杰拉德·福特宣誓就任总统

1975年

4月　美国在失去西贡后离开了越南

7月　美国和苏联的宇航员在外空会合;美国和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同意承认欧洲的边界和保护人权

1976年　吉米·卡特当选总统

1979年

1月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6月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限制远程导弹和轰炸机的数量

7月　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推翻了索摩查独裁政权

12月　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制裁苏联和有意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1980年　卡特主义出笼,它宣称美国在波斯湾有至关重要的利益

1981年

1月　瓦文萨领导波兰团结工会举行非法的罢工;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美国人质在伊朗获释

12月　波兰实行军事管制

1982年　里根阐述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的基本内容,即美苏双方削减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核武器的数量

1983年

3月　里根提出战略防御倡议(SDI),俗称"星球大战计划",以发展导弹防御技术

11月　美国开始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Ⅱ型中程导弹

1985年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基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模式的"核武器与太空武器谈判"(NST)在日内瓦召开

1986年

10月　在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中里根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有关美国以放弃星球大战计划换取苏联大幅度裁军的建议

11月　美国通过向伊朗出售武器来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秘密泄露

1987年　在华盛顿首脑会晤中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同意销毁中程导弹,以便今后达成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1988年

4月　苏联同意不晚于1989年2月从阿富汗撤军

6月　戈尔巴乔夫告诉共产党领导人,共产主义学说必须有所变化

8月　古巴从安哥拉撤军

11月　乔治·H.W.布什当选总统

1989年

6月　中国政治风波

11月　柏林墙倒塌,成千上万的民主德国人进入联邦德国

1990年

5—6月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华盛顿首脑会晤

10月　德国重新统一

11月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减少美苏驻欧洲的军队

12月　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1991年

7月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承诺销毁上千枚核武器

8月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但权力落到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手中

9月　所有战略轰炸机、空中加油机和民兵—Ⅱ型洲际弹道导弹停止戒

备状态

12 月 苏联解体，美国承认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

后续阅读材料

1. 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 T. V. Paul, *The Tradition of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pp. 1-123.

3. Don Munton and David A. Welc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4. Joseph S.Nye, Jr., *Nuclear Ethics* (New York: Press Press, 1986) .

思考题

1.冷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为什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是如何帮助你解答这些问题的?

2.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爆发?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可以避免?

3.为什么政治家们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协调一致的体系?产生了何种体系?

4.在冷战的形成过程中,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原因有多重要?美国和欧洲政治家是如何认识苏联的?苏联又是如何看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

5.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关键的问题不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而是为什么冷战没有发展成"热战"。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为什么没有爆发热战?

6.遏制指的是什么?美国的遏制政策是如何形成和被实施的?苏联如何反应?

7.常规武器与核武器有什么不同?核武器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方式吗?

8.米勒认为核武器不是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大战的主要原因,这一看法对吗?他认为的其他原因是什么?

9.从道义上说核威慑是防御性的吗?或者用一个理论家的话来说,它是否在道义上类似于把婴儿绑在汽车前面的保险杠上以防止在追思节(Memorial Day)发生交通事故?是否有的威慑战略比其他的威慑战略更符合道义?

10.除了核威慑,核武器同国际关系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多大的用处?

11.冷战为什么结束?硬权力和软权力扮演了什么角色?

[1]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 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2),p.114.

[2] Ralph B. Levering, *The Cold War* , 1945—1972(Arlington Heights, IL: Harlan Davidson, 1982), p. 15.

[3] William Taubman,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1982), p.36.

[4]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3—24.

[5] Ibid., p. 24.

[6]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Norton,1969) , p.375.

[7] George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4 (July 1947) , p.581.

[8] Irving Howe and Michael Waltzer,"Were We Wrong About Vietnam?" *The New Republic* , August 18, 1979, p.18.

[9] John L. Gaddis,"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Footnotes* 5:5(June, 1998) .

[10] The 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The Challenge of Peace: God‘s Promise and Our Response," *Origins* 13:l(May 19, 1983) , p. 1.

[11] 引自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0,1985,p.6。

[12] 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 p.184.

[13] 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MA: Belknap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

[14] 中央情报局在1961年获得的情报表明,苏联人拥有10—25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参见 Jeffrey Richelson, *CM's Directo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1）, p.28。

[15] 在危机高潮阶段发生了一些令人清醒的事件。在美国方面有:一架间谍飞机意外闯入苏联领空；一枚"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根据预先计划好的飞行—试验程序在加利福尼亚州发射；蒙大拿州的一个"民兵"洲际弹道导弹执勤小组用电线短路法启动发射控制系统；一盘训练用的录音带被错误地输入新泽西州的雷达监视器中,显示苏联正发动导弹攻击。在苏联方面有:一位潜艇指挥官误以为战争已经爆发,下令装载和发射核鱼雷(这一行动被潜艇上一位头脑比较冷静的政治指挥官制止）；违反军令击落一架飞越古巴上空的美国间谍飞机。参见Don Munton and David A. Welc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 Concise History* ,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9—100；也可参见Michael Dobbs, *One Minute to Midnight :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Knopf, 2008）, passim。

[16]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299.

[17] James Blight and David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p.80.

[18] Robert McNamara, *Blundering into Disaster: Surviv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clear Age* (NQV/ York: Pantheon, 1986）, p.14.

[19] Theodore C.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p.705.



来自中国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帮助非洲儿童

第六章

冷战后的合作、冲突与热点

管理冲突

冲突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具有不同偏好的时候,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假如你想看《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 而你的妹妹想看《犯罪现场调查》(CSI) ,那么除非有两台电视机,否则你们之间就会发生冲突。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冲突都以和平方式解决,极少会升级为暴力行动。在某些情形中,冲突以一方获胜、一方失败而得到解决。如果你的父母对你说,你必须让妹妹看《犯罪现场调查》,那么她就获胜,而你则失败。你或许会不高兴,但不可能拔枪射击。

解决冲突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妥协,你可以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部分东西,而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全部。假如你和妹妹都想吃最后一块蛋糕,那么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蛋糕一分为二。这种办法对于吃蛋糕来说可能是有效的,而对于看电视剧则没有什么用处。你和妹妹两人可能都会想,吃半块蛋糕比吃不着要好,但是要看半集电视剧《法律与秩序》则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当你的父母要你让妹妹看《犯罪现场调查》时候,他们可能答应下一次让你看电视,以此缓和你的情绪。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用轮流的规范,即一种互惠的形式,来管理冲突。这种举动有效地把分出胜负的冲突解决方式,嵌入一种比较广义的妥协模式之中。久而久之,你和妹妹将共享播放时段。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失败的痛楚就将因此得到安抚。这也可能让你更加尊重父母的权威,因为他们通情达理、不偏不倚。第三种解决冲突的方式,就是某人说服一方或者双方改变自己的偏好。你的父亲可能告诉你,今晚播放的那一集《法律与秩序》是重播,你已经看过了。你的母亲也可能奖励你们兄妹二人出去吃冰激凌,而不看电视剧。

你们不仅要注意这些情景中的不同解决方式,也要关注不同的危机管理

战略。你的父母简单地命令你让着妹妹,这是他们在动用自己的权威。你可能还记得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这属于一种统治权。他们建议遵循轮流规范,是运用公平原则和倡导一种规范。你父亲告诉你电视剧是在重播,是通过提供相关新信息来改变你的偏好,从而运用软权力。你的母亲提出给你们买冰激凌,是以物质奖励的形式行使硬权力。

这样和平地管理冲突,需要相互合作。词典对 "合作"**(cooperation**) 的解释是"一起工作或行动"。合作通常并非自然发生,它常常需要由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来安排或促成。比方说,在1945年硫磺岛战役中把美国国旗插到折钵山顶端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被乔伊·罗森塔尔(Joe Rosehthal) 完美地摄入照相机镜头,这张照片给本书北美版的封面增色不少。毫无疑问,当时在场的军官并没有告诉其属下应该怎么做。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更愿意做其他事情。假如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他们通常会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偏好(除非是在具有强大的遵从他人规范的社会中) 。假如是属于这种情况,那么旗子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插到山上。 和谐**(harmony**) 是指一种大多数人偏好相同、皆大欢喜的情势。和谐是很好的事情,大多数人至少也在某个时刻、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验过和谐。然而,我们常常注意不到和谐,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冲突的解决方法或者冲突管理战略不是随时都有,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果。它取决于所涉及的"物品"(good) 之性质。经济学家把物品分成如下4种类型:

- "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 具有排他性:可以阻止他人将其占有。同时,也存在着对私人物品的争夺。假如你有一件私人物品,那么这就意味着其他人不能得到它。你的汽车是你的私人物品。如果你手里有车钥匙(以及有效的防盗装置) ,那么你就可以防止他人把车开走,你在开车的时候,别人就无法开走你的车。

-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没有办法阻止他人消费这些公共物品,你消费某些公共物品,这并不能减少其他人对这些公共物品的消费。新鲜空气就是一种公共物品:你显然无法阻止别人呼吸空气,你呼吸了空气,这并不能影响其他人也呼吸空气。

- "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 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包括诸如卫星电视信号之类的东西。卫星电视信号与传统的电台信号有所不同,前者是加密的,你如果没有用于解码信号的机顶盒,就不能观看电视节目。但是,拥有解码器的人则可以观看卫星电视节目。你对信号进行解码,并不影响别人也这么做。

- "共有物品"(**common goods**）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包括诸如野生鱼类以及游戏之类的东西。你不能阻止别人钓鱼,但如果你钓到一条鱼,别人就不能再得到这条鱼。假如你钓鱼纯粹是为了好玩,并且把钓到的鱼扔回到水里,那么你就把一条特定的鱼变成了一件共有物品。

不同类型的物品会对合作造成不同的问题。例如,有关公共物品的一个经典的合作问题就是供给不足:由于所有人都可以从一个公共物品中获益,因此没有人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承担提供该物品的费用。比方说,道路就是一种公共物品。虽然大多数司机原则上愿意分担修筑和养护道路的费用,但是也总有一些人想"搭便车"。研究表明,假如修筑和养护道路的预算费用全部来自捐赠,那么这样得到的钱是绝对不够用的,因此政府必须征税或者收取过路费。

涉及共有物品的一个经典的合作问题被称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北大西洋鳕鱼捕捞业在20世纪90年代陷于破产境地,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每条拖网渔船的船长都具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去尽可能多地捕捞鳕鱼,其结果是,船队捕捞鳕鱼的速度比鳕鱼再生的速度要快得多。

人们为了实现合作,也需要决定如何分配与保障私人物品与俱乐部物品的使用。只有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法律和经济体系中,你的汽车才真正属于你,因为该体系提供了金融、执照、登记以及执法(旨在保护你的所有权）等服务。需要有人为卫星电视的使用而分配电磁波频谱,以避免其他人使用相同的频率发射信号。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台信号也是如此。电台信号可能属于公共物品,但电台频率并非如此,后者是私人物品。你可以阻止他人使用同一个频率,如果一个人使用一个特定频率进行广播,那么其他人是不能同时使用该频率的。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合作对于确保人们从任何一种物品中获益是至关重要的。前面提到的例子表明,很多解决合作问题的有效方式都包含着政府(或者其他权威,比如父母、团体以及俱乐部）所制定和执行的规则与规范。事实上,各国政府有时利用自己的权力确保物品不得随意流动。比方说,MP3音乐文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公共物品:由于网络文件共享,防止别人获得这些文件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个人在网上下载MP3文件,并不会影响其他人下载。然而,假如音乐作品属于真正的公共物品,那么表演者和作曲家将由于"免费搭车"问题而无法靠音乐谋生计。因此,政府通过制定针对文件共享的法规,以及惩罚那些非法共享文件的人,以此来努力保护知识产权。在2009年夏天,一位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因为下载和分享绿日乐队(Green Day）和涅槃乐队(Nirvana）的音乐作品,而被罚款67.5万美元。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国际政治中没有高于国家的权威,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大量的解决国际合作问题的机制。它虽然并不能使国际合作无法实现,但是造成国际合作复杂化。绿日乐队和涅槃乐队可以让美国政府去惩罚那些非法分享音乐作品的美国人,但是美国政府无法逮捕、审判和惩罚那些用家用电脑下载音乐文件的上海人。美国官员只能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这么做,尽管它必须考虑拒绝这么做所导致的国际贸易互惠性问题。

有意思的是,虽然国际合作一般来说比国内合作更为困难,但是绝大多数国际冲突也都是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的。只有相对较少的国际冲突升级为暴力事件。当解决冲突的努力失败之后,大多数的结果是陷入僵局或者继续采取措施寻找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在冷战时期,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冷战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了解到的,至少从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很高水平的毁灭能力这一背景看问题,冷战时期发生的暴力冲突是很少的。大多数冷战时期的暴力事件都发生在所谓的边缘地带,而且涉及冷战的"代理人"(苏联或美国所支持的附庸政权、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民兵或者各种非正规军队)。虽然存在着很多没能得到解决的东西方冲突,但是其中大部分冲突只是陷于僵局,并且通过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协定,包括正式的协定(比如军备控制协定)和非正式协议(各种的"安全规制"),而逐步得到管理。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是世界政治中管理冲突与促进合作的两个主要手段。虽然我们已经在论述过程中多次涉及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但是在这里需要更详尽地对它们加以分析,因为许多人欢呼冷战的结束终于提供了一个实现威尔逊理想的机会,即缔造一个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实施更加有效和可靠管理的世界。可能有人认为,新威尔逊主义者期待出现建构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化与创建规范的过程,以此克服自由主义理想所面临的现实主义障碍。可以说,当今世界之所以更有秩序,就是因为在国际治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和平解决冲突规范的增多与深化。然而,持最乐观态度的新威尔逊主义者对此还很不满足,今天的世界没有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和平、稳定与安全。与此同时,那些悲观主义者的预言也被证明是错误的。悲观主义者曾经自信地预言,永恒的现实主义逻辑必将导致某种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敌对的轴心,这会阻碍任何形

式的进步。

人们在理解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是由于他们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同国内法和国内政府相类比。但是,国际组织不同于国内政府,国际法也不同于国内法。国际组织并不是萌芽中的世界政府,其原因有二。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国际组织章程都规定要保护成员国的主权。联合国由于其成员国几乎包括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以及它具有广泛的授权以及议程,是最接近世界政府的组织,但是《联合国宪章》第2章第7条还是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换句话说,国际组织并不想取代民族国家。

国际组织不是萌芽中的世界政府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国际组织本身的弱点。世界上有一个国际司法机关,即国际法院,它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由联合国选举产生,任期9年。但是,国际法院并不是世界的最高法院。各国可能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不接受它的判决。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法院判定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的布雷行为是非法的,但是里根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判决。

如果我们把联合国大会比作美国的国会,那么前者就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立法机构。它遵循的原则是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投票权,但是这个原则既不体现民主,也不反映世界上的权力关系。民主的基础是一个人拥有一个投票权。而在联合国大会上,位于南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和中国一样,都拥有一个投票权,但是前者人口只有10万,而后者人口却有13亿。这就是说,一个马尔代夫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拥有的投票权力是一个中国人的3000倍,这显然同立法机构的民主标准不相吻合。同样地,它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权力关系,因为马尔代夫群岛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拥有的权力与美国、印度或者中国相同。联合国大会的这种奇特性,使得国家不愿意让该组织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因此,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只是决议,而不是法律。

最后,我们可能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相当于萌芽中的世界总统。然而,这同样也会让人产生误解。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 是一个很弱小的行政官员,更像一个秘书(secretary) ,而不太像一个将军(general) 。如果说秘书长有权力的话,那么他更像教皇拥有软权力,而不像一个总统那样同时拥有硬权力与软权力。我们如果试图通过与国内政府进行类比的方法来理解国际组织,那么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它们最好被看作是国家间进行协调与合作的框架。

国际法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国内法。国内法是立法机关和惯例的产物,有时被称为"习惯法"(common law) 。国内法包括法律执行、由

个人提出裁决请求(你可以自己去法庭和提出诉讼）和立法机构按程序修改法律等规定。国际公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同国内法相类似,因为它也是由条约和惯例所构成的,条约是国家间的协定,惯例是国家普遍接受的行为习惯。但是,国际法在执行和裁决方面,和国内法区别很大。在执行方面,没有一个国际行政机构来确保一个国家服从法院的决定。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的体系,国际法有时是由大国来执行的。比如,在海洋法方面,曾经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国家拥有3海里的海洋管辖权。乌拉圭在19世纪提出要扩大领海的范围,以保护其沿海捕鱼业,而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则把炮舰开到离乌拉圭沿岸3海里的海域,以此做出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当利比亚企图把锡德拉湾当作本国领海的时候,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权国家把第六舰队派遣到该海域。你或许会问:"如果英国或美国违反了国际法,那么由谁来执行制裁英国或美国的法律呢?"答案在于,在自助的体系中执行国际法只是一种单向的行为。

在国际法中,是由国家而不是个人提出裁决请求(但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法院是一个例外情况）。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世界上几十亿人口中的某个人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惟独国家才享有提出裁决请求的权利。不仅如此,除非国家自己不愿意处理某个国际争端,或者认为自己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否则它是不会把该争端移交给国际法院的。所以,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比较少。国际法院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波斯尼亚及卢旺达冲突的战争罪犯,而且一大批国家在2002年同意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以审判那些国家政府无法审判的、犯有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的人。但是一些重要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拒绝签署这个条约,因为它们认为该条约侵害了本国主权。此外,即使国家同意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它们还面临着一个如何解释习惯规则的难题。让我们以征用原则为例来加以说明。国家普遍接受的一个规则是,国家可以对其领土上的一家外国公司实施国有化,但必须给予该公司相应的补偿。然而,到底由谁来确定什么样的补偿是合理的呢?许多不发达国家认为少量的补偿就足够了,而富国则通常要求较多的补偿。

最后,即使是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也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而且,它们不具有约束力。只有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所做出的决定,才是每个成员国在法律上必须接受的。《联合国宪章》第7章是关于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以及侵略行为的规定。如果安理会(而不是联合国大会）认定存在一个侵略或对和平构成威胁的行为,并且要求对此行为进行制裁,那么成员国必须采取制裁措施。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在2001年遭受跨国恐怖袭击之后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新法规的产生过程有时是这样的:先由大型的政府间国际会议讨论和起草条约,然后各国政府签署这个条约。这类会议通常规模庞大,而且效率不高。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海洋法会议,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旨在制定有关12海里领海、200海里渔业专属经济区以及洋底矿藏属于人类共有遗产等规则。其中的麻烦在于,有的国家只同意条约文本的部分内容,这就使得相关的国际法规不甚明确。尽管如此,在1995年,美国为了抵制中国可能对南沙群岛一带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还是求助于国际海洋法。

国际法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分散性质(fragmented nature) 。国际政治中的共同体观念是很弱的,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太愿意出于履行义务或者服从权威的考虑,而遵守规则或者约束自己。由于世界上缺少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武力垄断权的全球性行政机构,主权国家处于以自助、武力和生存为特征的环境之中。当生存问题出现以后,法律通常是第二位的。

可预见性与合法性

然而,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可以影响国家的行为方式。国家由于如下两个原因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可预见性与合法性。

国家如同个人,总是被卷入相互间的冲突之中。国际间的交往,不管是政府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极其广泛的,它包括贸易、旅游、外交使团以及人员跨国接触等。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发生摩擦的机会也就增多。在摩擦出现后,国际法可以让政府避免冲突升级。比如,如果一位美国游客因贩运毒品而在墨西哥被捕,或者一艘英国船只与一艘挪威船只在北海相撞,或者一家日本公司指责一家印度公司侵犯其专利权,有关国家政府可能不想让这些涉及个人的争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方面,如果按照国际法和普遍接受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可以使得这些问题非政治化和具有可预见性。可预见性有助于增进交往,并且有序地处理因交往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冲突。

合法性是国家需要国际法的第二个原因。政治不仅仅是争夺物质权力的斗争,它也是争取合法性的较量。权力与合法性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人既不是完全按道德原则行事,也不完全是自私自利

的。有关对与错的信念是人们行为的动力,这是一个政治事实,因此合法性也就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一国的行为被认为缺少合法性,那么该国就要为其政策付出更高的代价。国家希望借助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证明自己的政策具有合法性,并且指责别国的政策缺乏合法性,这会影响到它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合法性也会增强一国的软权力。

国际法在重大的利益冲突中,可能对国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它往往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法律是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也许怀疑论者会说,这些只是律师们玩的游戏而已。但是,法律并非毫无作用,因为政府总是很重视援引法律依据,或者认真地考虑国际组织的决议。这就好像一句格言所说的:"如果用邪恶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是善良的,那么善良肯定要因此付出代价。"简单地说,政府的行为可能被自己提出的法律借口所束缚。

以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为例。该决议是在1967年中东战争结束后通过的,它呼吁有关国家恢复战前的边界。在此后几年里,它使得以色列对它在战争中夺取的领土之占领缺乏合法性,从而迫使以色列在联合国处于被动地位。阿拉伯国家虽然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但是仍然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1976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极力促使联合国开除以色列,美国花费了很多政治资本来劝说阿拉伯国家,防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开除以色列的决议。这个事例再次说明,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性象征是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在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时,会使用武力这个最有效的权力形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使用武力的事态只能起到很有限的作用。用国际法来处理毒品走私、海上船只相撞或者侵害专利权等是一回事,遵守国际法而使国家面临生存威胁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集体安全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但是《联合国宪章》再次建立起了一种有所改进的集体安全制度。

联合国:集体安全与维持和平行动

在经典的均势体系中,战争是合法的,武力也是被允许使用的,而且它被认为有助于确保体系的稳定。在19世纪,随着技术革新导致战争更具破坏力以及民主与和平运动的兴起,有关国家采取了一些把国家组织起来以防止战争的措施。1899年,26个国家在海牙召开了和平会议。

1907年,44个国家参加了第二次海牙会议。海牙会议所采取的是法律手段,与会者极力说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签署一项仲裁条约,以便通过仲裁而非使用武力来处理争端。他们也试图制定战争法规,以便在仲裁失败的情况下约束战争行为。.

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国家创建起了国际联盟,试图通过国家的联合来阻止侵略行为和惩罚侵略者。在威尔逊及其思想的同路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一场由均势所导致的偶然的和不必要的战争,为了集体安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同盟可以防止发生这样的战争。如果说建立国际联盟的目的,在于防止再次爆发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那么1943—1945年间建立联合国的努力,则旨在防止再次爆发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1945年,49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旧金山,签署了一个宪章,它包含了一些创新的内容,以克服国际联盟的弱点。除了国家出于自卫或者集体安全的需要而使用武力外,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的举动被宣布为非法的行为。这样的集体安全制度和19世纪均势体系的区别在于,任何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以武力发动进攻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但是有三个例外情况,即国家出于自卫、集体自卫、集体安全的目的,才可以使用武力。

联合国的设计师们也设立了一个安全理事会,它由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一些有任期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安理会可以被看作是19世纪的均势思想和联合国集体安全框架相结合的产物。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安理会可以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如果5个大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它们都具有否决权,否决权就好比一座房子里的照明系统中的保险盒。联合国创立者们认为,与其让一场针对一个或两个大国的战火烧掉房子,不如使用否决权让所有的灯都熄灭。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冷战期间,只有在朝鲜战争中发挥过作用。这是由于当时苏联代表为了抗议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是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缺席安理会会议。在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国未能就什么是合法地使用武力的行为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它们在界定侵略的定义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比如,如何判断挑起战争的是先进行秘密渗透的国家呢,还是其军队首先跨越边界的国家?在1956年的时候,以色列深受由埃及支持的游击队秘密越界攻击之苦,但是以色列的常规部队首先越过边界。对于谁是侵略者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看法,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站在冷战的哪一方。在联合国创建后的最初20年里,联合国的有关委员会试图给侵略下一个定义。它在列出一个侵略行为的清单之后,又加了一个但书,指出安理会也可以确定其他行为属于侵略行为。即便动用了军队,安理

会也可能说没有发生侵略行为。就联合国来说,只有安理会可以认定一个行为是否为侵略行为。一切都取决于在安理会内部能否达成共识,而这在冷战时期是很难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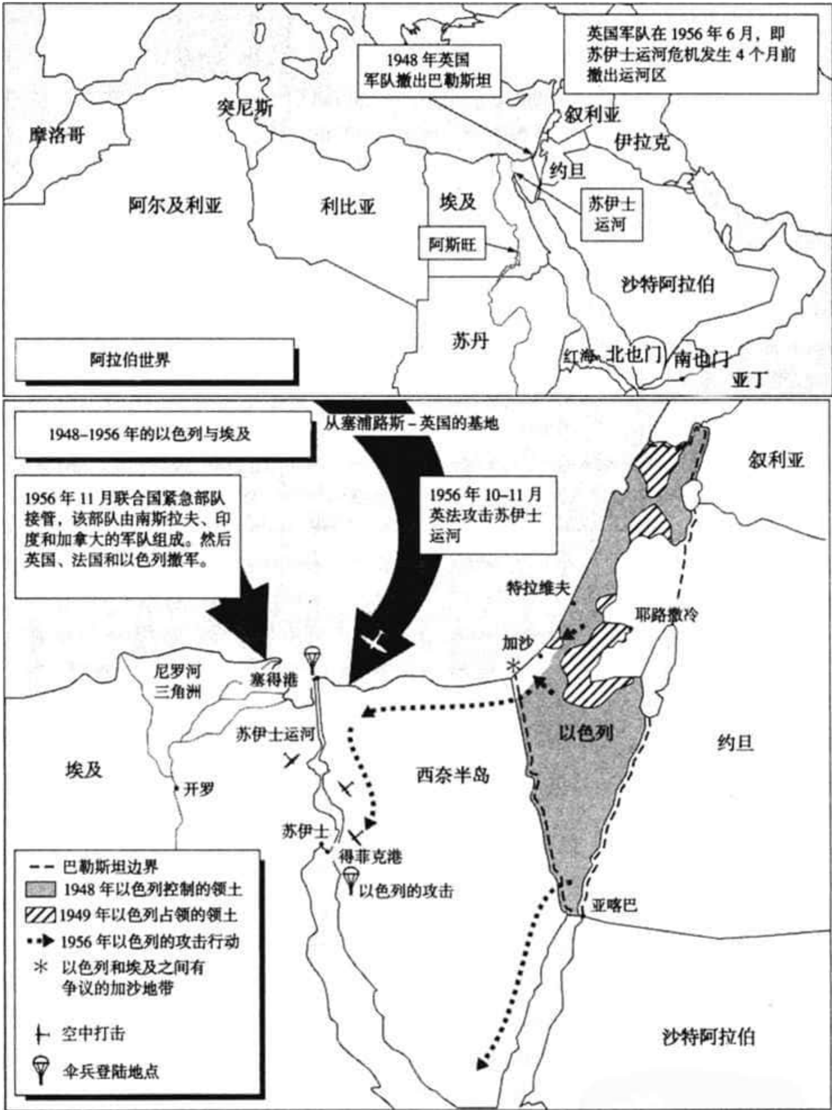


图6.1苏伊士运河危机与维持和平行动的诞生

集体安全制度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它促使了联合国预防外交思想以及维和部队的产生。联合国不再关注集体安全的基本思想,即确定和惩罚

侵略者,而是把来自独立国家的军队聚集起来,并部署在交战双方的中间地带。这种模式形成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

1956年7月,埃及总统贾迈尔·纳赛尔(Gamal Nasser)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见图6.1)。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认为埃及的行为对英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把纳赛尔比作新时期的希特勒,并且把该事件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相类比。他对纳赛尔接受苏联武器的事实感到担忧。英国与法国、以色列一道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即以色列入侵埃及(该国一直派游击队跨越以色列边界),英法两国进行"干预"以恢复和平,并占领苏伊士运河。联合国安理会辩论是否通过一项呼吁停火的决议,英国和法国利用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它们希望干涉继续进行,直至除掉纳赛尔。

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和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一道,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用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离开。联合国大会(大国在此没有否决权)一致通过决议,授权向西奈地区派遣一支联合国部队。美国没有支持其欧洲盟友,因为它担心英法的干涉行动会刺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而为苏联介入中东创造更多的机会。11月15日,第一批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到达西奈,把以色列和埃及的军队隔离开,接着在12月,联合国开始清理苏伊士运河的沉船。

联合国紧急部队成为后来数十次"蓝盔"维和行动的模式,而且联合国在1992年设立了维和行动部(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DPKO)来负责监督维和行动。目前在四大洲共有14个联合国维和行动。来自114个国家的将近10万人参加维和行动。迄今为止,总共有64次维和行动,预算总额差不多是700亿美元。维和是联合国具有创造性作用的一个典范,这是联合国创始人绝对没有想到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集体安全行动仅有2次(1950年在朝鲜,1991年在伊拉克)。

虽然冷战阻碍了联合国实施正式的集体安全原则,但是并没有阻碍联合国采取富有创意的行动,用国际部队把争端双方分开。根据集体安全制度,如果一个国家越过一条界线,那么其他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对付它,并且迫使它退回到原来的界线内。而在维和行动中,如果一个国家越过一条界线,那么联合国就会介入,并且把当事方分开,不表明谁对谁错。在冷战期间,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维和部队总是由小国提供,而不是来自苏联或者美国,这样大国就不会直接卷入冲突之中。预防性外交与维和行动是富有创意的举措,至今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不属于集体安全措施。今天,许多维和人员努力把内战冲突双方隔开。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冷战后的第一场危机。由于苏联和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集体安全原则在40年中第一次被付诸实施。这有三个原因。第一,伊拉克采取了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它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行为很相似,从而促使政治家们想到当年集体安全制度失败的教训。第二,政治家们认为,如果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这么一个明显的侵略行动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维持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原则。第三,联合国内的小国支持这一行动,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很脆弱,都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具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萨达姆·侯赛因为其侵略科威特的行为所作的辩解,也让其他大多数的小国感到害怕。用前面引用过的海地驻联合国代表的话来说,它们不想成为别人手中的科威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将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吗?答案是,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比如,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在1999年和2003年,都未能达成授权对科索沃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协议。存在着如下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当发生明显的侵略行为的时候,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最能够发挥作用,而它难以在内战中起作用。第二,集体安全制度在没有国家使用否决权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如果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不能达成协议,集体安全制度将会再度陷于瘫痪之中。况且1945年设计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是不能用来反对五大国的,这五个国家在安理会都享有否决权。第三,集体安全制度只有在成员国提供资源的时候才可以发挥作用,如果拥有庞大军队的国家不提供资源,那么很难想象集体安全制度会起什么作用。集体安全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在冷战时期被冷冻起来,然后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如同拉撒路(Lazarus) 一样死而复生。但这只是个小小的奇迹,正如我们将在第九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集体安全制度将来只是人们用来维持世界秩序的手段之一。

> 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
>
> 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占领莱茵地区,接下来成功地实施了入侵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西方的行动计划。大部分西欧人容忍和原谅了他的行为……
>
> 同样地,我们确信,夺取苏伊士运河是纳赛尔实施其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的目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剥夺西方的利益,并且把西方影响清除出阿拉伯世界。他相信,如果他能够顺利实施这个计划并成功地挑战18个国家,那么他就能够在阿拉伯世界享有极高的威信,可以鼓动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青年

军官发动革命。(我们知道,他已经开始在伊拉克这个最稳定、最进步的国家里策划一场革命。)这些国家的新政府,如果不是俄国人的卫星国,那么实际上就会成为埃及的卫星国。这些地方的石油资源将处于由埃及领导并受俄国人影响的阿拉伯合众国的控制下。一旦这个时刻到来,纳赛尔就可以停止向西欧供应石油,我们就将看他的脸色行事。

——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1956年 [1]

联合国发挥着政治作用,即便在集体安全原则无法得以实施的时期,它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联合国宪章》所阐明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原则,让那些想使用武力的国家负有举证的重担。建构主义者指出,此种有关使用武力的规范观念之变化,会影响国家的软权力。此外,安理会为讨论国际暴力问题提供一个重要论坛,会在危机时期增强集体关注的效果和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而且它有时也可以促使人们的观点变得明确起来,增加武力侵略行为的代价,以及起着外交安全阀的作用。最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是很有用处。联合国所设置的这些绊网和缓冲区,一再被大家认为是很有用处的措施。

随着冷战的结束,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机会更多了。联合国除了监督维和部队,还在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监督萨尔瓦多的人权状况、尼加拉瓜选举、柬埔寨的管理等方面都起了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近记录有好有坏。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海地和柬埔寨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未能防止卢旺达和苏丹的族群清洗,也不能阻止安哥拉内战,并且在波斯尼亚则不得不被更强大的北约军队所取代。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联合国维和人员确实帮助防止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流血冲突,但有人批评长期驻扎在塞浦路斯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蓝盔部队自从1964年开始就一直驻扎该国),实际上妨碍该国通过协商重新走向统一。向族群冲突地区派驻中立的部队,似乎并不总能发挥作用。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中立的干涉行动可能延长内战时间,导致更多的伤亡。在另一个方面,联合国依然发挥着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作用。例如,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在2003年未能通过第二个明确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美国和英国为占领伊拉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2] 此外,联合国继续扮演有创意的新角色。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建设和平(peace building),这体现在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UNMIT)上。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依据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安全任务的16点指令,试图帮助东帝汶提升自身能力和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便建立起一个稳定、独立和民主的国家。这类"支持和平行动"(peace support operations)绝对是在旧金山起草

《联合国宪章》的人所没有想到的,但它们越来越成为联合国在管理冲突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虽然最初的集体安全构想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但否定国际法和联合国作用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国际法和联合国是无政府国家体系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法采取过于怀疑或者过于天真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国家不能只按法律行事,但是如果完全没有法律,那么国家就无法生存。

在21世纪初,成立于1945年的联合国显然不是其创立者当初所期望的"人类议会"(parliament of man)。联合国每年正常的财政预算大约为40亿美元,拥有1.4万名雇员,该组织比很多城镇拥有更少的资源。即使把维护行动的特别预算(大约30亿美元)和所有专门机构和发展基金年度预算都加在一起,联合国所拥有的经费总数也就大约1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国防支出的2%。联合国人权行动的预算少于苏黎世歌剧院的预算,而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大约等于一所大学医院的预算。[3]

很多观察家呼吁改革联合国制度。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拥有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权力,其中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国、英国以及法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享有否决权。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任命的一个高级小组,建议安理会成员国数量增加到24个,印度、巴西、日本和德国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然而这个计划最后破产了,因为中国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一些地区的竞争对手表明反对该计划的态度,非洲国家也要求更多的席位。这个小组也提出其他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建议,包括设立一个建构和平委员会来监督失败国家的重建,改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取消那些侵犯人权国家的成员资格,制定允许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清晰标准,以及协商界定恐怖主义的含义。成员国除了允许设立一个小型的构建和平委员会以及一个温和的、新的人权理事会以外,并不愿意实施该小组的建议。

联合国依然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组织,它的193个成员国继续努力通过外交手段维护本国利益,并寻求达成合作的共识。然而,联合国在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安全、国际发展、人道主义援助、环境恶化、毒品、跨国犯罪、健康与疾病以及全球共同生存空间等诸多问题中,也处于中心地位。不管联合国具有什么样的弊病,它依然是唯一一个充当国际外交焦点的世界性组织。人们有时候会说,假如今后联合国不存在了,那么还得重新创立一个这样的组织。鉴于当今世界在文化和国家利益上的多样性,不清楚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创立一个这样的组织。

后续阅读材料

1.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Linda M. Fasulo, *An Insider's Guide to the UN* ,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pp. 1—89.

国内冲突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地区和国内冲突仍然持续不断,并且总是会产生促使大国和国际组织进行干涉的压力。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所发生的116次冲突中,有89次纯粹是国家内部的冲突,还有20次是有外国干涉的内部冲突。[4] 有超过80个国家行为体、2个地区组织以及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卷入了冲突之中。[5] 在这些国内冲突中,很多属于"族群战争"(ethnic or communal wars）,战争中的各方部分依据诸如语言、宗教或者相似的特性这样的文化界线,来给自己界定身份。其他的国内冲突属于革命战争,交战双方以意识形态划线。一些最严重的冲突是由政府有意加重的,而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则无力制止冲突。冲突的伤亡人数可能很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有超过10万人在下列国家冲突中丧生:阿富汗、安哥拉、布隆迪、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亚、卢旺达、塞拉利昂、苏丹、乌干达以及南斯拉夫。超过100万人死于柬埔寨、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埃塞俄比亚以及尼日利亚。

大部分国内战争是在已有的冲突调停机制失败之后爆发的。在帝国(比如欧洲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帝国以及苏联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帝国）瓦解之后,经常出现政府无法调停冲突的情形。这样的"失败国家"要么缺少一个强硬的政府,要么其政府权威受到经济状况恶化、合法性丧失或者外来干涉的损害。因此,尽管冷战两极冲突的结束导致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柬埔寨、安哥拉以及索马里,但国内冲突并没有因此消失。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在两极世界中可以保持独立地位的国家,但是铁托总

统之死和冷战的结束,削弱了该国政府调停族群冲突的能力。

建构主义者指出,族群性(ethnicity) 并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必然导致战争的因素。从符号、神话和记忆都会随时间而改变这个意义上说,族群性是社会建构的。比如,在1994年遭遇种族仇杀的卢旺达,民众讲同一种语言,具有同样的肤色,但是在图西族和胡图族人之间,存在着经济地位不同的区别,几个世纪以前从其他地方迁移到这里的图西族人属于游牧民族,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则属于农耕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和社会变迁使得两者之间的某些区别变得很模糊,但是殖民主义统治导致这样的区别得到增强。在1994年的种族仇杀中,75万图西族人被屠杀,许多主张采取克制态度或者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也惨遭杀害。

1991年前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也导致了族群冲突。一些严重的拼杀,就发生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而波斯尼亚是南斯拉夫联邦中种族成分最复杂的共和国。1991年夏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开始拼杀了。联合国对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都实施武器禁运。次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其人口中,44%为穆斯林、31%为塞尔维亚人、17%为克罗地亚人) 宣布独立并为西方所承认。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一场族群之间的战争随之爆发。在1992—1993年,有报道称在波斯尼亚发生了针对穆斯林的"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 或者驱逐穆斯林事件。不仅如此,塞尔维亚人武装阻止联合国人道主义护送队进入波斯尼亚保护当地的穆斯林。随着克罗地亚人把拼杀的对象从塞尔维亚人转向穆斯林,塞尔维亚人也开始反对按照族群界线分裂波斯尼亚。1994年,波斯尼亚政府军征讨塞尔维亚武装的战斗行动得到了北约的支持。战斗持续到1995年,塞尔维亚人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6000名穆斯林,克罗地亚军队在一次大规模族群清洗行动中迫使塞尔维亚人逃出克拉季那。在该年年末,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以及克罗地亚签署代顿和平协议,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北约维和部队进驻该国。

1998年,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 派军队镇压科索沃省的动乱。科索沃解放军随之进行游击战,米洛舍维奇在当年9月面临北约提出要求停止镇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或者预计对塞尔维亚实施空中打击的最后通牒。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了持续78天的轰炸,造成了大规模的难民危机。由于北约的空中打击,米洛舍维奇从科索沃撤军,他也被联合国的一个特别法庭指控为战争罪犯。在2000年举行选举之后,爆发了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抗议行动,并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一年之后,米洛舍维奇被捕并被移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

米洛舍维奇2002年出庭受审,但是一直没有审判结果,他本人于4年之后在监狱中自然死亡。巴尔干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国际维和部队依然部署在当地。

> 我曾经问过一位参加过莫斯塔尔战役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军事指挥官,他是怎么知道应该对准谁射击的?因为街上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他回答说,在战前,你必须知道对方的名字,但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根据他们的制服进行识别。
>
> ——小约瑟夫·奈

但是,有的人也会把前南斯拉夫的冲突看作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冲突,因为旧的认同观念与神话在农村地区的影响最大,而城市群体中的很多人进行族际通婚,并且把自己视为"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或者穆斯林。一旦南斯拉夫解体和拼杀爆发之后,一些人被强加给了新的身份。一个人在1993年说过:"我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穆斯林。现在,我是一个穆斯林了,因为这是强加给我的。"一些理论家把族群冲突的原因,归结为根深蒂固和古已有之的仇恨,或者文明之间的大冲突。但是,族群间的区别,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话来说,就是"对细微差别的自我陶醉"。

为什么人们会因为细微差别而进行相互杀戮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这样。人类总是把自己归于不同的群体之中,而且在有的时候,差别伴随着歧视与仇恨。但是,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这样的差别才会导致暴力。虽然并不存在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冲突,但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动力,即:族群符号和神话导致分歧;经济竞争或者国家权威的削弱产生对于群体生存的忧虑;精英或者领导人借助族群信条来寻求支持;一些事件(比如1992年波斯尼亚宣布独立或者1993年4月卢旺达总统因为飞机坠毁而丧生)会引发拼杀。

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强调那些借助族群神话和恐惧而达到目的的暴力群体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族群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意味着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实际上"它是由很小的好战者群体所采取的行为,这些群体以某个较大实体的名义采取拼杀与杀戮行为"[6]。他认为,诉诸暴力行为的少数群体,破坏了那些比较温和的中间阶层之生活空间,并且使得病态与犯罪因素在随之而来的混乱状态中生长。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强调符号政治(symbolic politics)的重要作用。政客和极端主义团体利用族群符号可以煽动民众情绪的作用,来重新建构更大团体的偏好。我们在第一章所描述的经典安全困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理

性行为体之间缺少信任,以及无法在无政府状况中保证协议得到实施,从而导致严重冲突的爆发。但是,在考夫曼看来,许多族群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冲突的一方或双方宁愿冲突,而不愿意合作" [7] 。在诸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这样的失败国家中,对那些教育水平低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打劫和掠夺有着极大的经济利益。族群冲突早期阶段的安全困境之所以产生,除了理性行为体在无政府结构状态中面临的困境之外,经常是由于那些崇尚暴力并从中获利的人操纵了情感符号。

干涉与主权

一些分析家认为,当存在着失败国家或者种族屠杀危险的时候,其他国家可以无视相关国家的主权,并采取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干涉行动。2005年,联合国威胁、挑战和变革问题高级小组(the United Nations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Challenges and Changes) 赞成"国际社会负有保护……平民不受战争和侵犯人权行为所伤害之集体责任这一规范"。该小组认为,这一责任"可以由安理会所行使,即在发生种族屠杀和其他大规模屠杀、族群清洗或者严重违法人道主义法律而主权国家无能为力或不愿意制止的情况下,授权使用军事干涉这一最后手段"。

干涉(intervention) 是一个容易令人混淆的概念,其部分原因在于,它既是个描述性(descriptive) 的概念,也是个规范性(normative) 的概念。它不仅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做出价值判断。因此,讨论干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涉及道义问题。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规范(norm) 。不干涉是一个强有力的规范,因为它对秩序和正义都有影响。秩序限制了混乱的程度。如果基本原则得到遵守,那么国际无政府状态,即缺少一个更高权威的状态并不等同于混乱。主权和不干涉是保证在无政府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秩序的两个基本原则(principles) 。与此同时,不干涉同正义也有关系。国家指的是由那些享有在自己国境内共同生活权利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其他国家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属于这种理想的国家。很多国家难以用"主权国家"这个概念加以定义。比如,在21世纪初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索马里,存在着集团与氏族(clan) 的纷争,缺少能够有效控制整个国家的政府,甚至孩童也被迫参与战斗。因此,正义与秩序之间经常产生冲突,从而导致人们对于是否进行干涉的认识是前后不一致的。

干涉概念的界定

最为宽泛的定义为: 干涉 就是指影响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外部行为。某些分析家则使用一个较为狭窄的定义:干涉是指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 强迫性 的干预(forcible interference) 。这种狭窄的定义仅仅是强制程度从弱到强变化的图谱之一端而已(见图6.2) 。在图谱的左端,干涉可能仅仅表现为一次旨在影响另外一个国家内政的讲话。比如,1990年布什总统呼吁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1999年萨达姆号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推翻本国政府。这样的讲话的目的在于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但是经常起不到什么作用。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马蒂电台,播放反对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息,但是卡斯特罗在21世纪初依然掌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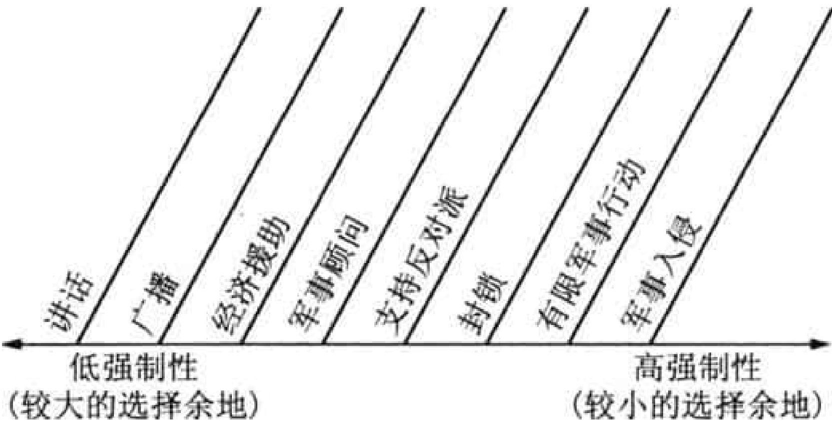


图6.2 干涉概念的界定

经济援助也可以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比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向萨尔瓦多和古巴提供经济援助,目的在于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尽管贿赂是一种不合法的经济援助形式,它可以通过收买外国高级政府官员,促使相关国家改变政策。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情报机关经常投入资源来影响外国选举的结果。同样地,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花了很多钱,试图帮助那些较为照顾韩国利益的美国政治家在选举中获胜。

图谱中强度更大一点的干涉行动是派遣军事顾问。在20世纪50年代末

的越南战争初期,美国的干涉行动先是经济援助,然后是军事援助。与此相类似的是,苏联和古巴向尼加拉瓜和其他"仆从"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另一种干涉的形式是支持反对派。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向萨尔瓦多以及智利民选总统的反对派提供金钱援助,苏联也在不同的时期用金钱支持欧洲国家的和平组织。最近发生的相关事件有:美国向几个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共和国(包括乌克兰)中的民主运动提供金钱资助;叙利亚一直以来很深地介入黎巴嫩事务之中;委内瑞拉利用其石油财富影响拉美国家的选举。

靠近图6.2最右端的是有限军事行动。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轰炸利比亚,报复该国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攻击苏丹和阿富汗,以报复针对东非美国大使馆的恐怖袭击。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通过空中打击和向当地武装提供地面支持的方式,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本书后面将对此加以详细论述)中,有18个联合国成员国提供军队,确保在内战中的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图6.2最右端是大规模军事入侵或者军事占领。这样的例子包括美国1965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83年在格林纳达、1989年在巴拿马以及2003年在伊拉克的行动,还有苏联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9年在阿富汗的行为。实际上,不只是大国才进行军事干涉。比如在1979年,坦桑尼亚出兵乌干达,越南入侵柬埔寨。1997年,小小的卢旺达有力地干涉了比它大得多的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务,埃塞俄比亚在2007年出兵索马里。某些干涉是多边的,但通常以一国为首。比如,美国在1995年领导了联合国对海地的干涉和在1999年领导北约对科索沃的干涉,尼日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几个西非国家干涉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宽泛的干涉定义包括了图谱中所有的行为,其强制程度是由弱到强。干涉的强制程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和当地人选择权的大小相关,因而和当地自主权受外界力量限制程度的大小有关系。

对干涉行为做出判断

对于怀疑论者来说,道义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实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对干涉有着不同的认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价值(values)是秩序与和平,最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是均势。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有助于维持均势和秩序

的干涉行为就是正当的。在整个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正是采取这样的干涉行为来维护各自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比如,美国在1965年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在20世纪80年代干涉中美洲,其依据是不能容忍在西半球出现更多的共产党政权。而苏联则在东欧采取干涉行为,以维护当地的共产党政权。苏联人在1968年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即表明苏联有权采取干涉行动,以捍卫其势力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现实主义者可能认为这样的干涉行动是正当的,因为它们维护了秩序,并且防止了可能因为误解或者判断失误而发生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

相反,世界主义者看重正义。在他们看来,个人组成的社会是最重要的国际制度。因此,如果干涉行为伸张了正义,那么它就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应该允许为了善意的目的而进行干涉。但是如何界定"善意的"之含义呢?在冷战时期,自由的世界主义者认为,诸如反对菲律宾费尔南德斯·马科斯独裁政权(1965—1986)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1948—1990)的干涉行为就是正当的,而保守的世界主义者则认为,反对左翼政权的干涉行为是正当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美国人宣扬"里根主义",即针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政权的干涉行动是正当的,因为这些政权侵犯了民主权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主义者极力支持如下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在索马里防止饥荒的蔓延(1992),在海地恢复民选总统的权力(1994),在波斯尼亚制止一场内战(1995),在科索沃遏止由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政府挑起的"族群清洗"(1999)。同样地,他们呼吁美国干涉利比里亚(2003)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2008)。左派和右派世界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如果干涉行为伸张了个人的正义和维护了人权,那么它就是正当的。

在国家道义主义者的眼里,国家和人民的自主权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价值。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制度是国家组成的社会,它拥有一定的规则和国际法。在这些行为规则中,最重要的是不干涉别国领土主权的原则。因此,在国家道义主义者看来,干涉行为基本上是不正当的,只有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或者抵制外来侵略的战争才是正当的。然而,现实世界有时要比这复杂得多。外来侵略的性质经常是不甚明确的。例如,1967年6月,以色列军队穿过边界,首先对埃及发动了进攻。但是,人们经常认为,以色列不算是侵略者,因为它是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阻止埃及即将发动的进攻。到底谁是侵略者呢?是在边境集结军队、看上去在准备进攻以色列的埃及呢,还是在埃及发动进攻之前就开始进行攻击的以色列?

不干涉规则的四个例外

政治学家和国家道义主义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在其著作《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中指出,尽管没有发生公然的侵略行动,但在四种情势中进行战争或者采取干涉行为可以是正当的。不干涉原则的第一个例外是先发制人的干涉行动,1967年以色列攻击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面临着明显的和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它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采取行动了。但是,威胁必须是迫在眉睫的。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干涉阿富汗的行为是正当的。 先发制人的打击**(preemptive strike ）** 不同于 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 ）** ,前者是在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发生的,后者则是在领导人确信早打不如晚打的时候爆发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这种预防性战争的思维影响了1914年的德国总参谋部。许多人担心,假如德国等到1916年再发动战争,那时俄国已经太强大了,"施利芬计划"将无法实施。沃尔泽所说的不干涉原则的第一个例外并不意味着允许发动预防性战争,因为德国并没有面临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在本书前面所列举的反事实推理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假如发生其他的事情,那么1914年到1916年的情势就可能大不一样。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新安全理论使这种区别变得很模糊,它声称美国在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威胁。

不干涉原则的第二个例外是,可以用一次干涉行动来平衡上一次的干涉行为。这个规则可以追溯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观点,即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上一次发生的干涉行为使得当地人民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一次反干涉行动就是正当的,因为它恢复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根据穆勒的观点,只有针对上一次干涉行为的反干涉行动才是正当的,除此之外的干涉行动就是不正当的,让当地人民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美国有时就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明自己介入越南的行为是正当的。1979年,中国军队越过边界、对越南采取干涉行动,但在几个星期之后撤回本国。中国声称此举目的在于反击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为。

不干涉原则的第三个例外是,为了拯救面临大屠杀威胁的人民而采取的干涉行为是正当的。如果这些面临杀身之祸的人民不能获得解救,那么旨在尊重当地人民独立或权利的不干涉原则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是在乌干达独裁者大规模屠杀当地人的时候,这个干涉行动是为了拯救面临大屠杀威胁的人民,因而是正当的。越南以类似借

口,即拯救柬埔寨人民,入侵了柬埔寨。然而,并非只要发生大屠杀或者族群仇杀事件,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就会进行干涉。比如,美国就不愿意出兵干涉卢旺达(1994)、波斯尼亚(1992,1995)、利比里亚(1996)、塞拉利昂(1999)以及刚果(2003)等国所发生的这类事件。联合国大会在2005年通过一个决议,主张国际社会承担起保护民众免于可以避免的灾难之义务。但是,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议依然很大。比如在麻烦不断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阻止族群集团屠杀行为的军事干涉行动只限于温和的维和行动。

不干涉原则的第四个例外是,如果一个分离主义运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那么支持它的干涉行动就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国家中的一群人明确表示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那么帮助他们从原来的国家中分离出去就是正当的行为,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他们把自己的权利放在一起,享有作为一个国家(nation)的自主权利。然而,分离主义运动在什么时候才值得帮助呢?是否说分离主义运动获得胜利就意味着外界值得向它提供帮助呢?穆勒观点的部分含义是,一个群体为了建立一个合法的国家,它必须具备拯救自己和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的能力。这样的观点至少同不干涉原则以及国家组成的社会之观念是相统一的,但它作为一个道义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意味着强权即公理。

自决的问题

有关支持分离主义运动之干涉行动的一个问题是,"人民"(people)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是否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外人如何知道国家内的人群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一个共同体或者国家(state)呢?自决(self-determination)是指人们具有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其最常见的表达形式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是存在着由谁来做决定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索马里的情况。与许多非洲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索马里的人民基本上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族群(ethnic)的背景。而毗邻的肯尼亚则由于殖民统治的原因,是由几十种族群或部落(tribes)所组成的,他们的语言背景和生活习俗差别很大。其中,在肯尼亚北部居住有索马里人。索马里声称,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应该让肯尼亚东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索马里人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nation)——索马里人。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他们还处于创建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结果是在北非发生了一系列围绕索马里民族主义问题的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结果是,索马里自己后来陷入了氏族(clam)和军阀之间的内战之

中。

投票并不总能解决民族自决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应该在哪里投票的问题。以爱尔兰问题为例。许多年来,天主教徒声称,如果在北爱尔兰的政治区域内投票,那么占三分之二多数的新教徒将居主导地位。新教徒则认为,如果在整个爱尔兰岛的地理范围内投票,那么占三分之二多数的天主教徒将说了算。到底谁来决定在哪里投票呢?最后是借助外部的调停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应该在什么时候投票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索马里人要求马上举行投票,肯尼亚则要求等40年到50年后再投票,在此期间肯尼亚要努力完成民族创建的过程,或者把部落认同塑造成肯尼亚认同。

分离运动会给当事国的其他人造成伤害吗?分离主义者会从当事国带走多少资源,或者会给该国造成多大程度的混乱状况?比如,苏台德地区在1918年奥地利帝国解体之后被合并到捷克斯洛伐克,而那里的居民却是讲德语的德意志人。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脱离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加入德国,其结果是,原先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多山的边疆地区就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中,这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务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让苏台德的德意志人行使民族自决权,意味着剥夺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防御能力,这样做是否正当呢?在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的东部地区要求与尼日利亚分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比夫拉,但是尼日利亚其他地方的人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其部分原因在于,尼日利亚的绝大部分石油产区位于比夫拉。他们宣称,石油属于所有尼日利亚人,而不只是属于该国东部地区。印度尼西亚对于石油资源丰富的亚齐省的分裂主张,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在1989年以后,自决问题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变得十分尖锐起来。在前苏联地区,各种族群集团(ethnic groups) 要求获得自决的权利,它们中的许多族群集团在1917年到1920年间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权利。在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车臣人都要求在自决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不同的族群和宗教集团采取分离主义行动和要求行使自决权。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了独立的共和国,但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却没有那么顺利。波斯尼亚战争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后来海牙国际法院设立了战争罪行法庭,从1996年开始审判那些负有屠杀罪责的人。然而,在冲突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北约以及欧盟不能就如何应对这场冲突达成一致的意见。波斯尼亚战争让国际社会感到为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难以判断这场冲突在

多大程度上是属于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在多大程度上是塞尔维亚的干涉行为?如果这场冲突不是简单的外来入侵行为,那么国际社会出面干涉的唯一理由就是防止大屠杀。巴尔干和卢旺达的情况一样,引起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是在1995年北约维和部队开往冲突地区之前,国际社会一直没能就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达成一致意见。

自决权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道义原则。伍德罗·威尔逊在1919年认为它可以解决中欧问题,但实际上导致了更多问题的产生。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利用这一原则侵害了弱小国家。在当今世界,只有不到10%的国家属于单一族群国家,把自决权视为首要原则而不是次要原则,可能会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导致灾难性后果。

对今后来说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决定什么以及由谁来决定。在不同群体难以生活在一起的情势中,可能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决定内部事务之自主性。内部自决可以允许类似瑞士或比利时那样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自主性。如果保持这种宽松的纽带还不行的话,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安排友好的离婚,就像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1月1日和平地分裂成两个主权国家一样。但是,如果不极其小心地加以处理的话,有关自决的绝对要求很可能成为暴力之源。

总之,尽管简单、绝对的不干涉原则经常在实践中被违背,但是它依然很重要。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几种例外,必须根据具体个案以及考察动机、手段以及结果来加以判断。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伊拉克战争,本书后面将对此加以论述。

种族灭绝与"保护的责任"

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主权国家地位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在这一方面,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点像一个俱乐部:只有获得俱乐部其他成员的承认,你才可以成为俱乐部的一员。自从17世纪以来,成员标准一直处于演变之中。在过去,主权通常是防止外部干涉的屏障。而在今天,主权的此种作用已经不被那么强调。国际共同体的成员逐渐要求一国政府首先需要在其边界之内达到某些行为标准,然后别国才能遵循不干涉该国的原则。正如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报告所指出的国家主权意味着责任,国家承担着保护本

国人民的主要责任。"具体来说,"当一个群体由于内战、叛乱、镇压或者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 而遭受严重伤害,以及所在国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制止、避免此种伤害的时候,不干涉原则就让位于国际保护的责任" [8] 。

与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规范变迁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 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过去的失败所做出的反应。国际共同体在卢旺达爆发种族灭绝的时候袖手旁观,以及没有及时地干涉南斯拉夫,这些都导致了一种真正的羞耻感。这很像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简称《反对种族灭绝公约》) ,它是对世界未能阻止希特勒暴行和防止大屠杀而做出的反应。尽管保护的责任是一个相对较新出现的原则,但它尴尬地遭遇了与《反对种族灭绝公约》类似的命运。我们的确可以说,所有那些试图使和平、正义与安全国际化的善意努力,其中包括国际联盟的建立以及1928年签署的、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的《凯洛格—白里安条约》,都遭遇了一系列重大障碍:权力政治、自我利益以及搭便车问题。一般国家通常不愿意挑战大国。有的时候大国把防止国际共同体干涉盟友、仆从国或者卫星国的内部事务,视为自己的重大利益。国家常常担心,过快地同意授权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从而开创一个先例,这很可能在今后会被别国用来反对自己。不仅如此,和平、正义与安全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公共物品:由于它们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因此每个国家都希望让其他国家承担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费用。

《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所遇到的问题不只限于上述那些。该公约第二条对种族灭绝行为定义如下:"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1)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2)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3)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4)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成员生育;(5) 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 [9] 这个定义本身为国际共同体在面对暴行时的不作为,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例如,作恶方及其同情者会声称,受害者之所以成为打击对象,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族群、种族或者宗教认同。他们也可以说,那些被杀死或者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只是"间接伤害",而不是有意加害行动的受害者。他们还可以说,"全部或局部"意味着团体中的所有成员或者几乎是所有成员,而不是指团体中的一部分成员,尽管这部分成员的人数可能达到成千上万。即便一个个案非常符合上述定义,国际共同体也可能认为,鉴于正在进行外交努力,干涉行动不切实际或者时机不成熟。其结果是,在该公约通过40多年

之后,所有的国际指控都是以设立临时法庭的形式出现。这些临时法庭对种族灭绝行为提出指控,以及法庭判决本身让种族灭绝的界定得到扩展和细化(比如,强奸现在被从法律上界定为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种族灭绝行为),无疑都是重要的进步象征。然而,进步过程是极其缓慢的。

保护的责任(R2P)旨在克服某些上述局限性。它主张国家具有积极和主动地干预"大规模暴行"(mass atrocity,包括但不限于公约中所界定的种族灭绝行为)的义务。然而,虽然人们开始时对这个原则的期望很高,但是它迄今为止对国内冲突的影响却是很小的。

达尔富尔冲突是保护的责任(R2P)较早遇到的一个严峻挑战,其结果并不太令人感到鼓舞。自从2003年爆发冲突以来,可能已经有45万平民在苏丹西部这个省的族群冲突中丧生(各种死亡人数估计差别很大,苏丹政府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阿拉伯民兵组织(Janjaweed militia)杀害的,该组织得到苏丹政府的支持,尽管苏丹政府不承认这一点。迄今为止,美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主张把达尔富尔冲突定性为种族灭绝行为的国家,其他国家则不愿意这么做,担心因此承担采取行动的义务。国际共同体采取的唯一有力的反应措施,就是派遣一支非洲联盟维和部队,但该部队在人数、武器装备、训练以及指挥上都很弱,也没有得到保护平民的授权。与人们普遍的认识不同,保护的责任(R2P)只是把军事干涉当作最后的手段,但是批评者声称,如果连达尔富尔冲突都不能让国际社会采取果断的行动,那么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冲突会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2011年对利比亚内战进行的国际干涉更令人鼓舞,利比亚内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人民对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专制政权不满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反对卡扎菲政权的人控制了该国东部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西部的钱袋子,迫使卡扎菲政权发动进攻。卡扎菲政权凭借无法挑战的空中优势力量、强大的装甲部队,对反对派展开进攻并且不放过支持反对派的平民,预示着一场血腥大屠杀就要到来。正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安理会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果断与团结,它通过了1973号决议,以保护平民的目的在利比亚设立一个禁飞区。这是保护的责任(R2P)原则首次得到果断的实施。

1973号决议是否意味着国际共同体的态度发生重大的转变,愿意给予保护的责任(R2P)以强力支持?这还有待观察。该决议虽然把空中战斗任务视为合法的外国军事干涉行动,而且这些干涉行动成功地击溃了卡扎菲的空军,但是禁止向利比亚派遣外国地面部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利比亚的干涉行动属于一种折中的措施。也有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1973号决议并不意味着保护的责任(R2P)获得那么大的支持,而主要是因为某些成员国(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担心,假如它

们不同意建立禁飞区的话,那么更严重的流血冲突会导致要求采取更严厉的干涉措施,包括派遣地面部队,而它们既不会轻易地批准这样的外国军事干涉行动,也不愿意为阻止这样的干涉行动而行使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后来的确表达了对于"使命偏离"(mission creep) 的忧虑,担心使用对地攻击的战斗机打击装甲部队、后勤补给设施、指挥与控制中心、甚至卡扎菲的住所,认为它们超出了设立禁飞区的授权。

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变迁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且也不会是直线发展的。下一次再发生残暴的极权统治政权伤害其国民的暴力事件时,国际共同体可能会无所作为。然而,利比亚内战至少表明,我们不能再说保护的责任(R2P) 原则只是"保护的责任"。

后续阅读材料

1.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n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 pp.86—108.

2. Gareth J.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

当今热点

虽然世界上武装冲突的水平是很难被加以衡量的,但是有几个重要因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相比国际冲突,国内冲突一直是导致死亡、破坏以及流离失所的更重要原因。在冷战时期,国内冲突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而国际冲突的发生频率与激烈程度实际上略有下降。如果我们只看冷战后时期,那么我们会发现,国内冲突大大衰减,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比国际冲突严重得多的问题,后者实际上略有上升,但是水平很低。乔治·梅森大学全球政策中心所属的系统和平中心(The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使用"战争强度综合指

数"来反映这些趋势,见图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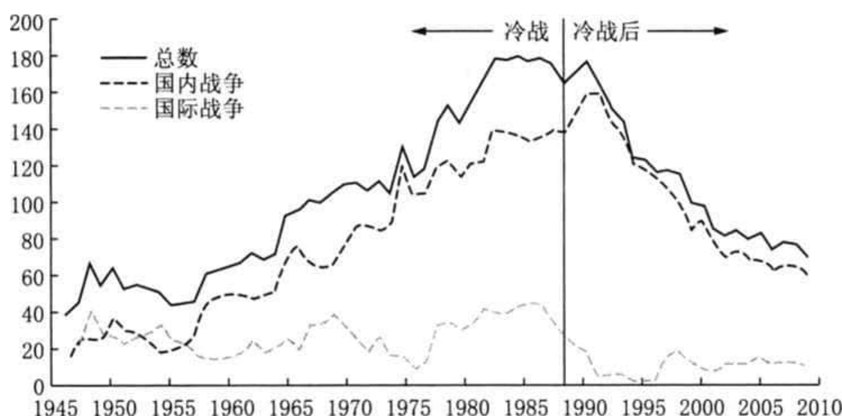


图6.3战争强度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系统和平中心,http:www.systemicpeace.org/conflict.html

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 曾经提出,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变得"过时了"。 [10] 假如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想象成本—收益计算会为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提供依据,那么米勒所言或许是对的。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国家,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是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前者特别希望维持一个拥有很多冲突管理手段的、和平的、井然有序的国际秩序,而后者则急于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应有地位。然而,历史表明,战争有时会由于那些难以用传统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来解释的原因而爆发。偶然事件、错误认知以及疏忽大意行为,常常都会引发战争。历史还表明,国家有时介入战争,并非完全出于工具理性方面的考虑,而是由于对象征性东西和理想的强烈追求,或者出于其他无形的考虑。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为世界已经比较好地解决国家间战争问题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不可声称国家间战争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了,特别是因为当今一些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与其邻国存在着严重的争端。

国家间的战争并非到处都可能发生。很多人可能认为,在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和平群岛"或安全共同体中,国家间的战争就基本上不可能发生。这些地方包括: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美以及澳大利亚。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脆弱不堪、支离破碎或者深陷国内暴力之中,国家间的战争几乎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各个"热点"地区爆发战争的危险很严重,那些充分武装、长期争执的国家相互对峙,国际危机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由于某些尚不完全清楚的

原因,这些热点分布于亚洲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包括伊朗、克什米尔、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朝鲜半岛,但中东是一个最为复杂、历史最长的热点。

中东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东或许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地区冲突舞台。它特别符合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即便如此,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该地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冲突频繁发生?民族主义、宗教和均势政治各自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1980—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伊拉克入侵比自己大的邻国呢?一个原因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声称对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整个水道拥有控制权。但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国王统治之后,伊朗处于纷争之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借此时机发动进攻。而且,革命后的伊朗给伊拉克国内制造了难题。伊拉克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萨达姆·侯赛因是世俗的国家元首。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鼓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起来反对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侯赛因杀死了很多伊拉克什叶派领袖,使得这种跨越国界的宗教煽动行为遭到了失败。然而,伊拉克也犯了判断上的错误。虽然伊朗人不属于阿拉伯人,但在靠近伊拉克的伊朗领土上生活着很多讲阿拉伯语的人,他们在伊朗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伊拉克人认为,生活在伊朗的讲阿拉伯语的人会以对待解放者的态度欢迎伊拉克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伊拉克的进攻促使伊朗人团结起来。

在这样的误判之后,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战事,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所期望的一场时间很短和对伊拉克有利的战争。伊拉克人很想脱身,但伊朗人紧紧抱住伊拉克人不放。伊朗遭受了伊拉克的攻击,它不愿意让伊拉克人想走就走。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宣称,只要萨达姆·侯赛因不下台,伊朗就不会停战。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件。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因为它们更害怕伊朗的革命政权。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叙利亚是个世俗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伊拉克,但是它却出于均势的考虑,站在伊朗的一边。叙利亚担心毗邻的伊拉克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不那么担心离自己较远的伊朗。

局外国家也表明了立场。美国担心伊朗力量的增强,所以向伊拉克提供秘密援助。尽管伊朗原教旨主义者号召消灭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暗地里把美国造的武器运往伊朗。以色列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以色列对伊朗和伊拉克都很担心,但是伊拉克是一个离得较近的威胁源,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援助。因此,这场战争是由错误的判断而引发的,战争的根源在于宗教、民族主义因素以及个人野心,均势的考虑进一步促使它成为一场很难解决的、持续将近十年的冲突。

民族主义是如何引起战争的呢?民族主义不只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 的词,它也是一个规定性(prescriptive) 的词。如果一个词既具描述性,又具规定性,那么它就会成为政治词汇,被应用于权力斗争之中。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中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因此,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主张,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如果一个群体可以让其他人承认它是一个民族,那么它就可以要求获得民族的权力,并以此反对自己的敌人。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成功地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认定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racism) 。阿拉伯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剥夺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合法性。种族主义者是一个很不好的名称,而民族主义者则基本上是一个好的称谓。宣称以色列人不是一个民族,实际上就是把言词当作武器来加以使用,以剥夺其合法性和削弱其软权力。

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宗教可以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基础。而且毫无疑问,宗教基础可以使得不属于该宗教的少数人更难以分享这种民族认同。以色列境内穆斯林所处的地位比犹太人要低,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教徒所处的地位比穆斯林要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用宗教来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群体就是种族主义者。联合国大会最后在1991年通过第二次投票,废除了上述那项决议。

在18世纪的时候,民族主义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民族主义主张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呢?建构主义者指出,人类的效忠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上,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下,而且这些效忠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正常的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人们的效忠目标就会发生变化。民族的理念往往产生于正常生活模式受到极大破坏、处于文化边缘地带以及认同不明确的那部分人的头脑中。他们在自己的正常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便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民族主义主张通常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和宗教集团提出来的,例如19世纪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农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模式与效忠目标,他们所表述的有关新的认同的想法,渐渐地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导致民众形成新的认同的动力,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革命所推动的。中产阶级的兴起破坏了传统的政治与社会模式,新兴的政治集团希望法兰西不再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家,而是民族的国家、全体人民的国家。从外部的情况来看,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模式,促使德意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到19世纪中叶,同一个民族应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观念最后导致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并没有极力把讲德语的人都统一到一起,只是统一了那些普鲁士国王能够控制得了的德意志人。然而,他也利用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模式是颇为成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殖民帝国,而且在此后30年里,非殖民化运动成为亚洲和非洲的主导潮流。宗主国的社会已经受到战争的削弱,殖民地的精英们开始运用民族主义观念来反对正在摇摇欲坠的欧洲帝国。19世纪典型的国家是以语言和种族为基础的,如果这种模式还运用于后殖民地世界,那么它将导致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出现无数个微型国家。然而,后殖民时代的精英主张国家拥有缔造民族的权力,反对与此相反的19世纪模式。当地领导人声称,他们需要利用殖民主义者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如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把那些较小的部落群体塑造成为一个民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即民族缔造国家和国家缔造民族,同样都可以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可以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认同是社会建构的。(即便是在法国这个似乎为"民族缔造国家"的个案中,国家也利用教育和警察,使布里塔尼这样的落后地区就范。)

在早期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的浪漫时代里,那些"泛"运动之间的差别被成功地掩盖了起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在欧洲兴起,它声称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具有一样的认同。在当代,中东有泛阿拉伯主义,非洲有泛非主义。早期反对异族统治的人宣称,由于殖民地人民都遭受外来殖民者的压迫,所以他们应该组成泛非或者泛阿拉伯民族。然而,他们在获得解放或者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开始面临建立政权这个实际问题,并且发现政权运转需要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这些手段。而且这些手段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泛"的基础,而是根据殖民主义者人为划定的边界。所以,随着浪漫主义情感的消退,以国家为基础的认同开始取代以"泛"运动为基础的认同。尽管如此,"泛"运动的浪漫主义情感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依然存在着。

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中东曾经出现过奇

特的情势:某些国家突然宣布组成一个国家联盟,比如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或者利比亚和摩洛哥这两个差别极大的国家在1989年 [*] 宣布成立国家联盟。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国家的力量在与泛民族主义运动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这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还远没有完结。在大部分后殖民国家中,由于经济变革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出现,正常的生活模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政治领导人极力控制这种后殖民时代的不满情绪。一些人借用民族主义的感召力,另一些人借用泛阿拉伯主义的感召力,还有一些人借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感召力。它们一起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冲突。该地区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失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人转向了原教旨主义和基地组织所推动的恐怖主义。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结果是,在两个声称具有不同的民族认同和争夺一块弹丸之地的群体之间发生了8次战争。以色列声称,早在《圣经》问世的时代,那块地方就属于犹太人,它后来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才为罗马人所占据。以色列人还援引在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事情,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了《贝尔福宣言》,即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罗思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 ,表示英国将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而努力。以色列人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希特勒的大屠杀表明,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1948年,犹太定居者同意接受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反对这么做。联合国承认了新建立的犹太人国家,但是以色列人不得不为了阻止阿拉伯人的联合攻击、维护国家的生存而斗争。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国的存在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正当的。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反驳说,他们也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90%的居民是阿拉伯人。直到1932年的时候,仍然有80%的当地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宣称,英国没有权利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来向犹太人做出承诺。阿拉伯人进一步指出,大屠杀的确是历史上一个大污点,但犯下这个罪行的是欧洲人。为什么阿拉伯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呢?

巴勒斯坦走向分治

> 大英帝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且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促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英国政府十分清楚,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益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亦不应损害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
> ——《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双方的观点看上去都有道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今日巴勒斯坦的那块地方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那时的奥斯曼帝国同德国结盟。奥斯曼帝国在战败之后便瓦解了,其阿拉伯领土成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法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把自己托管的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那块地方称为"巴勒斯坦",把其托管的约旦河以东的地方称为"外约旦"。

在20世纪2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很少,但在30年代,随着希特勒上台和欧洲反犹太主义势力的增长,犹太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36年的时候,40%的巴勒斯坦居民是犹太人,而且犹太移民导致阿拉伯居民发起暴动。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1939年5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英国需要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以对抗德国,所以英国向阿拉伯人许诺,它会限制犹太人移民。但是,英国的限制措施在战争结束之后很难实施。由于大屠杀,许多欧洲人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计划,而且大量犹太人悄悄地移居巴勒斯坦。除此之外,一些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当地的英国统治者。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印度的非殖民化(1947年英国宣布这个政策,1948年5月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大大衰落,它于是把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理。

1947年,联合国建议巴勒斯坦分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阿拉伯人当初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计划,那么他们的处境会更好一些,然而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这个计划,这导致在当地爆发了战争。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宣布建国,其阿拉伯邻居发动进攻,企图阻止巴勒斯坦分治。第一次阿以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个月。尽管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超过以色列人,占有40比1的优势,但他们的组织性很差,而且相互之间不团结。在实现停火和经过联合国的调停之后,约旦控制了被称为西岸的那个地区,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绝大部分处于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中,以色列控制的领土面积大大超过其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所能得到的领土。

这场战争致使大量巴勒斯坦人沦落为难民,这让阿拉伯人产生了耻辱

感,并且促使阿拉伯人普遍抵制有关永久和平的方案。阿拉伯人不愿意接受战争的结局,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们相信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阿拉伯领导人极力煽动泛阿拉伯主义情感,并且坚信阿拉伯人将在下一次战争中消灭以色列。事实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 1951年被刺杀,就是因为他当时努力与以色列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这使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更加难以达成和平协定。

第二次阿以战争发生于1956年。1952年,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和其他一些青年军官推翻了埃及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 的统治并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从苏联获得了军火,并且试图控制苏伊士运河——一条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商业运输通道。埃及派遣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骚扰性的攻击。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英国和法国不满纳赛尔在运河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担心他主宰中东,因而伙同以色列进攻埃及。然而,美国拒绝帮助英国,联合国通过决议以及派遣维和部队把冲突双方军队隔开,从而促使双方停火。但是双方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

第三次阿以战争,也就是1967年的"六天战争",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今日的主要领土问题,它是今日中东问题的核心。纳赛尔和巴勒斯坦人继续用游击队的攻击行动来骚扰以色列人,而且埃及还关闭了蒂朗海峡,切断以色列通往红海的航线。纳赛尔并没有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但他看到叙利亚和以色列即将开战后,认为这正是埃及介入战争的好时机。于是,纳赛尔请求联合国从埃及边境撤走维和部队。以色列看到纳赛尔正在准备战争,便决定先发制人。以色列摧毁了埃及地面上的战斗机,紧接着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约旦的西岸地区(见图6.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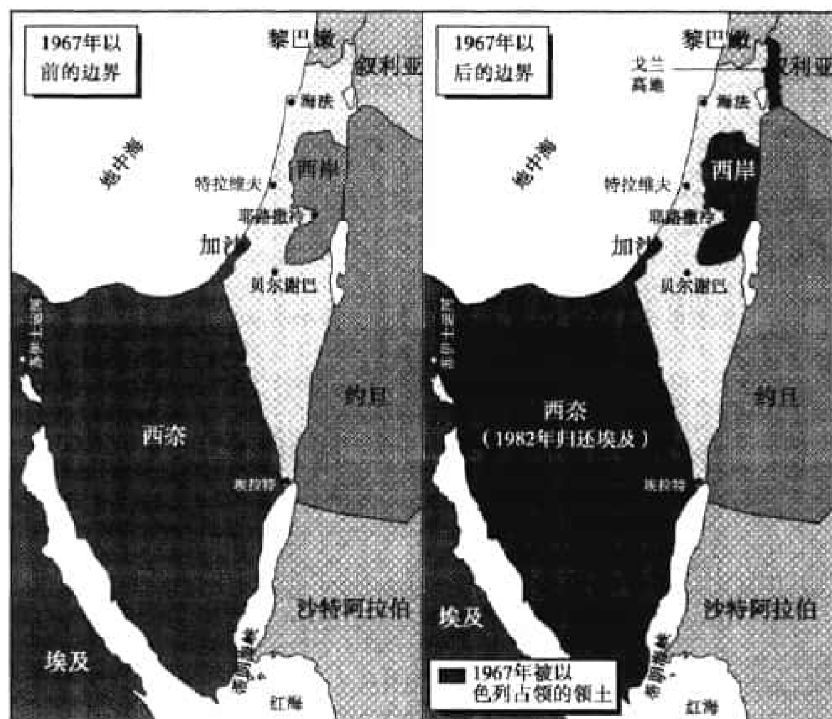


图6.4 1967年以前和1967年以后的以色列边界

超级大国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迫使交战双方同意停火。1967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领土上撤退,换取中东实现和平和以色列获得承认。但是第242号决议有意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该决议的某些语种的文本没有提"所有的领土",而只是提"领土",这意味着某些领土可以不必归还。在决议中,有关巴勒斯坦人地位的表述也是模棱两可的,巴勒斯坦人不被视为一个民族,而是被当作难民。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

第四次阿以战争,即消耗战,其重要性较小。在1969年到1970年间,纳赛尔得到苏联的帮助,策划了一些横渡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的骚扰行动。这些行动引发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一系列空战。最后,空战逐渐陷入一个僵持的局面。

第五次阿以战争就是1973年10月的斋月战争(Yom Kippur War)。纳赛尔去世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埃及无法消灭以色列。萨达特认为,在采取旨在实现和平的和解行动之前,应该取得某种心理上的胜利。所以,他决定埃及军队越过运河,对

以色列发动攻击,但是不收复整个西奈半岛。萨达特同叙利亚人合谋,发动了一次颇为成功的突然袭击。在战争的初期,埃及人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以色列人后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超级大国再次介入,呼吁双方停火。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飞赴莫斯科,然而以色列军队就在这个时候包围了埃及的军队。苏联人感到受骗了,于是在苏联南部集结军队,并且致信美国政府,建议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出兵干涉。美国以宣布其核力量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相回应,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这个举动让苏联感到困惑。不管怎么说,苏联放弃了共同出兵的主张。以色列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也有所让步,给埃及军队留了一条生路。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有关各方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美国同以色列达成了以军撤出部分领土的协议。联合国观察员也进驻西奈和戈兰高地。但是,这场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却姗姗来迟,萨达特在1977年访问以色列,宣布埃及准备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年和1979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且达成了协议。根据《戴维营协定》,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双方就西岸实现自治进行对话。该协定意味着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脱离了反对以色列的同盟,埃及的民族主义在与泛阿拉伯主义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萨达特瓦解了泛阿拉伯同盟,但是他在几年之后遭到反对其政策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

第六次阿以战争是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最初的时候,黎巴嫩处于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两种力量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该国的穆斯林又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这三种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基地设在黎巴嫩,黎巴嫩的基督徒也分裂为很多派系。黎巴嫩这个真正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中东的一个安宁的天堂。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四分五裂,陷入内战之中,给外来干涉提供了机会。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的北部,以色列则在1978年入侵黎巴嫩南部,占领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

1982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他首先宣称,以色列军队要进入黎巴嫩领土25英里以内的地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但实际上以军挺进的距离要远得多,而且还围困贝鲁特长达10个星期。以军对贝鲁特的围困,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贝鲁特,黎巴嫩基督教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然而,杰马耶勒很快遭到暗杀,这项和约也流产了,黎巴嫩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985年,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大部分黎巴嫩领土上撤退,但仍然占据其南部的一个缓冲地带,最后于2000年从这里撤退。但在2007年,以色列和黎巴嫩政治与准军

事组织真主党(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 再次于黎巴嫩交火,这也是第七次中东战争。2008年,以色列进攻另外一个巴勒斯坦人组织,即激进组织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 ,第八次中东战争在加沙地带发生。

中东最近的暴力冲突历史表明,族群、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根源如何使得地区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和难以解决。双方的强硬派人士使对方态度更加强硬。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能很快地提出和平的倡议,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这样反过来又增强了以色列那些反对同阿拉伯人媾和的强硬派在国内的地位。极端主义者实际上结成了一个跨国同盟,它使得那些试图达成妥协方案的温和派人士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萨达特在1973年和1977年冒险采取了行动,但最后把自己的性命给断送了。十多年之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 也因为冒险采取和平行动而被犹太宗教极端分子所暗杀。在这样一个极端的世界中,双方很难相互信任和进行合作,尤其是在争夺私有物品(比如领土)的冲突之中,双方更难相互信任和进行合作,因为你可能还记得,私有物品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

在两极冷战时期,中东的战争持续时很短,其部分原因在于超级大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每个超级大国都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方面,超级大国在看到自己可能被盟友拖向核战争边缘的时候,又把各自的盟友拉了回来。也就是说,停火的压力是来自外部的。1956年,美国通过联合国施加了停火的压力;1967年,美国和苏联利用热线达成了停火的安排;1973年,美国和苏联介入冲突;1982年,美国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退。虽然在很多事件中,冷战加剧了地区冲突,但是冷战也给地区冲突设置了一个安全网。

阿以冲突呈现出我们在全球层面上所观察到的冲突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从国际冲突到国内冲突的转移,从常规军事冲突到非常规冲突(叛乱与反叛乱) 的转移。以色列武装部队与邻国军队之间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是发生在将近30年前。然而,真正的和平一直没有来到该地区。单单是在过去10年里,就已经有超过8000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由于发生在以色列以及被占领领土上的政治暴力行动而丧失生命(见图6.5) ,它是从2003年以来在伊拉克丧生的美国人数量的两倍。由于以色列国防军(IDF) 在组织和火力上占据优势地位,所以丧生的巴勒斯坦人多于丧生的以色列人,但双方其实都很脆弱。在不对称冲突中,较弱的一方经常采取非常规的伤害对方的手段,巴勒斯坦人的确常常使用诸如自杀式爆炸这样的手段,特别是在第二次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 中,他们常常这么做。从2000年到2007年,超过500人(大多是以色列平民) 死于140起自杀性攻击。2002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年头,有220人死于55起自杀性攻击,这促使以色列开始修建一个物理屏

障,以防止攻击者从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进入以色列以及被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这个屏障通常被以色列人称为"安全篱笆",而巴勒斯坦人则经常说它是"隔离墙",它有效地阻止自杀性攻击,但是也给那些来往于两边(因为居住或工作)的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不仅如此,该屏障由于其走向同1949年的停火线或者"绿线"(这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以色列合法的边界线)不完全一致而饱受争议:这个屏障把大约12%的西岸地区划到了以色列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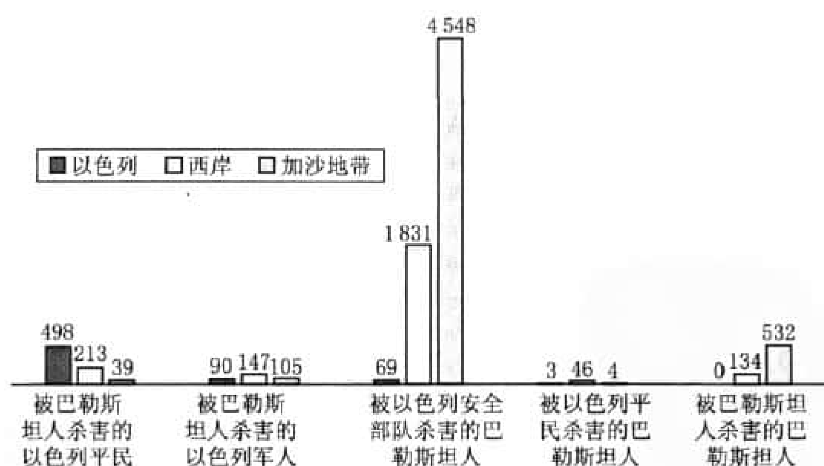


图6.5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丧生人数(2011年9月29日一2011年5月31日)

资料来源:以色列人权组织 B'Tselem,http://old. btselem. org/statistics/Casualties. Asp。

阿以冲突之所以如此棘手,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它属于一个争夺私有物品(即领土)的冲突。主权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拥有领土则是主权国家的一个核心特征。尽管一些国家(以及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如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承认以色列的,以色列也是联合国成员国之一。然而,巴勒斯坦迄今还不是联合国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阿以之间的持久和平只能有赖于"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虽然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尚未得以实施,但是一些事态发展表明,这个解决方案是有可能被实施的。其中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或许就是《奥斯陆协议》,该协议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政府于1993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原则声明》。此后,

双方又达成了有关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城镇与村庄撤军的一系列协议。经过这些谈判,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并且把当地自治权,包括警察治安权,移交给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此同时,约旦国王侯赛因(King Hussein) 与以色列拉宾政府就双方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举行了谈判,并且于1994年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一项和约。

200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场十分重要的非正式谈判,并且达成一个更为全面的和平方案。这个被称为《日内瓦协议》的非正式方案,继承了原先达成的各种共识与建议,甚至还往前迈了一步,即解决了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人定居点以及1948年逃离的巴勒斯坦难民家庭的有限"回迁权利"等等难题。虽然这个协议没有法律地位,但是它表明双方的有识之士可以就最棘手的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不顾以色列政府的强烈抗议,会见了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双方代表。不只一个观察家指出过,这个事件说明,制定一个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solution) ,比寻找一条实现这一方案的道路(way) 要容易一些。

自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2004年11月去世之后,部分由于巴勒斯坦人内部的深刻分歧,巴以和平进程处于停滞状态。在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 于2005年夏天从加沙撤出以色列军队之后不久,哈马斯开始填补真空,使得巴勒斯坦领导层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阿拉法特的继承人、法塔赫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as) 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设在西岸,越来越务实。另一方是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权,它很好战,也不灵活。法塔赫和哈马斯曾经分别于2007年和2011年两度试图弥合分歧。2007年的那次努力只是短暂的,而2011年开始的第二次努力的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显而易见,务实与教条两个派别相互竞争、试图左右巴勒斯坦国家的愿景这一事实,使得"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变得很困难。



2010年9月,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会见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阿以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吗?以色列渴望自己作为一个犹太国家(指事实上的犹太国家,而不是法律上的犹太国家,以色列没有一个正式的宪法,其基本法实际上并没有把以色列定义为一个犹太国家）在安全的边界内生存之权利得到承认。至于以色列可以接受什么样的边界线,这是一个在国内具有极大争议的问题。以色列还坚持保留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完全控制被犹太教徒视为圣地的旧城(Old City）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最低要求是,让那些由于1948年和1967年战争而被迫离开家园、幸存的第一代难民以及第一代难民的后代们回归故里,他们还坚持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巴勒斯坦人也坚持自己要完全控制被伊斯兰教徒视为圣地的旧城地区,尽管旧城中的某些地方属于犹太教圣地。也许在耶路撒冷以及圣地之类的问题上可以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比如主权共享或主权重合(实际上是把私有物品变成双方一起管理的共有物品）,其前提是两边的温和派占上风。

为了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以色列必须解决其与叙利亚间长期存在的戈兰高地争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一直占领着的戈兰高地；双方需要就西岸及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定居点问题达成可以被接受的协议；有关各方要谈判解决长期存在着的以色列与叙利亚、约旦以及巴勒斯坦共享和管理稀缺的水资源问题,该问题几十年来导致相互埋怨与不信任。真希望未来会出现奇迹,让阿以冲突成为世界上不再棘手的问题之一！

1991年和2003年的波斯湾地区冲突

我们在前面看到,外部大国有时卷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去,但大国的介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直接和非正式的。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分别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但没有直接卷入当地冲突之中,其原因有二。第一,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卷入一场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冲突之中。第二,鉴于越南战争的记忆还没有消失,美国不想在海外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苏联同样也因为已经在阿富汗打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而不想在中东地区介入一场大的军事冲突。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对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成为一个新的模式(见图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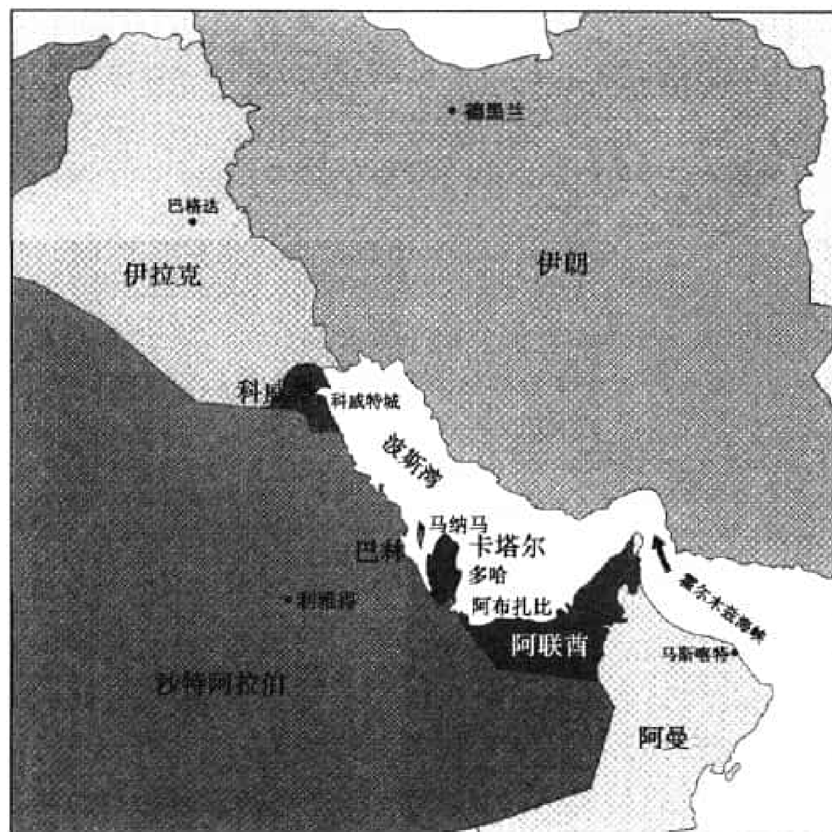


图6.6波斯湾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对科威特的入侵,第一次海湾危机从此开始了。伊拉克一直声称,科威特是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国家,它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国家。1961年,伊拉克企图占领科威特,但在英国的威慑之下,伊拉克没有实现其目标。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的,有关殖民地边界毫无意义的观念,给很多后殖民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联合国会员国都不赞同伊拉克的辩解。

每一个个案都有较为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使得伊拉克在经济上受到了极大冲击。伊拉克的债务高达800亿美元,而且还以每年1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伊拉克的邻居科威特则是一座金矿,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稀少的人口。而且,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石油政策也极为不满。伊拉克声称,科威特没有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协议,每一桶石油的价格下降1美元,伊拉克每年就要损失10亿美元。因此,占领科威特似乎可以解决伊拉克的经济难题。

在政治上,萨达姆·侯赛因也担忧伊拉克的安全。在他看来,谁都想搞垮他的国家。不管怎么说,以色列曾经在1981年轰炸过伊拉克的核研究反应堆,而且随着苏联的衰落,美国和以色列似乎日益强大。萨达姆于1990年2月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次讲演中指出,苏联正在衰落,它不再具有遏制美国和以色列的能力。萨达姆认为,他不得不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试探美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绥靖政策,试图把他拉回到负责任的国家共同体之中,并把伊拉克当作在中东平衡伊朗势力的一个筹码。美国前后不一致的政策对萨达姆·侯赛因起了误导作用,萨达姆·侯赛因相信自己可以侵略科威特,而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然而,萨达姆错了。联合国依据集体安全原则,通过了一系列反对伊拉克的决议。为什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石油。对美国和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石油出口,使得海湾地区变得极其重要。然而除了石油外,1990年的海湾危机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英国虽然并没有从海湾进口任何石油,但却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很多国家关心集体安全问题,忘不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侵略行为未能被及时制止的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即进行预防性战争。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秘密地从国外进口了相关材料,以实施一个核武器计划,他已经拥有化学武器,而且还在研制生物武器。假如让伊拉克占有科威特并获取其石油收入的话,那么世界今后将面对一个国土面积更大、实力更强、更具有破坏力的伊拉克。一些人认为,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晚打不如早打。

也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战争手段,因为经济制裁就可以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我们很难证明这个反事实推理的假定是否正确,但是历史上的制裁措施很少在短期内取得预期效果。1990年11月,即海湾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不在最后一刻宣布撤军或者采取其他策略,从而解救自己呢?部分原因在于他的错误判断,正如他在1990年8月对美国大使说,美国人承受不了很多的人员伤亡,不愿意介入一场时间拖得很长的战争。如此说来,萨达姆成为了越战经验的受害人。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萨达姆的自负心理,他无法退出自己所处的世界舞台中心。

1991年的海湾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这场战争虽然使联合国集体安全原则一度得到复兴,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提出了一些有关这场冲突是否具有典型性的问题。这场战争的停火开创了一个先例,即由联合国核查人员视察伊拉克并摧毁伊拉克的核武器与化学武器设施。但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没有被推翻。乔治·H.W.布什(George H. W.Bush) 总统决定不占领巴格达,因为他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可能会被自己的民众撵下台,而且也担心美国民众和联合国授权的多国同盟不允许对伊拉克实施代价高昂的占领。

10年之后,美国新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在当政初期推行现实主义对外政策,重视发展与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大国关系。布什批评克林顿政府卷入中东和平进程之中,明确表明他将对中东冲突采取脱身的政策。8个月之后,随着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布什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反恐成为了布什政府的工作重心。

在阿富汗,从2001年10月至该年11月,美国空军和特种部队改变了内战的局势。美国的军事干预帮助北方联盟推翻了塔利班原教旨主义政权,因为后者为"9·11"恐怖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罪魁祸首——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恐怖组织——提供庇护。美国的行动得到了北约盟国的广泛支持,并获得了联合国决议的授权。

然而,在2002年,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所获得的国际支持开始减少。美国把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是很多国家认为美国把入侵视为"预防性战争"选择,因为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并非迫在眉睫。2002年9月,在布什发表演讲、呼吁联合国执行过去安理会针对伊拉克通过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萨达姆·侯赛因积极配合国际核查人员的工作,证明自己遵守安理会10年前通过的、要求伊拉克放弃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决议。在萨达姆的允许之下,国际核查人在离开伊拉克4年之后第一次回到该国。与此同时,美国在邻近伊拉克的科威特、卡塔尔集结大批军队,美国国会也通过决议授权对萨达姆·侯赛因使用武力。核查人员分别于2002年12月

和2003年2月报告说,伊拉克部分而非完全遵守相关决议,并要求更多的时间以完成核查工作。布什政府考虑到炎热的天气以及军队的准备情况,认为再拖延时间会延误战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授权进攻伊拉克决议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连同少数几个盟友,声称安理会过去的决议已经为进攻伊拉克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于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在3个半星期之后,巴格达被占领,萨达姆本人逃亡。

但事实证明,赢得战争比赢得和平要容易得多。虽然对伊拉克的占领在刚开始的时候受到一些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地区居民的欢迎,但很多原先的逊尼派统治集团和某些什叶派人士发动了抵抗占领军的起义。一些外国的恐怖主义者,比如出生在约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伯·阿·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 ,越界进入伊拉克继续其针对美国的、激进的圣战事业。布什政府没有计划好派遣足够的军队,应对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出现的抢劫事件或者随入侵而来的起义。后来发生的暴力事件延缓了伊拉克的重建步伐,而伊拉克的重建有助于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增加软权力。此外,由于没能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很多国家认为入侵伊拉克的行动缺少合法性。其结果是,有关国家参与伊拉克重建的程度很有限。

由于核查人员在战后没能找到任何一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软权力受到损害。在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的三个理由中,有两个理由,即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萨达姆与"9·11"事件有关联,被事实证明是建立在虚假情报和政治夸张基础之上。最后只剩下第三个战争理由,即希望推翻萨达姆的野蛮独裁政权,将导致建立起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从而开启中东的民主变革。伊拉克在2005年举行了三轮选举,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在存在着族群和宗教分裂、制度不健全、共同体观念不强、少数族群不愿意默许主体族群统治的社会中,选举本身不足以产生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尽管可能还需要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判断伊拉克战争的效果,民意调查表明很多美国人认为代价大于收益。不管最初动机是什么,美国未能仔细地寻找合适的手段,导致了负面的结果。鉴于伊拉克混乱局面的加深和伤亡人数的增多,以及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政治压力和民众压力,布什政府在2007年初改变了战略。所谓的"增兵战略"(Surge Strategy) 导致增派2.2万名士兵到伊拉克,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2008年反叛乱的军事态势,但是并没有导致防止主要派别之间暴力冲突所必需的政治妥协。到了2009年,当地冲突水平有所下降,奥巴马总统认为已经可以从伊拉克城市撤出美国军队、裁减驻伊拉克美军以及把重点转向在阿富汗进行打击塔利班叛乱的多国战争。

中东地区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上的动因,

而我们在其他冲突中已经了解到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在个人层次上,阿拉法特、拉宾、沙龙、萨达特、侯赛因国王以及萨达姆这些个人决定着走向战争或缔造和平。恐怖主义者和刺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地区国家通常的行为方式是与现实主义模式相吻合的——在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追求权力和安全,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连同个人和非国家行为体,也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宗教、族群性、经济落后以及人口压力等问题,使得中东政治动荡不定。中东地区独裁政府的权威面临着极端势力的挑战,很多这样的挑战可能发展成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那样的内战。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中东地区发生冲突。

阿以冲突大事年表

1897 年	赫泽尔(Herzl)的《犹太人的国家》出版;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
1915 年	麦克马洪—谢里夫·侯赛因协议导致阿拉伯人起来反对土耳其人,换取英国人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1916 年	有关在中东建立英法势力范围的赛克斯—皮科特秘密协议
1917 年	《贝尔福宣言》表明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英国政府十分清楚,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益和宗教权力受到损害"
1922 年	英国从国际联盟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权
1936 年	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联合所有的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主张
1937 年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发动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三: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英国管理的地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

会通过一项计划，泛阿拉伯会议反对这项计划

1939 年	英国政府的白皮书表示要在 10 年之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
1945 年	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建立阿拉伯联盟
1947 年	英国政府把巴勒斯坦争端移交联合国；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表决，决定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由联合国托管；犹太人接受联合国分治计划，但是阿拉伯人反对
1948 年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爆发战乱；英国的托管权力终结；戴维·本古里安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以色列国；美国和苏联承认以色列国
1948—1949 年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盟的战争
1949 年	以色列加入联合国
1952 年	埃及的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起义
1955 年	苏联和埃及达成军火交易协议；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成员包括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1956 年	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色列军队入侵西奈；英国和法国对埃及进行轰炸并向苏伊士运河区投放伞兵
1957 年	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总统获得国会的授权，在发生共产党人入侵中东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出兵干涉
1958 年	伊拉克反对君王统治的起义；黎巴嫩和约旦危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登陆
1964 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1967 年	“六天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加沙地带、西岸和戈兰高地；联合国第 242 号决议，呼吁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通过谈判确定永久性边界，实现中东和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只被视为“难民”问题
1969 年	消耗战争
1970 年	约旦“黑色九月”：约旦军队把巴勒斯坦人的指挥机关逐出约旦；纳赛尔去世；安瓦尔·萨达特就任埃及总统
1973 年	1973 年十月/斋月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
1973—1974 年	阿拉伯石油禁运
1974 年	以色列同埃及、叙利亚达成军队脱离接触协议
1975 年	以色列和埃及达成《西奈协定》，决定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
1977 年	埃及总统萨达特成为第一位承认以色列和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发表讲演的阿拉伯领导人
1978 年	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在戴维营举行首脑会晤

1979年	伊朗革命的高潮：伊朗国王被追流亡，阿亚图拉·霍梅尼作为伊朗新的领导人回到德黑兰；埃以和约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伊朗人占领美国大使馆，美国使馆人员成为人质；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0年	卡特主义：美国将使用武力抵制苏联在波斯湾的侵略行动；伊拉克军队侵入伊朗领土；两伊战争开始；伊拉克入侵伊朗
1981年	萨达特在开罗遇刺
1982年	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
1983年	多国维和部队到达贝鲁特；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营地受到攻击
1987年	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起义
1988年	约旦国王侯赛因宣布约旦放弃对西岸的主权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在西岸和加沙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990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拉克的决议
1991年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逐出科威特
1991—1992年	阿以在马德里和华盛顿特区举行和谈
1993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奥斯陆会谈和《原则宣言》
1994年	约旦—以色列和约在华盛顿特区签署；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达成关于巴勒斯坦人管理加沙和杰里科的协议
1995年	拉宾在特拉维夫遇刺
1996年	以色列城市的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使得拉宾在工党的继承人佩雷斯的支持率下降，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
1997年	以色列把西岸城市希伯伦的80%归还给巴勒斯坦人
1998年	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瓦伊河协定》，以色列再把13%的西岸土地归还巴勒斯坦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加沙的巴勒斯坦议会发表讲演
1999年	约旦国王侯赛因去世；工党领袖巴拉克当选以色列总理
2000年	戴维营谈判失败；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Intifada)爆发
2001年	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
2002年	以色列重新占领西岸与加沙的城镇，并且开始在西岸和以色列之间修建安全隔离墙；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城镇撤军
2003年	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公布三个阶段的“路线图”，要求在2005年结束以前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实现中东和平；阿拉法特任命阿巴斯为总理；阿巴斯、沙龙和布什于当年6月在约旦举行和谈；在停火协议被破坏以及谈判失败后，阿巴斯辞职；美国入侵伊拉克并在3个星期中击败萨达姆·侯赛因，

	但面对持续不断的抵抗和内战
2004 年	阿拉法特去世;阿巴斯成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
2005 年	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
2006 年	沙龙因为一次严重的中风而不能履行总理职务;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选举;奥尔默特及其领导的新党卡蒂马党在以色列选举中领先;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萨达姆被起诉、审判和绞死
2007 年	以色列轰炸叙利亚一个核设施;该年 11 月中东和平会议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召开;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军事冲突,最后导致哈马斯完全控制加沙地带,法塔赫被逐出加沙地带;美国在伊拉克增兵
2008 年	以色列关闭通往加沙地带的边境通道;以色列与哈马斯同意 6 个月的停火;以色列重新开放边界,只因为报复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攻击而关闭边界;在 6 月停火协议到期 8 天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空袭
2009 年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入侵;以色列和哈马斯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声称取得胜利;利库德领导人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宣誓出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宣布需要建立巴勒斯坦国,并且停止定居点建设;美国军队开始从伊拉克城市撤军并把安全任务移交给伊拉克警察;美国在阿富汗增兵
2010 年	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战斗任务结束
2011 年	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发生“阿拉伯之春”起义;在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摩洛哥、阿曼、沙特阿拉伯发生抗议活动;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利比亚内战;法塔赫—哈马斯和解协定;卡扎菲被杀;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

伊朗成为核国家?

我们往东看,伊朗是另外一个很严重的热点地区,尽管伊朗问题的严重性主要不是因为一个持续存在着的争端,而是由于伊朗的核野心可能在未来导致冲突。

伊朗人口超过7700万人(在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和土耳其),其国土面积仅次于本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因此,伊朗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它有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国家的潜力。首先,伊朗战略地位很重要,它

位于波斯湾的东面并且控制着出入波斯湾的唯一狭窄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其次,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0%,仅次于沙特和加拿大。再次,伊朗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弹道导弹项目,大体上有能力打击中东地区的任何一个目标。

伊朗长期以来被承认为一个重要国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得到西方的青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Shah Mohammed Reza Pahlavi)统治下的伊朗,获得美国的巨额援助和投资,成为美国坚定的反共盟友。然而,伊朗改革家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在1951年当选总理,他宣布伊朗石油资源国有化。英国和美国对此深感震惊,并策划迫使他下台,此后巴列维国王对伊朗实施日益专制的统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政权,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当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人质(长达一年)之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急速恶化。美国部分出于应对这些戏剧性事态的发展,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由于美国的此种举动,再加上美国支持以色列以及允许被废黜的伊朗国王赴美就医,伊朗人给美国起了个"大撒旦"的绰号。

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不同寻常的敌视态度,在过去30年中一直都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都在积极实施一项核计划,而且官方声明它是为了和平和民用的目的。然而,极端反以色列和反美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2005年当选总统这件事敲响了警钟。虽然有关伊朗核项目的情报不太令人满意,但是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谈判与制裁,来抑制伊朗的核野心。

伊朗的核野心到底是会衰退,还是发展成为一场很大的国际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同时使用硬权力与软权力加以应对。硬权力形式包括以威胁进行威慑、经济制裁,许诺奖励好行为。软权力形式则是,试图吸引那些日益对高压神权统治不满的伊朗民众。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建议同伊朗领导人进行"无条件的"会晤,寻求打开接触与对话的渠道。奥巴马伸出橄榄枝,它在伊朗民众中的反响显然很好,但却让德黑兰政府感到难堪,因为有关美国威胁迫使伊朗政府抵制改革的说法因此不成立了。2009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一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中击败温和的改革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seinMousavi),并引发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这可能是自由民主理念的软权力发挥作用的证据,这种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软权力资源——技术——的支撑。比如,一种软件程序,即赛风(Psiphon),能够让普通伊朗人突破官方网络审查,获得有关

抗议活动的外国新闻。然而,伊朗政府成功地镇压了"绿色革命",它在短期内导致伊朗政府重新无视国际共同体对伊朗核计划的忧虑,并采取新一轮的、武断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伊朗护卫舰以及补给船在2011年通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把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解读为一个重大挑衅行为。

大事年表:伊朗核计划

1957 年　伊朗与美国在美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框架内,签署了民用核合作协定;美国向伊朗提供数公斤浓缩铀

1963 年　伊朗签署和审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1967 年　德黑兰核研究中心成立;美国提供 5.54 公斤的浓缩铀

1968 年　伊朗签署和审批《核不扩散条约》

1969 年　白宫宣布 1957 年《美国—伊朗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协定》延长 10 年

1975 年　德国 Kraftwerk Union 公司开始在伊朗的布舍尔修建 2 座核反应堆

1979 年　伊斯兰革命推翻国王统治;布舍尔核反应堆建设被停止;美国撤销对伊朗核计划的支持并停止向伊朗提供高浓缩铀;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伊朗核计划进展极其缓慢

1984 年　伊拉克—伊朗战争;布舍尔反应堆遭到伊拉克的多次轰炸

1989 年　阿亚图拉·霍梅尼去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开始重新启动核计划

2002 年　俄罗斯不顾国际上的反对,派遣专家重新修建布舍尔反应堆

2003 年　伊朗宣布在纳坦茨有核设施,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此后不久,伊朗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监视核设施的摄像头;法国、德国以及英国(欧盟三巨头)开始与伊朗谈判,以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2004 年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有关伊朗未能停止浓缩铀计划的决议;伊朗与欧盟三巨头达成一项协议,同意停止大部分的浓缩铀活动

2005 年　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打算恢复浓缩铀活动并开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些工厂所贴的封条;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出任总统

2006 年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告诉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伊朗有能力在 10 年之内生产出核武器;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伊朗在纳塔茨成功地提炼出浓缩铀;美国提议如果伊朗停止所有浓缩铀活动,它将与欧洲国家一道同伊朗就伊

朗核问题进行谈判;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1696号决议,这是第一个针对伊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其内容包括制裁威胁;艾哈迈迪-内贾德正式宣布在阿拉克建设重水生产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黑兰愿意接受华盛顿的邀请,与美国就地区问题进行谈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设施里新发现铀的迹象,并且认为该机构在缺少透明度和伊朗合作态度的情况下,不能保证伊朗会遵守安理会决议。

2007年 作为联合国第二轮制裁的组成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几乎减少一半对伊朗的援助

2008年 安理会通过1803号决议,对伊朗银行业以及某些军民两用项目的进口实施制裁;美国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建议与伊朗领导进行"无条件"的对话

2009年 在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在选举中击败改革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伊朗发生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奥巴马总统在八国集团(G8)峰会上表示,如果谈判无进展,那么将有"很严重后果"。

2010年 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第四轮制裁;美国和以色列被怀疑制造Stuxnet电脑蠕虫病毒,破坏应用于核离心机中的西门子控制系统

2011年 国际原子能机构声称已掌握伊朗研发核武器的证据;伊朗核科学家达里奥什·里扎-内贾德在德黑兰被骑摩托车的枪手打死。

印度与巴基斯坦

再往东就是当今世界上领土争端最白热化的地方:克什米尔冲突。这场冲突有三个主要的当事方,即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但冲突中两个最危险的轴心是印度与巴基斯坦。

英国在1947年从南亚撤退的时候,把原先自己统治的这个地区划分为两个国家。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区域被划入印度,而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地区被划入巴基斯坦(其中东巴基斯坦位于恒河三角洲,而西巴基斯坦则位于西邻阿富汗和伊朗、东靠印度的印度河流域)。然而,印巴分治的标准并不是十分清楚,某些领土就成为争端对象。其中最主要的争议地区就是克什米尔,它属于南亚次大陆遥远的西北部山区的一个"土邦"(a princely state)。克什米尔原先享有半自治地位,不愿意并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第一次印巴战争(1947—1948)源于对克什米尔控制权的争夺,但它却导致印度与巴基斯坦各自占领克什米尔的一部

分。中国也控制了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即高海拔、遥远、几乎无人居住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和印度曾在1962年为争夺这个地区打过一场短暂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印度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印巴战争发生在1965年,也是源于对克什米尔的争夺。在这个事件中,由于印度方面对巴基斯坦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有争议地区从事渗透活动没有做出果断的军事反应,巴基斯坦军方坚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克什米尔的印度占领区。然而,巴基斯坦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印度方面展开了强大的军事还击,甚至还把军事行动扩大到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双方停火之后,战事得以停止,两国同意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但是最终没能实现这一目标。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是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事。大约9000名巴基斯坦军人丧生,印度方面死亡人数为2500人。但与前两次战争不同,这次战争不是因为争夺克什米尔。它始于巴基斯坦的国内争端,最终发展成为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

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经成为核国家,因此今天的印巴冲突十分危险。印度率先研制核武器,它在1974年成功进行一次"和平的核爆炸",其主要目的在于威慑与印度有领土争端的中国。然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当时并没有让印度的核能力"武器化"。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始于1972年,即该国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失败之后,但它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才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印度在1998年进行一系列的核试验,紧接着巴基斯坦也进行了核试验,但是印度这么做的动机目前尚不清楚。印度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可能是想向中国(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一个核现代化项目)以及巴基斯坦(当时该国的核野心已经很清楚,而且成功试射一枚远程导弹)发出一个威慑信号;他也可能想为本国的远程导弹开发出一些有用的核弹头;或者他纯粹就是为了追求印度的大国地位。把这些动机综合起来考虑也完全说得通。巴基斯坦的反应很显然具有威慑性质,其核试验过于仓促,效果也不够好。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印巴对抗特别令人担忧。第一,两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导致冲突的错误认知与错误判断。比如,1999年的卡吉尔对抗便是两国在核试验之后陷入的一场冲突。换句话说,在这个事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被证明没有多大的威慑价值。第二,印度的核武库看上去处于文官的相对有效的控制之中,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则为军方直接控制,巴基斯坦军队具有高度政治化以及爱冒险的特点。第三,巴基斯坦缺少能够负责任地管控核武器的文化或历史。巴基斯坦首席核科学家A.Q.汗(A.Q. Khan)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扩散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该网络把巴基斯坦与利比亚、伊朗以及朝鲜联系在一起,可能世界上没

有另外一种人能够比A.Q.汗对全球防扩散事业造成更大损害的了。第四,印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而巴基斯坦却不是,巴基斯坦国内的很多人同情伊斯兰激进分子。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像"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主义团体最有可能染指核武器的途径,就是从巴基斯坦核武库得到流失的核武器。

国际上对印度与巴基斯坦成为核国家的反应是强有力的,尽管也有些矛盾。两个国家都因为违反核不扩散规范(尽管并不是因为违反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印巴都没有签署该条约)遭到严厉谴责和受到制裁。然而,两国最后都因为自己的越轨行为而得到丰厚的奖赏。乔治·W.布什总统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2006年3月达成一项协议,印度被免除美国法律对《核不扩散条约》非签字国的约束,可以从美国引进核技术。作为交换条件,印度同意开放其民用核设施,接受国际核查。美国也慷慨地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目的在于挽救该国的世俗民主制度,帮助巴基斯坦打击叛乱者。很显然,美国(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努力向印度与巴基斯坦军方提供技术支持,防止核武器被意外或者无意使用。然而,只要克什米尔问题没有得到持久或永久的解决,印巴核战争的可能性是根本不能消失的。

大事年表:克什米尔冲突

1947年	英国允许印度独立,划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查谟和克什米尔仍属于有争议地区;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战争;克什米尔土邦主主张并入印度,以获得印度的军事支持来应对巴基斯坦的渗透
1949年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交战于该年1月停止;实际控制线确立
1962年	中印边界战争
1965年	巴基斯坦对印控克什米尔发动秘密军事进攻;第二次印巴战争;经过3个星期的交火,在联合国调停下签署停火协议

1971 年　东巴基斯坦要求独立；巴基斯坦爆发内战；印度入侵东巴基斯坦以阻止难民涌入印度；东巴基斯坦宣布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

1972 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西姆拉协议》：双方表示要进行和平谈判

1974 年　巴基斯坦正式承认孟加拉国为独立国家；印度爆炸“和平”核装置

1989 年　在克什米尔河谷发生反对印度统治的武装抵抗运动；一些团体要求查谟和克什米尔独立，另外一些团体则主张查谟和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

1992 年　巴基斯坦宣布它已经掌握制造核武器的科学能力（实际上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获得此种能力）

1998 年　印度在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地区进行地下核试验；作为报复手段，巴基斯坦也进行核试验；美国对两国实施制裁

1999 年　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人员穿过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的卡吉尔地区；印度发动报复性的空中打击；穆沙拉夫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巴基斯坦政府

2001 年　武装分子攻击斯利那加的克什米尔议会，导致 38 人丧生；不明身份的人攻击新德里的印度议会，导致 14 人丧生；印度发动帕拉克拉姆行动，在克什米尔集结军队；双方在克什米尔的军事部署升级

2002 年　经过数个月断断续续的暴力冲突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始撤军

2003 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停火协定并恢复外交关系；德里和拉合尔之间的巴士交通得到恢复，这有助于缓解紧张关系

2006 年　乔治 · W. 布什签署法案，允许美国同印度进行民用核技术合作，以换取印度民用核设施接受国际核查

南中国海

再继续往东去,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热点就是南中国海。南中国海北邻中国、东靠菲律宾、西接越南、南抵马来西亚和文莱,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与经济意义的地区。三分之一的世界商船通过该海域。南中国海的捕鱼量占世界产量的将近8%。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或许可以满足全世界一年的消费。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南中国海的国际冲突是很严重的。第一,这个海域分布着很多所有权存在争议的岛屿、暗礁以及环礁。这些领土争端导致5个与南中国海相邻的国家,对该地区的海洋空间所提出的主权要求相互重叠。中国大陆和台湾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主权要求。第二,

卷入争端的国家表现出有意愿使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主张。第三,存在着产生严重的错误认知或者错误判断的很大可能性,这会导致并非想要的冲突。特别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在可能发生的任何一场严重地区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不确定性。美国政府一方面表明它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不站在任何一边,另一方面又主张根据《海洋法公约》南中国海属于国际水域,要求保证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与此同时,美国对菲律宾负有条约义务,也与越南保持友好关系,这可能会让菲越两国或者其中一个国家做出错误判断,认为它们在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因而做得太过分。中国方面也可能低估华盛顿抵制中国意图成为该地区主导国家的意愿,一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家已经表达了中国的此种目的。不仅如此,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政策只是在北京制定的。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处于驾驶员的位置。

由于意识到南中国海是一个火药桶,中国和东盟在2002年通过谈判发表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虽然并非解决领土或海洋争端问题,但是呼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采取可能使争端复杂化或升级的举动。然而,随着中国成为一个更加自信的海上强国,以及全球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高涨,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地区未来到底是冲突还是合作占上风,依然是个不确定的问题。

大事年表:南中国海

1976年*	中国从南越手中夺回西沙群岛
1988年	中国和越南在南沙的赤瓜礁发生小规模冲突,70名越南水兵丧生
1992年	越南谴责中国占领 Da Lac 礁(Da Lac Reef)
1995年	中国占领菲律宾所主张的美济礁
1996年	3艘中国船只与1艘菲律宾巡逻艇发生长达90分钟的枪战
1998年	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越南士兵在无乜礁附近枪击菲律宾渔船
2002年	中国与东盟发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2003年	越南挑战中国发布的南中国海休渔令,伸张对西沙群岛与南沙群

* 原文如此,应该是1974年。——译者注

	岛的主权
2005 年	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的石油公司签署一项保护南中国海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协定
2007 年	在中国设立“三沙”行政区、加强对南中国海的行政权之后，在河内发生反华示威活动
2009 年	5 艘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与美国调查船对峙，这再次让美国担心自由航行问题；越南和马来西亚联合提出大陆架延伸提案，招致中国与菲律宾抗议
2010 年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宣称，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促使中国外长杨洁篪批评她的言论是“对中国的攻击”
2011 年	菲律宾、越南和中国加强支持本国主张的举措并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国防部长警告，假如多边机制未能得到加强，那么“将会发生冲突”；越南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 5 次实弹演习；在河内爆发反华抗议活动；美国与越南发表联合声明，主张航行自由以及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华盛顿呼吁中国缓解争端并重申保护菲律宾的承诺，这促使中国要求美国不要介入本地区争端之中；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使用武力，要求以和平与多边的方式解决争端，但遭到中国的反驳；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的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和越南宣布海军互访

台湾海峡

还有一个重要的热点就是台湾海峡,这个海峡把中国大陆与台湾分隔开。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自己的一个省,并且强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由于中国共产党(CCP）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KMT）,在国共内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执政党,因此一个中国原则一直不是一个严重的争议问题,只存在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开始是由台湾占据。但是,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通过2758号决议,不再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很快取代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

尽管台湾当局始终没有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台湾实际上一直在寻求国际承认,而且自1991年以来,一再申请加入联合国,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台湾海峡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危机。在1954年到1955年间,共产党军队试图把国民党军队赶出靠近大陆的一系列小的岛屿。他们成功地占领了几个岛屿,并把主要矛头对准金门与马祖,金门与马祖遭受猛烈的炮击,但是它们没有失守。中国大陆在1958年再次炮击金门和马祖,但同样未获得成功。在第三次台海危机(1995—1996)中,中国大陆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了几枚导弹。北京坚信,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李登辉如果再次当选,那么他一定会抛弃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单方面宣布台湾独立。这样的担忧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结果李登辉获得了大多数选票而连任。

美国在上述三次危机中,都坚定地支持台湾。在前两次危机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一个核国家,而中国大陆则不是,前者占据上风。而在第三次危机中,美国和中国大陆都拥有核武器,但美国的实力比中国大陆要更强大,能够在一场大战中拥有制海权。中国大陆的选择余地是很有限的。

今天台湾海峡依然很危险,因为台湾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一个中国原则在大陆很强有力,台湾独立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事情。北京担心让台湾正式独立,将使得西藏或者新疆的分裂主义运动具有合法性,从而损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执政党的地位。为了阻止台湾独立,北京很可能使用武力,而这将导致与美国的冲突。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和北京在防止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个问题上,拥有很大的共同利益。美国一直呼吁北京不要使用武力,也要求台北不要宣布独立,并主张在此框架之内进行谈判。

近年来,两岸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在2008年的就职演说中,马英九承诺执行"不统、不独、不武"政策。马英九在台湾的批评者经常表示担心,马英九只重视不独、不武,北京的官员也确实愿意吸引台湾人增加在大陆的贸易、投资以及旅行。于是,冲突的危险似乎已经降低,至少在目前是如此。然而,假如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相互低估对方的决心而在未来的对峙中做得过火的话,那么台湾海峡依然会再次成为危险之地。

大事年表：台湾海峡

1945 年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

1949 年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宣布战胜美国支持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追随者逃到台湾；美国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合法的领导人

1950 年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宣称，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攻台湾，美国将不介入国共冲突之中；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宣布台湾海峡为中立水域，派遣第七舰队进入该区域，有效地把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1953 年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并撤销美国海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

1954 年　国民党派遣军队到金门和马祖；中国大陆炮击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否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出的动用美国军队或核武器的建议；美国和台湾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它被理解为美国承诺在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的时候援助台湾

195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一江山岛；在中国大陆沿岸以及马祖、金门的战斗在继续进行；国会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使用美国军队保护台湾，抵御军事进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承认，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停火

1958 年　中国大陆炮击金门与马祖；艾森豪威尔派遣美国海军分遣队到台湾海峡；面对军事僵局，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意停火；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实际上是毛泽东起草的)，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且共同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杜勒斯和蒋介石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相互支持以及不使用军事手段反攻大陆

1971 年　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意外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这标志着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解冻；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

1972 年　尼克松访问中国，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非正式关系；《上海公报》发表，声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9 年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54 年签署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被废除；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宣布美国承诺保护台湾的安全，以此安抚台湾当局

1982 年　美国与中国发表第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宣布将减少对台军售

1987 年　台湾废除实行了 38 年的戒严法；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商品与人员往来增多

1988 年　台湾本省人李登辉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加快民主改革步伐

1989 年　中国大陆的政治风波使得中美关系紧张

1995 年　李登辉访问美国并在其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中国召回驻美大

使以示抗议；中国大陆向台湾控制的彭佳屿附近海域试射导弹，并且在福建集结军队；中国大陆进行第二轮导弹试射、实弹军事演习以及海上演习；美国派遣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这是自1976年以后美国首次派兵到台湾海峡

1996年　克林顿总统派遣美国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附近海域；中国大陆宣布考虑在澎湖列岛附近完成实弹演习；美国派遣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到台湾附近海域；中国大陆在3月2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完成第三轮导弹试射，并且宣布在3月18—25日举行两栖登陆进攻演习；李登辉获得54%多数选票再次当选；美国增加对台湾的军售

2000年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引起中国强烈抗议

2001年　布什总统批准10年中最大一笔对台军售

2002年　台湾《国防报告》呼吁海峡两岸增强信任措施

2005年　在华盛顿举行的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和日本宣称“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涉及台湾海峡的问题”以及中国增强军事透明度，属于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这引起中国外交部强烈抗议，声称北京“坚决反对美国和日本发表任何涉及中国台湾的双边文件、干涉中国内政以及损害中国主权”；中国通过《反分裂法》，要求阻止台湾宣布独立

2008年　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朝鲜

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热点就是朝鲜半岛。正如本书第五章所提到的,朝鲜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分裂为两个国家,北面是共产党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南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大韩民国(ROK）。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促使联合国采取第一次集体安全行动,这是由于苏联代表缺席安理会、抗议联合国未能让北京占据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苏联后来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把朝鲜军队几乎赶到了中朝边界鸭绿江,导致中国出兵干涉并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战争最终在战前的边界北纬38度线附近处于胶着状态。虽然交战方一直没有正式签署和平协定,今天的朝鲜与韩国的边界线正是1953年的停火线,它被称为非军事区(DMZ）,它是一条狭窄的地带,也是朝鲜和韩国军队之间的缓冲区。虽然这条边界线的名字是非军事区,但是由于在其两边驻扎着重兵,它实际上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一条边界线。

朝鲜在经济上变得没有生机。朝鲜很孤立、落后,基础设施破败不堪,民众营养不良。朝鲜政权把大量的国家资源用于军队与国家安全,对真正的经济发展投入不足。与此同时,韩国则一片繁荣景象。韩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享受着完全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为什么一个贫穷、落后的朝鲜会成为一个如此严重的地区安全威胁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朝鲜的政策一直是反复无常、不可预测以及富有进攻性的。它的特工多年来一直在从事一系列令人迷惑、稀奇古怪的行动,其目的常常让人难以理解。1968年,朝鲜在国际水域抓扣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让美国船员受虐待和挨饿,直至美国政府对间谍行为表示道歉之后才把他们释放(今天这艘船是平壤的一个浮动博物馆)。2009年,朝鲜逮捕、审判两名美国记者,以在沿中国边境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判处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尽管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率领的外交使团最后让这两名记者获得释放,但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朝鲜依然是个不可预测的国家。

第二,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朝鲜分别在2006年和2009年进行的核试验,从军事上说意义并不大。在两次核试验之后,西方情报机构对于朝鲜是否真的成功地爆炸核武器就存在争议。朝鲜的导弹试验也是常常失败。然而,朝鲜愿意采取挑衅性的试验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担心的事情,因此这可能说明该国的非理性或者绝望。我们如果不清楚朝鲜想要什么及其行为动因,那么就无法知道到底什么是与朝鲜打交道的最好方法。

朝鲜的政策基本上一直是很神秘的。它唯一清晰的行为模式似乎就是,朝鲜在感到被忽视或者遇到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就会采取某些挑衅行为,以及它为了从国际共同体获得有价值的资源,会暂时提出和遵守承诺。然而,2009年的核试验用事实说明了那些试图应对朝鲜"威胁"的领导人所处的尴尬境地。这次核试验反映了朝鲜的如下特点:进攻性与自信心;虚弱与绝望;渴望树立起自力更生形象(与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思想相一致需要外部世界的关注;希望被别国重视;任性;幕后进行领导继承权斗争。当一个国家是反复无常、不可预测以及神秘莫测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知晓如何对该国行为所引起的危机加以管理的。

在2003—2009年间先后举行的六轮"六方会谈"中,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以及日本试图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以换取朝鲜同意可验证的去核化。在此过程中,朝鲜努力从其对话者那里获取各种食品援助、能源援助以及技术援助,同时并不信守诺言。可以说,不管朝鲜是鞭打邻国,还是经济崩溃,它都是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源。它无疑是当今世界

所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国际冲突管理问题之一。

大事年表：朝鲜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的统治；波茨坦会议与朝鲜半岛的国际托管；美国国务院发表总命令第一号，以北纬 38 度线把朝鲜半岛划分为两个受降区
1948 年	在北纬 38 度线以北成立由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50 年	朝鲜战争爆发
1953 年	朝鲜战争以停战协定的签署而结束，该协定至今依然有效；朝鲜接受苏联和中国的援助
1956 年	朝鲜、中国与苏联开始联合核研究计划
1967 年	在离平壤 100 公里的宁边建立一座核反应堆，该反应堆开始运行
1977 年	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协定（Type 66 agreement），允许宁边核反应堆接受国际核查
1984 年	朝鲜试射飞毛腿-B 型导弹
1985 年	朝鲜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声称朝鲜正在宁边修建第二座核反应堆，它可以为制造核武器提供完整的燃料循环
1989 年	朝鲜试射飞毛腿-C 型远程导弹
1991 年	美国从韩国撤走核武器；朝鲜和韩国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表明禁止核武器并邀请国际核查
1992 年	朝鲜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协议》，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员核查所有核设施
1993 年	朝鲜试射射程为 900 公里的大浦洞—Ⅰ型导弹；平壤威胁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以及赶走国际核查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汉斯·布里克斯宣称，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确定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
1994 年	美国和朝鲜签署《框架协议》，美国同意提供轻水反应堆和替代能源，以换取朝鲜关闭宁边钚反应堆
1998 年	朝鲜发射大浦洞-Ⅰ型导弹，其射程达到 2 000 公里
2002 年	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把朝鲜称为“邪恶轴心”
2003 年	朝鲜宣布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朝鲜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并参加多边会谈；第一轮六方会谈开始

2005年	朝鲜以反对美国威胁为由无限期退出六方会谈；朝鲜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美国承诺不进攻朝鲜，换取朝鲜不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停止核活动；朝鲜发表声明，声称除非得到民用核反应堆，否则不会放弃核计划
2006年	朝鲜爆炸核设施；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18号文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朝鲜实施商业与经济制裁；朝鲜钚的拥有量估计足够生产4—13枚核武器
2007年	第五轮六方会谈达成协议，朝鲜关闭宁边反应堆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换取国际援助以及与美国关系正常化
2008年	朝鲜为国际核查提交长达60页的核能力评估报告；美国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
2009年	朝鲜不顾国际压力，使用大浦洞-Ⅱ型导弹发射“卫星”，但是发射失败；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要加大制裁力度；朝鲜赶走国际核查人员
2010年	韩国“天安号”轻武装快舰爆炸并沉没，导致46名水兵丧生，可能是因为遭到朝鲜鱼雷的袭击；朝鲜炮击延坪岛，造成2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金正日之子金正恩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获得重要的政治职位，标志着第三代权力转移的开始

后续阅读材料

1. Ian J. Bickerton and Caria L. Klausner, *A History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Boston: Prentice Hall, 2010）.

2. F. Gregory Gause III,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Persian Gu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S. Paul Kapur, *Dangerous Deterrent: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and Conflict in South*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Lynn E. Davis, Jeffrey Martini, Alireza Nader, Dalia Dassa Kaye, James T. Quinlivan, and Paul Steinberg, *Iranis Nuclear Future: Critical US Policy Choices* (Santa Momcei, CA: RAND, 2011）.

5. Rosemary Foot,"Modes of 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Compar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Reassess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Competition,Congruence,and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pp.93—112.

6. David A. Welch, "Lessons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for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 S. -Chinese Relations," in Christopher Twomey, ed., *Perspectives on Sino-American Strategic Nuclear Issu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3—38

思考题

1. 什么是族群冲突?它在什么时候可能发生?

2. 干涉在什么时候正当的?自决总是正当的吗?人道主义干涉的局限是什么?

3. 国际法同国际道义有区别吗?国际法的重要性何在?

4.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对于目前以色列所控制的领土的看法是什么?在你看来,哪一方的看法更有道理,或者双方的观点都很合理吗?

5. 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是什么?为什么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6. 1956、1967、1973和1982年中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这样,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还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战争吗?

7. 1967年的战争确定了当今阿以争端的格局。在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事件?著名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内容是什么?

8. 萨达特声称他必须在1973年发动战争,然后才可以与以色列媾和。试分析他的这一观点。如何比较纳赛尔在1956年所取得的成果和萨达

特在1973年所获得的成就?

9.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有什么不同?各自的理由是什么?先发制人战争与预防性战争之间的区别何在?

10.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如何帮助你理解本章中所考察的各个热点?

11. 在中东、伊朗、克什米尔、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朝鲜半岛,争夺的物品类型分别是什么(公共、私有、俱乐部或者共有物品)?在每个案例中,不同类型的物品是如何使得冲突管理复杂化的?

12. 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国际热点是哪一个?为什么?

[1] Anthony Eden,引自 Robert R. Bowie, *Suez 19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24。

[2] "Binding the Colossus," *The Economist* , November 22. 2003, pp.25—26.

[3] Linda Fasulo, *An Insider's Guide to the U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5.

[4] Michael Erikson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 1989—2003,"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1 : 5(September 2004), p. 626.

[5] Peter Wallersten and Margareta Sollenberg, "Armed Conflict 1989— 2000," in Margareta Sollenberg, ed., *States in Armed Conflict 2000*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Departmen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Report No. 60, 2001),pp. 10—12.

[6] John Mueller, "The Banality of Ethnic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Summer 2000）, p. 42.

[7] Stuart Kaufman, *Modern Hatreds*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20.

[8]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2001）,p. XI.

[9] http://www. hrweb. org/legal/genocide.html.

[10]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Basic Books, 1989）.

[*] 应该是在1984年。——译者注



新加坡集装箱码头

第七章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一些观察家指出,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经济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通讯和交通成本的下降以及距离制约力的减少,遍及全球的经济相互依存网络在发展。新的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改变对政府和国家作用的认识,也促使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大。今天,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工业产值是由跨国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有关在什么地方从事生产活动的决定,会对一国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所指出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上的群体发生两极分化,一边是那些拥有技能和适应全球市场发展的群体",另一边则是缺少这种能力的群体,比如"工人、养老金领取者以及环境保护论者,政府则被夹在这两者的中间" [1] 。一些理论家用"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 取代"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以此来分析国家之间新的竞争形式,经济制裁和禁运正在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考虑这些变化。现实主义者提醒我们,在和平时代,安全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所有的市场都是在一个政治框架中运行的,全球市场依赖于国际权力结构。安全就如同氧气,人们在失去它之前,很容易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失去它之后才只想着它。同样地,经济制裁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工具,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使用武力,然而其效果则是很复杂的。研究显示,不足一半的经济制裁的事例达到了预期目标。多边制裁措施是20世纪90年代促使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及令塞尔维亚和利比亚政府承受极大压力的一个因素,但是它并没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也没有让一个民选的总统在海地这样一个穷国恢复权力。不仅如此,早在19世纪的时候,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就已经发展得十分迅速,那时的国家奉行了比较自由的贸易、投资和移民政策。但是,这并没有阻止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的爆发,从而使得这些长期的发展趋势受到了阻碍。

全球化的各个方面

全球化(**globalization**）被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网络,而不是指普世性(universality）。比方说,在21世纪初,有一半的美国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南亚只有1%的人在使用。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电话。甚至在手机时代,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在偏远乡村,与世界市场或者全球思想流通过程少有联系。全球化的确导致了穷者与富者在许多方面差距的扩大。它既不意味着同质化(homogenization）,也不意味着均等(equity）。

即便是在富国中,也存在着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市场,意味着商品、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相似的利率。事实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即使在北美地区,虽然多伦多和温哥华之间以及多伦多和西雅图之间的距离相等,而且关税极低,但是多伦多和温哥华之间的贸易额,是多伦多和西雅图之间贸易额的10倍。全球化使得国家边界更容易被渗透,但没有使得它失去作用。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建立起一个世界共同体。从社会角度来看,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根深蒂固价值观念的人之间接触增多,经常会导致冲突: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11世纪到13世纪）和当代中东某些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把美国称为"大撒旦",就是明证。很显然,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不一定导致同质化。

尽管经济学家常常认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是一回事,但全球化实际上有很多方面。其他形式的全球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就是环境全球化。例如,最早有记录的天花传染病例,出现在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它于公元49年传到中国,公元700年后传到欧洲,1520年传到美洲,1789年传到澳大利亚。鼠疫或黑死病发源于亚洲,但是它的传播导致14世纪欧洲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欧洲人在15世纪和16世纪把疾病带到了美洲,并且导致95%的当地土著居民死去。1918年,由一种禽类病毒引发的流感导致全世界4000万人死亡,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今天一些科学家预测,禽流感传染还会再次爆发。自从1973年以来,世界上出现了30种过去未曾知晓的传染病,而且其他人们所熟悉的疾病则以新的抗药形式,扩大了传播的地理范围。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后,只经过20年,它就在全世界杀死了2000万人,并且另外还感染了4000万人。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外来物种传播到新的地方,导致了当地物种的消失,而且可能每年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在另一方面,环境全球化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比如,欧洲和亚洲就受益于引进土豆、玉米和西红柿等新的农作物,而且过去几十年所出现的农业"绿色革命"技术也帮助了世界各地贫苦的农民。

全球气候变化会影响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在今天的科学共同体中有

一个基本共识,即过去50年中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活动,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预计会提高2.5到10华氏度。其结果可能是更严重的气候变化,某些地方降水量过多,而其他地方则降水不足。对北美的影响包括更大的风暴、洪涝、旱灾以及滑坡。自1960年以来,气温上升已经使许多地区缩短了霜冻期和减少了积雪量,下降幅度达10%。冰川和冰盖正在融化。20世纪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比过去3000年里的平均上升速度要快10倍。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家詹姆斯·麦卡锡(James McCarthy)所说的:"今天和过去很不相同,地球上居住人口达到60亿[现在已经是70亿],而且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为我们提供食物、燃料和纤维的自然与人类系统。"[2] 随着气候变化速度加快,"未来的事态变化可能不像过去那么顺利"。不管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它都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军事全球化包括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相互依存网络。20世纪的世界大战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球战略相互依存是极为明显的现象,并且广为人知。它不仅导致了世界性的两极对峙同盟体系,而且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敢使用能够在30分钟内摧毁对手的洲际导弹。这之所以不同寻常,并不是因为它属于完全新的现象,而是因为此种军事相互依存可能产生的冲突规模巨大,而且速度极快。今天,基地组织和其他跨国行为体形成了全球运行网络,正在以所谓的非对称战争挑战传统的国防。

社会全球化是指人员、文化、形象(images)和思想的流动与传播。移民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世纪,大约有8000万人跨越大洋到了新家,这比18世纪要多得多。在21世纪初,有3200万的美国居民(占人口总数的11.5%)是在外国出生的。此外,每年大约有3000万来访者(学生、商务人员以及游客)进入美国。思想的传播也是社会全球化中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组成部分。在过去2000年里,世界四大宗教,即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传播的范围极其广泛。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科学方法与启蒙世界观的传播也是如此。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表现为立宪制度的传播、民主国家的增多以及国际规则与制度的产生。那些认为国际共同体不值一提的人,忽视了政治思想在全球传播的重要性。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反对奴隶制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以及今天的环境保护与女权主义运动,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当然,世界离建立一个全球共同体以取代氏族、部落和国家等民众效忠对象的目标还很远。即便如此,这样的跨国政治思想无疑会影响国家如何建构自己的国家目标和使用自己的软权力。

21世纪全球化有什么新内容?

尽管全球化过程已经经历了很多世纪,当今的全球化形式"程度更深、速度更快"。今天的全球化不同于19世纪的全球化。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帝国主义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政治结构,而且高昂的交通与通讯费用意味着很少的人直接介入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流过程之中。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同信息革命密不可分。正如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指出的,当今的全球化走得"更远、更快、更廉价以及更深刻" [3] 。

经济学家用 "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 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势,即越多的人使用同一种产品,这个产品的价值就越高。一部电话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当电话网络形成后,它的价值就很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导致了如此之快的变革。像"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Linkedln这样的社交网站发展速度极快。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知识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外溢效应,它们经常像火一样迅速传播,带来更多的创新成果,引起新发明的连锁反应……然而,产品不同于知识,并非总能像火那样传播" [4] 。不仅如此,随着相互依存更深、更快,不同网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重要,网络之间的联系增多了。其结果是,"体系效应"(system effects),即一个地方出现的动乱,会传播到整个体系,正变得更为重要。

政府官员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面对着全球主义不断深化(即相互依存网络的密度增加)的现象,这意味着一个地区在发生的事件,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环境方面的,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或者是军事层面的,或者是社会层面的。这些国际网络越来越复杂,其影响越来越不可预测。此外,在人类体系中,人们经常努力超过别人,以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式,获得经济、社会或军事优势地位。因此,全球化伴随着不确定。今后将持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竞争,一方面是不断加深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政府、公司和其他行为体努力认识日益复杂的相互关联体系,并为自己所用。经常发生的金融危机或者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会导致大众运动的产生,从而限制相互依存。

速度加快也给制定对应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难度。如前所述,现代全球化比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之步伐要快得多。天花用了3000年才传遍世界各大洲,最后于1789年传到澳大利亚。艾滋病只花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已经从非洲传播到全世界。在2000年,由菲律宾黑客发明的"爱

虫"电脑病毒,只用了3天时间就传播到整个世界。从3000年到30年,再到3天,这就是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表现。

在富裕国家中,大众直接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也增加了。普通百姓购买外国合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在境外互联网站上赌博,享受过去属于富人专利的境外旅游和品尝异国风味菜肴。弗里德曼把这样的变化称为技术、金融和信息"民主化",因为成本下降使得社会中更多的人可以享受以往的奢侈品。然而,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因为在市场和金钱选举中,人们所具有的实力基础是不平等的。比如在资本市场中,尽管新的金融工具允许更多的人可以参加,但平等是不存在的。对于对冲基金投资人来说,至少需要100万或者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 多元化(**pluralization**) 这个词或许更准确一些,它意味着数量和种类更多的人加入全球网络。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指出,在1914年的时候,"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用电话订购世界上的各种产品,并且可以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所要的东西送到家门口" [5] 。但是,凯恩斯时代的英国人必须很富裕,才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消费者。而在今天,超市和互联网零售商可以让后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拥有这种能力。

这种跨越世界各大洲的跨国联系渠道的大幅度扩展,意味着更多的问题能够很快地在国际上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包括规则和习惯,从实验药品、统计和产品标准,到银行规则,这些都已经不再是完全由各国政府独立处理的事情了。

信息革命对当今全球化产生的影响,在于相互联系网络的速度和深度,它使得全球化更为复杂。但是"深度全球主义"(thick globalism) 现象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问题领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

国内政治影响一国应对变革的方式。某些国家模仿成功样板,比如韩国和东欧那些正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的国家采取了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方式适应变革。例如,像荷兰、丹麦、挪威以及瑞典那样的欧洲小国,保持着相对庞大的政府,并且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偿,而英美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则一般重视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及反对控制(deregulation) 。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欧洲、日本

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也就是说,应对国际市场和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途径不止一种。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也会采取不同的做法。美国过去一直是世界上金融制度最为自由的国家,但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变得很严重,像贝尔斯登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这些原先似乎是美国金融产业不可撼动的支柱的公司破产,引发世界性衰退(正是由于全球化）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被迫进行政府干预。华盛顿采取的反应措施是,花费成千上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购买诸如通用汽车这样大公司的股权以防止它们破产,甚至在某些个案中限制企业高管薪酬。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采取了比较武断的干预措施,从而把美国资本主义带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代。

在伊朗、阿富汗和苏丹这样的社会里,保守集团十分强烈地抵制全球化,甚至采取暴力方式。对全球化的反应助长了原教旨主义。国内制度和国内分裂,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族群方面的,会导致社会内部冲突,从而深刻地,经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族群与政治认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波斯尼亚的精英们求助于农村地区民众保守的认同,来压倒和摧毁都市民众已经开始形成的认同,并且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伊朗也一直存在着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同思想比较自由的对手之间的斗争,那里的自由派也属于穆斯林,但是他们比较同情西方思想。

如前所述,日益加大的不平等是政治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曾经阻碍了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最近一个阶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一样,存在着某些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日益加大的不平等现象。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国家的收入与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国家的收入之比,从1960年的30比1扩大为1997年的74比1。与此相比较,它从1870年的7比1扩大到1913年的11比1。在任何情况下,不平等状况即使没有恶化,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指出:"其结果是存在着很多充满仇恨的民众,对他们来说,新的信息技术威胁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之稳定,甚至是威胁了富裕国家的社会稳定。" [6] 随着信息流通量的增加,人们对不平等状况的了解也在增多,于是某些人选择采取抗议行动,这一点都不令人感到奇怪,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世界范围的"占领"运动。

上述不平等现象加剧的状况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很复杂的,但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其经典著作《大变革》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论述道,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以及19世纪的全球化,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反应。不平等与政治反应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但是前者会导致后者。

特别是当不平等同不稳定相结合的时候,比如发生导致大量失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这样的反应可能最终限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抵制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变化之反应。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不完善的市场是效率低下的,而在政治学家看来,国际市场中存在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可以被看作是"有用的低效率",因为它们充当了政治变革的减速器和缓冲器。全球化在消除低效率的同时,也成为经济成功的政治囚徒。此外,随着全球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以及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增多,摩擦也就会产生。

权力与相互依存

自由主义者有时认为,相互依存意味着和平与合作,但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便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权力的争夺仍在继续。由于联盟变得更为复杂,以及各种形式的权力被加以使用,因而冲突常常就好像同时在几个棋盘中下棋。21世纪的冲突不仅需要大炮,也需要黄油。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意识到,油桶子里面也出权力,我们很快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后续阅读材料

1. Manfred B. Steger, *Globaliz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W.W.Norton & Co., 2011）.

相互依存的概念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同其他诸如 民族主义、帝国主义 或者全球化 (的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属于相互依存范畴,即全球层面上的相互依存) 之类的政治词汇一样,是一个含义不清的词,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领导人和分析家使用政治词汇的动机不一样。领导人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模糊语言,并且极力造成一种体现大家共同利益的印象:"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大家必须相互合作,都要听我的。"在另一方面,分析家则关注相互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理解世界。他们强调,好与坏的问题有程度大小之分。分析家可能指出,我们所乘坐的那条船可能只是朝着一个人的目的地行驶,或者说一个人划船,另一个人掌舵或免费搭乘。

作为一个分析性词汇,相互 依存 指的是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简单地说,它指的就是互相依赖。这样一个情势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的区别,只有程度大小之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婚姻誓约就表述了相互依存的思想,也就是说,夫妻双方互相依赖,"同甘苦、共患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在18世纪的时候,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就指出,摩擦和冲突同相互依存相伴相随。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孤立和分离。然而,这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些试图与外界隔绝的国家,比如朝鲜和缅甸,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今天,一个国家很难与外界相隔绝。

相互依存的根源

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相互依存的情势加以分析:根源、收益、相对成本以及对称性。相互依存既可以产生于物质现象(比如在自然界中) ,也可以产生于社会(经济、政治或者认知的) 现象。物质上和社会上的相互依存经常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互相依赖情势中选择程度的大小。

军事相互依存就是产生于军事竞争中的互相依赖状况。这里有武器物质层面上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可能性而变得十分明显。然而,相互依存还包含认知上的重要内容,认知或者政策上的变化可以减轻军事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如

我们在第五章中所了解到的,美国人一点都不担心英国或者法国的核武器打到美国的领土上,因为他们不认为英法的核武器会被用来攻击美国领土。同样地,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西方人开始睡得更安稳一些。这并不是苏联武器数量减少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人对苏联的敌意或者动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尽管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前苏联数千枚核弹头的安全保卫措施比较差,它们有可能落入恐怖主义者或者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手中,但美国公众对苏联核武库的担忧随着苏联的最后解体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生态相互依存

> 相互依存力量迫使我们认识到,今天的挑战不只是我们自己(本国)所面临的困境,而是所有人都面临的困境。环境是我们共同关注的具体问题:除非气候对所有人来说是稳定的,否则就无所谓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的稳定气候。气候安全是全球公共产品。
>
> ——英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在2006年9月27日的讲话 [7]

一般来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类似于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同样属于传统国际政治的内容,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层面(尤其是认知上的)因素。经济相互依存涉及有关价值和成本的政策选择问题。比如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十分担心全球粮食供应满足不了世界人口的需要。因此,许多国家开始抢购美国的粮食,导致美国超级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由于印度洋雨季不能如期到来,以及苏联粮食歉收,美国消费者买一块面包就要比原来花更多的钱。1973年,美国为了阻止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决定停止向日本出口大豆。其结果是,日本投资于巴西的大豆生产。当几年之后供需比较平衡的时候,美国的农场主对禁运的做法十分后悔,因为日本人从巴西进口价格更为低廉的大豆。与此相类似,在2008年,由于富裕国家把更多的农作物用地用于生产乙醇,全球粮食价格暴涨。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社会选择和物质短缺会影响经济相互依存。因此,我们在做出短期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远眼光。

相互依存的收益

相互依存的收益有时被表述为 零和(**zero sum**) 与 非零和(**nonzero sum**) 两种情势。在零和的情势中,你的所失就是我的所得,反之亦然。在 正和(**positive sum**) 的情势中,大家都获益;在 负和(**negative sum**) 的情势中,大家都受损。分馅饼属于零和情势,做一块更大的馅饼属于正和情势,而把馅饼扔到地上则属于负和情势。既有零和的相互依存,也有非零和的相互依存。

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只从双赢或者正和的角度认识相互依存,即每个人都获益、都比过去过得好。这样的分析家没有注意到利益的不均等以及相对收益分配所导致的冲突,因而忽视了相互依存的政治层面。双方的确都能从贸易中获利,但是以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电脑和智能电话机贸易为例,该贸易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呢?即使日本和韩国双方都获益了,还有一个问题,即谁获益更多一些呢,到底是日本,还是韩国?利益分配——每一方从双赢局面中获益多少——是一种零和的情势,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其结果是,在经济相互依存情势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政治冲突。即便有一块更大的馅饼,人们也会为争得其中最大的一块而进行争斗。

一些自由主义分析家错误地认为,随着世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合作将取代竞争。他们的理由是,相互依存导致共同获益,共同获益又鼓励相互合作。这样的说法有道理,但是经济相互依存也可能被当作一种武器来使用,比如利用贸易制裁来对付塞尔维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相互依存的确比武力更好使用,因为它的分级更精妙,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较少关心从相互依存中获得绝对收益,较多关心对手是否获得更多的收益并对自己构成危害。

一些分析家确信,传统的世界政治总是属于零和的范畴。但是这种对过去的解释会使人误入歧途。传统的国际政治可以是正和的,这取决于行为体的动机。例如,俾斯麦或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的结果同他们不掌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方极力扩张势力,正如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那么肯定会出现零和的政治局面——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但是,如果所有各方都希望稳定,那么就可能在均势中出现共同获益的局面。反过来说,新的经济相互依存政治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含合作性的正和内容。

在相互依存政治中,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之间的界限不甚清楚。比如,前面提到的大豆问题既涉及控制通货膨胀的国内问题,又涉及美国同日本、巴西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商品价格下跌,这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不需要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2005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

访问中国,他恳请中国人增加消费信贷,因为美国认为这"有助于解决我们最关心的全球收支不平衡问题"。中国领导人回答说,美国人"需要通过减少财政赤字解决好自己的问题"。[8] 你说斯诺和中国人是在谈论国内事务还是对外事务呢?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石油产量缩减,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开车限速每小时55英里,并且关闭空调,以此降低能源消耗。这到底属于国内问题,还是对外政策问题呢?一些社会科学家把这类问题称为"国际国内问题"(intemiestic),也就是说,既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

相互依存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国内政治。在1890年的时候,法国政治家关心相对收益,采取了阻碍德国发展的政策。今天,采取促使德国经济增长放慢的政策,对法国没有任何好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意味着,未来法国经济状况是否良好,取决于未来德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如今这两个国家共同拥有一种相同的货币,德国经济状况良好符合法国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反过来说,法国经济状况良好也符合德国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古典均势理论预言,一个国家为了阻止另外一个国家取得主导地位,一定会采取行动挫败对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势中,国家不仅关心绝对收益,也关心相对收益。

相互依存的成本

相互依存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 敏感性 **(sensitivity)** 指的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也就是说,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引起另一个部分发生变化。比如,在1987年,由于外国人对美国的利率以及债券和股票价格的走向产生疑虑,美国股市突然间崩溃了。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市场对外国资金的撤出极其敏感。在1998年,亚洲新兴市场的弊病,蔓延到了距离遥远的俄罗斯和巴西,并对这两个国家的新兴市场造成了损害。在2008年,美国的抵押金融问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房价。

然而,高度敏感并不等于髙度脆弱。 脆弱性**(rolnerabitity)** 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存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它指的是逃离体系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两个国家中不那么脆弱的一方不一定不太敏感,但是该国政策调整的代价一定是相对较低的。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

依赖进口的能源大约只占其所需能源总量的16%,而日本大约95%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美国对于1973年阿拉伯世界石油禁运所导致的油价上涨十分敏感,但是它不像日本那么脆弱。1998年,美国对东亚经济形势十分敏感,但是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那里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是当时美国经济形势很好,美国承受得了这场危机的负面影响。然而,印度尼西亚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变化,不仅敏感,而且脆弱。印度尼西亚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并且导致国内政治冲突以及政府的变更。

脆弱性属于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1979年伊朗国王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伊朗的石油生产一度中断,当时正值石油需求大、市场供应紧张之时。伊朗中断石油生产使得世界市场的石油供应量减少了5%。市场对此极其敏感,供给短缺很快引起石油价格上涨。但是,美国人只需要关闭汽车空调和限速每小时55英里(而不是60英里),就可以节省5%的能源消耗量。美国可以通过使用这样简单的政策调整来避免受到损害,这就表明,虽然美国很敏感,但是它并不脆弱。

然而,脆弱性并不仅仅取决于综合措施,它也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迅速地应对变革。例如,美国就不如日本那样善于应对石油市场的变化。而且,市场中的个人、大公司以及投机家,可能通过观察市场形势,决定囤积居奇,因为他们认为供给短缺的情况将越来越严重。他们的行为会使商品供应更短缺、市场需求更大,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所以,脆弱性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简单。

脆弱性也取决于原料是否有替代品以及其供应渠道是否多样化。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1970年警告说,美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越来越大,因而美国的脆弱性将日益严重。在13种基本的工业原料中,美国将近90%的铝、铬、锰和镍依赖进口。他预言,到1985年的时候,美国有10种基本的工业原料需要依赖进口。[9] 他认为,这样一来,美国的脆弱程度和较不发达的原料生产国的影响力都会大大增加。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世界原料价格下跌,而不是上涨。布朗的预言存在什么问题呢?布朗在判断脆弱程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原料的替代来源和供应地的多样化可以防止原料生产商人为地哄抬价格。不仅如此,技术也在进步。昨天的垃圾可能变成新的资源。如今,有的公司在利用废弃的矿渣,因为新技术的出现,使从几年前废弃的矿渣中提炼出铜成为可能。今天铜用量的减少,是由于使用了以硅制成的纤维光缆,而硅则主要来源于沙子。另外,在2010年生产一台最新型的计算机所需要的铜比1980年要少得多,这是因为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所以,有关美国将因为原料短缺而变得脆弱的看法是错误的,

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技术的发展和替代产品。

相互依存的敏感性

我们已经忘记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和传播速度之危险。当前的事态发展始于金融市场中的一个较小领域,即次级抵押贷款(2007年在美国）,迅速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拉克什·莫汉(Rakesh Mohan）2007年9月20日的讲话 [10]

一些分析家声称,当今发达的经济体是以信息为基础的,因为计算机、通讯和互联网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这样的经济体有时被称为"轻量级"的经济体,因为产品中所包含的信息的价值远远大于原料的价值。这种变革会进一步降低原料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仅有的几个例外之一是石油,它依然在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波斯湾极具战略意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已探明的石油储藏就在这个地区。

相互依存的对称性

对称性(**symmetry**） 指的是和不平衡依赖相对应的相对平衡的依赖情势。依赖性小可以是一种权力资源。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存,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都看重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就拥有某种权力资源。在国际政治中,谁能够左右相互依存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一些分析家认为,相互依存只产生于对等依赖的情势之中。这种看法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最有意思的国际政治行为。完美的对称现象是极其罕见的,而那种只有一方依赖另外一方的绝对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少见的。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见图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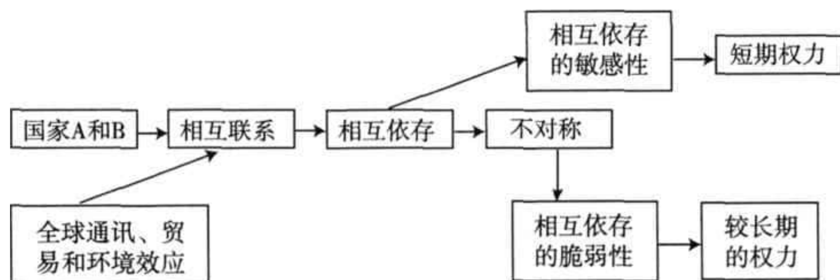


图7.1 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

不对称性经常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总统实施减税和增加开支的政策之后,美国依赖引进日本的资金,以平衡联邦政府预算。一些人声称,这使得日本对美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停止向美国提供借贷,美国以及日本自身都会受到损害。此外,如果日本停止向美国提供借贷,从而损害美国经济,那么那些在美国拥有极大利益的日本投资家也会因此遭受损失。不仅如此,日本的经济规模只及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多一点,也就是说,虽然两国都需要对方以及都能从相互依存中获益,但是日本比美国更需要向对方出口。今天美国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关系与此很类似。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中国拥有美元和美国债券,实际上是借钱给美国。虽然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元来威胁美国和损害美国经济,但是美国经济受损意味着中国出口市场缩小,而且美国政府也可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任何一方都不急于破坏相互间那种脆弱性相互依存的对称性。2010年,某些中国将军建议用大量抛售美元,来惩罚美国对台军售,但是高层领导人拒绝这么做。中国领导人知道,假如中国试图以抛售美元迫使美国就范,那么这也迫使中国自己就范。

不仅如此,安全问题通常与美日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奉行贸易立国的政策,不发展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也不拥有核武器。它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以便在东亚地区平衡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美日之间出现贸易争端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做出让步,以避免两国的安全关系受到损害。

如果不同问题领域的相互依存状况是不对称的,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极力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或者把它们分开。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独的纸牌游戏,所有的纸牌游戏同时进行,一个国家可能在一个牌桌上拥有最多的筹码,另一个国家可能在另一个牌桌上也拥有最多的筹码。一种国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或者要求各个牌桌的游戏单独进行,或者在所有的纸牌桌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因此,很多国际冲突都是围绕着建立联系或者反对联系而进行的。国家希望在自己占优势的领

域左右相互依存情势,而避免在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为他人所操纵。经济制裁经常就是这种联系的例子。比如在1996年,美国威胁要对在伊朗投资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措施,但在欧洲国家提出要把它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之后,美国就退让了。

国际制度通过设定议程和确定问题领域,经常制定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交易规则。国家极力利用国际制度来制定规则,影响牌桌之间筹码的转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把较穷国家占据相对有利地位的一些冲突同强国所主导的军事问题分开,使较为弱小的游戏者获益。但是,存在着某些十分强大的游戏者推翻一张或者更多牌桌的危险。有关货币、航行、污染和贸易的制度都是独立的,如果军事上十分强大的游戏者遭受太大的打击,那么就存在他们可能推翻其他牌桌的危险。然而,尽管美国和西欧在1973年的石油牌桌上受到打击,但它们并没有使用自己占优势的军事力量来推翻石油牌桌,这是因为一个复杂的联系之网阻止它们这么做。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种情况。

最大的国家不一定总能在争夺经济相互依存操控权的斗争中占上风。如果一个较小或较弱的国家更关注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会占得先机。例如,与美国的贸易大约占加拿大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三,而与加拿大的贸易大约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一,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大于美国对加拿大的依赖。然而,加拿大在同美国的一系列贸易争端中却占得上风,这是因为加拿大威胁采取关税和限制性报复措施,这对美国产生了威慑作用。如果加拿大的行动导致美加之间发生一场全面的争端,那么加拿大将比美国受到更大的损害。但是加拿大人认为,偶尔冒险实施报复性措施,比接受那些会使自己总是处于下风的规则要好一些。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加拿大知道自己的损失会更大一些,于是具有更强烈的动机使自己的谈判更有效果,因而常常在谈判桌上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11] 通过操控经济相互依存来威慑对手,有点类似核威慑,因为二者都依靠能对对方造成有效损害并使对方相信自己意图的真实性的能力。小国往往能够利用较强烈的态度和较高的信用,克服自己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情势中的相对脆弱性地位。

相互依存发展的自然结果就是贸易条约的增多。在这些条约中,有关欧盟的协定是最为复杂的,它要求成员国不仅放弃某些经济主权,而且放弃某些政治主权。1994年初,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KNAFTA)。该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把两国的经济同规模更大的美国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它们的产品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并且增强它们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能力。对美国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的出口领域,而且使得美国公司更容易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从事经营活动。

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条约,可能会增强相互依存关系中相互依存程度和减轻不对称性。美国通过把自己的经济与墨西哥的经济连成一体,为墨西哥承担了某些经济义务,也使得美国更容易进入墨西哥的市场。1994年,墨西哥比索汇率大幅度下跌,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初向墨西哥紧急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日益贬值的墨西哥货币。当时,美国国会正陷于有关增加国内服务支出(如医疗保险)问题的僵局之中,美国行政当局认为美国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必须出面挽救比索。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强,即便强大的国家也会发现自己对境外经济事态的发展十分敏感。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像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脆弱,它主要是通过多边制度加以应对。尽管如此,由于担心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崩溃所产生的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的信心,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不能继续采取观望态度。

世界经济中的领导者与制度

大致说来,国际经济的规则体现了那些最大的国家的政策(见表7.1)。在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在货币流通领域,英格兰银行遵循金本位制度,给世界货币流通确定了一个稳定的框架。直到1932年,英国也一直确保海上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并且为世界贸易提供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实力由于同德国的战争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它在20世纪30年代远离国际事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行为体,似乎还想免费搭便车,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便是由于不良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不愿意充当领导者而引起的。英国力量太弱,无力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而美国又不愿意承担新的责任。

表7.1主要国际经济制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所在地:华盛顿特区

创建时间:1945年,是1944年新罕布什州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与金融会议的成果

成员:187个国家

雇员:大约有来自160个国家的2500人

资产:3760亿美元

组织结构:

·理事会,由每个会员国委派一名理事组成,每年开一次年会

·国际货币与财政委员会,有24名成员,每年开两次会议

·执行董事会,有24名成员,负责IMF的日常事务

投票制度:多数通过——投票权大小取决于成员国的(支付)份额

主要目标:

·促进货币领域的国际合作

·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均衡发展

·促进汇率稳定

·帮助建立一个多边支付体系

·给面临收支平衡困难的成员国提供可动用的资源

世界银行

所在地:华盛顿特区

创建时间:1945年,是1944年新罕布什州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与金融会议的成果

成员:187个国家

雇员:来自160个国家,超过10000人

预算:承诺资金442亿美元,总支出289亿美元

组织结构:

·理事会,由每个会员国委派一名理事组成,每年开一次年会

·行长,来自持有股份最多的国家(美国),任期5年,可以连任,负责监督董事会

·董事会,由24名成员组成,每周开两次会议

·执行董事,负责日常业务和决策

投票制度:大多数通过——投票权的大小取决于成员国的经济规模

下属机构: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金融公司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主要目标:

·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来减少贫困

·减免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债务

·改善管理机构的管理质量与能力

·减少疾病(包括艾滋病与疟疾)的传播

·增加儿童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减少环境退化

世界贸易组织(**WTO**)

所在地:瑞士日内瓦

创建时间:1995年,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前身为成立于1948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成员:153个国家,31个观察员国

雇员:629人(秘书处工作人员)

预算:1.96亿瑞士法郎(2.64亿美元)

组织结构:

·总理事会,由每个成员方派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召开多次会议,还履行其解决贸易争端和审议各成员贸易政策的职责

·上诉机构,由7名成员组成,他们负责裁决提交给争端解决机构(比如总理事会)的争端

·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导,它不具有正式决策权,主要负责总理事会和各个下属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投票制度:协商一致——一个成员一票制

主要目标:

·管理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协定

·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讲坛

·寻求解决贸易争端

·监督各成员贸易政策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与培训

·与其他国家开发组织进行合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所在地:法国巴黎

创建时间:1960年,属于经济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前身是二战结束后成立的、旨在协调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34个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

雇员:2500人(秘书处工作人员)

预算:3.42亿欧元(大约4.86亿美元)

组织结构:

·理事会,由每个成员国家派一名代表组成,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动提供指导和决定该组织的年度预算

·秘书长,监督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该组织的日常工作

投票制度:协商一致

主要目标:

·推动好的治理方式

·从事经济评估和提出经济政策建议

·促进经济发展

·作为讨论经济、发展、社会和治理挑战的多边论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家们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 布雷顿森林 举行的国际会议,建立起了旨在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的制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负责贷款,贷款对象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其目的在于帮助它们实现收支平衡或者偿还债务利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时候一般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比如减少预算赤字和价格补贴。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有时会引起争议,并且不总

是很有成效,但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帮助俄罗斯克服经济困难,以及在90年代末帮助亚洲国家渡过金融危机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界银行为较穷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贷款。(还有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地区开发银行。)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负责制定自由贸易规则,也是一系列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多边谈判的场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34个最发达国家协调经济政策的论坛。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7个最大经济体(它们占世界产值的三分之二)的领导人每年举行一次七国集团首脑会晤(因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入而扩展为八国集团),讨论世界经济形势。1999年,一个更大的、涵盖地理范围更广的国家集团(即二十国集团)建立起来,它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制度有助于增强各国的政策,促进了跨国民间交往的迅速发展。在1945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保持在3%到9%之间,高于世界生产的年增长率。国际贸易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I960年为5.6%,1995年提高到11.2%,2009年更达到了27.97%。国际投资年均增长率接近10%,那些具有全球战略的大型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

批评家声称,国际经济制度带有歧视性,主要对富国有利,而对穷国不利。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加权表决制度(weighted voting),这使得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其中享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由欧洲人来领导,而世界银行行长一般是美国人(尽管未来会有变化)。美国可以采取财政与贸易赤字政策,而且几乎不受指责,但穷国在面临类似债务问题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就会要求它们回到市场原则上来,并以此作为借贷的条件。其中一个原因是,穷国经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以获得借款,而美国不需要国际基金组织的帮助也照样可以得到借款。换句话说,国际经济制度反映了金融市场中不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包含的权力现实。撤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能改变金融市场中的权力现实。如果没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让私人银行家和基金管理者来处理问题,那么穷国将更难借到钱。

世界贸易组织并不采取加权表决制度。它提供了一个论坛,使得153个成员可以在非歧视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而且也提供了帮助成员方仲裁贸易争端的委员会(panels)和规则。批评家指出,成员方在该组织框架(比如目前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内所商议的协定,让富裕国家保护农业与纺织业等领域,使之应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因而对穷国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批评是对的,保护主义

政策的确损害穷国。但是,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富裕国家的国内政治,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发挥作用的话,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就更大。这再次说明,国际制度能够减轻,但不能消除权力现实。不管怎么说,美国和欧洲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委员会所做出的对它们很不利的裁决,这个事实就表明.制度的作用即便很小,它还是起作用的。

即便是在富裕与强大的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如何在一个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管理跨国经济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2001年以后,美国成为了一个纯债务国,因为它拒绝提高国内税收以实现收支平衡,而是从国外借贷。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演,美国将步英国的后尘而走向衰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并没有衰落和变得内向,其他国家依然愿意借钱给美国,因为它们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美国经济繁荣符合它们的利益。比如,中国就拥有很大数额的美元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以此扩大对美国的出口。2009年,虽然有中国官员提出要减少美元的持有量,但是该国的实际做法并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金融动荡依旧是一个潜在问题。全球金融市场最近一些年来增长速度迅猛,但是其动荡不定的局面对世界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愿意采取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政策。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将会有更多的部门、国家、问题和私人行为体被纳入相互依存关系之中。那种把世界政治仅仅描述为几个大国如同坚硬的台球在均势体系中相互碰撞的看法,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现实主义与复合式相互依存

如果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军事力量是支配性的手段,权力(或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假如国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 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s**) 也是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军事力量不是唯一重要的手段,经济控制和利用国际制度也是支配性的手段,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安全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福利(**welfare**) 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那么这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反现实主义的世界称为 复合式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有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复合式相互依存是一个"理想的模式",它是一个人们想象出来的概念,在

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现实主义观点也不能与现实世界完全吻合。把世界设想为一种复合式相互依存状态,可以让我们想象出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政治,自由主义范式在其中大概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事实上,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都是简化的模式或者理想的模式,真实的世界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看看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在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之间的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中东国家间的关系靠近现实主义这一端。当今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或者法国和德国的关系靠近复合式相互依存那一端。国家间关系在光谱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着政治关系的特点和权力斗争的形式。实际上,国家可以改变自己在光谱中的位置。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端,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俄关系移到了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之间的中心位置(见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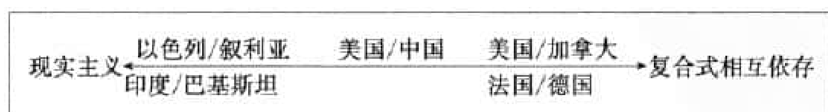


图7.2 从现实主义到复合式相互依存的变化光谱

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同美日关系一样,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大大超过对中国的出口额。其结果是,美国有巨额贸易赤字。虽然美中双边贸易是不对称的、对中国有利的,但是中国潜在的贸易禁运行为不会使美国处于特别脆弱的地位,因为美国可以通过从其他地方采购产品获得补偿,而且中国国内也有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强烈动机。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中国威胁通过抛售从出口中获得的大量美元以伤害美国的做法,将会损害其对美国出口。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大市场,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这使得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国不利行为的能力受跨国行为体(包括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制约,这迫使美国政府不能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然而,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东亚均势的认知,促使美日安全同盟从1995年开始得到强化。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许多欧洲国家不怎么愿意同萨达姆·侯赛因这样危险的独裁者对抗,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复合式相互依存所创造的和平环境,而且倾向于把它推广到欧洲以外的霍布斯式世界。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个机智的说法过于简单了,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明证,但是它的确抓住了大西洋两岸认知中的不同之处。它也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道理。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所有发达民主国家构成了霍布斯现实主义海洋中的自由和平群岛。在同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中,甚至美国也是来自金星。如果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那么这就如同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复合式相互依存一样,两者都是错误的。

后续阅读材料

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11) .

2. Mark J.C.Crescenz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

石油政治

如本书前面所提到过的,不管是从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说,石油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原料,它很可能在本世纪内一直保持着关键能源资源的地位。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虽然中国目前占将近9%,但是其石油消费增长速度很快) 。即便中国消费量大增,世界上的石油也不会很快就被用完。目前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1万亿桶,而且今后还可能有更多的石油资源被发现。但是,有三分之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在波斯湾地区,而该地区易受政治动荡的侵害,因而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虽然石油并非两次海湾战争的主要原因(从夺取和拥有石油这个意义上说) ,但是中东石油供应稳定与全球经济稳定之间的重要关联性,的确是政策制定人讨论对伊拉克政策的时候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个笑话所言,假如海湾地区出产的是花椰菜

而非石油,那么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此,石油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它还是一个可以同时用来阐释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思想相关联的问题。

某个特定领域中的相互依存,往往产生于一个由规则(rule)、规范(norm)和制度(institution)组成的框架之中,我们把这个框架称为规制(regime) [*] 。国际石油规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0年的时候,石油规制表现为同主要石油消费国政府密切相关的私人垄断。那个时候的石油价格大约为每桶2美元,有时被称为"七姐妹"的7家跨国石油公司决定石油产量。石油价格取决于这些大公司的石油产量以及富裕的、进口绝大部分石油的国家的需求量。跨国公司依据富国的情况确定石油产量和价格。传统军事意义上的那些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时常采取干涉行为,以确保该体系顺利运行。例如,1953年,伊朗民族主义者采取行动,试图推翻国王的统治,英国和美国秘密出面干涉,恢复了国王的统治。石油规制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国际石油规制在1973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石油生产国决定石油产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不再单独由富国市场决定。权力和财富发生了从富裕国家到较穷国家的大转移。2004年曝光的秘密文件表明,正如现实主义者可能预测的那样,美国曾经考虑过使用武力夺取波斯湾油田。但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去做,石油规制发生了有利于较弱小国家的变化。如何解释这一重大变革呢?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产油国联合起来,并且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这样的解释有一个问题,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0年,而大变革则是发生在1973年以后。尽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价格依然下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思路来解释国际石油规制的变革:总体的均势,石油问题上的均势,以及国际制度。

现实主义者主要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分析均势的变化,他们在分析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地波斯湾地区局势的时候尤其如此。两种变革影响了该地区的均势: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非殖民化。在I960年的时候,一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属于欧洲的殖民地,到了1973年的时候,它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国家了。伴随民族主义兴起而来的是军事干涉成本的提高。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和非殖民化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付出较高的代价。美国和英国在1953年干涉伊朗的代价并不高,但是如果美国在1979年试图维护伊朗国王政权,那么它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富裕国家之所以没有在1973年采取干涉行动,把产油国变成殖民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们认识到,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

付出很高的代价。

美国和英国权力的变化也影响了波斯湾的均势。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之后,尤其是在它创立后初期,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波斯湾的警察。在1961年,英国阻止了伊拉克兼并科威特的努力。但是到1971年,英国的经济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且英国政府也在努力减少英国在国际上的防务义务。1971年,英国放弃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让人想到1947年的情景,当时英国无力维持其在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大国地位。那时美国接替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且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但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却无力像在1947年那样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作用。美国当时深陷于越南战争之中,不愿意再在波斯湾地区承担重要的军事义务。其结果是,尼克松总统和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制定了一个大力依靠地区强国的战略。他们所选择的目标就是伊朗。他们想通过扶持伊朗成为地区霸权国家,以较小的代价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警察作用。因此,现实主义者会用整个权力结构的上述变化,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均势的变化,来解释石油规制的变革。

第二种解释石油规制发生变革的思路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关注各个国家在一个特定问题领域内所具有的经济权力的相对对称性。在1950年到1973年间,全球石油消费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美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具体来说,美国在1971年以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是,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71年达到最高值。此后,美国的石油进口开始增长,美国不再拥有多余的石油。在1956年和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尝试过石油禁运,但是它们的努力很容易地就被挫败了,因为美国可以生产足够的石油来供应欧洲,以防止阿拉伯国家切断石油供应。随着1971年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最高值和美国开始进口石油,左右石油市场的权力转到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手中。美国不再拥有在最后关头向他国供应石油以抵消石油禁运的能力。

第三个解释1973年以后石油规制变革的思路,主要不是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是根据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制度(尤其是跨国公司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作用的变化来分析问题的。"七姐妹"在这个时期逐渐丧失了权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同产油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消失。当一个跨国公司去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与所在国达成一项协议,使得本公司从双赢的项目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从穷国的角度来看,让跨国公司开发资源,可以使本国获益。即使穷国获得20%的收益、跨国公司获得80%的收益,穷国也比过去所得到的要多一些。所以在较早的时期,跨国公司由于垄断资本、技术和左右国际市场,它们可以同穷国达成协议,使得

自己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跨国公司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过程中(而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无意识地把资源转移到了穷国。它们训练了当地人。于是,沙特人、科威特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学会了怎样经营油田、管理泵站以及修建船坞。当地人也获得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技能。

最终结果是,穷国要求分得更多的权益。跨国公司不能再以从当地国撤出投资作为威胁的手段,因为现在穷国也可以用自己独立经营的主张来威胁跨国公司。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跨国公司与穷国讨价还价的权力,特别是在原材料行业,就慢慢地消失了。这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丧失"。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3年,跨国公司无意识地把技术和技能交给了穷国,帮助它们获得了自主经营石油生产的能力。

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石油市场,成为"七姐妹"的"小弟妹"。这些新的跨国公司虽然比不上"七姐妹",但依然是很庞大的,它们开始同产油国做交易。这样一来,产油国为了摆脱"七姐妹"的控制,可能与较小的、独立的跨国公司达成协议。这也削弱了那些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

从制度上看,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一个卡特尔,其作用有了一些提高。在石油行业中,卡特尔的典型作用就是限制石油供应量,但在过去这些一直都属于"七姐妹"之间的私下安排。卡特尔通常有一个问题,即当市场疲软和价格跌落的时候,其成员往往不遵守市场配额的规定。卡特尔在石油短缺的时候最能发挥作用,但在石油供大于求的时候,大家都想出售自己的石油,并且倾向于降低价格,以争得较大的市场份额。经过一段时间,市场的力量就逐渐迫使卡特尔失去作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产油国家政府间的卡特尔,而不是私营企业之间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创建初期难以发挥作用,因为那时石油过剩。只要存在着石油过剩的局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就有采取欺骗行为以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动机。从I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无法让成员国遵守有关价格的规定。但是在出现石油供不应求的局面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调生产国讨价还价权力的作用就上升了。

1973年的中东战争给石油输出国组织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它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作用了。在1973年的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削减了石油供应,但是这也造成了一种情势,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是美国维护波斯湾地区稳定局势的工具。但是,伊朗国王宣布把本国的石油价格提高4倍,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也跟着这么做。从长远角度来看,由于市场的力量,石油输出国组织无法让石油价格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但油价持续居高不下,则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不无关系。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是石油公司在危机中所起的"减轻伤痛"的作用。时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危机期间的某个时候曾经说过,美国如果面临"窒息"的危险,那么就可能使用武力。阿拉伯石油禁运使得世界石油贸易量减少了15%,美国的石油进口减少了25%。然而,石油公司确保每个国家承受相同的损失。它们对世界石油贸易作了新的调配。由于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减少了25%,所以石油公司向美国供应了更多的来自委内瑞拉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它们减轻了伤痛,使得所有富裕国家都减少7%到9%的石油进口量,这个比重远远低于"窒息"点。它们的行为有助于防止经济冲突演变成军事冲突。

石油公司为什么这样做呢?这肯定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跨国公司要长期地、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它们为此希望局势稳定,获得市场准入。跨国公司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势,即如果它们拒绝向所在国出售石油,那么它们就可能被该国收归国有。比如,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要求英国石油公司的首脑只向英国出售石油,不得向其他国家提供石油。但是英国石油公司的首脑回答说,如果他服从这个命令,那么他的公司将会被其他国家宣布国有化,从而断送英国石油公司的性命。英国首相最后还是作了让步。从根本上说,石油公司是长期的、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它们极力稳定市场,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受到严重的打击。跨国公司通过降低"窒息"的危险,减少了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简言之,石油体现了介于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这两种理想模式之间的一个问题。总体的军事力量平衡、某个问题领域内经济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以及石油问题领域内的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解释从1960年的石油规制到1973年以后的石油规制的变革。



2010年8月在墨西哥湾爆炸和沉没的海上深水钻井平台,它造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石油泄漏事件

作为权力资源的石油

石油武器在1973年这个转折关头到底有多重要呢?阿拉伯国家通过减少产量和对以色列的友好国家禁运石油,使得美国关注它们的问题。它们也导致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一度陷于混乱,各个国家的反应有所不同。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促使美国在1973年斋月战争之后,在解决阿以争端问题上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在另一方面,石油武器并没有促使美国根本改变其在中东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美国人没有突然抛弃其盟友以色列、转而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石油是一个能产生影响的权力源泉,但是它没有强大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程度。

为什么石油武器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其部分原因在于相互依存的相互性。沙特阿拉伯是个重要的产油国,它在美国的投资额很大。如果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害,那么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会遭到伤害。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安全领域依赖美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唯一有能力确保波斯湾地区的均势稳定的国家,沙特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他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使用石油武器时不敢走得太远。不仅如此,在经历过石油危机之后,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采取措施减少自身未来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比如,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实际上就是储存石油,同时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一道建立了国际能源组织,旨在推动世界能源市场的透明度以及采取合理的能源政策。

那么武力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武力没有被公开使用。由于没有出现"窒息"的局面,所以没有发生军事干涉行动。不仅如此,美国所提供的长期的安全保障使得沙特人获益。因此,武力在幕后起了作用。安全相互依存和石油相互依存之间存在着一种间接的联系。公开使用武力的代价太高,但是武力作为一种权力的资源在幕后起了作用。

这些复杂的因素依然存在。石油依然在原材料中占据十分特殊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次海湾战争,并且促使美国继续在波斯湾保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是,石油的价格对全球市场的力量、跨国公司在中亚以及其他地区开采石油和增加石油供应量等等因素很敏感。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石油价格回落到1973年危机前的水平。

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所预言的石油噩梦并没有成为现实。比如,美国能源部曾经预测,到2000年的时候,石油价格将上升到每桶100美元。[12] 虽然石油价格在2008年超过了每桶100美元,但是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曾经跌到过每桶11美元。有一些因素导致早先的预言未能成真。从需求一方来看,政策措施和价格上升导致相关国家更注意能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美国通过了《公司平均能源效率法》,强制要求汽

车生产商所生产的汽车的耗油量必须达到一个最低标准。这是国内政策有意识地影响对外政策的一个明显例子。(此外,驾车的人面对着高油价的压力,有意识地减少油耗,这也是导致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供应一方来看,冷战后一些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石油产地的兴起,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市场上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俄罗斯成为了向西方供应石油的一个重要国家。里海地区是另外一个不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控制的、让人感到有希望的石油储藏地。科技进步让地质学家发现了过去不可能发现的石油资源,从而说明了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对全球石油储量所作的估计是有局限性的。

然而,2005年以后,石油价格再次走高,部分原因在于战争、飓风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也由于需求的增长。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增强了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这类能源生产国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国家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深受石油价格低廉之苦。两个正在兴起的能源消费巨人将影响未来的能源市场: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是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处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阶段,它们对能源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两国正在采取重商主义手段购买和控制外国石油,尽管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教训会让它们知道,石油是一种可替代的商品,不管谁拥有石油,市场会导致石油供应增加和让大家一起分担痛苦。中国也有大量的煤炭储量以及天然气资源,而且还正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它今后会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石油,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两个国家也面临着环境方面的挑战,因为使用化石燃料可能对全球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产生影响,本书第九章将对此加以论述。不管怎么说,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大大增加全球对石油的需求。

尽管采取了节能措施,美国也很可能继续依赖进口石油以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这意味着像波斯湾那样的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区,将继续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虽然世界上有像俄罗斯那样的新的石油生产地,但专家们仍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沙特阿拉伯及其邻国将满足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需求。[13] 由于沙特阿拉伯是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其政治体系中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重大后果。

如果冲突导致波斯湾石油供应中断,那么富国和穷国都将同样面对石油价格的突然大涨。有关石油的戏剧并没有落幕。在信息时代,虽然原料的作用不像在工业革命时代那样具有关键性,但是石油依然十分重要。正在发展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网络不仅导致共赢,也产生了政治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权力政治正变得更为复杂。

在21世纪,石油政治很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其复杂程度将取决于我们大家的远见与智慧。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假如我们继续快速开采石油,那么石油将会被用完。大部分容易开采的油田已经被利用了。国际能源组织在2008年的《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成熟油田产量递减率可能从现在的6.7%,提高到2030年的8.6%。或者换句话说,即使今后20年全球石油需求保持不变(考虑到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石油需求增长快速,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也需要再找到4个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石油产地,以抵消现有油田产量的减少。这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使用非传统的石油资源,比如油砂矿,但是它们的开采比较困难,成本也比较高。上述三个问题,即容易开采的油田枯竭、已有油田的产量减少、日益依赖非传统资源,反映在一个被称为能源投资收益率(EROI)的统计数据上,它说明了能源生产过程中单位能源消耗的能源产出量。任何的石油开采活动都需要用电来带动泵和钻,以及需要给车辆加油等等。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消耗相当于1桶石油的能源可以开采100桶石油。今天,能源投资收益率指数已经从100比1下降到17比1。利用含油砂来炼油,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来从砂土中提取可用的石油,其能源投资收益率指数不到6比1。[14]

从长远来看,世界将会找到终止依赖石油的办法。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后碳经济靠什么能源来驱动。核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以及生物能源资源无疑都将是未来能源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与此同时,石油将继续在全球政治中处于突出地位。世界中的霍布斯式部分主导石油产业时间越长,石油政治就可能越像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世界越依赖像加拿大那样的国家,世界政治就越反映导致复合式相互依存条件的动力。然而,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中,石油政治和环境政治可能将会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两者不可分开。这是因为,在没有取得迈向后碳世界的重大进步之前,解决世界长期能源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很容易陷于相互矛盾的境地。

后续阅读材料

1. Francisco R. Parra, *Oil Politics: A Modem History of Petroleum* (New York: I.B.Tauris, 2004).

2.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 March/ April(2006),pp.28—36.

思考题

1. 全球化的主要类型有哪些?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吗?当今的全球化与过去的全球化有什么区别?

2. 文化领域中的全球化有什么影响?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文化同质化吗?更具体来说,全球化最终会导致世界的"西方化"吗?

3. 全球化引发了哪些种类的政治反应?反全球化情绪和国际经济不平等有什么关系?

4. 什么是"复合式相互依存"?它与简单的"相互依存"有什么区别?哪一种范式最有助于我们理解复合式相互依存?当今复合式相互依存在哪些地区发展得最为充分?

5. 什么因素使得经济相互依存成为权力的源泉?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区别何在?

6. 1973年石油危机的深层和中层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发生,比如1967年?它是一个特殊事件,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场革命的开端?为什么没有使用武力?武力可能在今天被加以使用吗?

7. 自由主义理论乐观地认为,国际商业的发展会使得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国际政治工具的吸引力下降。国际石油规制是支持还是否定这种理论呢?

8. 按照古典现实主义的假设,国家间的合作不可能在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你如何解释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取得的合作程度?制度起作用吗?

[1]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 p.2.

[2] James J. McCarthy,"The Scope of the IPCC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The Climate Repor* t (Winter 2001）, p. 3.

[3]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9) , pp.7—8.

[4] Joseph Stiglitz, "Wieightless Concern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 3, 1999, p.14.

[5]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Penguin reprint, 1988) , p.11.

[6] Robert Wade,"Winners and Losers," and "Of Rich and Poor," The Economist,April 28, 2001. pp.72—74, 80.全球不平等难以衡量,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然而,尽管收入不平等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大增加,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可能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略有降低。参见David Dollar,"Globalize tion,Poverty and Inequality since 1980," in David Held and Ayse Kaya,eds., *Global Inequality: Patterns and Explan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 pp. 73—103。

[7] UK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Climate Change John Ashton, *Speech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in London* , September 27, 2006.

[8] Edmund Andrews, "Snow Urges Consumerism on China Trip," *The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4, 2005, p. 1.

[9] Lester Brown, *World Without Bord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 p.194.

[10] Rakesh Mohan, Valedictory Address, Reserve Bank of India, Asia Regional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20, 2007.

[11] 1959年的《国防生产共享安排》、1965年的《汽车协定》以及1988年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Michael Hart, *A Trading Nation:Canadian Trade Policy from Colonialism to Globalization* (Wancouwer:UBC Press, 2002）, pp.214一217, 240—247, 367—393.

[12] "Still Holding Customers Over a Barrel," *The Economists* October 25, 2003, pp. 61—63.

[13] Ibid.

[14] Thomas F. Homer-Dixon, *The Upside of Down : Catastrophe, Creativity, 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6）, pp.90, 93.

[*] 又译“机制”。——译者注



2011年春为利比亚内战难民提供帮助的国际红十字会/新月会帐篷

第八章

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

权力和信息革命:从书写的起源到"阿拉伯之春"

一场信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政治。早在400年前,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写道,知识就是权力。在21世纪初,已经有更多的人拥有了这种权力。政府总是担心信息的流动与控制问题,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第一个受到信息技术变革极大影响的时期。古登堡(Gutenberg)发明活动铅字,使得很多欧洲人可以读到印刷体的《圣经》,因而对宗教改革的开启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册子和通信委员是美国革命开路先锋。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信息快速流动会导致认同与利益的重大变化。

当今信息革命的基础是计算机、通讯以及软件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进步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处理与传输信息的成本。自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以来,计算机运算能力每隔2年就增加1倍,到了21世纪初,计算机的价

格只有20世纪70年代的千分之一。假如汽车价格像半导体那样快速下跌的话,那么今天一辆小汽车的价格应该只有不到5美元。

在1993年,世界上只有50个网站；而到了2010年底,世界上网站数量达到2.55亿个。在2000—2011年间,全球互联网用户增加480%,中东和非洲用户增加的速度最快。通讯带宽扩展迅速,通讯费用继续下降,而且其下降速度甚至比计算机运算能力的上升速度还要快。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人们用铜制导线传送电话信号,每秒钟可以传输1页纸的信息；今天,一根细细的光导纤维每秒钟就可以传输9万册书籍的信息。按目前美元币值来计算,一次简短的跨越大西洋通话的费用,已经从1930年的250美元,下降到21世纪初的不足1美元。现在的网络电话(VoIP）基本上是免费的。网络摄像头可以让人们在家里的办公室中舒舒服服地参加视频会议。在1980年的时候,1千兆字节(a gigabyte）存储器要占据一个房间的空间,而到了21世纪初,如今一台可以装进口袋中的"苹果"掌上电脑(Apple iPod）,其存储量就达到160千兆。

信息革命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富裕与强大国家之间的通讯速度:在过去130多年里,至少欧洲与北美之间一直可以实现瞬间通讯。最关键的变化在于两点,即传输信息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及传输能力难以置信地得到提高。实际上,传送和接收信息的费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存储与带宽能力增长迅速。重要的通讯设备生产商思科公司(Cisco）估计,到2015年,将有超过150亿个设备被连接到互联网上,其数量是世界人口的2倍,这会导致信息传播总量达到将近1个泽它字节(one zettabyte,即1万亿千兆字节）。这些巨大的变革,被有的人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正在改变着治理的性质,影响了国家的主权,以及导致了权力的分散。

过去的教训

技术总是对人类的互动以及管理他们的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在古代的苏美尔）发明的书写,使得第一个早期的官僚国家得以建立。在欧洲发明的活字版印刷,使得中世纪的封地演变成现代国家。 [1] 通讯、交通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使得治理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最早产生现代主权国家的西欧,国家都很小,这并非偶然。 [2] 欧洲最大的国家法国在世界只能排到第49位。澳大利亚相当于12个法国,美国或加拿大相当于15个法国。正在进行中的科技发展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通过回顾过去,可以得到有关我们正在走向何方的某些想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在工厂和交通工具中的使用,对经济、社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生产、工作、生活、社会阶级以及政府的模式因此都发生了变革。公共教育兴起了,因为日益复杂以及更具潜在危险的工厂需要有文化知识和受过培训的工人。像伦敦"警察"(London's bobbies)那样的警察力量被建立起来了,以便应对城市化问题。运河和铁路那样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财政补贴的支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合成材料与内燃发动机的使用为标志,也带来了类似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美国从一个大体上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大体的工业国和城市化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民或者仆人。几十年之后,大多数美国人住在城市和在工厂里上班。随着城市劳动者和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阶级和政治分野形势发生了变化。尽管有些滞后,但政府的角色也有所变化。两党进步运动催生了反托拉斯法案,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前身制定了早期的保护消费者条例,联邦储备局致力于维护经济稳定。美国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大国。有人预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在经济、社会、政府和世界政治等方面,导致类似的变革。

这样的历史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影响21世纪世界政治的力量。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变化速度比政府的变革更快。主权和权威的政治重要程度并没有以相同的速度增大。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指出的:"如果说在后工业社会存在着一个压倒一切的社会问题的话,尤其是在变革的管理方面,那么它就是程度的管理问题。" [3] 用简单的话来说,新技术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果我们只关注民族国家的硬权力,那么就会无视新的现实。

我们还处于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而且当今信息革命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正如随着18世纪末蒸汽技术的使用与19世纪末电的发明,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滞后现象,因为社会不得不花时间去学会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社会制度的变革速度比技术更慢。比如,电动机发明于1881年,然而,大约在40年之后,亨利·福特(Henry Ford)才率先充分利用电力所带来的好处,对工厂组装线加以重组。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领域,也同样存在着滞后现象。美国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

一个世纪之前因为新的廉价电力而出现的大众通讯与广播,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去理解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它带来了大众通俗文化的时代。大众通讯和广播(而不是电话),会产生政治集中化的后果。随着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甚至在民主国家中,信息对政治集中化

的影响力也大于只有地方新闻机构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利用广播电台,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在集权国家中,这样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政府可以压制其他信息来源。难怪一些学者相信,如果没有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大众通讯手段的话,专制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



纽约商品交易市场的交易员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担心信息革命时代的计算机和通讯手段,会导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中央集权控制的现象。大型计算机系统似乎加强了中央计划,并且增强了那些处于控制金字塔顶端的人士的监管权力。政府电视台会主导新闻发布。通过中央数据库,计算机可以使得政府更容易进行识别与监管工作,而且商业化已经改变了早期的意志自由论文化和互联网规则。尽管如此,编成密码技术(the technology of encryption)正在发展之中,而且一些能够让使用者匿名进行数字信息交易的程序也被开发出来了。虽然政府正在努力控制网络空间,但是同第二次信息革命相比,互联网也让政府更难加以控制。

随着计算费用的减少、计算机的小型化和便携化,计算机所带来的分权化影响要大于集权化影响。互联网建立起一个使得控制信息的权力更加分散化的体系。同编辑和播音员所控制的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相比,互联网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个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个人主页、博客或者Twitter Feed)、群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传

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在线聊天室或者留言板）,可以进行无限制的交流。政治学家皮帕·诺里斯(Pippa Noris）在比较电子通讯手段与过去其他通讯手段的时候写道:"互联网信息具有流动更远、更快的能力,而且较少需要通过中介手段。" [4] 集中监管是可能的,但试图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政府将面对很高的代价。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专属领地。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恐怖主义者在内的个人与私营组织,将拥有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的权力。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未来的权力将更加分散,非正式网络将挑战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互联网的速度意味着,各国政府控制议事日程的能力将下降。政治领导人在必须对事件做出反应之前,将享有较小的自由度,他们必须同更多的行为体共享同一个舞台。建构主义者警告说,我们不能为"均势"、"霸权"这样的词汇所迷惑,也不能仅仅通过衡量中央政府所具有的硬权力,来比较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他们指出,现实主义者把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作台球之间相互平衡与撞击的论点,会使得我们无视新的复杂现实。

新的世界政治?

信息革命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它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吗?现实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信息革命将对最强大的国家有利。不管是好还是坏,信息革命正通过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使得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方面,富国获益、穷国落后。虽然一些穷国,比如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在迈向信息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201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依然生活在欧洲与北美。今天,5个生活在北美的人当中就有4个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在非洲只有不足6%的人在使用互联网。世界仍然由各种不同的经济体所构成,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工业为主,有的以服务业为主。受信息革命极大影响的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政府,同那些至今较少受信息革命影响的国家共存与互动。

这种数字分野(digital divide）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费用的下降可能让穷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即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例如,在很多非洲国家,廉价手机的功能除了通讯之外,还有金融和货币服务。无线通讯已经开始取代费用昂贵的有线通讯,语音识别技术可以让不识字的人使用电脑通讯设备。技术在不断传播,而且许多国家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硅谷。然而,识别高科技王国的虚拟钥匙,比开启实际的大门要更容易一些。随着时间的发展,穷国将(但不会很快）拥有发达的通讯基础设施、受保

护的财产权、明智的政府政策、鼓励创建新产业的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及一支熟练的劳动力大军(其中很多人懂英语,因为英语是互联网的主导语言),但是它们不会很快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在印度,虽然它已经符合上述一些标准,其软件公司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印度12亿人口中依然有将近三分之二是文盲。

信息革命具有一种分权和拉平的效应,但它会使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均等吗?原则上说,随着信息革命降低费用和减少市场准入的壁垒,它将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和增强小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然而在实践中,国际关系要比这种技术决定论所描述的前景复杂得多。信息革命在某些方面的确帮助了小国,但是也在其他方面帮助了已经很强大了的国家。现实主义者提到了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规模因素依然很重要。经济学家所说的准入壁垒和规模经济依然存在于同信息有关联的权力的某些方面。比如,软权力就受到广播或者影视节目中的文化内容的极大影响。那些大的、有地位的娱乐产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就经常受益于规模经济。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支配地位,就是一个明证。那些后来者很难同好莱坞竞争,尽管印度宝莱坞(Bollywood)的影响在增大。不仅如此,在信息经济中,存在着"网络效应",规模越大,回报越多。众所周知,一部电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二部电话使得电话具有价值,随着电话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电话的价值更高。

第二,虽然目前传播已有信息的费用很低,但是新信息的收集和产生通常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许多竞争激烈的情势中,掌握新信息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使用了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使用信息的数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用蜡烛来进行类比: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然而,在一个竞争性的情势中,假如我先拥有发光体和比你先看到某些东西,那么这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情报收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以及中国收集和制造情报的能力都强于其他国家。公开发表的数字表明,美国每年花在与国防无关的情报方面的钱大约为550亿美元。在某些商业场合中,快速的追赶者往往比创业者要做得更好,而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创业者则通常比追赶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让人觉得偶然的现象是,虽然人们在谈论互联网减少了距离的制约力,但是大量公司依然聚集在硅谷,一个位于旧金山南部的人口稠密的小地方,这是由于所谓的"鸡尾酒聚会效应"。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在新信息公布之前就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该信息。道格拉斯·麦格雷(Douglas McGray)指出:"在一个新技术总是会不断过时的产业中,企业必须了解需求、获得资金和把产品迅速地推向市场.否则就会被对手

所击败。"[5] 在信息经济中,市场规模以及竞争对手、供应商和消费者距离市场的远近,依然很重要。

创业者通常是信息系统标准和架构的制定者。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著名的诗句所说的,前进的道路在森林中分岔,你如果选择走其中一条道路,那么就不可能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中去了。虽然在有的时候,廉价的技术会为你提供捷径,使得你有可能超越创业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信息系统的路径依赖式的发展过程总是反映了创业者的有利地位。英语成为在互联网上被加以使用的语言,以及互联网上那些顶级域名的分布格局,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冷战军备竞赛带动大规模投资,美国在各种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通常总是创业者,现在还处于领先地位。然后,美国作为一个创业者也使得它更依赖于互联网,从而导致美国比朝鲜那样的孤立国家更为脆弱。

第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关键领域中依然很重要。信息技术对武力的使用,产生了一些有利于小国的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对原本就很强大的国家有利的影响。现在用很少的费用就可以从商业渠道获得过去那些十分昂贵的军事技术,这有利于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并且增加了大国的脆弱性。比如,今天任何一个人就可以从商业公司订购到,或者干脆从谷歌地球获得有关其他国家的卫星图像,花费很少或者是免费。商业公司和个人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卫星照片,而仅仅在几年以前,这些照片还属于高度机密的材料,花费了有关国家政府数十亿美元的金钱。几年以前,一个非政府团体认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太危言耸听,于是公布了有关朝鲜导弹发射场的一些私人卫星照片。显然,其他国家可以购买到有关美国军事基地那样的照片。

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可以提供精确定位,它们在过去只为军方所使用,如今在沃尔玛这样的商场里就可以买到,很多新车都装有GPS导航系统。另外,信息系统为恐怖主义团体(包括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团体)增加了有利的打击目标,从而使得富国很脆弱。我们可以设想,未来一个高水平的敌手(比如拥有网络战资源的小国)可以对美国进行讹诈。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发动的网络攻击的前景,而且由于一个国家无法搞清楚发起攻击的地方,实施威慑战略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其他的发展趋势也增强了那些业已十分强大的国家的实力。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军事革命。部署在太空上的传感器、电视直播、高速计算机以及复杂的软件等,使人们具有了收集、分类、处理、传输和传播有关各地方发生的复杂事件信息的能力。这种重要的战争空间观念

同精确打击目标武器相结合,会使得一方占据很大的优势地位。正如两次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除非国家拥有把信息同武器相结合的能力,否则那种估计武器装备(如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的方法就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所犯的错误(也是那些在1990年预测美国将伤亡惨重的国会议员们所犯的错误)。很多相关的技术在商业市场上有出售,较弱小的国家会购买到很多这样的技术。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最新的硬件或者先进的系统,而在于具有"使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或者占据现代军事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例如,虽然任何人都可以买到GPS接收机,但是美国军方在紧急状态下有能力更改GPS接收机赖以工作的信号,这是因为提供信号的卫星属于美国所有。换句话说,美国可以迅速地让那些使用GPS导航系统的敌对力量陷于混乱境地。由于在信息战中,甚至某个小小的优势地位就可能改变结局,所以美国的巨大领先地位今后很可能依然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尽管它也可能是一个脆弱之源。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也在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以便自己不受制于美国的权力。现实主义者所看到只是方式的变化,而非世界政治的基本变革。

自由主义者赞同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信息革命将使民主国家的作用得到加强,从而最终实现康德的民主和平。就国家而言,大多数信息塑造者是民主国家。这并非偶然。民主国家社会熟悉信息的自由交流,而且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会因信息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威胁。它们之所以能够塑造信息,是因为它们也能够获得信息。极权国家属于对信息反应迟钝的行为体之一,它们面临着更多的麻烦。有些国家的政府(比如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互联网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提供方,以及监控互联网用户,来限制本国公民对互联网的使用。这样的控制是可能的,但是代价很高,而且出于政治目的的网络控制并不完全有效。新加坡是一个努力把政治控制同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国家,它一直希望在进行政治控制的同时提高互联网的作用。但是,新加坡这样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普遍反对控制互联网,新加坡面临着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工人流失的危险,这些人是确保新加坡在信息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新加坡就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它要改革教育体制,鼓励个人的创新精神,这是信息经济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放松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埃及在2011年的示威中曾经短暂地切断互联网服务,并且从中发现,封闭的体系总要付出较高的代价。

封闭的体系要付出较高代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把资金注人一个极权国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极权国家的重大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自由主义者指出,透明度正成为那些争取外来投资的国家的重要资产。防止信息外流的能力看上去似乎对极权国家有利,但是

它损害了国家的信誉与透明度,而信誉和透明度是在全球竞争中吸引外来投资的必要条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缺乏透明度的政府信誉较低,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有偏见性和选择性的。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压制性措施不仅在国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会损害国家的国际声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都认识到,压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做法,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软权力。它们通过启动民主化的进程,增强了自己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今后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增强的有关政治参与的要求。

不管互动和虚拟共同体今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免费信息通过众多渠道增加其流通量,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后果,即国家丧失了很多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寻求发展的国家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及其相关的组织。地缘意义上的共同体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希望本国快速发展的政府将不得不取消那些保护官员不受外界监督、阻碍信息流动的壁垒。那些希望提高本国发展水平的政府再也不能把自己的金融和政治形势隐藏在国家的暗箱之中(比如朝鲜和缅甸所做的那样)。随着开放和民主观念的传播,自由主义者看到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对于信息革命是否改变世界政治这个问题,建构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一些建构主义者声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开始走向消亡。第三次信息革命对中央政府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海蒂·托夫勒(Heidi Toffler)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信息革命正在葬送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那种等级制的官僚组织。[6] 在公民社会中,随着分权化的组织与虚拟共同体在互联网上产生,它们跨越了领土管辖界线,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如果这些预言家是正确的话,那么结果将会是一种新的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即公民具有多重认同和效忠对象,以及声称对公民具有管辖权的共同体相互重叠。简单地说,这些变革意味着,在过去350年中主导世界政治的现代集权化国家将会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将面对的不再是"国际"政治,而是范围更广的"世界政治"。一位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可能会同等地效忠地方领主、公爵、国王和教皇。一个未来的欧洲人可能同时效忠布列塔尼、巴黎、布鲁塞尔以及一些与宗教、工作和各种兴趣相关的网络共同体。

虽然今天的国际体系依然属于主权国家体系,但是建构主义者指出,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种共同体和治理方式重叠与交叉的模式,它有点类似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正式确立国家体系之前的情势。在封建时

代,跨越政治边界的跨国接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逐渐为后来兴起的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压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在30年前,跨国接触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只限于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国公司、科学团体以及学术组织的精英人士之间的联系。如今,互联网正在为无数人提供费用低廉的、参与跨国交流的手段。

主权与控制

主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许多政治家抵制任何可能限制国家自主地位的做法。他们对联合国在限制武力的使用方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经济决定以及创立关于环境的制度与条约的努力感到担忧。在他们看来,有关国际共同体的想法纯属幻觉。

但是,有关主权国家命运的辩论一直是有误区的。正如建构主义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说的:"现在有一种极其苍白无力的思想倾向,即从思考可能取代国家的制度实体之角度,来想象国家体系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7] 一种更好的历史类比事例是在封建早期阶段形成的市场与城镇生活。中世纪的贸易集市并没有取代封建权威制度。它们没有拆毁城堡的城墙,也没有废黜当地领主,但是确实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联盟以及由"城镇空气带来自由"这句格言所概括的新态度。

中世纪商人创造了商人法(Lex Mercatoria),即用来管理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套商务活动的私人行为规则。同样地,在今天,从黑客到大公司,每个行为体都在制定互联网规则与规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控制范围之外。跨国公司所使用的设有防火墙的局域网(intranet)以及编成密码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公共空间为私人所挪用" [8] 。像公司局域网或者涉及专门问题(如环境)的新闻组这样的私人系统,并没有正面挑战主权国家的政府;它们只是增加了一种主权国家无法有效控制的相互关系。人们在参加跨国网络共同体的同时,可以继续充当效忠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的视野一定会与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那些典型的、效忠国家的公民的视野不同。

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制度的角色也可能渐进发生变化。在领土国家兴起之后,其他取代中世纪统治方式的行为体,比如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和汉萨同盟,依然作为有活力的替代方式而得以继续存在,能够进行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征税与争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真正的问题,并不

是主权国家继续存在,而是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正在怎样被加以改变。"国家的影响力在某些领域得到增强,在某些领域则受到削弱。当权者们已经认识到,远离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增强自己的有效控制力。" [9] 所有的国家,包括最大的国家,都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难以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资金流动、毒品交易、气候变化、艾滋病、难民、恐怖主义以及文化入侵等等。国家治理的复杂化并不能等同于主权受到侵害。政府会适应变革。然而,在适应的过程中,它们也改变了对主权管辖、控制以及私人行为体的角色的认识。

我们以美国边界的控制问题为例。机场、港口以及陆上边境口岸都面临着各自特有的挑战。在2010年,单单是从陆上边界口岸进入美国的,就有2.34亿人、9300万辆小汽车、1000万辆卡车、33.5万辆巴士、3.4万列火车。据估计,大约有500万名非法移民通过步行或者乘车,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地区进入美国。"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溜进美国,而且运入几磅致命的生物或化学制剂,比每年非法贩运数吨的海洛因和可卡因要更容易。国土安全部对付这类人和物品流入美国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在其他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情报人员与协作行动把手伸到境外,以及依靠私营企业开发商品流通的跟踪系统,让执法人员可以对运入美国的货物在入境之前进行"虚拟"检查。今天,海关人员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协助企业采取安全措施,以减少为贩毒分子所利用的风险,而且监控商品流通的国际合作机制也正在创建之中。主权国家的确在适应变革,但这样一来,它也改变了政府管辖权的含义与排他性。法律边界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在实践中显得很模糊。

国家安全,即不存在对基本价值的威胁,是另外一个例子。气候变化或者病毒传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生命威胁,会比一些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即便我们从更为狭义的角度来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即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有组织的暴力,军事安全的性质也正在发生着变化。正如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U.S. Commission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指出的,美国自从1814年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外国军队的入侵,美国军队的任务是在远离本国领土的地方投放力量和从事战争。然而,美国军队并不能有效保护美国自己,无法避免恐怖主义者利用民航飞机作为武器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单纯从数字上说,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的跨国恐怖袭击中所遭受的人员损失,要大于日本人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从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来看,后者几乎是前者的2倍)。今天,攻击者可能是政府、团体、个人或者某种联合体。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基地网络,其成员包括来自许多国家的个人与团体,据说在50个国家(包括美国)有其基层组织。然而,有的入侵者可能具有秘密身份,而且甚至离目标国家很远。如本书后面将论述的,网络攻击可能对安全构成真正的跨国性威

胁。于是,核威慑、边境巡逻以及驻军海外以塑造地区均势等等,在信息时代依然很重要,但是它们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

即便是在法学领域,也产生了对主权的不同解释。自从1945年以来,《联合国宪章》中同时存在着有关人权的条款和保护国家主权的条款。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宪章第2章第7条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讨论保护的责任(R2P,见第六章)时所了解到的,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但并非单一声音的发展趋势,即认为不干涉属于国家必须通过好的行为来获得的一种特权,而不是它们绝对享有的一种权利。全球反种族主义规范的形成,以及人们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使得大多数联合国成员违背了不干涉原则。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基于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授权对利比亚内战进行军事干涉,尽管安理会并未能在1999年授权北约干涉科索沃,但利比亚和科索沃的情势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很类似。《联合国宪章》同时把人权与维护国家主权都视为重要原则,然而重视前者会损害后者。一些新的行为体介入了这些争论之中。1998年,皮诺切特将军在英国被拘留,这是因为西班牙根据皮诺切特在总统任期内侵犯人权和犯下罪行的事实而要求引渡他。英国最终拒绝了西班牙的请求,但只是根据法律上的理由,而不是根据英国或者智利的主权权利。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使得协调工作比较容易,并且增强了人权活动家的力量。但是,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原先属于殖民地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坚持维护合法主权和抵制外来干涉。国家主权原则与正在兴起的人权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后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在许多人看来,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政治认同的重要源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可以有多重和交叉的认同——家庭、村庄、族群、宗教、国民和世界主义者认同,而且其中哪一种认同居主导地位取决于具体的不同场合。在许多前工业化国家,在部族或部落层次上的次国家认同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某些后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世界主义者认同,比如"全球公民"或者"地球的守护者",正在形成之中。现在要全面理解互联网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认同的塑造过程可以同时朝着相反的方面发展,也就是说,由于环境的左右,人们既可能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也可能把自己看作是布列塔尼人,或者只把自己看作是巴黎人。

我们在散居共同体(diaspora communities)的政治中,可以发现那种热衷于利用互联网来使用软权力的现象。用信息专家戴维·博里尔(David Bollier)的话来说,"互联网对这样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天赐之物,因为它使得那些数量很多和享有共同的历史,但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人们,可以组成大的虚拟共同体" [10] 。互联网让他们向故土上的同胞传

播具有吸引力的观念。外国公民和当地民众之间的互联网沟通,引发了1998年北京的示威活动,其矛头指向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针对华人的骚乱。有关印度尼西亚华人悲惨遭遇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到北京。同样地,2008年在津巴布韦,2009年在伊朗,互联网在传播有关政府在有争议的选举中所作所为的消息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虽然手机和互联网让世界关注镇压和侵犯人权事件,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导致政府变更。新技术也没有在2007年使得缅甸政府停止镇压佛教僧侣和其他抗议人士。

互联网也让一些松散的组织,而不是等级制的组织,可以迅速地发起示威活动。在越南战争时期,筹划一次示威活动需要花数个星期或者数个月的时间,以便散发小册子、张贴标语以及进行电话联系,从最初只有2.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发展到1969年出现的人数达到50万人的示威活动,这就经过了4年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2月的一个周末,就有80万美国人和150万欧洲人上街抗议即将发生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11] 抗议者们并非代表"国际共同体",但是他们可以影响那些主要国家的社论作者、议员以及其他头面人物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的观点可以用"国际共同体"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加以概括。 [12] 对合法性持续追求显示了软权力的重要性。

其结果可能是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始终如一地朝一个方向发展。正如皮帕·诺里斯所言:"互联网所具有的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交流的特点……似乎很符合网络文化那种不拘小节的平等主义和意志自由的性质。" [13] 一种效应是"闪光式运动",即突然爆发的抗议活动,它们是由特定问题或事件所引发的.比如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还有在2000年秋天在欧洲政治中突然出现的反燃料税同盟,或者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抗议行动。 [14] 政治变得更具有舞台效果,而且是面向全球观众。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叛乱者,主要依靠的手段并不是枪弹,而是跨国性宣传,这种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协调的,以此迫使墨西哥政府采取改革措施。在2004年,一些活动家利用手机在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组织和平革命。

互联网具有动员民众、促进政治变革的力量之最为令人关注的范例,或许就是最近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在2011年,一波潮汐般的抗议浪潮席卷北非和中东,它不是事先策划好的,也没有被任何人所预见到。其导火索是在2010年12月17日,一个名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 的突尼斯年轻街头小贩采取了绝望的行为。在被腐败官员一再骚扰、没收货品与侮辱之后,布瓦吉吉忍无可忍并自焚以示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内,公众对他不幸遭遇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声讨政府的渎职与腐败行为,最终导致掌权23年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 总统下台,并且引发埃及、也门、叙利亚、巴林以及利比亚也发生类似的群众揭竿而起事件。长期执政的埃及强人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很快随之在2011年2月11日被轰下台。其他被困中的独裁者们,或者通过一些小的让步,或者通过采取暴力镇压手段(有的时候两种手段都采用) ,竭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相关国家的政府并非都倒台,各国的政治发展也有所不同。

"阿拉伯之春"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互联网推动政治变革的力量呢?互联网与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卫星电视台一起,让北非与中东的青年与青少年了解到,其他地方(比如欧洲与北美) 与自己年龄相仿、教育程度类似的人过着比自己好得多的生活。渗透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让这些年轻人进行互动,并且看到本族群散居共同体的海外移民所享有的较好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使得独裁统治政权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过以及领导人的无能。此外,一旦抗议活动爆发,社会媒体就易于发挥动员与协调抗议活动的作用。

我们同样可以用深层原因、中层原因与突发原因这三个概念,像本书第三章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样,来解释"阿拉伯之春"。深层原因包括人口因素(年轻人在北非和中东国家的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 、经济因素(大规模失业人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有关权利被剥夺的认知) 以及政治因素(民众无能为力的感觉以及不认同国家领导人,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水平的下降) 。突尼斯街头小贩提供了一个突发原因,而信息革命则提供了关键的中层原因。通讯技术以及社会媒体使得经济和政治不满情绪得以爆发,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所有这些似乎都十分清楚。但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现象,即当时并没有人预见到"阿拉伯之春"。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在理解北非、中东政治动力的时候,并没有把新近出现的信息革命之影响考虑进去。如果发现自己看不清楚远处的景物,那么通常的做法是换一副眼镜。

尽管"阿拉伯之春"表明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地区政治的动力,但我们基本上尚未发现信息革命影响政治认同的证据。在任何一个经历动荡的国家中,动荡期间以及动荡之后的基本政治分野,与动荡之前的基本政治分野并没有什么两样:比如,埃及的世俗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对立,利比亚部落之间的不和,以及巴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较量。然而,电脑连线可能有助于缓和这样的分歧,因为人们比较容易结识国内外不同团体的成员。政治学家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 发明了一个新词"散合"(fragmegration) ,用来归纳这样的发展趋势,该词表达了这么一个思想,即形成较大共同体的整合过程与形成较小共同体的过程会同时出现。然而,人们没有必要去改变英语这种语言,以便认识会同时发

生的和显然矛盾的运动过程。它们并没有宣告主权国家的消亡,但是的确使得主权国家政治局势变得比较动荡不定,而且更难以把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遏制在国家边界之内。

后续阅读材料

1. Ronald J. Deibert, *Parchment, Printing, and Hypermedia :Communication in World Orde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Elizabeth C. Hanson,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

跨国行为体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全球信息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s) 的作用得到加强,而跨国行为体指的是那些行为跨越国界的非国家行为体。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我们经常使用诸如"德国想得到阿尔萨斯"或者"法国害怕英国"这种简单化的表达方式。这种简单化的表达方式是很有用的,这在国际政治的古典时期尤其如此。在18世纪,君主就代表国家。如果弗雷德里克大帝想为普鲁士获取什么,那么弗雷德里克就等同于普鲁士。在19世纪,一个较为庞大的精英阶层控制了对外政策的决策,但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外交基本上还是由少数人掌握的内阁外交。除此之外,在国际政治古典时期,被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领域是比较狭窄的。军事安全问题在议事日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它们主要是由外交部门处理的。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跨国行为体几个世纪来一直都在起作用,但是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量变标志着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变革。在全球相互

依存的世界中,国际政治议题更加广泛,而且每个人似乎都想介入。比如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内政府机构都扮演某些国际角色。农业部关注国际粮食问题,环境保护署关注酸雨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海岸警卫队关注海上倾倒垃圾问题,商业部关注贸易问题,财政部关注汇率问题。国务院不能掌管所有这些问题。美国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小外交部。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美国的驻外使团就会发现,来自国务院的人员在大部分美国驻外使馆中只占少数。

在复合式相互依存情势中,各种社会之间的互动点很多。这就相当于十字路口上车辆太多,或者说一个十字路口只有一位警察是不够的。这些跨越国界的、对外政策机关管辖范围之外的相互关系就是跨国关系。它们包括(但不只限于)人口的迁徙,资本每天在世界股票和资金市场上从一个国家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武器和毒品非法交易以及某些形式的恐怖主义。政府可以努力对这些行为加以控制,而且它们必须控制恐怖主义或者走私问题,但往往要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苏联对跨国关系加以严密的控制,结果苏联经济深受其害。在经济相互依存程度高和存在着大量跨国行为体的环境中,那种在古典时期很有用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经常说"日本同意增加进口"或者"美国反对就大陆架提出广泛的要求",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日本跨国公司在增加出口,或者一些美国公民正在国际上进行游说,希望对大陆架的定义更为宽泛一些,这和美国海军的立场相左。

这种利益上错综复杂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但它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表现要比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上的表现更加明显。在安全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通常比较一致。全体国民的生存显然是一种集体产品。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存在着较多利益分歧。因此,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和经济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的上升,我们发现传统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政治过程了。

让我们再用本书第七章所分析的石油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1973年的时候,消费国希望石油价格较低,生产国希望石油价格较高。但是,政治要比这复杂得多。消费国里头的生产商希望石油价格较高。那些较小的得克萨斯石油生产商们很高兴看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有着相同的利益,而与新英格兰地区寒冬里的消费者们则没有共同的利益。核能的生产商看到石油涨价感到很高兴,因为这可能促使核能成为一种更有竞争力的能源。欧洲日益衰落的煤炭行业的经营者以及失业的煤矿工人看见油价上涨也很高兴。生态保护者认为石油价格上升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有助于减少消费和污染。因此,在消费国内部,人们对于油价有不同的利益考虑。在相互依存的形势下,

我们如果揭开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面纱,那么就会发现,政治是另外一种样子。石油消费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没有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比如动用武力,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消费国内部的一些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认为,导致能源价格高涨的敏感性相互依存是值得欢迎的。那些欢迎石油涨价的人事实上结成了一个跨国联盟。

当然,国家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利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19世纪,美国政治的一个特征是,南方农场主和北方实业家在关税问题上进行斗争。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提高了钢铁进口关税,这让钢铁生产行业的公司与工会组织感到高兴,但也让汽车生产商那样的钢铁消费者感到不快。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国内政治一直对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国内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这种影响变得更大了。不仅如此,随着一些国内利益集团与其他国家利益集团的沟通与交流的增多,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世界政治模式得以产生。

图8.1描述了两种形式的世界政治。传统国际政治形式就是图8.1左边的那个图形。传统国际政治通常选择明确的路线。如果社会1的人想对政府2施加压力,那么他们就得请求政府1(通过正常的国内政治,如垂直线所示)和政府2(通过正常的政府间政治,如水平线所示)进行对话。但是在跨国关系中,社会1的人可以直接对政府2施加压力,或者社会1的人可以直接对社会2的人施加压力。在右边图形中,两条对角线显示跨国关系,而下方的水平线则代表着跨越国界的个人与(或)非国家行为体的直接交往。(未在图中显示的还有不同国家政府下属部门之间日益多样的、重要的直接联系,我们把它们称为跨政府关系。有的时候,中央政府下属的部与外国对等部门的关系,要好于同本国政治领导人的关系。比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和加拿大的军方之间进行密切合作,但白宫与五角大楼、加拿大政府与加拿大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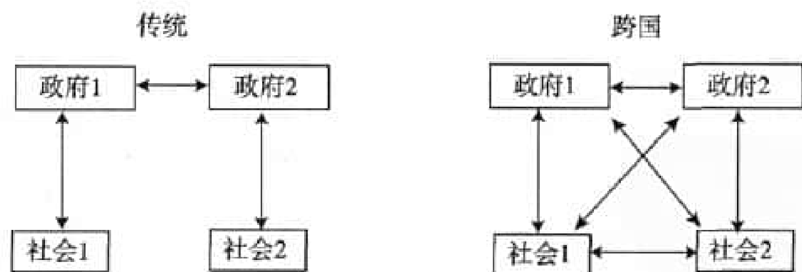


图8.1 传统世界政治与跨国世界政治

当我们谈论相互依存政治的时候,我们不可假设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纳入

传统的政府间关系的模式之中。复合式相互依存的一个特征就是,除了国家之外,其他行为体也很重要。传统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并没有错,它依然比较接近相互依存政治的现实。国家通常是主要的行为体。然而,"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如建构主义者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说国家是主要行为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到所有对于理解相互依存的政治和冲突都很重要的行为体。

非政府组织(**NGOs**)

私营组织也日益跨越国家边界(见表8.1)。跨国宗教组织反对奴隶制的行为可以追溯到1775年,社会党国际、国际红十字会、和平运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组织以及国际法学会等等非政府组织,都产生于19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有176个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1956年,有将近1000个这样的组织,而到了1970年,已经有大约2000个。最近一些年来,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由6000个增加到大约40000个。(现在已经有一个超大型NGO,换句话说,就是NGO的NGO,它就是世界NGO协会,即WANGO。)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它们只是统计了那些正式创建的组织的数量。许多非政府组织声称自己是根据"全球意识"行动,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不在国家管辖范围之中,或者国家可以被视而不见。尽管这些非政府组织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但它们有时可以通过直接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施加改变政策的压力,以及间接地改变大众有关政府和企业应该怎么做的认识,从而帮助制定出新的规范。从权力资源的角度来看,这些新型的团体一般都不具有很多的硬权力,但信息革命大大增强了它们的软权力。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 Watch**)

网站地址: www.hrw.org

创建时间:1978年

总部:纽约

预算:4800万美元(资助与收入)

·总部设在美国的、最大的人权组织

·通过记录80多个国家侵犯人权事件、引起媒体关注此类事件以及游说政府和组织对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加外交压力,羞辱侵犯人权的行为体

·为1997年因为禁止地雷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个人与团体成员之一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网站地址: www.crisisgroup.org

创建时间:1995年

总部:布鲁塞尔

预算:大约1700万美元

·分析"处于暴力冲突爆发、升级或者反复爆发危险境地中的"国家,向政策制定者提出缓解紧张局势和解决冲突的政策建议

·危机组织董事会成员来自政界、外交界、商界以及媒体,负责确定组织的行动计划和游说采用本组织的政策建议

大赦国际(Amnest International)

网站地址: www.amnesty.org

创立时间:1961年

总部:伦敦

预算:4500万英镑(大约7300万美元)

- ·动员150多个国家300多万名成员的力量,防止和制止"严重侵害人的肉体和精神、思想言论自由和不受歧视的权利之行为",以促进人权

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

网站地址:www.msf.org

创建时间:1971年

总部:日内瓦

预算:2亿欧元(大约2.87亿美元)

- ·援助对象超过70个国家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
- ·援助"遭受自然或人为灾难、武装冲突之苦的人口,没有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归属上的歧视"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创建时间:2000年

总部:西雅图雇员:957人

资产:大约363亿美元(捐赠)

- ·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创立
- ·旨在"促进以下四个领域中的公平:全球健康、教育、公共图书馆以及援助处于危机中的家庭"

国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 International)**

网站地址: www.oxfam.org

创建时间:1942年总部:英国牛津

预算:大约8.947亿美元(项目支出)

- "一个由13个组织所组成的联盟,旨在共同努力寻找解决贫困和不公正的持久解决方案"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

网站地址: www.icrc.org

创建时间:1863年

总部:日内瓦

预算:11亿瑞士法郎(大约14亿美元)

- 执行《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责任即"在武装冲突中访问俘虏、组织救助行动、帮助离散家庭团聚以及其他类似的人道主义行动"
- 为一个"仅仅致力于人道主义使命的公正、中立与独立组织,旨在保护战争与国内暴力受害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

网站地址: www.greenpeace.org

创建时间:1971年

总部:阿姆斯特丹

预算:大约2.26亿欧元(大约3.24亿美元)

·动员超过40个国家280万支持者的力量支持抵制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捕鲸和基因工程的努力

·支持保护古老森林、清除有毒化学物品、鼓励可持续的贸易

今天的政府必须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因为后者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增强自己的软权力和直接对政府施加压力,或者通过动员民众来间接地对政府施加压力。鉴于信息时代那些令人可信的编辑与出点子的人有能力过滤数量极大的信息,要评估跨国组织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大体上可以通过了解这些组织被主流媒体提及的次数来加以衡量。根据这种衡量标准,那些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在争夺有影响的编辑的注意力之较量中,成为了被认可的、有地位的角色。例如,在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发布《2003年度世界人权报告》,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行为仅仅10天之后,就有288家报纸和杂志发表了提及该组织的文章。[16]

过去十年的新闻报道反映了这类组织在发展壮大的事实。"非政府组织"或者"NGO"这个词在英语报纸中出现的次数,1991年7月为70次,2001年7月为576次,2011年7月为4371次,在20年中增加了62倍。除了人权观察组织之外,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比如大赦国际、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以及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等等,从被主流媒体提及的次数这个意义上说,也都迅速地壮大了起来。随着信息革命减少全球通讯成本,世界政治的准入门槛也降低了。

不仅跨国与政府间的接触数量大大增加,而且这种接触的类型也有所变化。早期的跨国关系,受到像跨国公司或者天主教教会这样大型的官僚组织的严格控制,这样使得它们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利。这样的组织今

天依然重要,但是互联网时代较为低廉的通讯费用,使得那些结构松散、没有多少总部工作人员的网络组织,甚至是个人,也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些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在穿透国家边界方面所做的努力,显得特别有成效。因为它们经常把一些国家国内政治中的重要人物网罗过来,从而可以让媒体和政府关注那些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前面提到过的禁止地雷条约就是一些互联网组织同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政府、一些政治家以及像已故的戴安娜王妃这样的名人进行合作的结果。在全球贫困问题上,摇滚明星、非政府组织和政治领导人一起努力,促使一些背负巨额债务的穷国获得了债务减免。

环境问题是另外一个例子。在从1997年京都会议开始的每一个重要的气候变化会议上,非政府组织或者作为各国代表团之间的一个交流渠道,或者作为议题的设置者,或者作为公众压力的动员者,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 组织的Live Earth音乐会,在全球8个主要城市24小时不间断地演出,让全球观众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抵制气候变化的行动。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地缘共同体和主权国家将继续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它们会更难摆脱外来的影响,其边界更容易被渗透。他们不得不同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这些行为体可以利用信息来增强自己的软权力,以及通过动员大众直接和间接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如果想看到国家快速发展,那么就必须消除一些过去使官员免于外界监督但阻碍信息流通的壁垒。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今后政府将无法像缅甸和朝鲜当局那样,把本国的财政与政治形势放在一个黑箱子里面,否则的话,就别想看到自己国家的发展达到很高水平。那种类型的主权国家要付出太高的代价。即便是那些拥有很多硬权力的大国,比如美国,也会发现自己与新的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而且面临着更多的涉及控制本国边界的麻烦问题。网络空间不会取代地理空间,也不能埋葬国家主权,但是它会如同封建时代的城镇集市一样,与主权国家或者强大的国家共存并使之大大复杂化。

信息革命和复合式相互依存

信息革命并没有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均等。假如它所导致的结果正好相反,那么现实主义者可能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但是,如何解释政府的作用和所有国家的权力因此下降这种现象呢?这方面的变化比较符合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预测。今天,复合式相互依存的

程度的确要比过去大得多,因为社会之间的交流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信息爆炸已经带来了"丰富的惊论"(paradox of plenty) 。 [17] 丰富的信息导致了注意力的分散。人们面对着过多的信息时,很难集中注意力。于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号同背景噪音加以区分的人便拥有了权力。编辑、信息筛选员以及出点子的人变得更加抢手,而且这也是一种权力的源泉。商标名称和获得国际"好管家"的称号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此外,公众对于宣传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和敏感。宣传作为免费信息的一种形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希特勒和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效地运用了宣传鼓动手段。在20世纪90年代,米洛舍维奇控制了电视台,为维护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权力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信度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它是软权力的一个来源。信誉现在甚至比过去要重要得多,政治斗争是围绕着确立自己的信誉和破坏别人的信誉来进行的。在有关可信度的竞争中,不仅政府之间互为对手,而且政府也同包括新闻媒体、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以及科学共同体网络等等在内的众多行为体进行较量。

政治已经变成了一场争夺可信度的竞争。叙事变得更加重要。传统的权力政治典型地表现为哪一方的军事或经济实力占上风。然而在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获得胜利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同其他组织之间相互竞争,旨在增强自己的可信度和削弱对手的可信度。

我们所看到的塞尔维亚和北约相互进行的较量,实际上是竞相提出一个有关1999年在科索沃发生的事件以及次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事件之解释框架。在2000年10月发生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前,45%的塞尔维亚成年人收听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节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31%的人收听由政府控制的贝尔格莱德电台。 [18] 不仅如此,另外一家国内电台B92播送了来自西方的新闻报道,而且在政府极力把它关闭的情况下,继续在互联网上提供这样的消息。在2006年以色列与非政府行为体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中,虽然以色列军队在空中占上风,但是以色列空袭导致儿童被杀的电视画面,让真主党获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看上去纯属宣传的信息不仅可能为人所不屑,而且也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为它会损害一个国家的信誉。在2003年,有关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夸大其词的说法,虽然可能帮助动员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民意调查表明,在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被推翻之后,英国和美国的信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新的条件下,软推销(softsell) 可能比硬推销(hardsell) 更为有效。

伊拉克的例子表明,隐瞒信息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私有信息可能会破坏该信息拥有者的信誉。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ckerloff)所指出的,二手车卖方比潜在的买方更了解该车的缺陷。而且,坏车的车主比好车的车主更想把自己的车卖掉。这些因素使得想买二手车的人总想把车价压低,以补偿自己因没有发现的缺陷而遭受的损失。这样一来,二手车的卖主虽然拥有较多的信息,但是并没有把车卖个好价钱,而且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好的二手车。在不对称的贸易相互依存关系中,权力属于那些敢于坚持立场或者断绝贸易关系的一方,信息权力则不同,它属于那些可以编辑信息、辨别信息的真伪,从而获得正确和重要信息的一方。

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免费信息资源,加上可信度的重要作用,软权力很可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物质资源的作用。在信息制造和传播能力属于稀缺资源的时候,控制出版社、电台和报纸就是至关重要的。硬权力——比如使用武力占领电台——可以产生软权力。从全世界的电视业来看,财富也可以产生软权力。例如,有线新闻网(CNN)总部设在亚特兰大,而不是在安曼或者开罗,这是因为美国在该产业和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CNN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的公司,它把这个事件描述为侵略行为(类似于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而不是旨在洗刷殖民统治屈辱的正义行为(类似于印度的果阿在20世纪60年代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解放"),从而影响了世界范围的民众对此问题的认识。但是,到2003年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线电视网,比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和阿拉伯语新闻频道(Al Arabiya),它们打破了美国人的垄断地位,提供了当地人对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看法。在信息时代,占领伊拉克及其相关报道,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

新的全球行为体

> 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发展阶段,制度和权威的源泉都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或者圣芳济会的领袖们所享有的地位仅次于那些最有权势的君王那样,今天的大赦国际的秘书长和荷兰皇家充牌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远远大于马尔代夫、纳米比亚和瑙鲁的领导人。国家可能不会很快就消亡,但今天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
>
> ——彼得·斯皮罗(Peter J. Spiro)[19]

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这种密切关系,可能在信息时代复合式相互依存的条

件下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广播电视的权力依然存在,但是互联网将日益补充广播电视的作用,互联网有众多的通讯渠道,并且受到众多行为体的控制,这些行为体不能使用武力来控制对方。影响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那些拥有电视网络、电台或者网站的行为体,也包括那些关注信息和错误信息来源的人。

> "人咬狗"
>
> 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Gates) 星期一呼吁美国政府投入更多的金钱和努力来增强"软权力"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援助以及沟通,因为单靠军事无法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盖茨先生戏称,自己作为国防部长,却在国内周游,并努力为增加其他部门的预算而四处游说,这可能属于反常的"人咬狗"的新闻范畴。
>
> ——2007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 [20]

电视广播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形式,它长期以来影响着公众舆论。广播电视台通过关注某些冲突事件和人权问题,促使政治家对一些国外的冲突事件做出反应,而对另一些国外冲突事件则不予关心——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索马里冲突和苏丹南部冲突,美国只对前者做出反应。无怪乎政府一直极力影响、操纵或者控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广播电视台可以被用来向数量众多的人传播相同的信息。然而,从广播(broadcasting) 变成"窄播"(narrowcasting) ,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使得信息发布者们瓜分受众群体,分别面对一部分受众。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政治的影响更大,它不仅让人们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助于协调跨国行为。YouTube视频会影响政治问题被认知和解读的方式。费用很低的交互作用,促使了新型的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 的出现:虽然一群人相互间的物理距离很远,但他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团体中的一员。跨国通讯已经使得边界更容易被渗透。

跨国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非国家行为体并非都是善意的。毒品卡特尔、贩卖人口团伙以及有组织的犯罪辛迪加,显然都不属于善意的非国家行为体。对于这些恶意的

非国家行为体来说,信息革命给它们提供在比过去要远得多的地方采取行动的新机会。"9·11"事件发生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在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宣布进行"反恐战争",并表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21]

201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导致来自90多个国家的2974位无辜民众丧失生命,其中不包括19名丧生的劫持者。记录第二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这一段令人感到恐怖的视频,几乎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差不多使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表达了震惊、愤怒、悲痛以及同情美国的心情。这些恐怖袭击行为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攻击手段的科技含量很低这一事实。那些劫持飞机的恐怖主义者仅仅携带在任何一个五金店就可以买到的美工刀,他们成功地通过安检,并且把民航客机变成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攻击行动如此轻而易举,这使得类似事件很可能在未来重演。

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第一个意象(即个人分析层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9·11"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以及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所解释的,人类对于来自他人的威胁极其敏感,这会导致道德义愤,而且这样的威胁看上去是确切无疑、实实在在的,同时也让人猝不及防。恐怖主义行动就像舞台剧,恐怖主义者正是利用其行为的戏剧性效果来扩大影响。吉尔伯特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很可能将对美国的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这种损害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并非蓄意预谋、逐步产生的。[22]于是,我们有"反恐战争",却没有"反气候变化战争"。

那么跨国恐怖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视角,以及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段。假如我们把跨国恐怖主义主要看作是非正常死亡的一个原因,那么它在目前并非属于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从全球角度来看,跨国恐怖主义攻击的高峰期出现在1987年。如果不算"9·11"事件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暴乱(正是反恐战争让外国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那么在过去15年里,全世界每年因为恐怖主义而丧生的人数不足5000人。恐怖主义攻击频率是平均每天不到1起。作为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之一,恐怖主义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很靠后,排在不安全饮用水、传染病、交通事故、吸烟、过敏反应以及肥胖症之后。在全世界发生的所有跨国恐怖主义事件中,其中只有相对很少的部分与"基地"组织有关。拉美的毒品卡特尔以及准军事组织所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数量要比这多得多。"基地"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频率,如果不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迄今为止大约是每年2次。除了"9·11"事件之外,"基地"组织每次攻击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大致平均为50人。虽然我们很难得到有关恐怖主

义袭击的可靠信息,因为政府不愿意公布可能影响未来行动的信息,但是很清楚,很多"基地"组织的攻击行为事先得到及时制止。也有一些恐怖袭击行动由于能力不足以及不够专业的原因而失败了。"基地"组织攻击美国科尔号战舰(USS Cole）事件,实际上是该组织第二次试图攻击也门亚丁港口内的美国战舰:在第一次预谋的攻击行动中,恐怖主义者在他们的船上装载了太多的炸药,导致船只沉没和攻击行动失败。美国当局抓到了"千禧年炸弹客"艾哈迈德·雷沙姆(Ahmed Ressam）,他在入境处受到盘问后情绪失控并企图逃跑。"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就对世界贸易中心发动第一次攻击,即一辆卡车在该中心地下车库内爆炸。这次攻击只能说是部分成功,它导致6人死亡,1400人受伤。然而,这次攻击也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达到让世贸双子星倒塌的目标,而且参加攻击的恐怖主义者也被抓获,这些人竟然愚蠢地返回位于新泽西州的租赁公司,在没有把卡车开回去的情况下还想要回租车押金。

跨国恐怖主义者在当下只是导致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他们假如能够获取、运输以及引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的话,那么将会使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达到灾难性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政府十分重视反恐问题,这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即便是"基地"组织或者其他某个跨国恐怖主义团体得以染指核武器、化学武器或者生物武器,这也并不能对现代发达国家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冷战的后半期,苏联拥有在半个小时之内摧毁美国社会的能力。而"基地"组织最多能够让美国一座城市陷于混乱,产生一个或许宽达几英里的辐射区。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出于多种考虑。首先,发起一次成功的跨国恐怖主义攻击所需要的组织性能,与造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所需要的组织性能是有很大区别的。恐怖主义团体必须在雷达探测之下进行作业,这就需要拥有必要的资金与通讯手段,组建一些由相互间联系松散的技工所构成的操作小组。要获取、运输以及引爆一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需要拥有一大批具备丰富知识的人才、一个精细的安全团队以及规避或挫败现代主权国家的侦探、封锁的能力。做这些事情要花费很多钱,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基地"组织每年的行动预算大概不会超过3000万美元,或者它只相当于1%的美国国防预算中的不到5%。除了面对面的会见之外,恐怖主义者也利用通讯设施(手机、电台以及互联网）进行活动,但是这样做比较容易为国家情报机构所监视,从而难以摆脱被挫败或抓捕的危险。

然而,"基地"组织能够做到破坏美国的民主特性,束缚其硬权力资产,侵蚀其软权力吸引力。恐怖主义就像柔术(jiu jitsu）运动,小个子进攻者借助大个子防守者的力量来击败对手。可以说,"基地"组织通过促使美国对"9·11"事件采取过激反应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即使用空中力量

以及特种部队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破坏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是,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 ,即在2003年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有权利、也有意愿发动预防性战争,以便应对未来可能来自远方的威胁(该文件本身不恰当地使用了"先发制人战争"这个词) ,这种单边主义与挑衅性的危险思想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爱国者法案》中的一些条款以及在古巴关塔那摩设立囚禁恐怖主义者的监狱,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对民主原则、个人自由以及法制这些美国最具吸引力的软权力资源造成了损害。换句话说,在一些人看来,"9·11"之所以是一场"成功的"恐怖主义袭击,主要不是因为它导致的死亡与破坏,而是因为引起了美国的反应。

所有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公民以及领土免遭恐怖主义攻击,也负有义务去这么做。美国也不例外。然而,抗击跨国恐怖主义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与朋友及盟友的合作,开展坚定的、艰苦的安全与情报工作,同时采取措施不让恐怖主义团体招募到新人,切断恐怖主义团体赖以发动致命攻击的物质与金融资源。虽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吸引了世界的主要目光,但是幕后进行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更为成功。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8月决定不再使用"反恐战争"这个词,这并不意味着他宣布美国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表明他认识到,强调反对恐怖主义政策的强制性、军事性以及吸引眼球的方面,会导致不良后果。正如很多批评家长期以来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打一场针对一个名词的战争:我们只能追捕和挫败恐怖主义者。

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威胁是,"基地"组织或者其附属团体今后获得1枚"失去控制的核弹"(loose nuke) ,并在某个地方把它引爆。因此,美国已经花费了上百万美元,确保前苏联的核武器置于恰当的管理与控制之中。同样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巴基斯坦,它是一个核国家,但是其军队和情报机构庇护伊斯兰激进分子。令人有些惊奇的是,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金融与技术援助的最大接受者之一。然而,巴基斯坦最多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盟友,美国在该地区试图挫败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努力,不止一次地伤害了这一重要的战略关系。例如,美国利用远程控制的捕食者无人机,试图杀死已知藏身巴基斯坦或者被怀疑藏身该国的塔利班或"基地"组织领导人,这有时会导致平民丧生,并成为两国多年以来的主要争端。在2011年1月,两名巴基斯坦人在拉合尔被具有外交官身份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雷蒙德·戴维(Raymond David) 杀死,引发了巴基斯坦人的群情激奋。但迄今为止,美国—巴基斯坦战略关系遭受的最大打击,来自2011年5月2日的海王星之矛行动(Operation Neptune Spear) ,美国特种部队在这次行动中杀死了奥萨马·本·拉登。拉登在阿

伯塔巴德的住宅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只有几个街区之远,他在那里已经居住了好几年。由于华盛顿事先没有同巴基斯坦政府协商,而且这次行动也侵犯了巴基斯坦的领空与主权,再加上巴基斯坦军方因未能发现这次行动而很尴尬,因此巴基斯坦政府感到很恼火,它谴责美国蛮横无理,并终止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行动。美国官员也同样对巴基斯坦深感恼火并牢骚满腹,他们认为本·拉登之所以在巴基斯坦藏匿多年,是因为巴方的共谋。对于双方来说,这种微妙的关系既很重要,又令人沮丧。它清楚地表明,有的时候进行非常规战争的最主要内容,不是接触和击败敌人,而是接触与管理自己的盟友。

后续阅读材料

1. Peter Mandaville and Terence Lyons, eds., *Politics from Afar: Transnational Diaspora and Network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Christer Jonsson and Jonas Tallberg, eds., *Transnational Actors in Global Governancei Pattern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结论

我们处在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任何结论都是不确定的。但是,现有的情况证实了四个基本观点。第一,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挑战了有关信息和通讯革命将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分布趋于均等的观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商业和战略信息领域,规模经济和准入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免费信息领域,较大的国家往往在有关信誉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第二,廉价的信息流动使得跨国交流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产生自由化效果。跨国性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表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主权国家越来越容易被渗透,越来越不像一个暗

箱。政治领导人将会发现,保持对外政策连贯性的难度加大了。第三,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政治过程,在争夺至关重要的、有关信誉的权力资源中,开放的民主社会的竞争力要大于极权国家。最后,随着信誉成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权力资源,软权力相对于硬权力来说变得比过去重要。尽管更加多元和开放的国家可能更难保持其政策的连贯性,但这些国家在信誉和软权力方面却很可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总之,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将在信息时代继续左右政治结构,但建构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以该结构为基础的世界政治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家依然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是在信息时代,这个舞台已经变得更加拥挤了。

思考题

1. 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和过去的工业革命有什么不同?

2. 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是怎样影响世界政治的?

3. 在信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集权化和分权化两种影响中,哪一种影响更大?

4. 信息革命对主权国家产生了哪些影响?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中的哪些变化是由它所导致的?

5. 信息革命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地位和财富大小均等吗?

6. 什么是"数字分野"?它特别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

7. 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建构主义者如何认识信息革命的主要影响?

8. 什么是跨国行为体?它们的重要性有可能得到增强吗?有关信息时代跨国行为体权力的例子有哪些?

9. 大国在管理国际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10. 信息革命和民主是什么关系?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增强了非民主国家内的公民社会吗?它们对政治参与有什么影响?

11. 信息革命如何帮助恐怖主义?信息革命如何增强反恐?在"反恐战

争"中占得先机的是国家,还是跨国恐怖主义团体?

[1] Ronald J. Deibert, *Parchment, Printing, and Hypermedia : Communication in World Orde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Daniel Deudney, *Bounding Power: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ls to the Global Vill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 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pp.94, 97.

[4] Pippa Norris, *The Digital Divide : Civic Engagement ,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New York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232.

[5] Douglas McGray,"The Silicon Archipelago," *Daedalus* 128:2,p.167.

[6]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s* (Kansas City,MO: Andrews and McMeel,1995) and Peter Drucker,"The Next Information Revolution," Forbes,August 24,1998, pp. 46 —58.

[7] John Ruggie,"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3) , pp. 143, 155.

[8] Saskia Sassen,"On the Internet and Sovereignt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Spring 1998）, p.551.

[9] Stephen Krasner,"Sovereignty," Foreign Policy (January/ February 2001）, p.24, and Linda Weiss,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David Bollier,"The Rise of Netpolitik"(PDF document）, pp. 21,23, 24, The Aspen Institute http://www. aspenist. org(accessed March 15, 2006）.

[11] Jennifer Lee, "How Protesters Mobilized So Many and So Nimbly," *Th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3, 2003, "Week in Review", p.4.

[12] 有关其含义的各种观点,参见"What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September 2002 issue of *Foreign Policy* 。

[13] Norris, *The Digital Divide* , p.191.

[14] Ibid.

[15] Peter T. Haydon,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Canadian Involvement Reconsidered* (Torontoi Canadi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3）.

[16] Search of Factiva/Dow Jones database January 14—25,2003.

[17] Herbert A. Simon,"Information 101: It's Not What You Know,It's How You Know It," *The Journal for 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July/August 1998) , pp.3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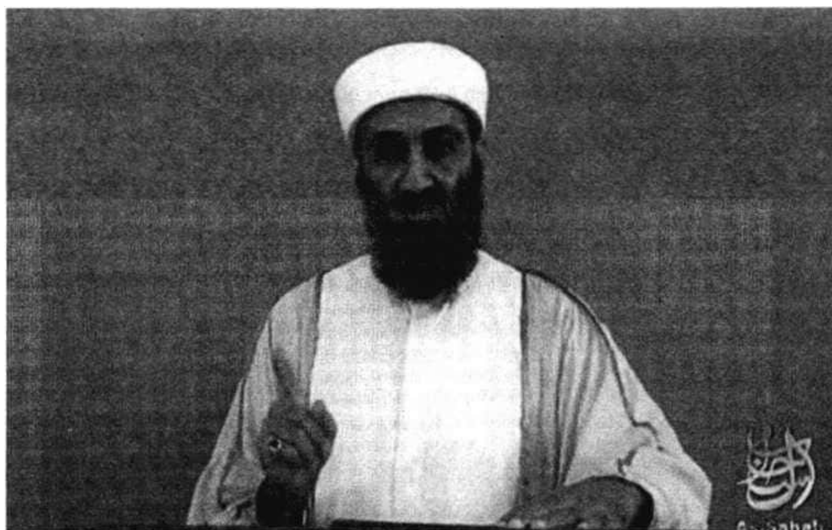
[18] Edward Kaufman, "A Broadcasting Strategy to Win Media Wars"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3) , p.303.

[19] Peter J. Spiro, "New Global Communit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 tions in Intern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18:1 (Winter, 1995) , pp.45—56.

[20] "Defense Secretary Urges More Spending for US Diplomacy, " *The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7, 2007.

[21] David A. Welch, *Painful Choices: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 pp.l—4.

[22] Daniel Gilbert, "If Only Gay Sex Caused Global Warming,"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2006 ; 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06/0702-26.html.



美国特种部队于2011年5月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本·拉登(1957—2011 ）藏身地缴获的录像

第九章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有关未来世界的各种构想

国际政治依然属于自助的领域,国家面临着安全困境,武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有助于缓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制度,比如均势、国际规范、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但是它们不能防止所有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国际冲突"安全困境"逻辑依然适用于当今世界的一些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很多有关"新的世界秩序"的言论。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所看到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它更多地属于一种乐观主义的愿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两极体系已经瓦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冷战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它仍然属于无政府国家体系内的秩序,而且不一定公正。也有人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无政府国家体系的难题。问题是,真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世界吗?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在冷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写道,民族国家和原子弹不可能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处。他认为,在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战争是防卫的终极形式,核弹头是终极武器,其中的某个东西必然消失,最好是国家消失。正如我们在前面两章中所看到的,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新的挑战,不管这样的挑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领土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因此它在将来也不一定继续存在下去。从修昔底德生活的时期至今,世界上一直存在着分散的单位和国家体系,但作为国际政治主要基础的大的领土国家则是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仍然具有封建战争的某些特征,因此它既是最后一场封建主义的战争,也是第一场领土国家的战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的领土国家成为现代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性组织(dominant institution) 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一些未来学家预言,领土国家将会消亡。他们所主张的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可以克服无政府困境的结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提出过五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备选方案,以此作为世界政治的模式。

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 联邦主义是欧洲最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它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国际联邦,来解决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国家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接受某种程度的中央政府。联邦主义者经常用北美13个殖民地在18世纪组成联邦的事实来论证这个观点。一些人认为,历史上不乏一些较小单位组成一个较大单位的事例。然而,联邦主义并没有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构想。和平不是人们所崇尚的唯一的东西。人们也追求正义、福利和自主权,而且他们不相信世界政府能够保护自己。此外,没有多少人相信,联邦主义会起作用,成为消除战争现象的药方。即使无政府国家体系是战争的部分根源,消灭独立的国家也不一定会使战争消亡。实际上,最近几年所发生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内战。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由于联邦主义存在着缺陷,所以有人提出了国际功能主义的思想。功能主义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它认为,如果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得以建立并且真正具有处理全球问题的决策权,那么国家将没有多少理由去相互争吵,战争因而可以得到消除。主权的意义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便国家的外壳形式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国家间相互敌视的内容已经消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功能主义思想促使联合国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功能主义的影响今天依然存在,即使是在真正的国际制度较弱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各种类型的跨国行为体,比如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经常出面推动和协调某个特定问题领域内冲突的解决。因此,功能主义精神依然还很有活力和用处,是当今世界中很多国际合作行为的推动力。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功能主义也没有被证明是一种充分可行的世界秩序构想,因为大多数国家不愿意看到相互依赖程度太高,避免自己极易受到别国的伤害。

地区主义(**Regionalism**） 地区一体化思想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计划委员会主席让·莫内(Jean Monnet）认为,地区层次上的功能路径(functional approach）可能把德国和法国拴在一起,从而防止再次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国际冲突。1950年,欧洲根据舒曼计划,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实现煤钢产业一体化。1957年以后,《罗马条约》建立起了欧洲共同市场,逐步减少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并且逐步实施共同的农业和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在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地区也在努力借鉴欧洲地区主义的经验,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是西半球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然而,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分别在1965年和20世纪80年代,对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加以限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欧洲国

家在应该把多少主权让渡给地区性政府这个问题上,普遍存在着矛盾的心理。欧洲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2002年开始在某些国家(而不是所有国家)流通了。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选民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新的欧洲宪法草案,使欧盟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努力受挫了。但即便迈向联邦的步伐有所放慢,以及欧盟在吸收东欧国家为成员国过程中面对着一些组织和制度上的问题,今天的欧洲同我们所分析过的早期的欧洲相比,已经朝着好的方向迈进了。欧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正在进行和充满活力的试验。随着欧盟成员国继续努力通过谈判来建设一个处理从农业到共同防务力量诸多问题的多边制度网络,一个独具特色的欧洲认同已经形成。虽然成员国之间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民意调查表明,许多欧洲人把自己看成既是欧洲人,也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西班牙人。这同建构主义理论相吻合,该理论强调观念和文化在建构政治认同和信念中的作用。欧盟成员国之所以选择增强它们之间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就是因为它们相信,权衡成本和收益,合作是一种比保持国家完全独立更好的选择。在今日欧洲,可能大家并不都在一条船上,但是所有的船只都以各种方式被拴在一起,这种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比如,在很多领域欧盟法律已经代替了成员国法律。欧盟代表着一种新型国际政治,但它只是一个地区的新型国际政治。

生态主义(**Ecologism**) 在20世纪70年代,生态主义代表着一种希望建立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之新思路。理查德·福尔克在其著作《面临威胁的星球》中指出,有两种东西将构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一是跨国的、非领土的行为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二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福尔克声称,结果会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大众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要求更多的平等权利以及生态平衡的观念,不仅会增强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力量,而且会导致建立解决世界资源日益减少问题的新规制。其最终结果是建立起有关和平、正义和生态平衡的国际规范,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秩序。

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加深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全球资源供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而且随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属于人类共有物品的海洋、大气层受到进一步的危害。在20世纪,政府签署了170多个环境条约,涉及渔业、酸雨、臭氧层被破坏、保护面临威胁的物种、南极以及海洋污染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三分之二的条约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会议以后被签署的。联合国召开的有关环境和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会议,分别于1992年、1997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在巴西、日本、印度尼西亚、丹麦、墨西哥和南非召开。环境问题也催生了很多从事跨国游说的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公民以及政治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关注环境恶化与保护问题。

然而,福尔克夸大了资源稀缺问题的严重性,而过低估计了新技术弥补资源稀缺的能力,而且在很多国家,对环境的关注,同快速发展经济的愿望相比,只占据次要地位。

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 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一些信息时代的组织理论家,如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以及海蒂·托夫勒等人宣称,信息革命正在消除等级现象,并且用网络组织取而代之。他们预言,20世纪那种权力集中化的官僚政府在21世纪将成为权力分散化的组织,更多的政府职能将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来行使。互联网专家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 还指出,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权力分散化的组织和虚拟共同体,将超越领土管辖权,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虽然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将失去其重要性和中心地位。人们将根据多种的、自愿的协议而生活,通过点击鼠标,加入或脱离某个共同体。这种相互交叉的共同体和新的治理模式,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确立主导地位以前的封建世界。

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存在,但是有关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并没有告诉我们,虚拟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怎样处理暴力和安全问题。另外,正如我们在上面一章中所看到的,新的信息技术既可以被用于邪恶的目的,也可以被用于善良的目的。今天的恐怖主义者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招募新成员获取武器制造技术、转移资金和扩大自己的网络。远方的黑客可以不用跨越国界,就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在这样的形势下,民众可能需要更强大的,而不是更弱小的国家政府来保护自己。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几个世纪以前所说过的,国家之间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危险的,但是与此相比,另外一种无政府状态,即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免受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则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现实情况与上述五种模式相反,主权国家还没有过时。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人,往往使用简单的类比。他们说,今天的民族国家会被迅速飞过边界的火箭所穿透,以及为传播快捷的电子信息所渗透。如同火药和步兵穿透和摧毁了中世纪的城堡一样,核导弹和互联网已经使得主权国家过时了。然而,人们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政治制度得到如下三种东西:生命安全、经济福利、共同体认同。国际进程的变革正在慢慢地改变着这些价值所处的地位,但主权国家至今依然是最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这三样东西的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缺少保障人们安全的军队,也不具备作为共同体认同焦点的合法性。不仅如此,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目前阶段,民主只是在主权国家之内得以茁壮成长。虚拟共同体仍然比地缘共同体弱小得多。因此,尽管人们一直努力提出新的构想,但领土国家依然在世界政治中处于中心地位。

国家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但世界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使得世界看上去变得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对快速的变革坚定地采取了族群的、宗教的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反应态度。正如第七章所论述的,全球化会同时导致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裂化。

通讯手段正在改变世界。外交行动以实况直播的方式进行着。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和布什都通过观看CNN,来获取最新消息。在阿富汗发生激战的时候,本·拉登和乔治·W.布什都在看CNN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节目。在伊拉克战争中,电视记者与军队同行,为世界观众直播战事。人们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就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到地球上遥远地方的人权问题和民众的苦难。那些生活在穷国、每天生活费只有1美元的人,正变得越来越了解那些一年就挣上百万美元的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政治一体化。大多数通过半岛电视台观看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况的人,和那些看CNN的人有着不同观点。同样地,尽管互联网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人们获取的信息类型以及信息的来源往往是不一样的。互联网、有线电视以及卫星电视,鼓励信息向特别的人群进行"窄播",而不是像电视网络那样向普通百姓"广播"。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指出,现代的通讯手段正在导致一个"地球村"的出现。但是,有关地球村的比喻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全球政治认同的程度仍然是很低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民族、宗教和族群认同的力量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弱小。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地球村,而是在地球上存在着许许多多个相互之间更加了解的村落。在这些村落中,既存在着地方观念,又存在着共同体观念。这种一体化和解体化同时发生的过程,已经导致在冷战结束后产生两种十分流行和过于简单化的有关未来世界政治的观点。

历史的终结或者文明的冲突?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他并不是论述历史真的终结了,而是声称随着共产主义的解体,我们已经看到了意识形态演变(ideological evolution)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政体(human government)的终极形式"。在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导致了国际冲突,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比如法西斯主义是对现代化破坏传统生活方式这一现象

的反应。工业化迫使人们走出了自己的村落或小社区,并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所动员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资本主义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公民参与意识方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冷战的结束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占了上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山是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不仅如此,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和德国或者美国和日本,不再认为今后相互之间会发生战争,也不去准备这样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复合式相互依存关系,在当今世界构建起了一个大的民主和平群岛,这同康德的自由主义预言是相吻合的。

然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的现象,而是出现了可以称为历史的"回归"的现象。历史的回归意味着,现在的国际环境比较正常,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本身并不足以在国际政治中导致较大规模的冲突。自由资本主义有很多竞争对手,尽管它们是很分散的。中国和俄罗斯利用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但它们既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挑战自由资本主义的规范和惯例。我们有时对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不加以区别,但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反对和抵制世俗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在冷战以后主要面对着族群、宗教和民族地方自治主义的挑战。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一种与福山不同的、为人所熟知的观点。亨廷顿声称,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因素,文化之间的大分野将主导着未来的冲突。亨廷顿借用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把世界分为八大"文明"(西方和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他预言这些文明之间将会发生冲突。一些现实主义者利用均势理论预言德国同它的邻国会再次发生冲突,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和平将传遍全世界。亨廷顿和他们不同,他强调文化是冲突的一个根源。

亨廷顿通过借用汤因比那种很随意地把文明加以分类的思想,使得自己的观点过于简单化。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文化不是同质的或静止的,而是重叠的和变化的。更多的冲突发生在亨廷顿所描述的那些大的"文明"内部(比如非洲内部或者伊斯兰世界内部),而不是发生在这些文明之间。一些观察家指出,本·拉登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和号召对西方发动伊斯兰圣战的事实表明,亨廷顿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在伊斯兰世界发生了激进主义者和主流穆

斯林之间的内战。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同基督教和犹太教温和派人士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前者和本·拉登之间的共同点。

福山和亨廷顿两人试图把冷战后的世界归纳为一种单一、简单的模式,因而使得他们的观点有缺陷。一种型号的鞋不可能适合所有人的脚。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多种文明,而且还有经济现代化水平很不相同的各类国家。福山有关自由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民主和平的观点,同后工业化世界的情形相吻合。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强调,比较符合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地区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当认同受到伴随现代化和全球化而来的重大社会变革的挑战时,族群和文化冲突就会产生。族群特征无疑是一种很强大的纽带,但国家认同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中东所看到的,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的行为基础主要是传统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泛阿拉伯主义或者穆斯林的认同。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当下的确正在同伊斯兰激进主义进行斗争。

即便是在国家处于上风的时候,民族主义力量也有强弱的不同。比较东欧和西欧的情况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被压制了半个世纪。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许多这类的冲突开始激化。例如,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以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争斗开始爆发,并且在南斯拉夫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在整个前苏联地区,存在着很多跨越国界的族群群体,今后它可能导致更多的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冷战后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反,国家内部的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原先相互间激烈争斗的国家组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欧洲联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最主要的原因可以用自由主义理论来加以解释。当人们生活变好以后,相互间的敌视可能会有所缓解。其中部分答案可能同民主有关,因为当人们有机会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之后,情绪化的东西可能会得到较好的管控。一些西方敌对思想就是通过民主的进程而被消除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国内的辩论,导致修改教科书和重新认识德国的历史。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地区制度的作用,这些制度把西欧人纳入一个更大的、摈弃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框架之中。幸运的是,许多东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的意愿,对于使得本国领导人和民众民族主义情绪温和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的软权力的确有助于促进东欧经济和政治重大变革,这种快速的变革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即使在西欧,民族主义远未消亡。许多欧洲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

认同被完全埋没在欧洲认同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对对方心存某些疑虑。法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牵制德国。不仅如此,许多西欧人担心外来移民损害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害怕北非人和东欧人移居西欧。有专家指出,"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发生的马德里和伦敦恐怖袭击证明,欧洲国家公民和领导人未能妥善解决欧洲大量穆斯林移民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困难。发生在法国的骚乱也表明,许多从北非来的移民未能成功融入法国的经济与社会中。与此同时,西欧的右翼政党煽动仇外情绪,这也提醒我们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族群间紧张关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正如2011年7月发生在挪威的悲惨事件所表明的,憎恶外国人的人,也会成为他们自己所痛恨的团体中的最极端成员,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随着出生率下降以及边界控制放松,欧洲不可能阻止来自地中海一带贫穷邻国的移民。如何解决好维护欧洲的认同与让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欧洲正面临的挑战。世界上其他低出生率的富裕国家,也将越来越要面对同样的挑战。

技术和权力分散

还有第三种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它不像福山和亨廷顿的观点那样武断,但更接近现实。这一观点的基本内容是,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正在导致一种中央政府的权威相对弱化的权力分散(diffusion of power)现象。20世纪是权力集中在首都的时代,这种权力集中化的过程,在苏联和纳粹德国专制统治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但是,经济和信息网络正在促使政府的某些治理功能,转移到比国家的层次更高或者更低的行为体手中,其中一些治理功能从政府转移到私营和非营利部门,正如表9.1所显示的。

	私　人	公　共	第三部门
超国家	跨国公司(如 IBM,壳牌)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
国家	国内公司(如西南航空公司)	21 世纪中央政府	非营利组织(如美国红十字会)
次国家	地方企业	州/地方政府	地方团体

表9.1 21世纪治理的分散化

本书第八章提到,信息影响权力,并且在21世纪,所有类型的政府都会发现,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传播以及相关费用的持续降低,自己的控制能力正在受到侵蚀。人们在20世纪中叶曾经担心,计算机将导致一个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样的权力集中的世界。然而,事实证明,分权效应更为强大。

至于信息革命对权力分散化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有多深,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会产生抵制权力分散化的力量。但总的来看,本书第八章所论述的有关政府逐渐丧失对外政策的垄断权以及不得不在世界政治中同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的情形,是极有可能出现的。

权力的分散既可能导致积极的后果,也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一种好的前景是,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并使得专制政权较难以维持下去。其结果是加快民主和平群岛的扩大。一种坏的前景是产生新的封建主义,那些极具破坏性的个人、恐怖主义者以及弱小的国家获得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造成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它不同于国家间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中,历史发展可能会倒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会受阻,公民会牺牲民主自由权利,以便建立起霍布斯所构想的可以为个人安全提供基本保障的专制政府。

那种好的前景告诉我们,由于跨国通讯手段的作用,人们现在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比过去了解得更多,也比较容易组织起全球性的团体。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发起保护环境和人权的跨国运动。互联网通过向民众提供信息,削弱了集权政府的控制力。

跨国公司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跨国行为体。跨国公司通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和在全球市场的不同领域追求利润,导致了一种独特形式的世界经济。各国政府竞相吸引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本田公司在美国所生产的汽车超过其在日本本土的汽车产量,而且它把在美国生产的汽车运回到日本销售。美国政府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后者进口在美国生产的本田汽车。也就是说,美国把向欧洲出口美国生产的日本汽车,视为自己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的IBM是日本最大的电脑主机生产商。IBM的日本公司在日本从事研究和雇用日本职员。2004年,IBM个人电脑部门为中国电脑厂商联想集团所收购,进一步增强了电脑行业的全球化性质。当一位美国人在美国拨打一个免费服务电话时,接电话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已经学会美国口音的班加罗尔的印度人。

这促使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 提出"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分析人员应该关注公司总部的认同呢,还是关注公司在

哪里从事研究和生产?他认为,从是否有利于美国境内的居民这个角度看问题,在美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家外国公司,可能比在日本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家美国公司更重要。一些批评者反驳说,赖克看得太远,其观点在目前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认同,四分之三的美国产值是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所创造的。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未来进行展望的思路。跨国投资使得人们不容易搞清楚认同问题,难以回答"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跨国性投资和生态相互依存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全球问题的长远认识。

如果美国阻止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它只会使得美国的公司无力参与国际竞争。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麻烦是,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可能和对方一样受到同等的伤害。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就阻碍贸易的国内壁垒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迫使日本在其国内管辖权限内采取措施。日本曾经有限制超级市场规模和其他阻碍外国公司进入日本流通领域做法的法律。一些日本政治家和消费者对美国的压力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因为它对日本消费者有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生产商和日本消费者结成了一个跨国联盟。日本政府也迫使美国减少自己的预算赤字,它正确地指出,美国的贸易赤字与政府预算赤字有关。换句话说,美国和日本的官员在相互打交道的时候都不把对方逼到墙角,而是让对方采取各国主权管辖权限内的措施。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有关技术导致权力分散的坏前景,强调了技术跨国传播的一个特殊方面。正如我们在石油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公司传播了技术和技能。技术也可以通过贸易、移民、教育和思想交流进行传播。这会对安全产生什么影响呢?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0个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化学武器技术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也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扩散政策延缓了核武器的传播。但在苏联解体之后,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因为苏联的继承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控制核技术外流了。

在苏联解体之前,世界上有8个核国家。其中5个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NPT) 所正式确认的核国家,它们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3个迄今没有加入该条约的国家被普遍认为已经秘密地研制

了核武器,它们是: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公开试验了核武器。另外3个国家,即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曾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它们被很多人认为在试图发展核武器。朝鲜最终退出该条约并爆炸了2个小型核装置。还有5个国家,即南非、韩国、阿根廷、巴西和利比亚,也曾经走上这条路,但后来改变主意了。很有意思的是,有30多个国家具备研制核武器的能力,但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也就是说,有能力获得核武器的国家的数量是现有核国家数量的3到4倍。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候担心,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25个核国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为什么核扩散的情况没有变得更严重一些呢?不管怎么说,在主权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世界中,核武器毕竟是自助的终极形式。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现实主义者提到了冷战当中所形成的同盟体系,即每个超级大国都向自己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例如,德国和日本没有研制核武器,因为它们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美国许诺要防止任何国家对其盟友进行核讹诈,这使得德国和日本认为,它们不必发展核武器。同盟体系也制约了较小国家和地区的行为。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认为美国可能从亚洲撤退,因此开始研制核武器,但是在美国表示了反对态度和许诺继续向它们提供安全保障之后,韩国放弃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与此相类似的是,苏联也限制其东欧盟友和第三世界盟国发展核武器。

自由主义者强调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以及由规范和制度所构成的不扩散规制的产生。在核时代的早期,超级大国对核武器的态度是高度竞争性的。超级大国极力利用核武器,以使自己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得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大力鼓吹"原子用于和平"计划,强调原子的善良一面,并表示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以此使得美国在外交上得分。与此类似的是,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核援助。但美国和苏联在1968年采取了相互合作的态度,促成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1977年,美国、苏联以及另外13个提供核技术的国家成立了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规定了可以出口的核技术的种类。

自由主义者声称,条约和制度的存在制约了核扩散。189个国家已经批准或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承担不发展或者不转让核武器的义务。无核国家同意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20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派遣核查员视察本国的和平核设施,确保这些设施的正当使用。如前所述,迄今只有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等少数几个国家还没有签署该条约。也有某些签字国采取了欺骗行为。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

后,联盟军队和联合国核查员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建构主义者可能会补充说,1945年以后产生的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规范,有助于增强这些条约与制度的作用。最后,许多极权国家试图获得核武器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管控核武器要比肯尼迪所想象的困难得多。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家雅克·海曼斯(Jacques Hymans) 认为,管理不善的国家一般会有核武器项目管理不善的现象,这些核武器项目是最为危险的。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配备了精密的技术装置,即"许可行动连接装置"(permissive action links) ,只有高层领导人输入一个指令密码,核武器才能够被启用。但是,很多新近研制了核武器的国家并没有,或者很可能没有这些精密的技术装置。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核技术的跨国传播,准备加入核竞赛的某些新的核国家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今后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比过去的半个世纪要大。

人们担心的两个有关核扩散的不确定问题,一个是同盟、制度和安全保障的前景,另一个是核技术是否会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流出到未来的核扩散国家和恐怖主义者手中。肯尼思·华尔兹等新现实主义者声称,核武器的扩散可能具有稳定局势的作用,因为威慑会起作用。既然核武器有助于防止冷战变成热战,为什么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不能在中东和南亚这样的地区导致谨慎的行为和秩序呢?这种观点的毛病在于,它几乎是完全建立在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s) 之间理性威慑模式的基础之上。如果冷战后的核武器可能失控,那么这种建立在理性模式基础上的、自信的预言就可能基本上毫无意义了。很多将来可能研制出核武器的国家,都有过政变和政治动荡的历史。

安全所面临的跨国挑战

未来有一点似乎是确切无疑的:国家所面对的许多安全挑战将带有跨国性质。在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主权国家只需要担心来自其他国家的安全挑战。今天,有一系列的行为体和问题对国家构成安全挑战。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可能会带来很多新机会,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很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不仅对国家,而且对其他安全客体(包括个人,属于"人的安全"范畴) 构成威胁。

跨国恐怖主义　我们在本书第八章中,讨论了信息革命背景下的恐怖主义问题并得出结论,虽然今天恐怖主义作为安全威胁的严重性被夸大了,但是我们的确有必要严肃对待它,这是因为存在着恐怖主义者获得和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尽管这种危险性看上去可能很小。我

们有必要在这里进行详尽的论述。

何谓恐怖主义?根据美国法律,恐怖主义指非国家团体发动的、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有预谋和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联合国通过了打击恐怖爆炸、暗杀、劫持人质以及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2001年9月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不给恐怖主义者提供庇护所,这给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为提供了合法依据。然而,联合国大会难以就恐怖主义定义通过一项决议。以埃及和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反对任何一个不把巴勒斯坦人排除在恐怖主义者范畴之外的文本,它们支持巴勒斯坦人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反对把他们定义为恐怖主义者。正如怀疑主义者所指出的:"一个人眼中的恐怖主义者正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战士。"

乔治·W.布什总统200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提出,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所有恐怖主义者,而不是反对其中某些恐怖主义者。民族愿望、历史过错都不能成为无端杀害无辜民众的正当理由"。他的这个发言与本书第一章所论述的正义战争理论是相吻合的,也符合国际法。非国家行为体的某些政治抵抗行为可能不应该被视为恐怖主义,比如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士没有杀戮平民。然而,即便一个政治团体认为缺乏变革的民主程序使得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根据正义战争理论,剥夺无辜生命也依然是不能在道义和法律上被接受的行为。同样,假如国家以无端杀害非战斗人员来恐吓其国民,那么这就是战争罪行。如果把恐怖主义定义为非国家行为体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的行为,那么国家就会被排除在恐怖主义者范畴之外(根据定义)。然而,采取类似不道德、非法行为的国家不应该被免除责任。虽然国际社会难以就恐怖主义定义达成共识,但是无端杀害无辜民众的行为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因为它同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道义信条以及国际法都是相违背的。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一个高级小组一致认定,恐怖主义是任何一种出于恐吓目的有意导致平民或者非战斗人员死亡或者肉体严重伤害的行为。

21世纪的跨国恐怖主义犹如以前的海盗行为。一些政府曾经庇护海盗以便从中获利或者骚扰敌手。今天,某些国家藏匿恐怖主义者以便打击自己的敌人,或者由于他们太弱而无力控制境内的恐怖主义团体。与此同时,爆炸物小型化技术、现代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比如航空旅行)以及互联网通讯的日益便捷,给非国家行为体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提供了机会,尽管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所在国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共同威胁的感受可能使得许多人赞同增强国家的作用,以及支持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一般来说,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比非国家行为体人人相互为战的无政府状态,相对更能被容忍。

由于跨国恐怖主义者如果不掌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话,他们就不会造成巨大的物质伤害,因此我们必须十分警惕他们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我们知道,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网络正在努力获得这类武器,并且曾经与参加巴基斯坦核项目的科学家进行过接触。我们也知道,"基地"组织的人员曾经接触过一些武器销售商,后者声称自己可以得到从前苏联国家偷运出来的材料。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看到的,裂变材料的生产难度很大、成本也很高,跨国恐怖主义团体缺少必要的组织特性和资源去获得这些材料。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恐怖主义团体有能力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核武器,并且将它们运输和引爆。然而,他们的确尝试过这么做。不仅如此,核武器并非唯一的威胁。生物药剂已经被一些国家研制出来了,尽管它们还缺乏在战场上使用的可靠性(让我们想想风对炭疽孢子烟雾剂的影响)!然而,制造生物武器要比制造核武器容易(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配方),而且可以被用于恐吓无防备能力的平民。1993年,跨国恐怖主义者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引爆了一个汽车炸弹,假如他们不是使用高强度的爆炸物,而是使用炭疽或者化学药剂沙林毒气,那么结果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受害。2001年,恐怖主义者转而劫持民航客机,并把它们当作硕大的巡航导弹来使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的话,那么无数人将会丧失性命。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即便"基地"组织网络被摧毁,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跨国行为体问题仍然不会消失。在1995年,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使用沙林毒气,导致10多人丧生,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恐怖冲击波。很有意思的是,在该事件发生8年以后,一位精神病患者在韩国大邱地铁车厢内点燃一个装满易燃液体的牛奶罐,它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是东京毒气事件的10倍多,但是并没有在韩国社会引发类似的恐惧或恐慌冲击波。这两个攻击事件的对比表明,不是攻击所造成的后果,而是攻击的性质以及攻击者的身份导致恐怖形势。

恐怖主义团体也可能对控制医院、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或者银行用电供应的信息系统发动攻击,从而引起混乱。实施这种攻击的方式可能是在重要的电脑服务器所在地放置烈性炸药,也可能是电脑黑客在上万英里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电脑上进行操作。

威慑手段对抵制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的作用不大,因为除非可以证明一个境外国家(比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支持恐怖主义者,否则的话,很难发现恐怖主义者的行踪。不仅如此,2001年以前在美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即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爆炸事件,完全是美国国内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者所为。在另外一些个案中,犯罪集团可能控制一国的政府,并且诡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国际法,根据主权的原则享有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能认为干涉是正当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很接近这种情况,比

如美国在1989年入侵巴拿马,逮捕其总统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并在美国以毒品走私的指控对他进行审判。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发表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张采取预防性战争来打击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但情报部门估计,入侵伊拉克的结果导致跨国恐怖主义者数量增多而不是减少了。

恐怖主义并不是世界政治中的新生事物。它是一种暴力形式,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很早的时候。恐怖意味着极大的恐惧,像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和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都使用这种手段来控制本国人民。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论述的,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跨国革命者也都使用过恐怖主义手段。他们杀死多名国家元首,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部分地由一次恐怖主义暗杀行动所挑起的。当今恐怖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发展使得原先主要为政府所拥有的毁灭性权力,落入那些离经叛道的个人和团体手中。在20世纪,像希特勒那样的政府首脑可以杀死大量的人。恐怖主义者如果能够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将拥有类似的能力。这正是为什么有的观察家把恐怖主义称为战争的私有化。不仅如此,技术已经使得现代社会的复杂系统更容易遭受大规模攻击。正如沃尔特·拉夸尔(Walter Laquer）所说:"这种脆弱性不断增加的趋势早在网络时代开启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互联网加快了这一发展趋势的速度。" [1]

对恐怖主义者来说,最难办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起不会被当地情报部门和警察所捣毁的、值得信赖的秘密组织。恐怖主义者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那种建立真实宗教庇护所的策略,转而在互联网上建立虚拟的宗教庇护所,从而减少了风险。他们也不再在清真寺和监狱这样的地方发展成员。相反,那些异端分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就可以通过一种新型的虚拟共同体,与世界各地的同路人进行接触与交流。据报道,伊斯兰圣战者网站的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几十个增加到今天的超过4500个。这些网站不仅招募成员,也训练成员。网站提供的内容包括有关如何制造炸弹、如何安装和引爆杀死军人和平民的装置之详尽指南。恐怖专家利用聊天室和贴吧回答受训人员的问题,计划和指令通过加密的电子邮件发出。当然,政府可以对这些网站实施监控。一些网站被关闭,其他网站则被监控。但是,警察机关与恐怖主义者玩的是难分胜负的猫和老鼠的游戏。

网络战　另外一个与信息革命相关联的威胁同时来自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体。网络威胁和潜在的网络战显示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脆弱性和失控性。例如,"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金融、通讯、医疗、交通、水源、国防以及互联网等等,都极其容易遭受网络攻击。需要采取快速和坚定的避险措施防止国家灾难的发生" [2] 。在漆黑一片的互联

网世界中,黑客难以被发现。

在今天这个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世界中,针对非政府设施的网络攻击可能造成极大危害。比如,一些专家认为,输电网可能就是特别容易遭受攻击的目标。电力公司所使用的控制系统被认为特别易受攻击,攻击的结果将使整个城市或地区断电数天或数周。不仅如此,网络攻击也可能影响金融市场,通过关闭商业网站而导致巨大经济损失。

一些可能发生的场景,包括发生一次"电子珍珠港"事件,让人听起来感觉很可怕,但是它们的确反映了权力从中央政府分散到个人的现实。1941年,强大的日本海军使用很多资源给数千英里以外的目标造成损害。今天,一位计算机黑客利用病毒程序就可以给很远的目标造成重大损失与混乱,而他自己几乎不要付出什么代价。所谓的"爱虫病毒"是由一位菲律宾黑客在2000年传播的,据估计它给信息系统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搞蓄意破坏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但信息革命使得个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做坏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恐怖主义者可以与政府进行不对称战争,并且利用网络空间的脆弱性。

2007年,中国政府被指责赞助数以千计的黑客事件,攻击的目标是德国联邦政府的电脑以及美国五角大楼和私营部门的电脑系统。但是,证明攻击源于何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五角大楼被迫关闭其计算机系统中的某些部分。最近,谷歌指责中国政府盗窃其知识产权,但是中国否认谷歌的指责。同样在2007年,在爱沙尼亚政府下令推倒一座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阵亡将士雕像之后,电脑黑客以切断爱沙尼亚互联网服务进行报复。人们无法证明这次跨国攻击是否得到俄罗斯政府的支持,或者它仅仅为一次自发的民族主义反应,或者两者都可能。2008年,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战争中,俄罗斯也被指责对格鲁吉亚采取类似的网络攻击。2009年,一些加拿大学者破解了幽灵网(GhostNet) 这一网络间谍系统,尽管该系统有很清楚的攻击目标,但是他们无法证实该系统的背后之手。2010年,伊朗的核离心机被一种神秘的被称为Stuxnet的电脑蠕虫病毒所破坏,有些人认为这是以色列或者美国所为。

一种新型的冲突舞台已经出现在日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政府将很难知道网络攻击源于何处,不清楚发起攻击的到底是一个敌对国家,还是一个伪装成外国政府的犯罪团伙。

传染病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了解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一场灾难,据估计这场战争导致全世界超过1500万人丧生。人们往往记忆不深刻的一个数字是1918年爆发的一场跨国性禽流感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感冒每年都在发生,但有时一种新型病毒会通过贸易、旅行者或者候鸟进行国际间

传播,并导致灾难性后果。由于跨国性传染病会比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更多人死亡,各国政府必须形成一个更为广义的国家安全观念,并采取一系列新政策来对付这种威胁。

微生物产生的速度永远快于科学发展的速度。不仅人们所熟知的病菌产生了抗药性,而且在过去30年间,每年都在人类当中产生一种新的疾病。艾滋病病毒在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于非洲,它在此后几十年间传遍全世界,并据估计已经导致了2500万人死亡。为了应对这些跨国挑战,政府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来制定对外政策。向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提供援助,可能是最有效的防御方式。必须采取措施完善这些国家的数据库以及监控工作。必须建立起疫苗和抗生素储备和发放系统。如同自然和人为灾难往往相互重叠一样,各国公共卫生系统与全球公共卫生系统也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紧密相连。

微生物是不会在乎边界的。西尼罗河病毒自从20世纪90年代在纽约被发现之后,只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已经传播到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几乎每一个州。这个病毒可以通过飞机上的一只蚊子或者一名曾经被当地蚊子叮过的乘客传播到其他国家。到了2009年夏天,世界各大洲都已经有人感染了H1N1病毒,而这种病毒大致是不到一年前首次在墨西哥被发现的。每年大约有1.4亿人乘飞机进入美国。至少有一半的美国结核病病例是从境外输入的,其中某些病毒由于外国不完善的医疗系统,而对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毫无疑问,恐怖主义者可以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外国试验室,或者通过贿赂参与处理俄罗斯生物战系统遗留物的低收入科学家,或者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微生物或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在最近一些年里发生过十几次炭疽病毒自然产生的个案。

有效对付这些传染性疾病,有赖于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监控、调查、通报和应对措施。世界卫生组织(WHO)为193个成员制定了国际公共卫生规章与报告制度。来自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报告,补充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预警网络。世界卫生组织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试验室网络,进行初期的调查工作,其每年的预算仅有大约30亿美元。各国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与全球公共卫生系统之间也有间接的联系。许多穷国需要外来援助,以便建立起用于监控、调查、通报和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实验室与制度。除了人道主义考虑之外,提高这些国家的能力也符合富裕国家的利益,因为这样做既有利于早期预警,又可以确保不会因为不完善的医疗系统而导致抗药性病变。即便是具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只要对外援助符合自己更为广义的健康利益以及减轻对传染病的担心,也更可能采取合作态度。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有助于穷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捐助国所采取的有远见的政策对本国以及他国都有利。面对跨国威胁,增强

安全的政策不能始于或止于国家边界。

仅仅是在几年以前,缺少资金是制约全球公共卫生状况改善的主要因素。由于来自私人和政府的捐助(比如盖茨基金会的捐赠),今天可供使用的钱更多了。然而,这些钱往往主要被花在应对那些大众关注度高的疾病和传染病上面,而不是被花在改善一般公共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上面,如果不改变不够系统的、混乱的工作方式,那么投入更多的钱也不可能达到改善全球公共卫生的目标。 [3]

气候变化 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论述了作为环境全球化组成部分的气候变化问题,而且气候变化在公共辩论中主要被视为有经济后果的环境问题。然而,随着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科学模型变得更可信和更精确,全球变暖问题越来越被看作一种跨国性威胁以及潜在的安全问题。当诺贝尔奖委员会把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小组的时候,指出气候变化是"国内以及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暴力冲突和战争威胁" [4] 的一个根源。

根据该领域领先科学家的研究,今天的全球变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行为所导致的。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聚集在大气层中,是导致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自一系列日常经济活动。碳排放属于经济学所说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这意味着排放者由于不用承担自己引起的破坏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因而会生产出过多的二氧化碳。抽烟是一个可以用以类比的国内例子。吸烟者不需要面对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因为社会必须承担一部分因此产生的医疗费用。其结果是,政府努力通过税收和规章来让人们少抽烟。但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做到这一点要困难得多,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迅速约束排放过量二氧化碳行为的全球政府,各国会试图搭便车和让别人采取代价高昂的解决措施。不仅如此,某些国家像俄罗斯,由于希望气候变暖给西伯利亚带来经济好处,因而具有不同于孟加拉国的考虑,后者作为一个穷国可能因为伴随气候变暖而来的海平面升高,而面对洪涝的威胁。美国在2001年决定不签署限定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定——《京都议定书》,就是因为它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害,而且该协定也没有对像中国这样不太发达的国家施加限制。

那么气候变化的后果将是什么样的呢?一些科学家预测将发生严重的灾害,比如与天气相关的自然灾害、干旱、饥荒等等,可能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在未来30年里,全球气温升高1.6到2.8摄氏度,会导致海平面上升0.5米。这只是保守估计,假如北极冰层反射性减少以及永冻土解冻导致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海平面上升的程度会导致一些岛国(比如马尔代夫和图瓦卢)被淹没,从而威胁整个国家的生存。与此同时,在非洲和中亚这样的地方,水源会变得更为稀缺,干旱会导致食物供应减

少。气候变化导致的对其他国家的冲击,将直接影响到发达经济体,但发达国家还可能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鸿沟的扩大而面对间接的影响,比如大量移民流向富裕的、受影响较少的、适应力更强的地区。此外,气候变化也将使得贫穷国家的弱小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从而可能导致失败国家的数目增多。



2006年格陵兰正在融化的冰川

所有这些都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可能导致潜在经济、环境和生命巨大代价的跨国性问题。但是,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是否也属于一种跨国性威胁呢?假如我们把安全理解为保护至关重要的利益,那么气候变化对安全会产生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如果马尔代夫群岛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了,那么气候变化的毁灭性影响就如同核炸弹一样,而且甚至对美国来说,气候变化给佛罗里达、切萨皮克和旧金山湾区所造成的损害可能与遭受核打击差不多。这种人类行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尽管不像恐怖主义和网络战那样源于邪恶动机,但也促使我们需要扩大安全概念的内涵和采取新的政策。气候变化还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间接原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7年指出,达尔富尔问题"开始的时候属于一场生态危机,部分源于气候变化"。一些学者声称,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与国内战争、恐怖主义以及犯罪,日益稀缺的粮食和水源将导致暴力冲突以及从穷国到富国的大规模移民。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的后果没有这么严重,他们只把气候变化看作是引起冲突的众多因素之一。一些现实主义者因此声称,气候变化是一个科学技术上的挑战,不应该把它与国际间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冲突混为一谈。然而,其他

一些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士,比如美国退休将军,更关注气候变化的间接后果,他们把气候变化称为一种"加剧世界上最动荡地区之不稳定局面的威胁" [5] 。布什政府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在跨国恐怖主义时代可能面临着更多来自失败国家而非来自大国的威胁,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家的失败,气候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后果必须被纳入安全政策的表述之中。

有4种减少碳排放和减缓气候变暖的基本方式,即科技创新、替代政策、经济手段以及自然保护。有关技术创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碳截存(carbon sequestration) ,它是一项捕获碳以及把碳存储在地下与深海的技术,这样就可以让大气层中的碳含量减少。替代政策的一个例子,就是从利用煤炭、石油或者天然气的燃烧来发电,转而利用核能、风力、地热、潮汐能、太阳能以及其他可用于燃烧的资源来发电。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看,以上这些替代方式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核能发电无疑是最可靠的,也可以说是环境成本最低的。然而,在2011年3月日本地震和海啸之后,福岛核电站部分机组熔化,这导致核能发电突然在世界上不那么受欢迎了。经济手段包括经济激励与经济抑制。所谓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 strading system) 分配可交易的排放额度,旨在控制碳的排放。这种方法也被成功地应用于其他环境污染个案中。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就是碳税(carbontax) ,也就是一种能源使用税,假如税率准确,它将体现负外部性的代价。这将促使个人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减少碳的排放。最后,还有自然保护。如果人们学会减少能源消耗,那么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减少。日本公众对2011年3月11日地震和海啸之后核电站迅速被关闭的反应清楚表明,人们有能力靠消耗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的能源而生活。

把跨国性气候变化视为安全问题,就相应地要求调整安全政策。例如,中国在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然而,中国指出,按人均排放量标准计算,每个中国人的排放量只有每位美国人的五分之一。煤在中国所使用的商业能源中占70%,在美国所使用的能源中只占三分之一,而煤是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特别大的一种能源。中国每周建成不止一座新的烧煤火力发电站。在中国,煤的储量丰富而且价格低廉,它对于一个争夺能源以确保其许多能源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美国如何对付这种安全威胁呢?传统安全政策中的炸弹、子弹和封锁是没有用处的。国际能源组织(该组织创建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旨在为工业化国家提供政策建议) 在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要求采取合作的方式帮助中国和印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换句话说,美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安全,可能不得不与中国建立起伙伴关系,寻找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的创新思维、技术以及政策。

现实主义者会认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决定着气候变化问题难以得到全面解决。假如一些国家决定限制自己的经济发展,以便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那么其他国家则将免费享受因此带来的好处。这属于一个典型的搭便车问题,我们在很多国际政治情势中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行为。从个体国家的角度来看,搭便车通常属于理性行为。不仅如此,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对本国人民负责,而不是对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是第一位和最为重要的问题。于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可能选择免费搭车的政策,即本国不采取减少排放的措施,而享受其他国家减排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但总的来看,气候变化问题正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国际性挑战,它会导致环境、经济以及安全方面的重大后果。随着很多国家采取行动,一场浩浩荡荡的全球环保运动表明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未来,这样的环境问题以及其他跨国性挑战将变得更加重要,并且会带来从超越军事层面看待国际冲突的新思维。不管怎么说,跨国性挑战将增强当今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随着跨国性挑战与威胁的增大,国家不仅开始质疑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截然分开的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而且开始使用得到扩展的安全和防务的观念。很多新型的威胁不能靠拥有高杀伤力武器的军队来加以解决。情报、海关和警察部门的密切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私营部门所采取的保护和防范措施也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民主国家做不到这些,让恐怖主义者利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造成个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那么福山有关未来的构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即便政府起来应对挑战和遏制跨国性威胁,国际秩序中那些更为传统的问题也仍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后续阅读材料

1.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s No. 16 (Summer 1989）, pp.3—18； Francis Fukuyama, "Second Thoughts: The Last Man in a Botton," *National Interesty* No. 56(Summer 1999）, pp.16—33；and "Responses to Fukuyama," *National Interests* No.56 (Summer 1999）, pp.34—44.

2.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Summer 1990) , pp. 5—56； and Stanley Hoffmann, Robert Keohane, and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2 (Fall 1990) , pp. 191—199.

3.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 5 (Summer 1993) , pp. 22—49.

4. *Charles W. Kegley and Gregory A. Raymond, The Global Future: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Boston: Wadsworth, 2011) , pp.377— 392.

新的世界秩序?

既然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都在起作用,那么21世纪的世界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冷战的结束确实改变了国际体系,但有关"新的世界秩序"渐露端倪的言论则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人们对于"秩序"(order) 这个词的各种解释是大相径庭的。现实主义者声称,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国家在无政府世界中追求权力和安全,在无政府世界中没有最后的秩序仲裁者,国家只能靠自助和使用武力。按照这种观点,秩序主要是指国家间权力分布或者国际结构。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冲突以及预防冲突,不仅取决于均势,也取决于国家的国内结构以及国家的价值观念、认同和文化,还有跨国挑战、冲突解决的国际制度等。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同现实主义者相反,他们宣称,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制度,通过稳定期望(stabilizing expectations) ,使国家产生连续性的观念和相信今日的合作行为会在明日获得回报,从而有助于防止冲突和建立秩序。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秩序同民主和人权的观念以及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建构主义者关注规范、利益以及行为的认同,并且提醒我们,"秩序"会通过行为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发生演变。因此,有关秩序的理解总是存在着争议,秩序从来就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词,秩序也是不可预测的。

还有人认为,秩序更多地包含着阴谋。在以美国的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 和法国的让-马里·勒潘(Jean-Marie Le Pen) 为首的本土主义(nativist) 或者民族主义团体看来,"新的世界秩序"就是金融和政治精英为了主导世界所策划的阴谋。依此观点,跨国公司同华尔街、伦

敦和东京的金融市场沆瀣一气、损人利己。在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眼中,秩序纯粹是西方主导非西方世界的观念。

这些五花八门的秩序定义表明,"新的世界秩序"的含义是很难加以界定的。上述每个思想流派都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冲突的根源。现实主义强调均势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充分,因为正如建构主义者可能会指出的,长期的社会变迁正在侵蚀国家主权规范。有关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在许多国家,包括某些正在崛起的大国,还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就不是一剂万灵药了。过去的冷战两极秩序是稳定的。冷战使得一些第三世界冲突变得更为严重,但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冲突,则为这些国家所共同面对的苏联军事威胁所抑制,而且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也压制了当地深刻的族群矛盾。两极秩序已经消失了,但是冲突并没有随之终止。然而,冲突的根源却有所不同。

未来的权力格局

正如修昔底德以来的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一再提到的,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和霸权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样的权力转移就是最近历史上发生的大国冲突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包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权力的相对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角逐。人们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即冷战后的时期就是一个权力迅速发生转移的时期,美国和中国实力上升,而俄罗斯走向衰落。然而,人们对于权力转移的描述和重要性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正表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权力转移成为冲突的一个潜在根源。

有关未来权力结构的一种预测是 多极格局(**multipolarity** ） 。比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主张回到多极世界中去。如果"多极"这个词只是指19世纪的那种情况,那么它极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19世纪秩序的基础是5个实力大体均等的大国之间保持着均势状态,而冷战后大国的实力是极不均等的。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已经迅速地衰落了,其衰落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几乎没人想到过,尽管它还拥有巨大的核武库,并且由于最近油价上涨而获得一些推动力。中国的崛起速度之快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它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率,但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日本和德国并没有如某些人在1990年所预测的那样,成为羽翼丰满的超级大国。印度虽然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

进步,但是它若要想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克服一些障碍。美国是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的地位相类似。

一些现实主义者警告说,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在21世纪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这类似于威廉二世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英国的挑战。然而,这样的历史类比是有问题的。德国的工业实力在1900年以前已经超过英国,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40%(根据官方汇率计算)。假如中国经济继续以10%的年增长率高速发展,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那么中国将会在2025年赶上美国。但是,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中,其中包括环境与人口方面的变化,其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下降。不管怎么说,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双方都有避免冲突的强烈动机。如果两国政府处理不好双边关系,那么冲突是有可能发生的。然而,一场霸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有些分析家预测,世界将分为欧洲、亚洲和北美 三大经济集团**(threeeconomic blocs)**。即便如此,全球技术变革以及跨国公司和族群团体等非集团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将抵制这三大集团对它们的限制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那种从文明的角度描述世界秩序的观点之弊端。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也有一些分析家把国际秩序描述为美国的世界帝国。帝国的比喻在很多方面的确很吸引人。美国可以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世界各个地区,它在世界许多地方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当地的美军司令官有时就像总督那样行事。今天的英语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拉丁语那样,成为了国际通用语言。美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美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把首要地位(primacy)同帝国加以混淆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把今天的美国同19和20世纪的欧洲海外帝国加以比较,那么美国确实不是一个帝国,因为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控制。虽然美国同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使得其他国家容易为美国所利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对它们实施正式的政治控制," 帝国 "一词不仅是不准确的,也是会误导人的。

美国比帝国巅峰时期的英国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但是,从控制其他国家的行为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所拥有的权力比英国小,当时的英国统治着地球四分之一的地方。比如,肯尼亚的学校、税收、法律以及选举,更不用说对外关系,都是受英国官员控制的。今天的美国却没有多少这样的控制权。在2003年,美国甚至无法让墨西哥和智利在安理会表决中,赞成通过有关授权入侵伊拉克的第二个决议案。那些把美国称为帝国的分析家回答说,"帝国"这个词仅仅是一个比喻。然而,这样的比喻有

一个问题,即它所表述的华盛顿所具有的控制力,同当今权力分布的复杂形势是不相一致的。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了解到的,美国发现自己在伊拉克赢得战争要比对该国实施占领容易很多。

在全球信息时代,国家间权力分布格局很像一个复杂的、三维的棋局,你可以纵向地走棋,也可以横向地走棋。在政治—军事问题这个最高的棋局中,军事实力的分布呈现为单极,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在经济问题这个中间的棋局中,美国不是一个霸权国家或者帝国,它必须同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例如,在反垄断或者贸易问题上,美国必须同欧洲国家进行协商和达成协议。在跨越边界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这个最下方的棋局中,权力分布是极其混乱和分散的,行为体五花八门,包括银行家和恐怖主义者。除了恐怖主义之外,有关跨国关系的例子还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个人行为体,他们可以制约美国通过利率政策来进行经济调控的做法;毒品贸易、艾滋病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的产生,有不止一个国家内部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而且它们是跨越国界的,不受美国政府的控制。使用 单极 、 霸权 或者 美利坚帝国 等传统词汇去描述这样一些跨国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那些依据传统的军事实力来描述一个帝国的人,所依赖的是单个维度的分析。然而,在三维棋局中,假如你只关注一个棋局,无视其他棋局,以及没有看到这些不同棋局的垂直关系,那么必输无疑。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在最高的棋局上,采取了推翻伊拉克独裁者的军事行动,但与此同时,这又增强了"基地"网络在最下方的棋局上招兵买马的能力。这些问题代表着全球化的阴暗面,它们具有多边性质,其解决有赖于合作。把这样一个世界描绘为美利坚帝国,没能抓住美国所面对的世界之真实性质。



2003年伊拉克战争

不仅如此,这样的分析还有一问题,即美国公众可能不会容忍自己的国家扮演古典帝国的角色。美国在1898年兴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之后,曾经一度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国家,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美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经历感到不舒服。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帝国。相反,公众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和主张利用联合国。迈克尔·伊格纳蒂耶夫(Michael Ignatieff),一位主张采用帝国比喻的加拿大人,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低卡版帝国"(Empire Lite),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当前的权力分布属于 多层次的相互依存(**multilevel interdependence**)。世界政治就如同三维的国际象棋,单从一个维度是解释不清楚的。如果军事权力像货币一样具有互换性,并且可以左右各个领域的结局,那么这种复杂关系就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军事上的强大并不能决定当今世界政治中经济和跨国关系层面棋局的结果。美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它拥有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但从"帝国"这个词的传统含义上说,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能为所欲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议程上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所能独自解决得了的,这样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

传染病的传播以及跨国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21世纪美国权力的悖论在于,这个自罗马帝国以来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无力独自保障本国国民的安全。

旧观念的牢笼

冷战后的世界是很独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家正确地指出,我们不应该束缚自己的思想,不应当强求大家都用传统的和机械的有关极的比喻来认识国际政治。权力变得更为多维度,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变得更容易被渗透。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意味着世界秩序不可能只建立在传统的军事均势基础之上。

现实主义有关世界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正在慢慢地推动世界走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长期的社会变迁。欧洲国家经过30年的宗教战争,于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规定,统治者可以不顾公众的偏好,决定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秩序的基础是国家主权,而不是人民主权。在其后几个世纪中,国家之间那种机械的制衡(正如同台球一样)正慢慢地受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主参政意识的提高的侵蚀,但国家主权原则一直延续下来。今天,跨国间沟通、移民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对传统的秩序和国家控制观念的侵蚀,并且扩大了旧规范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这种演变使得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念变得比较有意义:人民和所有国家都是世界政治的行为体,秩序的基础既包括价值观、制度,也包括军事权力。过去被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的自由主义观点,比如伊曼纽尔·康德关于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主张,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牵强附会,因为政治学家们指出,我们实际上找不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交战的例子。例如,在讨论德国重新统一的影响时,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现实主义者认为,欧洲正"退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新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它通过欧盟的制度已经同自己的西方邻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然而,政治学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和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指出,年轻的民主国家会更倾向于介入战争,因此动荡地区(比如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不一定很快带来安全红利。

自由主义秩序观念的确不是全新的东西,它们并非对所有国家都适用。

冷战秩序也有规范和制度,但它们的作用很有限。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成了有关联合国的协议,该组织的基础是多极权力分布。联合国安理会负责实施集体安全和不侵略弱小国家的原则,五大常任理事国则使用否决权来保护自己。

然而,由于人们事先没有料到会出现两极体系,因此这个以制度维持秩序的威尔逊思想难以被付诸实施。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否决对方的倡议,联合国的作用被限制在派驻维和部队监督停火方面,而不能以武力赶走侵略者。苏联权力的衰落导致克里姆林宫在1990—1991年对伊拉克实施联合国集体安全原则的过程中,采取了同美国合作的新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到来了,而是表明有关国家战时预计在1945年实现的自由制度秩序构想的某个条件再次出现了。

但正如海湾战争使得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构想出现了生机,这场战争也揭露了自由主义观念的一个严重弱点。《联合国宪章》所表述的集体安全原则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只适用于越过边界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国家内部的民众相互使用武力的情势。自由主义者试图以宣扬民主和自决的原则来规避这个问题:让一国内部的民众表决是否反对外来干涉。然而,正如本书在前面所提到的,自决并没有像说的那样简单。到底谁来决定由哪个"自己"来做决定呢?当今世界上只有不到10%的国家是单一族群的,只有一半国家拥有一个在本国总人口中占75%以上的族群。绝大多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有很多少数族群,很多国家还有边界争端。非洲大概可以被视为这么一块大陆,大约有1000个族群生活在50多个国家内,并且跨界而居。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讲法语的居民占多数,他们要求拥有特殊地位,而且一些人鼓动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而独立。这种多元族群和多种语言的国家一旦出现问题,冲突的过程是很难结束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地方自治和国际社会对少数族群权利的关注应当得到尊重,然而,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的政策可能会导致世界陷于极大的混乱状况之中。

一种混合型的世界秩序的演变

那么如何做到在保持传统的、建立在主权国家均势基础上的某种秩序的同时,又建立起以"人民间的正义"(justice among peoples) 为基础的制度呢?国际制度正朝着这样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post-Westphalia) 的方向发生演变。人权与更为广义的人类安全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及其有关国家负有保护其公民的人

权、国际社会具有"保护的责任"(R2P)以解救受本国政府迫害的民众等观念,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早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就要求成员国承担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集体责任。甚至在1991年安理会通过授权干涉伊拉克的决议之前,联合国有关制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建议,就已经开了一个可以不受宪章有关主权规定严格限制的先例。在欧洲,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包含了少数人权利的条款,违背该条款的行为可以提交给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欧洲理事会处理。国际法也因此在逐渐发生演变。1965年,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把国际法定义为"规则和原则……用以处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20年之后,该学会的法学家在该定义后面添加了"以及它们与个人关系的某些方面"这些文字。人权越来越被认为不只是国家所关心的问题。2005年,联合国大会表明,虽然国家承担保护本国国民人权的主要责任,但是国际共同体在国家无力或者不愿意履行这一义务的时候应该负起这个责任。2011年,国际共同体首次依据保护的责任,采取行动保护利比亚内战中的平民。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或许是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人权依然遭到了蔑视,而且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以多边军事干涉行动来纠正错误,也会导致极大的混乱。然而,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干涉属于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干涉行为根据程度的不同有多种形式,最轻的当属发表声明和采取有限的经济措施,最重的则是全面发动侵略。有限干涉行为和多边制度侵害主权的情况,可能会逐渐增多,但不会突然破坏国家间的均势。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如果安理会确定国内暴力或者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能对一个地区的和平构成较大的威胁,那么安理会可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采取行动。这样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弹性,其适用范围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另外,国家集团可能在某个地区采取行动,正如尼日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框架下,出兵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或者如北约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

这些原则和制度并不完美,会给发生国内暴力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行为留下很大的空间。然而,它们在道义上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比起决策者动用武力纠正所有的错误或者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的做法,无疑要少一些。自由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出现一个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现实主义者必须懂得,传统的权力思想和纯粹军事意义上的结构观念,忽视了一个包含着全球沟通和日益发展的跨国关系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变革。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建立世界政府的时代并不会马上来临。这个世界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存在着太多的多样性,而且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支撑世界政府的共同体观念。联合国改革与新制度形成,给国家之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加强合作提供了新途径。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的跨国网络将促进这样的合作；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联合可以促进这样的合作。但是,这对民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民主就是那些为大多数人民负责并且可以被大多数人民所撤换的官员实施统治,与此同时,个人与少数民众的权利也受到保护。那么在全球层面政治认同观念很弱的一个世界中,"人民"(we the people) 指的是谁呢?"一国一票制"是不民主的。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了解的,根据这种投票制度,一位马尔代夫群岛的公民比一位中国的公民享有3000倍的选举权。在另外一方面,把世界视为一个全球选区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愿意在投票中始终被10亿中国人和10亿印度人所压倒。当少数人感觉自己已经参加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时,就会默认多数人的地位。由于在国际社会中缺少这样一种共同体,因此把国内层次的投票程序移植到全球层次中去,就没有什么实际上和规范上的意义。随着欧盟的发展,一个更为强大的欧洲议会或许会减轻"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 观念,但是人们难以相信在全球层面上也会产生类似的条件。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民主一直是在主权国家中得以兴旺发达的。

即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选举本身不足以确保官员采取负责任的行为。比如在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储备局只是间接地通过一个很长的代表链条(a long chain of delegation) 而受选举的影响。虽然专门规范和标准会有助于让法官和中央银行行长采取负责任的行为,但是透明度对于确保他们扮演这种角色则是至关重要的。除了选举之外,公众还通过从言论和民调到抗议等多种手段,表达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发泄情绪。利益集团和自由的新闻机构对于增强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透明度,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私营部门也能够督促官员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私营组织及其规章,比如国际化工行业在1984年印度博帕尔一个工厂爆炸之后所创建的组织与规章,就可以制定共同标准。非政府组织点名羞辱那些剥削童工的公司,有助于消费者敦促那些生产玩具和服装的跨国公司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尽管人们在市场中拥有的选举权利并不均等,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市场负责的要求可能使得腐败政府提高了透明度,而任何一个正式的协议却没有这么大的约束力。特别是在议会很弱的国家中,开放的市场有助于减少地方不民主的垄断权力,并且削弱那些保

守和不作为的政府官僚机构的权力。此外,投资者要求提高透明度和法律可预测件的努力,也会对政治制度产生有益的外溢效应。包含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代表的混合网络可能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这些全球治理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全球化治理的规范与程序。回避问题、与国内情势进行有误导的类比以及发表有关民主赤字的陈词滥调,这些都毫无用处。我们需要进程方面的变革,利用现代民主国家中多种形式的问责制度。国际制度虽然不是国际政府,但它们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治理至关重要。

后续阅读材料

1. Daniel Deudney, Bounding Power: *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6, 193—277.

2.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Heikki Patoma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Security: War, Future Crises and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6).

对未来的思考

你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呢?你几乎肯定将生活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支配一切的政治权威。幸运的是,这个世界并不会是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秩序的基础既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均势,又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制度,也可能

是建构主义者所说的演进中的新规范与新观念。这样的秩序并不总是公正的。正义和秩序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在自决问题上也是这样。到底是保证边界不受侵犯更重要呢,还是损害领土完整以追求人道主义目标以及保护人权更重要?这样的选择如何影响秩序的原则?合法性和软权力的作用是否更加重要呢?这些争论是不易得到解决的。

然而,世界正在发生变革。罗伯特·吉尔平声称,在过去的2000年中,国际政治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理解当今的世界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假如修昔底德突然来到中东,他可能很快就能搞清楚当地的局势。但假如他去了欧洲,他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理解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放眼世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核武器的发展所代表的技术革命;降低地理和领土因素作用的信息革命;迅速发展的经济相互依存;正在形成中的全球社会,人们日益意识到存在着某些跨越国家边界的价值观和人权观。很有意思的是,18世纪自由主义者伊曼努尔·康德在论述国际政治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类似的变革。康德预言说,从长远来看,人类将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超越战争:战争毁灭性的增大,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以及他所说的共和政府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

为了理解当今的世界,我们必须了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关注建构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变革。我们需要同时思考不同的理想模式。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它们都是抽象的世界模式。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由很多以武力追求安全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复合式相互依存的鼓吹者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经济手段、福利目标,它们比安全更加重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思想光谱中两个极端的观点,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该光谱中找到很多形形色色的认识真实世界的观点。所有三种路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我们理解变化中的国际政治,都是很有帮助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本书试图为您提供一个如何思考复杂和变化的世界政治之范例。我们已经努力告诉您如何把理论工具与历史结合起来解释(explain,即揭示原因)、诠释(interpret,赋予意义)以及评价(evaluate,政治和道义上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其他的工作等着您来完成。

思考题

1. 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指的是什么?他的这个观点之长处和短处何在?

2. 到底是大的文明之间还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更可能发生?亨廷顿观点之长处和短处何在?

3. 是否有一个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秩序的新的世界秩序?它是多极的,两极的,还是单极的?这有意义吗?

4. 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是减弱了,还是增强了?请举例说明。在民族主义时代可能出现帝国吗?

5. 核战争威胁是否已经成为历史了呢?恐怖主义者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会有什么后果?

6. 赞成和反对中央政府权力分流的观点有哪些?为什么权力分散很重要?它对民主会产生什么影响?

7. 什么样的权力现在很重要,而且在今后几十年中也很重要?这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或者正在进行中的阿富汗战争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吗?

8. 现实主义理论如何预测欧洲或者亚洲的未来?还有其他哪些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路径能够补充什么?

9. 全球政府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制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们会给民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0. 赞成和反对把当今世界描述为美利坚帝国的论点有哪些?

11. 如果互联网增强了跨国团体的力量,那么这对世界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2. 21世纪的安全与20世纪的安全有什么不同?像气候变化与传染病这样的跨国性挑战会改变世界政治的性质吗?

13. 人权在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吗?人道主义法规能否与威斯特伐利亚法律中的主权规范相调和?

[1] Walter Laquer, "Left, Right, and Beyond:The Changing Face of Ter- ror," in James F. Hogue and Gideon Rose, eds., *How Did This Happen? Terrorism and the New Er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c Affairs, 2001) .

[2] Professionals for Cyber Defense,"Letter to President Bush," http:// www. uspcd. org/history.htm (accessed on September 2, 2007) .

[3] Garrett, Laurie,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Health,"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7) , Vol.86, No.l, p.14.

[4] Michael T. Klare." Global Warming Battlefields:How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 Security, *Current History* , Vol. 106, No. 703 (November 2007) , p.355.

[5]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http://securityandclimate.cna.org (accessed August 28, 2007) , p.6.

术语解释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 反对北非和中东极权政府的抗议浪潮与起义,始于2010年12月的突尼斯。

霸权(**hegemony**) 在国家体系内行使控制权的能力。今天的美国经常被认为行使了军事霸权。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1994年签署的关于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 更准确地说,是修昔底德所记述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它是发生在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之间的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的冲突,导致雅典人的失败以及雅典民主

黄金时代的终结。见"修昔底德"。

博弈论(**Game Theory**) 有关理性行为体在战略互动背景下将如何行为的分析。

不对称(**asymmetry**) 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或者行为体之间实力对比不均等的情势。美国对基地组织所发动的战争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对称的冲突。

布雷顿森林(**BrettonWoods**) 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胜地,1944年在这里召开过一个有关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会议。

脆弱性(**vulnerability**) 改变相互依存体系所带来的相对代价。它也可以被看作是违背或改变游戏规则所带来的代价。

单极(**unipolar**) 一种国家拥有主导权力的国际体系结构。一些分析家把当今的军事力量结构视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它认为一国的位置、与他国的距离以及实力是决定其行为的关键因素。

对称(**symmetry**) 指权力对比相对均等的国家或者行为体处于对立状态的情势。冷战后半期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均势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对称的冲突。

多极(**multipolar**) 一种由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或国家同盟主导世界政治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很多学者认为19世纪的欧洲是多极的。

遏制(**containment**) 一种用来阻止某个潜在侵略者扩展其影响的地理范围的对外政策。遏制是冷战时期美国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政策基石。

反事实推理(**counter factuals**) 通过精心假设与事实相反的条件来想象出某种情势的思维试验。它们经常以"假如……那么会怎么样"的问话形式加以表述,被运用来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可能性,以便探询因果关系。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 从广义上说,它指的是任何一个代表除了国家以及跨国公司以外的行为体利益的组织。通常包括跨国或国际团体(有时也称国际非政府组织)。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天主教教会、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

非对称性(**Asymmetry**）指实力对比不平衡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体所处的相互对立的状态。美国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被普遍认为是非对称性战争。

干涉(**intervention**）影响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外部行为。该词经常被用来描述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事务进行粗暴干预的行为。

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1962年10月发生在美苏之间的有关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对峙。这场危机以苏联撤走导弹以换取美国私底下同意从土耳其撤走导弹而结束。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产生于1947年的一个关于关税和贸易的国际协定,它在1994年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取代。

国际法(**intemational law**）规范国家行为的条约和习惯之总称。国际法也可以适用于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个人。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解决国家间争端以及就联合国大会以及其他权威机构提交的问题提出法律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组成部分(第十四章）》国际法院设在海牙,其前身是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

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属于现在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一种。见"非政府组织"(NG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关借贷的国际制度,主要任务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以便帮助稳定货币或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见"布雷顿森林"。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致力于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伍德罗·威尔逊是国际联盟的主要倡导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阐明的十四点计划中,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国际联盟由于无力防止侵略行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失败。

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一种使国际体系概念化的方式,它强调国际法、规范以及规则(包括协议与礼节规则）以及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建构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中的英国学者(其中某

些人属于古典现实主义者）一般倾向于谈论国际社会,而不是国际体系。新现实主义者正好与此相反。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 见"体系"。

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一种审判犯有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或者战争罪的个人之国际审判机构。根据《罗马规约》而设立,2002年7月1日开始工作。

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见"国际政府间组织国家(state）一种拥有主权、领土的政治单位。

国家道义主义(**statemoralism**） 认为国际道义取决于主权国家遵守特定的游戏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并非总是被遵守；国家边界内的道义义务比国家之间的道义义务要重要得多。

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国家对于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目标之认知。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建构主义者对于国家是怎样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有着不同的认识。

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所使用的一种战略,旨在阻止对方以核打击威胁来采取挑衅性行动。见"威慑"。

环境目标(**milieu goals**） 诸如民主或人权那样的非具体目标,与诸如领土那样的具体目标相对应。

怀疑论者(**skeptics**） 怀疑论者坚信道义范畴内的因素在讨论国际关系的时候没有什么地位,因为不存在一个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国际共同体。

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国家集体同意通过建立一个制度框架和法律机制,以防止或者压制侵略行为,从而维持和平的一种途径。朝鲜战争(1950—1953）和海湾战争(1991）就是在联合国主持下的两个集体安全行动的例子。

结构(**structure**） 体系中单位的分布。结构决定单位之间的关系。现实主义者把权力分布视为国际体系结构的最重要特征；建构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社会层面(比如规范、规则以及认同）。

建设和平(**peacebuilding**）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造的一个词,指的是外国军事与非军事人员为了稳定受战乱困扰的社会,建设持久的治理结构,以及为长期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创造条件,而采取的一系列

行动。

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jus in bello**） 正义战争理论的一部分,强调符合道义的战争方式。传统上,这些方式包括:遵守战争法规；使用的武力与追求的目的相称；遵守不伤害非战斗人员的原则。来自拉丁语中的"战争中的正义性"。

建构主义(**constructvism**） 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强调观念、规范、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塑造行为体认同、利益以及行为上的重要作用。约翰·鲁杰、亚历山大·温特以及彼得·卡赞斯坦等人被视为建构主义者。

经济相互依存(**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在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的行为体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相互影响之情势。见"相互依存"。

均势(**balance of power**） 一种通常被用来描述下面几种情势的词汇:(1）一种特定时间段内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2）与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结盟以便防止另外一个国家取得权力优势地位的政策；(3）有关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中应该如何行为的现实主义理论；(4）19世纪欧洲多极体系。

跨政府间关系(**traresgovemmental relations**） 国家政府下属单位之间的关系。

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 任何一个其行为跨越边界的非国家行为体。见"行为体"。

冷战(**Cold War**）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它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并持续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虽然双方在全球范围进行了代理人的战争,但是美苏的军队没有直接交战,从而造就了"冷的"战争,而没有导致"热的"战争。

两极(**bipolar**） 由两个国家或国家同盟主导世界政治的国际体系结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对立通常被看作是两极体系。

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 在1957年签署的一项条约,它奠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先是导致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最后导致欧洲联盟和欧元的诞生。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联合国安理会设立的临时法庭,负责审判卢旺达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行或者战争罪行的人。

马克思主义(**Marxism**） 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的路径,它从卡尔·马克思以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述中获得灵感,把经济阶级视为主要行为体,从阶级互动的视角来解释世界事务中的模式与事件。

民族(**nation**） 指的是一群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历史、神话、认同或者命运观,而且同某个特定的领土有着密切的关系,希望获得政治自主权。所有的民族都属于人民(People）(见"人民"）。令人困惑的是,"民族"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国家"(见"国家"）。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指的是一个单一族群国家,即该国的所有(或者几乎是所有）国民都属于一个民族。该词既是一个描述性词汇(比如,它指的是韩国、朝鲜、日本以及其他单一族群国家）,也是一个界定性词汇(比如,它指的是所有民族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么一个在实践中不可能实现的哲学理念）。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民族认同的表达或者宣示,通常表达这么一种政治理念,即主张自决或自治的权利。见"民族"、"自决"以及"自治"。

敏感性(**sensitivity**） 相互依赖效应的大小与快慢。用来描述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化会在多短的时间内导致其他部分也发生变化。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联合国安理会设立的临时法庭,负责审判南斯拉夫暴力解体(1991—1995）期间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行或者战争罪行的人。

强制和平(**peace enforcement**） 部署外国军队以迫使交战的一方或者多方遵守联合国有关停止冲突的决议。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属于一种经典的战略互动,在其中,两个独立的决策者都想追求自己的理性的自我利益,将选择与对方不合作的行为(即背叛）,如果两人都这么做的话,那么结果将是很坏的。囚徒困境的最可能结果就是在别人合作的时候自己背叛,非合作的结果正是源于不能相互信任。见"博弈论"。

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 goods**） 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概念的延伸,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其中的例子包括知识与稳定的气候。

全球化(**globalization**） 从最广义上说,该词被用来描述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网络。它具有多个维度的内容,包括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全

球化。它不是一个新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但由于信息革命,当今形式的全球化比过去的全球化"程度更深、速度更快"。

权力(**power**) 笼统地说,指达到自己的目的或目标的能力；具体来说,指影响别人、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之能力。罗伯特·达尔把权力界定为"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这个定义更窄。

人民(**people**) 因共同文化、传统或者亲属关系(不一定是血缘、种族或者政治关系)而联合在一起的群体,通常使用一种语言并拥有共同的信仰体系。拥有领土家园以及共同政治认同观念的人民就是民族。

软权力(**softpower**) 通过吸引,而不是惩罚或收买,从而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之能力。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年间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源于国际、宗教和王朝冲突的战争。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 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的处理世界事务的蓝图。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呼吁建立一个能够保障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见"国际联盟"。

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组织,它试图协调成员国的石油生产与石油定价。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建于1994年的一个国际组织,旨在规范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与关税。见"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世界银行(**World Bank**)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旨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技术援助以及政策建议。见"布雷顿森林"。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认为个人,而非主权国家,是世界事务中的道义单位,主张像人权这样的道义原则具有普世性,而不具有文化特殊性。查尔斯·贝茨是一位著名的世界主义理论家。

绥靖(**appeasement**) 试图通过满足一个咄咄逼人的大国之要求以防止冲突的行为。更具体来说,它特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推行的满足德国合法申诉的政策。

体系(**system**) 一系列相互关联、经常互动的单位。国际体系是一种

特殊的体系,其单位是国际行为体,其中主权国家最为重要,主权国家之间互动的过程包括外交、谈判、贸易以及战争。

体系稳定(**system stability**） 笼统地说,指一个体系在没有崩溃或者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吸收冲击的能力之程度；具体来说,国际体系稳定指该体系战争倾向性的程度。

同盟(**alliances**） 主权国家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通常是为了相互保障自身的安全。

危机稳定(**crisis stability**） 领导人在国际危机中所感受到的危机升级到战争的压力之估量。

威慑(**deterrence**） 一种通过威胁或恐吓来阻止一个潜在侵略者采取侵略行动的战略。

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 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1648年签署并标志三十年战争结束的条约,它成为了主权国家为最高权威形式的国际体系的框架。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 见"威斯特伐利亚利亚和约"。

维持和平(**peace keeping**） 部署中立的、携带轻型武器的外国军队或者警察,以便阻止在一个国家内或者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很多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但是联合国之外的地区组织或者国家集团也可以采取维和行动。

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 在1815年签署的议定,标志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19世纪欧洲国际体系总框架的建立。

稳定(**stability**） 见"危机稳定"、"体系稳定"。

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 在1713年签署的一项条约,它标志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并且确立了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所占土地的合法性。

无政府状态(**anarchy**） 即缺少等级制。主权国家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属于无政府体系,因为国家之上没有权威。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无政府状态通常不是混乱状态的同义词,因为无政府体系可以是很有秩

序的。

现实主义(**realism** ） 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它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战争和武力的使用。修昔底德、俾斯麦、卡尔、摩根索以及基辛格等人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 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势。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 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严谨性获得启示,它认为国家行为主要受制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肯尼思·华尔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是著名的新现实主义者。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 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它认为国家的行为受制于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罗伯特·基欧汉被认为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见"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

行为体(**actor** ） 其决策与行为能够影响国际政治的任何一个人、团体或者机构。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有时候个人都可以是国际行为体。

修昔底德(**Thucydides** ） 雅典的一位指挥官,其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描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所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编年史,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部关于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著作。他被普遍认为是现实主义之父。

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 ） 反事实推理的一种特别方式,它推论.如果发生了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将会怎么样。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 一种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理论,它预言那些处于国际体系"中心"地带的富裕国家将阻碍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硬权力(**hard power** ） 通过惩罚或收买达到想要的目的之能力。

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doctrine** ） 一种源于古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思想传统,阐述了有关诉诸武力的理由以及在战争中如何使用武力的道义原则。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历史人物；迈克尔·沃尔泽是该思想传统的当代著名理论家。见"走向战争的正当性"和"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

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IGO** ） 成员为主权国

家的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就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范例。通常被称为国际制度。

主权**(sovereignty)** 统治的绝对权利。

自决**(self-determination)** 人民所拥有的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

自治**(self-government)** 人民所拥有的自己统治自己的权利。

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的路径,它强调国家是作为全球社会的一部分而行动的,全球社会是国家间互动的舞台,以及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伊曼纽尔·康德、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人的著作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源泉。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走向战争的正当性**(Jus ad bellem)** 正义战争理论的一部分,规定国家的战争行为符合道义的条件。传统上,这些条件包括:正当理由;正确动机;合法权威;最后手段;获胜把握,来自拉丁语的"走向战争的正当性"(justice to war) 。

第九版译后记

小约瑟夫·奈的国际关系教科书《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的中文版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历经数个月的紧张劳作终于告一段落。这是我自2001年以来第四次翻译、修订奈的这部久负盛名的教材,也更加深刻地体会了翻译学术著作的艰辛与乐趣。不过,翻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部新版教材所体现出来的变化与新意。

奈的这本教科书从第一版到第七版,书名都是《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但从第八版(2010年) 开始更名为《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从书名的变化,我们其实就可以大致了解到作者叙事与分析思路的某些调整,即从"国际"视角转向"全球"视角,从关注"冲突"问题扩展到探讨"冲突与合作"问题。此外,从第八版开始,该书的作者不再是小约瑟夫·奈一个人,而是多了一位合作者,即奈以前在哈佛大学教过的学生、现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戴维·韦尔奇。韦尔奇的加入,使得这本教材显得更"年轻",更与时俱进。

与已经翻译成中文的《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前三个版本、特别

是第七版(2009年）相比,《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2012年）有了不少改动,其中某些章节(尤其是第二章和第六章）从标题到内容,很多都是重新撰写的。首先,该书在理论阐述部分,除了继续重点介绍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这三个所谓的主流范式之外,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英国学派(被该书作者视为现实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政治心理学、官僚政治学等新内容。其次,该书添加了阿拉伯之春、日本福岛核危机、本·拉登之死、南中国海争端等最新重大事件。最后,该书有关中国的叙述与分析明显增多,这同国际上的"中国热"日益升温颇相吻合。

然而,《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依然延续了奈的写作风格与分析思路,即语言简洁明快、理论与历史相结合。另外,与以前的版本相比,该书最新版本的基本框架结构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相信,这部富有特色的教科书一定会给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教学与实际工作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也可以帮助正在学习和准备学习国际关系的中国学生掌握基本的相关理论概念、历史知识以及分析方法。

从《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三版的中文版正式出版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十年之间四次翻译和修订同一本教科书,实际上我每次翻译完该书的一个版本之后都会产生就此罢手的念头,有时甚至会对费时、费力的翻译工作深感厌恶与痛恨。支撑着我坚持下来的主要动力,是自己希望为中国读者提供一部可以信赖的、比较经典的国际关系教科书译著。为此,我十分感激这些年来给予我热心鼓励的广大读者,以及给予我充分信任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同时也感谢责任编辑潘丹榕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张小明

2012年7月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鸣谢

PEY'J

自己制作的的本书WORD版本

他也是用扫描PDF而后OCR制作的

所以文档有什么错误请找他。

哈哈，开个玩笑！

他会做电子书的话，这书就没我什么事了

希望他能够看到我对他的感谢！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页
- 序
- 前 言
  - 这个版本新增加的内容
  - 本书的特色
  - 致 谢
-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永久的冲突与合作逻辑吗?
  - 什么是国际政治?
  - 伯罗奔尼撒战争
  - 伦理问题和国际政治
- 第二章 解释冲突与合作的工具与技巧
  - 基本概念
    - 国家、民族、民族国家
    - 国际行为体、权力以及权威
    - 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
    - 体系稳定与危机稳定
    - "国家利益"
  - 分析层次
    - 个人层次
    - 国家层次
    - 体系层次

    - 范式与理论
        - 现实主义
        - 自由主义
        - 马克思主义
        - 建构主义
    - 反事实推理与"虚拟历史"
        - 合理性
        - 相近性
        - 理论性
        - 真实性
- 第三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 管理大国冲突:均势
        - 作为权力分布的均势
        - 作为政策的均势
        - 作为理论的均势
        - 作为历史上多极体系的均势
    - 19世纪的均势体系
        - 结构
        - 过程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三个分析层次
        -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 选择的漏斗
        - 再谈历史教训
- 第四章 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 集体安全制度的兴与衰
        - 国际联盟
        - 美国与国际联盟

        - 早期的联盟
        - 国际联盟在中国东北的失败
        - 埃塞俄比亚纷争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希特勒的战争?
        - 希特勒的战略
        - 个人的作用
        - 体系和国内原因
        -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 太平洋战争
        - 绥靖与两种类型的战争
- 第五章 冷战
    - 威慑和遏制
    - 解释冷战
        - 三个路径
        - 罗斯福的政策
        - 斯大林的政策
        - 冲突的阶段
        - 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 分析的层次
        -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 遏制行动:越南战争
        - 动机、手段和结果
        - 美国卷入越南大事记(1954—1975)
    - 冷战的其他方面
        - 冷战的结束
        - 核武器的作用:物理学和政治学
        - 恐怖的平衡
        - 核威慑的问题
        - 古巴导弹危机
        - 道义问题
- 第六章 冷战后的合作、冲突与热点

- 管理冲突
    -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 可预见性与合法性
    - 联合国:集体安全与维持和平行动
- 国内冲突
    - 干涉与主权
    - 干涉概念的界定
    - 对干涉行为做出判断
    - 不干涉规则的四个例外
    - 自决的问题
    - 种族灭绝与"保护的责任"
- 当今热点
    - 中东
    -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 1991年和2003年的波斯湾地区冲突
    - 伊朗成为核国家?
    - 印度与巴基斯坦
    - 南中国海
    - 台湾海峡
    - 朝鲜

- 第七章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 全球化的各个方面
    - 21世纪全球化有什么新内容?
    - 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
    - 权力与相互依存
  - 相互依存的概念
    - 相互依存的根源
    - 相互依存的收益
    - 相互依存的成本
    - 相互依存的对称性
    - 世界经济中的领导者与制度
    - 现实主义与复合式相互依存

    - 石油政治
        - 作为权力资源的石油
- 第八章 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
    - 权力和信息革命:从书写的起源到"阿拉伯之春"
        - 过去的教训
        - 新的世界政治?
        - 主权与控制
    - 跨国行为体
        - 非政府组织(NGOs)
        - 信息革命和复合式相互依存
        - 跨国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 结论
- 第九章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 有关未来世界的各种构想
        - 历史的终结或者文明的冲突?
        - 技术和权力分散
        -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 安全所面临的跨国挑战
    - 新的世界秩序?
        - 未来的权力格局
        - 旧观念的牢笼
        - 一种混合型的世界秩序的演变
    - 对未来的思考
- 术语解释
- 第九版译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序

前 言

这个版本新增加的内容

本书的特色

致 谢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永久的冲突与合作逻辑吗?

什么是国际政治?

伯罗奔尼撒战争

伦理问题和国际政治

第二章 解释冲突与合作的工具与技巧

基本概念

国家、民族、民族国家

国际行为体、权力以及权威

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

体系稳定与危机稳定

"国家利益"

分析层次

个人层次

国家层次

体系层次

范式与理论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建构主义

反事实推理与"虚拟历史"

合理性

相近性

理论性

真实性

第三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权力分布的均势

作为政策的均势

作为理论的均势

作为历史上多极体系的均势

19世纪的均势体系

结构

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三个分析层次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什么样的

战争?

选择的漏斗

再谈历史教训

第四章 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集体安全制度的兴与衰

国际联盟

美国与国际联盟

早期的联盟

国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联盟在中国东北的失败

埃塞俄比亚纷争

希特勒的战争?

希特勒的战略

个人的作用

体系和国内原因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太平洋战争
绥靖与两种类型的战争

第五章 冷战

威慑和遏制
解释冷战

三个路径

罗斯福的政策

斯大林的政策

冲突的阶段

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分析的层次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遏制行动:越南战争

动机、手段和结果

美国卷入越南大事记(1954—1975)

冷战的其他方面

冷战的

结束

核武器的作用:物理学和政治学

恐怖的平衡

核威慑的问题

古巴导弹危机

道义问题

第六章 冷战后的合作、冲突与热点

管理冲突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可预见性与合法性

联合国：集体安全与维持和平行动

国内冲突

干涉

与主权

干涉概念的界定

对干涉行为做出判断

不干涉规则的四个例外

自决的问题

种族

灭绝与"保护的责任"

当今热点

中东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1991年和2003年的波斯湾地区冲突

伊朗成为

核国家?
印度与巴基斯坦
南中国海
台湾海峡
朝鲜
第七章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全球化的各个方面
21世纪全球化有什么新内容?

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

权力与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的概念

相互依存的根源

相互依存的收益

相互依存的

成本

相互依存的对称性

世界经济中的领导者与制度

现实主义与复合式相互依存

石油政治

作

为权力资源的石油

第八章 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

权力和信息革命:从书写的起源到"阿拉伯之春"

过去的教训

新的世界政治?

主权与控制

跨国行为体

非政府组织(NGOs)

信息革命和复合式相互依存
跨国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结论
第九章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有关未来世界的各种构想
历史的终结或者文明的冲

突?

技术和权力分散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安全所面临的跨国挑战

新的世界秩序?

未来的权力格

局

旧观念的牢笼

一种混合型的世界秩序的演变

对未来的思考

术语解释

第九版译后记